

團結起來行動 遏止裁員減薪



2008 年立法會選舉評議

《人權宣言》發表六十周年看中國人權

毒奶害人 禍根何在？

關於中國「市場改革」的分析

悼念陳華與趙青音同志

經濟與生態危機特輯

拉丁美洲專頁

團結起來行動 遏止裁員減薪

振言

世界經濟衰退日益嚴重,中國和香港都不能避免蒙受影響,香港更首當其衝,最受打擊的是普羅大眾、工資勞動者,大企業資本家急不及待地對其僱員開刀,普遍裁員減薪,另方面又加價加費,把經濟損失完全推給市民負擔。

先從裁員來看。香港匯豐銀行雖為龍頭銀行,年年賺大錢,去年也是,但卻帶頭裁員 550 人,而且表示不排除再裁員;花旗裁 450 人,渣打裁 200 人,中信嘉華計劃裁 250 人,佔員工 17%;中銀香港分行也將裁 500 人。

這些銀行大企業,只是要利用香港營商有利環境,利潤豐厚,卻不肯負起社會責任,而只唯利是圖。它們在需要僱員相助時,總是要後者「同舟共濟,共度時艱」,但實際上卻只是損人

利己。

在傳媒方面,無線電視收視率高,過去幾年盈利可觀,今年上半年已賺 5 億元,但仍要裁 212 名員工;亞洲電視至今已裁了大量人員,其總裁王維基更自稱是減薪專家;南華早報集團今年有盈利,但仍裁 30 名,明年起且要減薪至 10%。

職工盟在 12 月分別以街頭及電話訪問的形式進行調查,訪問 348 名來自各行各業的打工仔,發現當中有 61%受訪者表示,即使今年上半年經濟環境好,仍然被凍薪或減薪;即使加薪,加幅並追不上今年通脹,其中 21.2%受訪者加薪少於 3%,不滿意薪酬調整的幅度。更有半數受訪者擔心會被裁走,或擔心僱主會單方面削減員工的福利。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 35 卷第 2/3 期 (總第 225 期)

2008 年 12 月 31 日出版

出版/編輯/承印:《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
通訊處:香港郵政總局信箱 10144 號

Address: GPO Box 10144, Hong Kong.

Email: octoberreview@gmail.com

Website: <http://www.october-review.org>

[本刊一切具名文章,不一定代表編輯部立場]

歡迎郵購

香港郵政總局信箱 10144 號

托洛茨基及其思想研究(第一卷)	劉家良等著	30 元
托洛茨基及其思想研究(第二卷)	曼德爾等著	30 元
彭述之選集(第一卷)	彭述之著	30 元
彭述之選集(第二卷)	彭述之著	45 元
彭述之選集(第三卷)	彭述之著	35 元
中國第二次革命的前因後果		
——評張國燾的《我的回憶》	彭述之著	6 元
毛澤東思想論稿	雙山著	30 元
我的回憶	陳碧蘭著	30 元
記尹寬	鄭超麟著	40 元
馬克思主義與第四國際	曼德爾著	30 元
第四國際文獻(第一卷)	兆立譯	40 元
第四國際文獻(第二卷)	兆立譯	40 元
第四國際文獻(第三卷)	兆立譯	40 元

最新失業率錄得自 03 年 3 月 SARS 以來最大升幅。統計處公佈,今年 9 至 11 月季度失業率升至 3.8%,較上次調查急升 0.3 個百分點,失業人數逾 13.6 萬,以零售、建造及進出口貿易等行業為重災區。學者及人力資源顧問均表示,農曆年過後失業情況將最嚴峻,零售及餐飲等內部消費行業在市民不願消費下,前景不樂觀,來年失業率或將升至 6%,升勢料至明年下半年才有望喘定。(12 月 19 日《文匯報》)

一方面是普遍裁員減薪,另方面各大企業卻逆市加價加費,加重市民負擔。在港人尤其是弱勢社群遭受經濟日益困難的時刻,港鐵首先取消長者優惠,帶動加價風。4 間巴士公司也向長者及其家庭成員開刀,落井下石,變相加價,宣佈取消長者假日乘車優惠,立即惹起各界不滿;事隔一周,4 巴改變初衷,決定延長有關優惠 1 年至 2010 年 1 月底,長者可繼續於周日及公眾假期,用八達通以半價或最多 2 元的優惠乘搭巴士。港鐵推出的長者假日乘車優惠期亦於上月屆滿,但港鐵會否仿效巴士公司延長優惠,發言人沒作回應。

一些壟斷性大企業也要加價,例如中華電力公司在 07 年賺逾一百億元,09 年仍以「調整燃料附加費」藉口,實行增加電費。大欖隧道更加價 15%。

領匯這個大業主,自從私有化之後,也在此時大大增加其小租戶的租金,在簽訂新租約時大幅加租,造成商戶不得不加價,加重附近消費者的負擔。部份街市商戶被迫罷市以表不滿,反對大幅加租。

而即使還未遭到失業打擊的市民,面對待遇減少,通貨日益膨脹,物價日高的時候,本港在職貧窮問題備受關注,勞工及福利局根據統計處的資料指出,目前全港有 265,500 個非綜援家庭,全家總收入仍低於相同家庭成員數目的綜援家庭;另方面,全港有 213,316 個完全沒有其他收入、單靠綜援維生的綜援家庭。

上述的發展加劇社會的分化。根據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最新調查顯示,有 78.9%受訪的香港市民認為,香港目前社會矛盾「嚴重或非常嚴重」,其中更有 77.9%認為金融海嘯會加劇香港社會矛盾。同時,調查也發現,有 73.9%市民更認為,應付金融海嘯衝擊應「依靠自己多些」,只有 12.2%表示應該「依靠政府多些」。(12 月 5 日《文匯報》載)

而依靠自己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團結起來爭取和維護自己的權益。在 07、08 年,已經爆發了許多的罷工、靜坐、遊行示威、抗議、請願等行動,其中大都獲得了成果,例如紫鐵工人的鬥爭。不久前的機場地勤人員,因資方要取消「工作表現獎」,罷工 3 小時,導致國際機場半癱瘓 6 小時,展示了工人團結鬥爭的威力,迫使資方作出部份讓步,員工以後還會發動「野貓式罷工」,以爭取應有權益。而港府提出新領生果金須經入息審查,在全城同聲反對下終於被迫取消。

今後,仍需儘量經過集體談判,反對資方裁員減薪,加強職工之間的團結,發揮集體的力量,去爭取得最好的成果,防止資方的分化和個別擊破。

港府救市不救人,明年動用佔財政儲備四分之一,即合共一千億元擴大中小企特別信貸計劃,它更應對低下階層施以援手,盡快推出各項援助措施,包括失業援助金、醫療補助金,增加基層人士就業機會等;同時減免徵差餉和稅務負擔;對於失業人士,提供免息貸款,等等。

當局須加速最低工資制的立法,防止無良僱主任意減低工資;以後也須隨著生活指數上升而提高最低工資的金額。

當局所宣佈的十大基建應迅速上馬,以吸納勞工,減少失業。

20/12/2008

2008 立法會選舉評議

軍行

特區第四屆立法會的選舉結果,在 45.2% 的低投票率下,原估算將受重挫的泛民主派陣營,出人意料地獲得 23 個議席;相反,在建制派中,上屆議會第一大黨自由黨在地區直選全軍盡墨,黨主席田北俊及副主席周梁淑怡更因嚴重流失選票而被迫提早結束議會生涯。民建聯則達保 10 席的目標(撇除兩名以工聯會身分參選人士),成為來屆立法會第一大黨。

民建聯得到北京當局和資本家以至香港許多親中社團等的支持,一向財雄勢大,有充足財力、物力、人力發展地區等方面工作,平日以舉辦各項活動,例如旅行、宴會、醫療福利,以及協助在內地的港人等,博取好感及支持,因而定下成為執政黨的目標。

自由黨的慘敗,反映出它再也得不到很多大企業、中產人士的支持,中聯辦也可能因它在 03 年 23 條立法的倒戈而加以抵制。這個一向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保皇建制派,竟落得如此下場,被廣大選民所唾棄!在選後,它又因繼任人選意見紛歧,幾名高層退黨,再受一重分裂打擊,終於變成了立法會內的小黨。雖然如此,建制派仍合共得到 37 席,但沒有 3 分之 2 的多數。

另一邊廂,泛民主派則從選前擔心連 21 席也難保有,得不到超過 20 席的優勢以否決不合理議案,在選前幾乎所有民意調查和專家、輿論都不看好的情勢下,結果卻在地區直選中爭得 19 席,功能組別 4 席,戰績喜出望外!

泛民中的社會民主連線可算是異軍突起,除了原有的長毛梁國雄和陳偉業在直

選中連任外,新參選的黃毓民,更以僅次於民建聯的高票當選。梁國雄在選舉日以前的支持度,幾乎所有民意調查都是在其選區中排名末席(第 7 席)的,但選舉結果卻以次高票當選,也是僅次於民建聯得票。這使得選前的預測完全失準,評論家大跌眼鏡。

大量選民之支持梁國雄們,顯示他們或多或少地贊同後者的反建制、為市民爭權益的言行和主張。尤其是梁國雄,平日敢於發言批評不合理事物,勇於街頭鬥爭,不畏權貴,衝出法制,多次被判罰甚至坐牢亦不退縮。他堅持泛民之間的友好團結,批評、反對、鬥爭的對象只是當權者及支持它的建制派。他經常穿著切·格瓦拉圖像的衣服,表示他以崇拜革命家來主張革命而非改良主義。同時,許多投長毛票的選民,也是由於對香港政府和現狀的非常不滿,而長毛則是言行一致的反建制的街頭戰士。以下的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在選後的調查也顯示:除特首曾蔭權繼續穩佔「市民最熟悉政治人物」的首位外,其次便是長毛梁國雄。因「掟蕉」而引起社會爭論的社民聯主席黃毓民則大幅跳升 41 位至第 4 位。計劃主任鍾庭耀稱,政治人物在市民心目中的起跌,顯示了政治生態的改變。(12 月 5 日《文匯報》)

新一屆的立法會將有部份新人事、新作風,會帶來新的議會鬥爭。泛民主派須要聯合一致堅拒通過不合理的提案,繼續積極爭取 2012 雙普選和市民權益,才不致辜負廣大市民的冀望!

20/12/2008

梁國雄：我的主張

2008 參選政綱

反通脹、反貧窮，保障勞工基層

1. 訂立切合基層市民生活的消費物價指數，工資、綜援及生果金根據物價指數調整。
2. 增建公屋，復建居屋，恢復公營房屋租金不超過公屋居民收入中位數百分之十的規定。
3. 一切有關民生的公共事業、包括公共交通、電、煤等、及壟斷性事業、包括食物、燃料等由民選機構監管，保障合理價格及服務質素。
4. 立法訂立最低工資、標準工時、設立失業援助金。
5. 恢復被廢除的集體談判權；立法保障罷工權及訂立懲罰「不公平解僱」法例。
6. 設立全民養老金，保障長者、家庭主婦、低收入及失業人士均可安享晚年。
7. 立即改善現時資源短缺、供不應求的公營醫療服務；反對推行「強醫金」及將公營醫療私營化的措施。
8. 綜援金額恢復 2003 年水平及恢復廢除的特別津貼。
9. 恢復居港一年可申請綜援的資格規限，讓貧窮的新移民家庭得到保障。放寬與家人同住的長者可以獨立申請綜援。
10. 開拓基層的就業機會，擴展社會福利服務和公共建設，如學校、醫院、托兒所及道路等。
11. 反對削減教育經費，實施十五年免費教育，增撥資源於學前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落實小班教育。

反財團壟斷

1. 開徵累進利得稅及資產增值稅、增加印花稅。
2. 設立中央銀行，立法限制金融、貨幣，股票炒賣。
3. 停止變賣涉及民生的公用事業資產，反對公營部門私有及私營化；政府應回購及直接管理重大的公用事業。
4. 政府倡議「企業社會責任制」，首先在政府及公共事業中落實推行，承認工會、用家的諮詢權和談判權，保障員工福利、合理價格和服務質素。

民主與民權

1. 一年內舉行全民公決，決定何時舉行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
2. 爭取 2012 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雙普選。
3. 廢除各級議會的委任及間選制度。
4. 反對二十三條重新立法。
5. 捍衛言論自由，爭取政府開放大氣電波頻道，令不同階層，族羣，性別，性取向的市民羣體可以暢所欲言。
6. 廢除基本法及現行法例內壓制市民權利的條文，如公安法、警察條例等。
7. 政府應致力消除及立法禁止對不同性別、性傾向、種族、殘障、年齡等的歧視。政府政策及措施均需通過相關的審查機制，確保不同社群的權利和需要。
8. 重組城規會及市建局，吸納更多民間代表，反映基層需要，以增加公共空間，保育文物，禁止屏風樓。
9. 優惠環保事業，據「製造污染越多，負擔越重」的原則，以累進模式向污染企業徵稅，並禁止公害增強擴散。

中國

1. 開放黨禁，結束一黨專政，實現黨派自由。
2. 開放言禁，反對以言入罪，立即實現言論、集會、結社、出版、示威、遊行、罷工的權利。
3. 反對政府操控傳播媒介，實現新聞自由，以監督政府、揭發貪腐。
4. 全國人大由各級人大普選產生之代表組成，並享有全權；代表可由選民罷免及撤換。
5. 促進建立公民社會，人民可成立獨立工會、農會、學生、教師、市民及不同社群和族群的自治團體，不受政府的監控和打壓。
6. 徹查六四屠殺，追究鎮壓責任，釋放政治犯。

平民議員向您交代

自我上任以來，一直秉持原則，身體力行去貫徹四年前的競選承諾，犖犖著者，僅列如下：

1. 不依附權貴，出席俾面派對。去，也只是為民喉舌，大聲抗議；不去，亦於場外吶喊，鞭撻時弊；
2. 信守承諾，堅持議員便服議政之權利；每月捐出四萬工資，作為支援社會抗爭基金；
3. 上任宣誓，高呼口號為中港民主鼓與呼，替政治囚犯請命，開創議事堂先河；
4. 不畏「千夫所指」，毅然反對為禍公屋的「領匯」上市。竟遭警方拘捕；
5. 毋懼警權，堵塞東隧，抗議財團加價，被判入獄，幸上訴得直；
6. 興訟司法覆核「電訊條例」，阻止特首濫權縱容警方任意竊聽，侵犯公民私隱，獲勝訴，逼使當局立法保障私隱；
7. 提交「全民投票法案」，讓民眾有合法機制決定重大事情；
8. 公民抗命，參與「民間電台」廣播，以身試法，挑戰特首獨斷獨行的發牌苛例；
9. 一再打官司，以「司法覆核」逼使當局依法訂立最低工資，屢敗屢戰，遭當局追討訟費160萬元；
10. 到高官孫明揚官邸之外示威，反對當局廢除公屋租金封頂法例，被控以「非法集結」罪，將於9月12日宣判；
11. 在去年底，我於禮賓府門外，抗議人大釋法否決2012雙普選，竟被警方誣告「襲警」；
12. 積極參與勞工運動，協助工友追討無良僱主欠薪，去年有幸與紮鐵工人同甘共苦，罷工逾月，苦戰得勝。



自然，「位卑未敢忘憂國」，我是中國人民之一員，深明香港前途繫於國運，普選來臨與否，亦與祖國民主大業相關。而且，內地財團化公為私，傾注資本來港與本地財閥分肥，憑權大氣粗的京官庇蔭，小圈選舉的特首自然唯命是從，任由勞苦大眾受多邊盤剝，此所以，我一如既往，不單為本港普選而盡一己之力，更為結束中共一黨專政，實現民主公義鼓與呼！上任宣誓時高呼口號，創議事堂先河，受中共政治逼迫，意料中事，四川採訪災情臨時被逐出立法會代表團，不過晚近之例。

《中大學生報》獲平反 言論發聲自由齊爭取

軍行

《中大學生報》「情色版」及明報副刊《星期日生活》被淫褻物品審裁處暫評為第二類不雅物品的風波,在 10 月 21 日獲高院平反。高院裁定淫審處暫定評級時,未有按照《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就刊物中的文章作個別評估,故下令推翻不雅評級。

高等法院的裁決清楚暴露淫審制度的諸多弊端,反映淫審處評級草率,也反映審裁員評審時只看表面,或是更多受個人好惡所左右。當局至少須從中汲取教訓,透過正在進行的檢討,以切實可行的措施改革淫審制度,確保言論自由和市民權益不受侵損,而得到應有的保障。

《中大學生報》前任總編輯曾昭偉指出,判決反映淫審處評級時粗疏懶惰,欠缺清晰紀錄,透明度欠奉,評級令人難以信服。他更批評中大校方急於懲罰學生,曾向編委會多次發警告信,又不肯承擔責任,故要求中大向曾為此收到警告信的學生道歉。

《學生報》現屆編委會表示歡迎判決,但認為聆訊無法認真討論淫褻不雅的評審標準,對《學生報》及其他媒體仍是計時炸彈。

《中大學生報》這次的勝訴,是民間爭取言論出版自由鬥爭的勝利,是對箝制民主自由的官僚的一次打擊,將激勵其他爭取民主權利的人士。

本刊當時(07 年 5 月)曾以《保衛香港的言論出版新聞等自由!》為題,撰文指摘淫審處及其保守的舊禮教衛道士成員的官僚霸道打壓,而支持《中大學生報》之「敢於闖開思想禁區。」(見本刊總第 222 期,該文同時支持香港電台員工保衛新聞編採獨立的傳統權利。)現在證明這種態度是正確的!呼籲大家能乘勝前進,保衛

既得的成果,進一步爭取撤銷淫審處及其現行的評審委員制度,同時,擴闊言論、出版、新聞、發聲等一切民主自由權利。

中大學生富有敢於批判和鬥爭的傳統,對參加學生運動、社會運動站在最前線,不遺餘力。他們時常在校園內的烽火臺舉行集會,發表意見,互相辯論。這個平臺,見證了中大學運的歷史,是學運的象徵。校方最近在未徵得師生同意下,以擴建圖書館理由,要拆毀烽火臺。這又一次激起學生們的反對,誓要保衛烽火臺;學生會發出反對拆遷烽火臺的聲明,一天內集得逾千師生校友及社會人士的簽署,3 天內更有逾 3600 人加入「反對拆毀中大烽火臺」網上 facebook 組。這迫使中大副校長程伯中在公開信中說:「烽火臺工程完成後原址重建。」如果將來校方違諾,又勢將掀起師生們的另一次鬥爭。

另一宗爭取開放大氣電波,使民間電台合法地廣播的鬥爭,在裁判官游德康今年 1 月以政府廣播發牌制度違反《基本法》及《人權法》為由,撤銷被控非法廣播的民間電台 6 被告罪名後,政府不服上訴,12 月 12 日獲上訴庭一致裁定上訴得直,指裁判官根本無權處理發牌制度是否違憲,因此 6 被告須於下月 15 日返回東區裁判法院繼續面對刑事審訊。電台召集人曾健成「阿牛」得悉敗訴後表示,會上訴至終審法院,並會繼續作出公民抗命,開咪廣播。

民間電台在長達 3 年多的申辦開咪期間,堅持公民抗命,繼續廣播。被控的該電台的被告海昇科技有限公司、曾健成、陳妙德、潘達強、楊匡和梁國雄被上訴庭裁定敗訴,這宗無牌廣播案,連同其餘十多名被告交由裁判官游德康繼續審理,假如各人上訴至終審法院後仍

然敗訴,他們將面對最高入獄 5 年和罰款 10 萬元的刑罰。

曾於 07 年 11 月以嘉賓身分開咪而被檢控、高呼「坐監就坐監啦」的 77 歲支聯會主席司徒華昨表示,絕對支持戰友上訴至終審法院,並繼續公民抗命「開咪」。這種爲了行使公民應有的言論自由權利而抗命,以便使人民多享知情權的舉動,很值得市民全力支持,參與鬥爭的。

當局面對著這種合理訴求,不但不予接受,反而大力加以打壓封殺,盡量利用法律、法院這些統治人民的工具,同時又由電訊管理局派人前去檢走民間電台的廣播器材,企圖使他們不能開咪廣播。但這一切只能激起更大的民憤,正如古語說的:「官逼民反,民不能不反」!動力學的規律是:壓力越大,反抗力也越大!這是屢試屢驗的。

2008 年 12 月 25 日

§ § § §

簡評澳門第 23 條立法

微波

澳門行政長官何厚鏵宣稱,要在他明年底卸任之前,一定通過澳門基本法第 23 條的立法,於是在最近推出澳門《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並限在一個多月短期內完成公眾「諮詢」,便要由澳門立法會蓋章通過施行。這反映他祇是從個人的私利出發,而不是先從澳門居民的權益著想。這項立法必將直接損害澳人的民主自由人權,他們對於這樣的立法理應認真審視,嚴加指出其缺點錯誤而予以反對。這與一海相隔,同爲特別行政區而息息相關、休戚與共的港人,也勢必產生唇齒相依,唇亡齒寒的影響。香港的 23 條立法如受澳門立法壓力而加速進行,對港人的民主自由權利將有重大壞影響。因此,港人對於澳門的 23 條立法,應予以密切關注,提高警覺,及時表示嚴正態度。

澳門的草案定出叛國、分裂國家、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煽動叛亂、竊取國家機密、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及在澳門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爲的「7 宗罪」,刑罰最高

爲判監 25 年。

其中的第 3 宗罪比香港 03 年的 23 條還要嚴苛,它規定:以暴力或嚴重非法手段,試圖推翻中央人民政府,或強迫中央政府作出或不作出某一行爲,判刑 15 至 25 年。

第 5 宗罪也比香港 03 年的 23 條更爲嚴苛。它規定:竊取、刺探或收買國家機密,危及國家獨立統一或內部、對外安全利益;接受指示、金錢以竊取國家機密,判刑:前者 2 至 8 年監禁,後者 3 至 10 年監禁,有公務身分處罰再重一些。

這個草案的許多文字含糊不清,充滿陷阱,澳人容易跌入,或踏上地雷陣,招致牢獄之災,表明是一條惡法。對於上引的條文,有澳門傳媒學者及工會指出,草案有含糊之處,擔心立法後令新聞工作者或工會成員觸犯法例。

本身是資深傳媒人的澳門大學傳播學系助理教授譚志強表示,澳門立法諮詢文件中提出,有關禁止竊取國家機密的訴訟一般不會公

開審訊,他對此感到憂慮,因為當時程翔、席揚亦是以同樣罪名入罪。他又指出,條文未清楚釐定國家機密,新聞從業員得到資料後,很難分析是否屬於國家機密。

職工聯盟理事長何興國認為,最重要是條文清晰,特別是界定什麼是外國勢力。他指出,澳門與世界接軌,他們亦有很多機會與外國工會聯繫,若這些外國工會也被列為外國政治勢力,對澳門工會發展存在很大隱憂。

澳門立法會議員區錦新表示,澳門政府想快刀斬亂麻,而澳門社會亦對立法沒什麼阻力。他個人則較擔心草案存在灰色地帶,例如煽動叛亂一罪,何謂「公開及直接煽動」,在執法上可能被濫用。國家機密由中央政府的證明書作定義,令澳門新聞自由存在隱憂。他又表示,政治組織的定義也不清楚,不知道一些諸如國際特赦組織或宗教組織等,會否按執法需要被視為政治組織。

香港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沃啓認為,澳門 23 條草案的條文,條例內容十分廣泛,擔心現代民主社會下可容許的行為都被規範,「隨時會中招」;他又指出,澳門政府「若要上綱,任何事都可以」。他認為,香港市民要警醒,現時已「水浸眼眉」,擔心條例會成先例,令香港不得不立法。(引自 10 月 23 日《明報》)

上引的批評意見是很對的,結論應當是反對這樣的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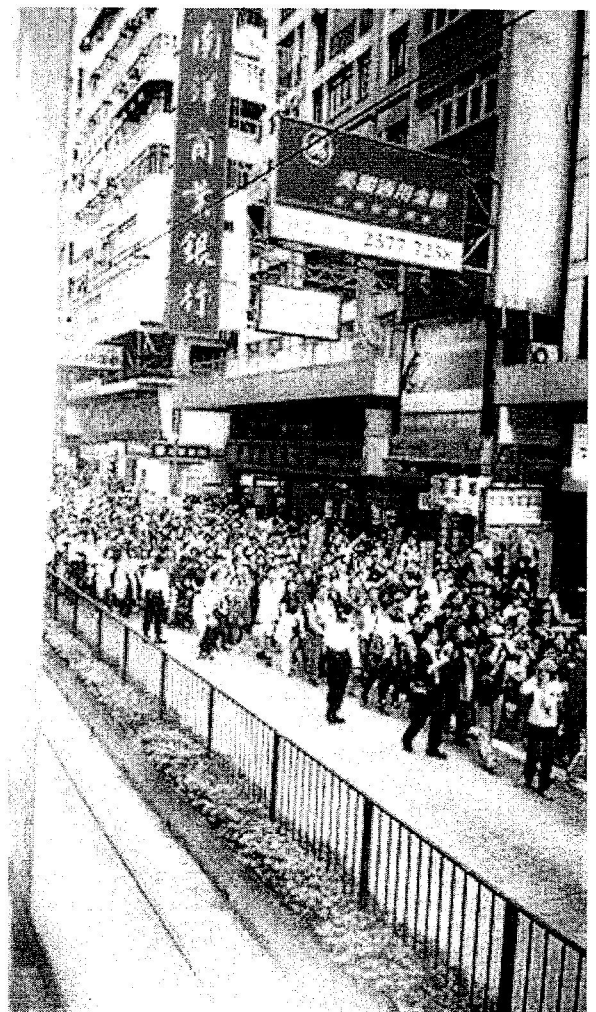
在公佈這條草案之前,澳門政府先用銀彈政策,給澳門居民每人 5 千澳元,又有其他的福利,以此沖淡一般澳人對草案的反對聲音。它所定的諮詢期短促,據當地有調查顯示,有近 6 成居民不清楚立法內容。但澳門當局卻玩弄假諮詢把戲,等如黑箱作業,諮詢期只有一個多月,說在收到的個人意見中,有 86.76% 的人贊成立法,反對的佔 2.59%,未表達傾向的有 10.65%。它連澳門大學學生舉辦 23 條論壇也迫使大學拒絕借出場地,加以封殺,並阻止香港民間人權陣線成員和其後的 9 名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

進入澳門,出席參加討論和遊行。

這些都顯示澳門政府要以高壓手段,強行制定這樣的 23 條惡法。

在澳門 09 年成功通過這條草案之後,勢將給香港帶來巨大壓力,使港府有藉口推出新的 23 條。縱使保安局長李少光表示,香港暫時無意就 23 條立法,特首的《施政報告》亦列明了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這個優先次序;但他重申,就 23 條立法是香港和澳門的憲制責任。他這番話的意思就是:在經濟衰退過去,經濟好轉而有所發展之時,便會輪到香港提出新的 23 條立法,以完成憲制的責任了!港人對此決不能掉以輕心!

2008 年 12 月 26 日



《人權宣言》發表六十周年看中國人權

張開

《08 憲章》努力爭取人權

2008 年是《世界人權宣言》發表 60 週年,中國簽署了《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第 10 週年,但中國的人權狀況至今卻很少改善。在人權公約通過 60 年的前夕,拘捕了異議人士劉曉波,和北京憲政學者張祖樺(後者不久獲釋),因為他們發起民間簽訂《08 憲章》。當局這個行動,直接違反了《人權宣言》的第 9 條:「任何人不容加以無理逮捕、拘禁或放逐。」

《08 憲章》提出的主張有 19 項,包括修改憲法,刪除現有不符主權在民原則的條文;司法獨立,應超越黨派,不受干預;軍隊國家化,軍人應效忠於憲法和國家;切實保障人權,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傳訊、審問、處罰;廢除勞動教養制度;全面推行民主選舉制度,行政首長的直接選舉應制度化;城鄉平等,廢除現行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結社自由,開放黨禁;集會、遊行、示威和表達自由;保障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立法民主,立法機構由直選產生;等等。

這份《08 憲章》簽署人包括茅于軾(北京經濟學家)、沙葉新(上海劇作家)、流沙河(四川詩人)、鮑彤(趙紫陽前秘書)、丁子霖(六四死難者家屬)、劉曉波(北京作家)、張祖樺(北京憲政學者)、徐友漁(北京哲學家)、以及有「中國律師良心」之稱的張思之和新華社前副社長李普、前中國法學會副秘書長于浩成、原北京大學副教授焦國標、前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任杜光和記者李大同、高瑜等,至今已有 2 千多名各界人士參與聯署。聯署者中很多是著名學者,經濟法律專家,也有許多的不同政見人士。他們代表著中國的良心和脊梁,背負著中國的人

權理想,現在提出的主張,正是中共專制統治下人民長期以來要爭取實現的。他們的勇氣和行動令人十分敬佩。

同一時候,北京又有逾百名來自全國各地的上訪、維權人士,罕有地聚集在外交部門外靜坐抗議,要求當局關注人權問題。請願人士包括年邁的老婦,他們手持請願信,要求政府正視非法扣留、強徵土地、地方濫權等問題,並作出補償。也有人手持在勞教所中被打的親屬照片。對中國當局打壓人權,更是不滿。北京公安一度劃出示威區,但見示威者人數越來越多,最終用巴士將他們載走。

中國的人權實況

國家主席胡錦濤近幾年來宣稱要堅持以民為本,順民意,謀民利,急人民之所急,現時也湊熱鬧似的致信中國人權研究會指稱:「特別是改革開放 30 年來,黨和政府把尊重和保障人權作為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莊嚴載入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並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促進人權事業發展,使廣大人民群眾權益得到切實保障,譜寫了中國人權事業發展的新篇章。」(引自 08 年 12 月 12 日《文匯報》載中新社電)

可是,中國的實況卻與他這些官腔濫調大相違反。《08 憲章》所提的 19 項主張,正說明了中國今天的人權沒有得到保障,必須爭取。事實也非常清楚,即使是發起和簽署者之一的劉曉波,卻在人權日前兩天被拘禁;作為黨政軍最高領導人的他,據傳就是下令拘捕劉曉波的(見 12 月 12 日《蘋果日報》報道)。而各地方當局也分別傳訊了許多簽署《08 憲章》的人士。劉曉波只因要求民主人

權,持有不同政見,已遭到第三次無理拘禁,雖然得到逾 1200 學術界人士通過電郵聯署《告全國人民書》,要求釋放劉曉波,並且指《08 憲章》是中國憲政史光輝的一頁,必將載於史冊,但截至本文完稿時止,已有多日仍在拘禁中。這是最新的一宗,証明中國人民的人權之橫遭踐踏,毫無保障。

在此前幾日,一些傳媒又傳出言論出版的自由人權壞消息:中國媒體正進入嚴冬,中共正展開新一輪對媒體的整肅行動。據報,多家大膽敢言的內地媒體及一批活躍的媒體從業員,被列入中宣部黑名單,他們將面臨整頓處理。而首當其衝的是廣州南方報業集團轄下多份報章。該報業集團副總編輯江藝平再度遭貶職,不再分管大膽敢言的《南方都市報》。

據披露,由於明年(2009 年)是建國 60 周年,89 民運 20 週年,加上全球經濟危機,中國

也可能在不同程度上爆發危機,加劇勞動人民的鬥爭(近來已不斷爆發工人追討欠薪的罷工示威,的士司機罷駛,許多省的教師罷教等等),中國經濟和政治社會發展都會出現大問題,中共認為必須加強防範,措施之一是中宣部決定加強對媒體監控,並列出一份媒體黑名單,其中包括廣州《南方都市報》、《南都週刊》、《南風窗》雜誌,北京的《新京報》、《炎黃春秋》雜誌及《中國新聞週刊》等。黑名單還包括 15 名內地活躍的媒體從業者,其中包括《南方週刊》主編江藝平,她已遭到三度打壓和貶職。《冰點》週刊前主編李大同表示,當局對媒體的控制和整肅從來沒斷過。(引自 12 月 6 日《蘋果日報》載博訊新聞網和自由亞洲電台)。

以上的新鮮事實充份表明,中共對人民言論、出版等自由人權的壓制,與官方所說的「得到切實保障」,恰成強烈對比。



人權事業將與科技同時並進

但是,中國人民爭取一切民主自由人權的努力也從來沒斷過,他們前仆後繼,再接再厲,奮勇前進,壓力越大,抵抗力也越大,而且,他們的努力也已爭得許多重大成果,勇敢地發表言論的報刊、網站越來越多,當局壓不勝壓。

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發展,日益帶來社會不公和兩極分化,貧富懸殊,民間爭取權益的群體性鬥爭頻密而激烈:這些鬥爭又激勵著爭取人權的力量和行動,並使人權的內容得到充實,人民爭得部份享有。以媒體為例,李大同指出,30年來,記者和媒體不懈的爭取和互聯網的普及,使記者能夠報道的東西在增多,報道的空間「一寸一寸地擴大」,「中國媒體在報道的深度和廣度上有了里程碑式進展。」

90年代中期以來,城市報在中國新聞界興起,打破了原有黨報「一統天下」壟斷新

聞的格局。「打破的基礎是互聯網。原來各家地方報紙登了新聞後別人根本不知道,但現在只要它有足夠的新聞價值,第二天就會成為網站頭條新聞,被全民知曉,而且很多時候不只中國媒體,國際媒體都在跟進,這是非常了不起的變化。」(12月17日《明報》報道)

據報道,中國的網民已接近三億,佔全人口五份之一有多。今後科技的日益進步,將替知情權等各方面民主人權帶來更多更大的促進影響,動搖官僚獨裁的穩定性,幫助人民最後把它廢除。

為了爭取和維護人權,現時的重要任務之一,是要爭取無條件釋放劉曉波、維權人士胡佳和所有持不同政見者(包括維權律師)。

2008年12月20日

毒奶害人 禍根何在？

張開

中國的食物不安全問題一直層出不窮,特別是推行市場經濟以後,假冒差劣商品不斷被發現。蘇丹紅被濫用,出口日本的毒水餃、毒米被指責;04年的「大頭娃娃」事件,導致13嬰孩死亡,飲用它的無數嬰孩受害,便是因為飲用了滲水的劣質奶粉,蛋白質成份嚴重不足,營養不良。其後走到另一極端,奶粉製造商加入工業原料三聚氰胺,製造蛋白質豐富的假象,通過官方的檢查。

08年9月大曝光的三鹿牌毒奶粉事件,是近來震驚中外的新一宗。較多飲用三鹿牌和其

他牌子奶粉的嬰幼兒都有了腎結石。即使是衛生部的通報,截至08年11月27日,因食用有問題奶粉而導致泌尿系統出現異常的患兒,全國累計已有29萬多人,大多數有少量泥沙樣結石而接受門診治療,部份患兒因結石症需住院的有5.19萬人,各地衛生行政部門上報的回顧性調查死亡病例共11例。(12月2日《蘋果日報》載新華網報道)而即使倖能生存的,後遺症也很嚴重,腎衰竭固然會危及生命,腎功能損害了也影響發育,病兒將承受一生的痛苦,其家長要負擔龐大的醫治費用。

據劉曉波著文指出:早在 08 年 8 月 6 日已有消費者向國家質檢總局投訴嬰兒飲三鹿奶粉後患腎結石。7 月 16 日甘肅省衛生廳報告三鹿奶粉引致嬰兒生病幾十例。同月 22 日三鹿的外資方新西蘭恆天然公司發現奶粉有三聚氰胺。8 月 2 日恆天然公司要求收回問題產品。但中國官方不迅速予以處理,致使毒奶粉蔓延,禍害全國以至海外。

事實上,有毒奶粉已查出不祇三鹿一家,還有蒙牛、伊利、光明等 21 家企業乳製品;且有 22 個乳製品品牌都已查出含三聚氰胺。當然,有毒食品也不祇中國才有,其他國家(如美國等)食品也含有三聚氰胺;不過沒有中國的那樣嚴重和廣泛,其重要原因是中國有關官僚的特大權力與金錢相結合,官商勾結,為害特大。

此外,中國的飼料混有三聚氰胺,早在 5 年前已經發現。據內地南方網引述廣東省飼料業人士說,在動物飼料中加入三聚氰胺已是「公開秘密」,5 年前由水產養殖飼料開始,其後逐漸向畜禽養殖等行業蔓延。廣東省農業廳更坦白承認,自 2007 年 5 月起,即遠早於內地傳媒揭發毒奶粉前,農業廳已展開「毒飼料」的整治行動。(引自 11 月 1 日《明報》)但這種飼料一直都在銷售使用,由此引致現時輸出的雞蛋也有這種毒。

中國食品等的不安全問題久已存在,且越來越嚴重,基本原因來自兩方面:其一是,中國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生產陷於無計劃、無政府狀態,私營企業日益蓬勃,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企業主以追求最大利潤為目標。正是古語說的:唯利是圖,財迷心竅,利令智昏,不惜幹出泯沒良心的壞事,例如為了達標和高質素假象,加入有毒的大量工業原料成份。

其二是官僚們的貪污腐敗,手握無上權力卻又無能;人民無權過問以糾正錯誤,地方有關官員祇求個人得利,不顧百姓死活。被刑事拘留了的三鹿集團董事長田文華的女兒在博客揭露:「各家奶粉廠都在用同樣的配方做奶

粉。」「衛生廳、衛生部經常來人,吃吃喝喝,就是不幹活,來一次就相當於敲詐一次,從來不檢查。」(引自 9 月 29 日《蘋果日報》載孔捷生雜文)

國家的新聞檢查制度一度阻延了毒奶事件的報道和防治工作。全國近 30 萬計的毒奶受害者,截至本文執筆時仍然投訴無門,就算他們想通過正式的法律手段起訴有關奶粉公司,均遭各級法院拒絕立案審理。但國家各有關部門是完全有責任必須受理,以解決受害者家屬的索償事宜的。

關於質量監管部門的官僚主義,在毒奶事件中清楚表現了出來:三鹿集團此前得到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三鹿奶粉更得到「國家免檢產品」的優待,從而掩護了該集團的肆無忌憚,為非作歹。質檢總局局長李長江終於被迫辭職,但也不能完全改變這些部門的官僚主義積習,這不祇是某些官員的個人問題,除非是整個官僚政制被廣大人民起來徹底地改造成民主的政制,人民能夠真正當家作主!

2008 年 12 月 18 日



(特譯)

中國現況

哈特-蘭茲伯格·馬丁

對 1978 年後的中國市場化改革經驗的關注仍然很高，有一個明顯的原因：中國被廣泛地認為是當代最成功的發展中國家之一。伴隨著大規模的工業變革，中國經濟已創造了一個長時期增長的紀錄。更為有趣的是中國政府聲稱，這一成功顯示了“市場社會主義”的可行性和優越性。

有一些這樣的左派，他們熱切贊同中國的經驗，認為對仍然在經濟思想中占主導地位的新自由主義咒語，它是一種有效的反駁。因此，他們鼓勵其他國家學習中國的漸進的，國家控制的市場化進程，私有化進程以及對經濟活動管制的放鬆。還有一些人，數量不多但份量不輕，他們贊同中國政府的觀點，認為中國的確開創了一種新型的社會主義。

許多左派還認為，中國可能不久就能夠確立另一種國際經濟體系，從而給其他國家提供機會，讓他們減少對當前美國主導之體系的依賴，致力於自己獨立發展的戰略。[1]

不幸的是，如下所述，關於中國經驗的這一正面觀點是沒有道理的。首先，不管中國領導人怎麼說，中國並沒有開拓一種新形式的市場社會主義 --- 而是改革造成了資本主義的復辟。其結果是，中國內部運作機制顯然敵視任何反資本主義措施的設立。第二，改革產生了日益增長的剝削過程，一個以絕大多數中國勞動者無法接受的代價為少數人生產大量財富的過程。

最後，中國的經濟增長進程目前陷入結構性泥沼，並依賴更廣泛的區域和國際重組的運作過程，這個過程由跨國資本所控制。其結果是，中國不僅沒有能力確立另一種全球經濟體系，它的積累機制還在實際上幫助加強了現有國際力量的結構，助長了它們引起的全球經濟失衡和緊張局勢。

對中國經驗的性質和意義這種信念，風險是相當高的。例如，左派對中國改革經驗的支

持，有意或無意地鼓勵了這種錯誤信念，即社會主義可以通過市場的使用和更緊密的融入全球資本主義積累機制而達成。至少，這也會導致對社會主義以及對資本主義本質的認識混亂。

這不僅僅是一個理論問題：人們會發現在許多國家 --- 包括古巴，委內瑞拉，南非和巴西 --- 社會主義宣導者爭辯說，它們各自的政府應實施中國式市場改革政策。

越來越多的中國工人，開始挑戰中國的國家政策，不只是為了對他們所經歷到的剝削做出反應，而且還因為他們對社會主義本身重新產生了興趣。因此，重要的是，關於中國經驗，我們要作出一個準確瞭解，既對那些尋求在中國重啟社會主義的人提供支援，又確保其他國家的社會轉型的努力，不受到對市場危險和資本主義當務之急的錯誤理解的影響。

中國的結構轉型

1978 年，毛澤東去世後兩年，鄧小平領導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層，決定從根本上提高經濟對市場力量的依賴。領導層稱，這一步驟對克服該國經濟增長的問題是必要的，這些問題據稱是由於毛澤東的過於集中的國家計畫和生產系統造成的。

政治和經濟變革絕對是大多數中國人想要的。但是，鄧小平和他的追隨者，大大誇大了所存問題的嚴重性，更重要的是，忽視了民眾探索其他非市場化改革的呼聲。

一旦開始，市場改革進程很快就變得無法控制。[2] 每一個階段產生了新的緊張和矛盾，這些矛盾惟有通過進一步擴大市場力量才能解決（因為領導層反對面向工作者社區的措施）。市場改革的“滑坡”，因而導致市場機制最終壓倒計畫體制，私有制超過公有制，外國企業和市場壓倒國內企業和市場。

經濟交易現在完全由市場價格形成。按市場價格決定的零售份額從 1978 年的 3% 上漲到 2003 年的 96.1%。對於生產商的貨物，在同樣的時期，市場份額從零上升到 87.3%。[3]

私營部門不斷增長的工業主導地位也很清楚。1978 年，國有企業占中國的工業部門（指採礦業，公用事業，製造業）的全部產值。到 2003 年，私營部門的份額大於國有部門的份額：52.3% 比 41.9%。[4] 但是，即使這個減少的國家份額也已經誇大了國營生產的實際“經濟重要性”。

考慮到許多國有企業現在同私人利益聯合擁有 --- 通過合資企業或股權 ---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合組織）把國有企業列為直接或間接受控制的企業，取決於國家股份額是否大於已投入股本總數的 50%。2003 年，直接受控制的國有企業僅占 22.9% 的工業增加值 --- 不到總數的四分之一。

如果我們把焦點限在製造業上，國家部門的重要戰略性的下降變得更清楚。經合組織把中國的製造業分為兩組。第一組包括 5 個行業，它們繼續由國家生產主導：石油加工及煉焦，黑色金屬冶煉及加工，有色金屬冶煉及加工，煙草加工和運輸設備。

第二大組（占 75% 以上的製造業增加值）主要是民營企業。這個小組由 23 個不同的製造行業組成，包括食品加工，紡織，服裝，化學品，醫療和藥品，塑膠，普通機械，專用機械，電氣設備，電子和電信設備。就像經合組織解釋說的：

1998 年，私營部門只在這 23 個製造業中的 5 個產生了較高比例的增值...。到 2003 年，則在所有 23 個行業中都是如此。此外，其中一半，私營公司生產了四分之三以上的出口產品。總之，在這 23 產業中，私營部門雇用三分之二的勞動力，生產了這些產業的三分之二的增加值，占其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5]

國有企業仍然是重要的，中國國家仍然對經濟的關鍵部門實施控制，但這些領域的力量，現在主要限於金融和國有自然資源支持的活動。因此，在 2006 年，三個國有石油公司占了最大的 160 個“國有壟斷和控制”部門的收

入的一半以上。事實上，“2006 年，所有中國企業所實現的同比增加的利潤的八成以上歸因於... 金融集團的壟斷或者石油石化，電力，煤炭和金屬領域的企業壟斷。” [6]

外國資本也在中國經濟中擔任大為有力的作用。外國製造商在中國製造業的總銷售額的份額，從 1990 年的 2.3% 增長到 2000 年的 31.3%。[7] 也許更有說服力的是，2006 年政府報告的結論說，在該國的 28 個主要工業部門的 21 個中，外資擁有多數資產。[8]

這一事態發展的一個後果是，中國的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外資生產的出口產品。外國公司主導中國出口活動：其所占全國出口的份額從 1985 年的百分之二增長至 2005 年的 58%（以及 88% 的高科技產品出口。）[9]

此外，越來越多的出口產品由 100% 的外商獨資企業生產。一個典型的例子：1993-2003 期間，100% 外商獨資企業生產的電腦相關的出口產品，所占比例從 51% 增加至 75%。[10] 由於這些趨勢，出口所占的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已經從 1990 年的 16% 上升到 2006 年的 40% 以上。

總之，雖然國家計畫者和企業繼續在中國經濟中發揮重要作用，國家權力被用來塑造一個積累過程，該過程現在主要由私營（營利）公司主導，以外國跨國公司為首，其生產主要是針對其他國家（主要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

不管人們可能如何評價中國經濟的表現，很難想像，在國家或國際範圍上，該發展如何可能被視為奠定了替代資本主義的基礎。相反，它的結論應是，資本主義本身已經在中國復辟。

市場化改革的社會後果

許多左派對於中國是否是社會主義的爭論不再感興趣。相反，他們關心的是中國發展和轉型導致了“成功”的經濟發展。對於多數人，答案是明確的“是的。”這答案似乎主要是基於有限但重要的一套指標的考慮：外國投資，出口和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

但是，如果我們擴大我們的發展概念，讓它包括工人階級福祉的措施，則答案就不幸地改變了。現實情況是，中國的市場改革政策創造

了一個成長過程，支撐這個過程的是大多數中國人日益嚴峻的工作和生活條件。

也許，最令人吃驚的事實是，該國的快速增長沒有產生足夠的就業機會。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1990-2002 年期間，所有城市（常規）製造業的就業人數，實際上從 53.9 百萬下降到了 37.3 百萬。[11] 而且，在整個城市就業中有一個小額增加時，幾乎所有的增長都出現在非正規就業，也即臨時工或自謀職業中——通常在建築，清潔和維修，零售貿易，街頭攤販，維修服務或家庭服務這樣一些行業。

更具體地說，這 13 年期間，城鎮就業總數增長了 81.7 百萬，其中 80 百萬的增長是非正規就業。因此，現在非正規工人是單一最大城市就業類——很像非洲和拉丁美洲，在那裏，這結果的原因是停滯不前的資本積累。此外，勞工組織的報告提到勞動力參與率的減少和城鎮居民的兩位數失業率。

改革進程已使國營職工有了重大的損失。根據中國政府的數字，在 1998-2004 年期間，國有企業下崗職工有 3000 萬人。截至 2005 年 6 月，21.8 百萬人掙扎在政府的“最低生活保障”線上——所有城市貧困居民的基本福利補助金。2005 年 6 月，這項津貼大約是一個月 19 美元。[12]



當然，私營部門的就業在增長，特別是生產出口品的企業。但大多數新的工作薪酬低而工作條件差。“即使 2002-2005 年間翻了一番，中國製造業的平均工資仍然只有一個小時 60 美分，相比之下，在墨西哥，一小時有 2.46 美元。” [13]

一家負責向跨國公司提供商業事務諮詢的美國公司，委日特（Verite）公司，最近有一份關於中國勞工實踐的報告，它認為，“中國出口工廠的支付運作的系統性問題持續地劫奪至少 15% 的工人工資。” [14] 工作場所的安全是一個更大的問題。據中國政府官方的資料來源，約 2 億工人處在“危險”的勞動條件下。

“在全國範圍，每年有超過七十萬起的嚴重工傷事故，奪去十三萬條生命。” [15]

有關中國製造業競爭力的一個關鍵但常常被忽視的解釋是，約 70 % 的製造工作是由移民完成的。在過去 25 年中，1.5 億到 2 億的中國人從農村移向城市地區，尋找就業機會。

儘管絕大多數農民工的遷移是合法的，他們卻遭受到巨大的歧視。例如，由於他們仍然被列為中國戶籍制度中的農村居民，不僅要支付高昂的手續費登記為臨時城鎮居民，他們也沒有權利享用為城市出生的居民提供的公共服務（包括免費或補貼教育，保健，住房和退休金）。這同樣適用於他們的孩子，即使他們的孩子出生在城市地區。因此，農民工很容易被剝削。他們通常每天工作 11 小時，每月 26 天。大多數沒有得到特別的加班工資，而且一般只是城鎮居民收入的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16]

中國勞工政策（主要是為了提高出口競爭力）的整體效益很好地說明瞭最近的工資和消費趨勢。中國的工資所占的 GDP 比例已經從 1992 年的約 53% 下降到 2006 年的不到 40%。私人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也下降了，在同一時期，從 47% 下降到大約 36%。相比之下，在英國，澳大利亞，義大利，德國，印度，日本，法國和韓國，私人消費占 GDP 的比例超過 50%，在美國則超過 70%。[17]

正如經濟學家雜誌指出的，“國內生產總值中，消費所占的比率下降……大體上解釋了為什麼國民收入中家庭所占比例的銳減（以工資，政府轉帳和投資收益的形式），而股票利潤和政府收入卻增加了的原因。”事實上，根據經濟學家雜誌報導，“最近幾年，在許多國家已出現了勞動收入份額的下降，但沒有國家下降得像中國那樣巨大。” [18]

一個惡性循環在這裏運作：分給工人的收入部份越少，出口導向的中國經濟的經濟力量則

越強，從而鼓勵實施新的政策壓低工人的生活水準。

可以肯定的是，中國的經濟增長和產業轉型也產生巨大的財富——導致了不平等現象的爆發和新階級關係的形成（或定形）。亞洲開發銀行研究了 22 個東亞發展中國家，得到的結論是，中國已經成為該地區的第二個最不平等的國家，僅次於尼泊爾。考慮到了大約 10 年期間（從 1990 年代初至 2000 年初），中國創造了該地區第二高的不平等現象增加的記錄，還是僅次於尼泊爾，這並不奇怪。[19]

雖然亞洲開發銀行的研究結果非常重要，但對於伴隨和推動中國市場改革計畫的真正的財富集中，它們沒有充分傳達出來。據波士頓諮詢集團，2005 年，中國已有二十五萬個百萬富翁（以美元計）家庭（不包括主要居住處的價值），全國總量位居世界第六。雖然這組家庭僅占全國家庭的 0.4%，卻掌握了 70% 的國家財富。[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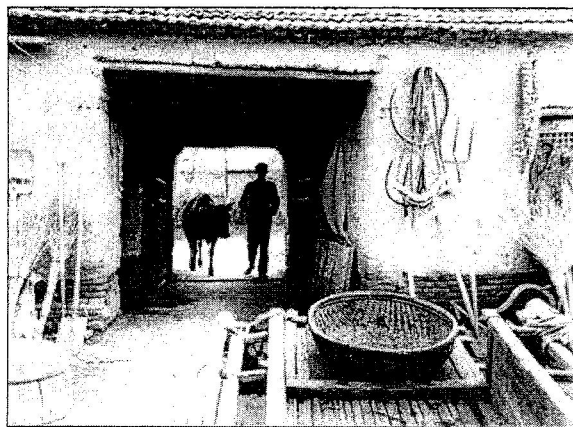
根據每年的中國富豪榜，擁有十億美元財富的富翁人數已經從 1999 年的 1 人增加到 2007 年的 106 人（超過除美國之外的任何其他國家）。[21] 中國的新暴發戶並沒有羞於花錢：

“酩悅·軒尼詩—路易·威登集團，世界頂級奢侈品集團，計畫每年在中國再開設兩到三家商店，因為那裏的銷售額每年上升 50%。第二大奢侈品集團，瑞士的曆峰集團，預期通過出售更多卡地亞珠寶和皮亞傑手錶，五年內在華銷售增加四倍。” [22]

有明顯的跡象表明，共產黨越來越關注的是，日益擴大的收入（和消費）差別，給民眾對日益惡化的就業，保健，住房，環境和退休條件越來越不滿的情緒火上加油。其理由很充分：大規模“擾亂公共秩序”的事件已從 2003 年的 5.8 萬增加到在 2004 年的 7.4 萬，2005 年的 8.7 萬，2006 年估計有 9.4 萬。[23] 尤其令領導層擔憂的是在外商獨資出口工廠中越來越有效和激烈的罷工活動（事實上，儘管罷工在中國是非法的）。

當鎮壓未能制止抗議潮的高漲時，該黨也開始啟動了一系列的改革努力。這些都是旨在改善中國發展戰略所產生的最嚴重的暴行，而不改變其根本方向。例如，中央政府批准了 2008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一項新的勞動合同法。[24] 歐洲和美國商會強烈反對這方面的努力，並在起草階段作了大量干預，竭盡全力，成功地減少了其施行範圍。



批准的法律規定，除其他外，所有雇主要向工人提供書面合同（大多數工人沒有或從來沒有見過的东西），其中要指明的就業條款包括養老金和保險福利。新法律還規定，企業須支付加班費和週末工作的額外費用。雖然新的法律產生了急劇增加的仲裁案件（其中大部分涉及拖欠工資和加班費），其對就業條件的影響似乎有限（即使是在傾向於解決問題的地區）。[25] 許多公司規避法律，降低其“正式”工人的雇傭（一些雇主在法律開始生效前這樣做），轉而依賴於勞動服務公司提供的工人或增加分包合同關係的使用。

現在，一些公司支付工人的合同工資，遵守休假和加班費標準，但隨即增加了這些工人必須支付給公司提供的宿舍和伙食的費用，從而損害工人收益。一些外國公司威脅，如果工人們的要求過急，就要將生產轉移到其他地方，甚至國外。

此外，多層次的官方的爭端解決進程仍然緩慢而昂貴，因此很難讓工人迫使不願意的公司遵守新法律的較高標準。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新的法律仍然允許地方政府，從而讓雇主，區別對待城市出生的和農村來的工人；使後者繼續被剝奪失業和其他與就業有關的社會保障福利。

儘管中國目前的發展戰略把破壞性的影響加在勞動人民身上，共產黨領導層的許多人仍然不願意支持從根本上改變該戰略，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一直是其最大的受益者。他們有能力塑造的改革進程，使他們能夠利用國有資產謀取私利，安排家人和朋友在國家和私營部門的利益豐厚的職位上，並確保快速增長的資產階級仍然依賴於黨的良好意願。

這反過來又導致了黨國資本主義的精英們圍繞一個共同的利益默契融合起來，繼續推動“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

很容易看到這方面發展的結果。許多黨的領導官員的兒女（稱為“太子黨”）被安插在這樣一些關鍵職位上，這些職位處在“最具戰略意義和盈利的行業：銀行，運輸，發電，自然資源，媒體和武器。一旦在管理職位上，他們從政府控制的銀行得到的貸款，獲得外國合作夥伴，並讓他們的公司在香港或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以籌集更多的資本。太子黨為自己斂財的每一步 --- 不僅是作為公司的大股東獲利，而且也通過發包給外國企業得到回傭。”毫不奇怪，2 萬個中國最富者的 90% 以上，據報導，“與政府高級官員或共產黨官員有關。” [26]

中國的精英已經願意同國際資本分享國家的生產成果 --- 儘管隨著國際資本加強其在中國內部的地位，在分配問題方面的鬥爭越來越尖銳 --- 因為國際資本的參與，對於中國新的政治經濟增長的建立和持續，起到了關鍵作用。但是，中國精英們看來要決心確保他們成為主要的國家利益獲取者。

因而在此同時，“中共前所未有地開放了一些部門讓外國資本的參與……當局……嚴格控制的經濟的其他方面。這導致了成千上萬的[中小型]私營公司的緊縮，儘管也許還沒有到萎縮的地步。但是，因為有黨和國家機關或高級幹部及其後代的有力壟斷和控制，它們都處在邊緣化的危險中。” [27]

總之，看來，在使用改革形成一個順應他們利益的積累過程方面，這些拉動中國經濟的戰略非常成功，並符合這一過程的資本主義基本性質，其成果的達成，以犧牲越來越大的大多數中國勞動人民的利益為代價。

其結果是，中國領導人現在必須面對爆炸性的罷工和示威。這樣的行動是否會危及未來的外國投資和出口生產，這兩個最重要的維繫著中國經濟增長戰略的支柱，還有待觀察。不管情況如何，很難看到，根據什麼原因，進步的東西會讚揚並促進中國的改革經驗。

市場改革和跨國積累

許多左派認為，中國增長的規模和模式，結合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的（自稱的）社會主義（或至少反帝）取向，意味著中國將很快能確定一個新的、更進步的國際經濟秩序。

這種信念往往會得到以下推理的支持：中國維持（而且可以預期會持續維持）高增長率達數十年之久。因為這種增長高度依賴進口，它支持出口生產，從而支援中國貿易夥伴（特別是東亞，但也包括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貿易夥伴）的經濟增長。

此外，中國出口的成功，使該國能夠建立自己的龐大外匯儲備，該國政府正在越來越多地使用這些外匯，幫助其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貿易夥伴的金融所需要的（基礎設施）的現代化。

把中國看作為國際變化的一個強大和積極的催化劑，這一觀點是有吸引力的，但存在缺陷。在大多數情況下，這是使用民族國家鏡頭瞭解中國積累過程的結果。現實情況是，中國的經濟轉型不是發生在真空中，也不僅僅是對中國人首倡精神的反應。

相反，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經濟體，正在被更廣泛的跨國資本主義的機制，特別是通過跨國公司建立和加強的跨境生產網路組織聯結起來，並作集體性的重整。其結果是，中國自己的積累過程正越來越多地與主要模式的投資和貿易相連接，從而加強它們，而不是提供替代它們的另一種方案。

最直接地，跨境生產網路的擴大已導致所有東亞經濟體的貿易依存度的顯著增加。這一趨勢的一項指標是：該區域的出口/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從 1980 年的 24% 增長到 2005 年的 55%。相比之下，2005 年的世界平均水準只有 28.5%。[28] 此外，這一活動有越來越多的部分，現處在跨國公司的控制之下；例如，它們占 73% 的馬來西亞和 86% 的新加坡製成品出口。[29]

更重要的是，由於這些網路運作，現在越來越多份額的東亞貿易製成品是零部件。主要東南亞國家（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和越南）貿易結構的改變，說明瞭這一點。

零部件在該集團的總製成品出口中所占的份額，從 1992-3 年的 27.5 % 增長到 2004-5 的 40.3%。[30] 同一時期，零部件的進口份額也大幅增長，從 32.6% 增長到 48.5%。臺灣和韓國的趨勢也是類似的。例如，臺灣的零部件出口份額從 21.2% 上升到 43.5%。

此外，東亞國家交易的幾乎所有的零部件來自相同的三個工業類別（關於重要性的國家排名相同）：電子機械，辦公機器和自動資料處理，以及電信和錄音。此外，這些零部件正越來越多地從一個東亞發展中國家交易到另一個國家；區域內零部件貿易部分由 1992-3 年的 37.8% 增長至 2004-5 年的 55.6%。總之，東亞出口生產（本身是全國生產的一個不斷增長的份額）正在日益縮小，不僅局限於零件和部件，而且也局限於按照跨國公司控制的生產網路的需求所選定的幾個行業中選定的幾個作業活動。

中國不僅被拉入這一區域結構調整的進程中，而且它已經成為其運作的核心。用亞洲開發銀行的話說，“區域內貿易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原因主要歸於零部件貿易，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作用是亞洲生產網路的最終產品的彙聚中心。” [31]

在這一區域生產系統的跨國結構裏，中國的獨特地位是最終的生產平臺，這一點突現在這個事實中，即它是該地區零部件貿易出現赤字的唯一國家。

由於這種結構調整，東亞地區的整體出口活動已從美國和歐洲聯盟轉向東亞，尤其是中國。另一方面，中國的出口重點離開東亞，轉向美國和歐洲聯盟。

1992-3 年和 2004-5 年之間，中國最終產品出口中的東亞份額下降，從 49.5% 降到 26.5%，而經合組織的份額（不包括日本和韓國）從 29.3% 升至 50.1%。[32] 事實上，在絕對值和相對值兩方面，中國現在都是該地區對美國和歐洲聯盟的最大出口國。因此，中國同美國和歐洲聯盟貿易中的順差是其東亞貿易赤字的鏡像。

由於這一區域結構調整，中國已成為幾乎所有東亞國家的數一數二的最重要出口市場。如上所述，這一發展激勵了這個信念，即中國依賴進口的生產將使東亞國家（以及那些對中國有出口貿易的拉丁美洲和非洲國家）同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分離”。

然而，由於這種貿易活動主要涉及區域內零部件的貿易，它在以中國為基地，最後基本銷向美國和歐盟的生產上達到高潮，因此，東亞整體對於發達資本主義市場的依賴實際上更強而不是更弱了。根據亞洲開發銀行引用的各種估計，似乎在亞洲內部，亞洲消費出口的比例，其範圍從高的 22% 到低的只有 11%。[33] 這一區域的觀察角度使我們能夠更清楚地看到中國增長機制（為中國內外的勞動人民）問題的性質。最明顯的問題是，中國的持續增長（從而該地區的生產），現在依賴於美國處理空前大的貿易赤字的能力。由於美國經濟是否能繼續忍受這樣大而日益增加的赤字，是值得懷疑的，因此很難看到中國（也延伸到向中國提供零部件的東亞國家）如何能夠避免痛苦的，涉及較低的增長率以及大多數人就業和生活條件進一步惡化的調整。

即使國際貿易不平衡可以承受，中國經濟的增長機制仍然存在問題。例如，中國作為許多跨國生產鏈內部的最後彙聚中心的地位，大大削弱了中國在技術升級上的努力。

調查了中國 2001 年加入世貿組織五年後的國情，中國的經濟學家韓德強回憶說，他“認為最大的[成員資格]的損害將會是中國對其工業和技術自主發展的控制能力。我認為，可以肯定地說，過去的 5 年證明這個說法很正確。在中國，任何企圖要發展自己的技術或市場的行業，都會遇到越來越大的障礙。” [34]

更麻煩的仍然是這個事實，即面對來自其他國家尋求提高自身在跨境價格鏈中的地位的競爭，為了保持中國在該地區的主要地位，中國政府不得不維護低工資和高生產率。

中國成功的一個後果是，整個東亞（和其他地方）的跨國公司已經把其生產轉移到中國，以利用其利潤更多的生產條件。這導致了低利率的投資和增長，並在整個地區實施新的勞動制度，旨在削弱勞動保護。結果，整個東亞（和

其他)地區的工人相互對抗競爭,以求匹配中國實現的勞動剝削水準。[35]



對於中國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主要貿易夥伴,這些問題有所不同,但是也很嚴重。這些國家向中國供應初級商品而不是生產的零部件。中國對這些商品大量而日益增長的需要無疑推動了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外匯收入和增長。但是,這些成就的代價是重大而長期的。與中國的貿易協定,有時會得到中國的財政援助和國外投資的支持,進一步加強初級商品部門的優勢,從而加強現有結構上的不平衡。[36]

與此同時,拉丁美洲和非洲建立製造業(和出口多樣化)的努力往往受挫於中國自己的出口攻勢。例如,近95%的拉丁美洲高科技出口面臨來自中國出口商的競爭。這些受威脅的高科技產品代表了全部拉丁美洲出口的12%。[37]最後,當然,如果中國增長滯後,拉丁美洲和非洲與中國的貿易預計也會受害。

總之,市場的邏輯推動中國的改革戰略,促進了經濟轉型,使中國經濟的活力陷入一個更廣泛跨國重組進程,該進程加快改革,其方向是確保中國資本主義需要的優勢。

結果,遠非為勞動人民開放新的可能性,中國的改革戰略實際上加強了跨國積累的過程,產生了嚴重的國家和國際的不平衡和緊張局勢,這是最終將需要花費相當大的社會成本加以糾正的情況。

最後的想法

從上述對中國經驗的檢討中,可以得到幾個結論。首先,中國的市場改革進程不會導致一種新形式的(市場)的社會主義,而是資本主義(雖然帶有“中國特色”)的復辟。具體地說,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產生了新的政治經濟,它有違於社會主義的目標,人類全面發展的促進,團結的關係,社會需要的合作生產和規劃,生產資料的集體或社會所有。

因此,中國的經驗,成為一個明確的警告:社會主義的建立,不能利用市場和更緊密的融入全球資本主義積累機制而達成。事實上,左派內部對於中國經驗性質的混亂看法表明,對於什麼是社會主義,並沒有明確說法,也沒有評估其建設進展的適當標準。

其次,中國經濟的經驗揭示了很多關於當代資本主義的問題。中國被認為是一個模範開發者;該國已經實現了持續快速的增長,吸引了大量的生產性資本的流入,輸出了空前精緻的出口製成品。然而,這些成績沒有轉化為越來越多中國工人的有意義的收益。

事實上,中國工人面臨的勞動和工作條件越來越類似於拉丁美洲和非洲地區的情況,這些地區的大多數國家的發展被認為是失敗的。因此,看來關於這件事,對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區的工人問題的答案,在目的是實現“成功”的資本主義發展,特別是那些旨在複製中國經驗的配套政策中,是無法找到的。

第三,中國的增長軌跡聯結和依賴於現有的積累過程,這個過程的形成被跨國資本主義的機制所左右。因此,不能認為中國有助於建立一個全新的經濟體系。

這並不意味著,要避免對華貿易。它也不意味著中國精英和西方(特別是美國)精英在所有的地緣政治問題上的看法一致。資本主義競爭是真實存在的,這些精英之間的差異,能夠而且經常創造一些缺口,有利於第三世界,特別是有利於受到美國威脅的國家。

與此同時,因為中國精英的利益,結構上受制於資本主義的需要,可預期的中國領導人會支持的改變種類是有限的。鑒於上述跨國機制所產生的失衡和緊張的預期後果,需要提起警惕注意。

對中國經驗的這個重要觀察，不應用來支持這樣一些分析師（其中許多人在美國寫作；其中一些人接近美國勞工運動），這些人認為中國是經濟問題的首要原因。他們一再聲稱，只要中國政府被迫“遵守”可接受的資本主義競爭的“自由市場”規則，世界經濟中的所有（包括勞動人民）都將好過。

一項隱含的假設是，中國工人正在真正受益於他們國家的“不公平”的國家干預，他們的就業和收入增長正是以犧牲其他國家，尤其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它們是中國的主要出口市場）的工人為代價的。

可悲的是，這一系列論證鼓勵中國境外的工人錯誤地認為，他們的敵人是中國，而不是資本主義制度，實際上這個制度操縱了他們國家同中國的經濟關係，陷害其工人在破壞性競爭中反對中國工人。事實上，正如我們從上述情況裏看到的，中國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跨國公司的出口活動，其中許多公司來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

此外，儘管——或者實際上是因為——自己國家的快速增長，中國工人，如世界各地的工人一樣，正面臨著艱難時期。適當的工作很少，社會服務在消失，不平等現象在增加，而競爭的壓力要求越來越大的犧牲。

如上所述，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在公開和直接挑戰他們的國家發展戰略。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挑戰正引發關於毛澤東時代的經驗和社會主義的性質和意義的政治討論和辯論（其中有許多發生在聊天室和電子論壇上）。[38] 就這一點而言，農民和工人參與者似乎集中在駁斥統治精英說毛澤東時期是一個社會經濟的災難的虛假言論，他們用自己的生活經驗，解說這一時期的成就，特別是就業，社會保障和國家民族意識方面的成就。

這一政治重建的進程正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進行，最重要的原因是，共產黨正在鎮壓低層人民的組織活動。其他挑戰包括農民工和城市出生的國家工人之間在就業和獲得社會服務上的緊張關係；中國共產黨聲稱要建設社會主義的說法所造成的混亂；以及這樣一個事實，即那些繼續毫無保留地讚揚毛澤東思想的人強烈抵制黨的政策，儘管事實上毛澤東基本上反

對農民和工人的自我組織，反對他們直接參與政治和經濟決策。

儘管有他們目前的限制，所有這些鬥爭、討論和辯論是一個令人鼓舞的發展，通過找到一些方式來分享我們自己對社會主義的理解，通過分享與中國參與者一起建立運動的經驗，我們可以借鑒並希望有所貢獻於該發展。它使我們通過自己的努力，對中國改革經驗的性質能有空前重要的更好的理解。

2008年11月1日

注釋

[1] 雖然大多數的左派，現在批評中國的市場化改革的戰略，但中國仍然有相當多的擁護者存在。人們願意相信，有替代新自由主義的可行方案，而且對中國社會轉型的進步性的信念無疑受到這個事實的鼓舞，即中國一直被美國政府妖魔化；中國向古巴和委內瑞拉提供貸款，投資，和貿易；共產黨仍然統治並公開宣佈其致力於社會主義。更具體地說，我參加過一些國際會議，在會上古巴和委內瑞拉經濟學家支持中國市場化改革的策略，並主張在自己的國家採取類似的政策。中國發展過程的捍衛者也繼續在許多左翼網際網路論壇上主張自己的立場。批判亞洲研究雜誌順利地組織了一次圓桌會議，會議中一些雜誌編輯採納了保羅·伯克特和我對中國市場化改革經驗的批判，這些批判見於我們的書，

‘中國和社會主義，市場化改革和階級鬥爭’（紐約：每月評論出版社，2005年）。批評以及我們隨後的回應被刊登在雜誌上（批判亞洲研究，2005年9月和2005年12月）。此外，著名學者，如喬萬尼·阿瑞吉，大衛·施韋卡特和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繼續發表文章和書籍，其中，中國作為一個非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強權的崛起而受讚揚。這種著作的最近一個例子見北京的喬萬尼·阿瑞吉，亞當·斯密的著作：二十一世紀脈絡，倫敦：Verso出版社，2007。

[2] 關於改革進程的討論見馬丁·哈特-蘭茲伯格和保羅·伯克特，‘中國和社會主義，市場改革和階級鬥爭’（紐約：每月評論出版社，2005），特別是第2章。

[3] 經合組織，經合組織經濟調查：中國，經合組織經濟調查，2005年，29。

[4] 該資料和下面一段資料來源同上，133。

[5] 同上，82。

[6] 威利·蘭，“中國精英經濟的雙重標準”，亞洲時報線上版，2007年8月17日。

- [7] 貿發會議，2002年世界投資報告：跨國公司和出口競爭力，紐約：聯合國，2002年，17。
- [8] 程汝樺，“中國：外國資本控制四分之三的行业”，綠色左翼週刊，2007年5月18日。
- [9] 約翰·華裏和辛賢，“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和非外國直接投資的經濟和中國未來高增長的可持續發展”，國家經濟研究局，工作檔系列，編號12249，2006；湯姆·米勒，“不作計算的製造業”，亞洲時報線上版，2006年11月22日。
- [10] 恩裏克·杜瑟爾·彼得斯，中國為墨西哥和中美洲帶來的經濟機會和挑戰，德國，波恩：德國發展研究所，2005年，102。
- [11] 阿吉特·光·戈塞，“中國就業”，國際勞動組織，就業分析科，就業戰略檔，2005年。
- [12] 中國勞動公告，“僅能維持生存的數以百萬計的前國家工人”，2005年9月7日。
- [13] 約翰·S·麥克林亨，“業務外包”，IndustryWeek.com，2006年7月1日。
- [14] 克雷格·西蒙斯，“中國新勞工運動動態”，政治家，2007年2月4日。
- [15] 中國勞動公告，“中國移民工人”，2008年6月。
- [16] 同上。2005年，中央政府給地方政府的權力，改革登記制度，包括結束農村和城市居民的區分。絕大多數都拒絕作出任何改變，大多數地方官員與當地的商業利益緊密聯結，而不想危及企業（或其個人）的盈利。
- [17] 經濟學家雜誌，“中國工人宣言”，2007年10月11日。
- [18] 同上。
- [19] 亞洲開發銀行，亞洲的不平等現象，2007年關鍵指標，特別篇章聚焦，馬尼拉：亞洲開發銀行，2007年，3，6。
- [20] 吳種，“中國遭‘通緝’的百萬富翁”，亞洲時報線上版，2007年9月19日。
- [21] 羅賓·況，“中國億萬富豪開始增加”，金融時報，2007年10月22日。
- [22] 撒母耳·沈，“中國，全面擁抱奢侈品，高端零售商瞄準內地有錢階級”，國際先驅論壇報，2006年10月16日。
- [23] 布魯斯·艾因霍恩，“在中國，一個不滿的冬天”，商業週刊，2008年1月30日。
- [24] 阿麗亞娜·尤紐格·查，“新法律給工人權力，給企業惡夢”，華盛頓郵報，2008年4月14日。
- [25] 國際工會聯合會，“中國：一些進步，但與貿易有關的工人剝削依然存在”，2008年5月21日；金龍·諾克，“中國勞工政策和勞動立法在市場轉型背景下的變化”，國際勞動和工人階級歷史，2008年春。
- [26] 彼得·況：“新自由主義的中國面孔”，反擊雜誌，7/8期，2006年10月。
- [27] 蘭，“中國精英經濟的雙重標準。”
- [28] 亞洲開發銀行，2007年亞洲發展展望：在變化中成長，香港：亞洲開發銀行，2007，68。
- [29] 亞洲開發銀行，2006年亞洲發展展望，香港：亞洲開發銀行，2006年，273。
- [30] 這裏的資料和下面一段的資料，來自普裏馬-錢德拉·阿蘇科如拉和中信山下，“製造業貿易中的生產各自為政：東亞在全球生產網路中的作用”，費力普·迪·毛若，華威·麥基賓和史蒂芬·迪斯（編輯），全球化、區域化和經濟的相互依存，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
- [31] 亞洲開發銀行，2008年亞洲發展展望，亞洲工人，香港：亞洲開發銀行，2008年，22。
- [32] 普裏馬-錢德拉·阿蘇科如拉，“中國的崛起和東亞的出口表現：擠出恐懼值得？”，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經濟學部，工作文件，2007/10號，2007年9月。
- [33] 亞洲開發銀行，2007年亞洲發展展望，70。
- [34] 斯蒂芬·菲力昂，“中國新自由主義的社會成本，訪經濟學家韓德強”，美元與意識，2007年7月/8月。對中國的技術能力改革之消極後果的更詳細的討論見馬丁·哈特-蘭茲伯格：“中國市場化改革的經驗，嚴格的評估”，即將出版。
- [35] 亞洲開發銀行，2007年亞洲發展展望，32-3；馬丁·哈特-蘭茲伯格和保羅·伯克特，“中國，資本積累和勞動力”，每月評論，2007年5月。
- [36] 何力，“紅星照耀拉丁美洲”，NACLA，2007年9月至10月；鄭汝樺“中國是非洲的新帝國主義強權嗎？”綠色左翼週刊，2007年3月2日。
- [37] 凱文·P·伽拉佛和羅伯托·坡則坎斯基，“攀登技術臺階？中國和拉丁美洲的高技術出口”，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工作文件20，2008年，14。
- [38] 討論這一事態發展見莫伯·高，為中國的過去，毛澤東和文革的戰鬥。安·阿伯，密歇根：冥王星出版社，2008。
- （譯自《中流砥柱》雜誌 Against the Current，2008年11月/12月號，第137期）

(轉載)

保卫中国畸形工人国家！ 为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而斗争！

托洛茨基主义 关于中国“市场改革”的分析

本文译自《工人先锋报》第874号(2006年8月4日)和第875号(2006年9月1日)

两年前，两位美国左翼知识分子，马丁·哈特-兰兹伯格(Martin Hart-Landsberg)和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以据称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中国“改革”时期的经济作出了严厉和彻底的谴责。他们的文章《中国和社会主义：市场改革和阶级斗争》，最初发表于《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2004年7月-8月)，并随后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在文中，两位作者特别把那些将中国视为可以替代由美帝国主义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定的、蹂躏了众多欠发达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构造改革”的一个成功经济发展模式的“进步”知识分子，作为批评的对象。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写道：“我们不仅不苟同那些认为无论社会主义与否，中国是一种发展模范的进步人士；我们还认为，他们确立这一立场的过程，更突出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即进步群体普遍地丢弃了马克思主义。”

他们所不能苟同的“进步人士”中便包括维克托·利皮特(Victor Lippit)。利皮特及其同道在《批判的亚洲研究》(Critical Asia Studies)2005年第3期(总第37卷)中，发表了回应《中国与社会主义》的批评文章。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进而写了一篇冗长的答复，回应利皮特等人的批评。(见《批判的亚洲研究》2005年第4期，总第37卷)

长期研究中国经济的政治自由主义者利皮特，尽管对中国市场导向的“改革”政策有一些左的批评，基本上是支持这项政策的。例如，他以“可耻”来谴责中国公共卫生系统、尤其在农村的恶化。利皮特希望北京当局在保健事业、教育和改善农村人口的生活条件上投入比现在远远更多的资源，哪怕以短期内降低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为代价。尽管如此，利皮特是明确地看涨中国的，他引用华尔街投资银行高盛(Goldman Sachs)的一项研究报告，推断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于2041年超越美国。

不管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两人同利皮特之间存在多少的分歧，他们双方的论点都是建立在一些共同的基本前提之上的。他们不但错误地断言中国的市场导向“改革”已经导致了资本主义复辟，还认为这样的结局是无可避免的。对利皮特来说，中国要持续和进一步地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才能实现现代化。他宣

称：“资本主义在完成其历史角色之前，是不能被取代的”，并补充说“欧洲大陆形式的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大概是目前可行的最好制度。”对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来说，在中国或其它任何地方的社会主义纲领(他们将这种纲领和“以工人和社区为中心的经济”这个混淆不清的公式等同起来)，都必须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腐蚀人心的种种罪恶有很少或没有贸易交往。

最为关键的是，他们双方都否定了在任何历史上有意义的时期内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爆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利皮特对此是毫不含糊的，而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则含蓄地表达了这种观点。因此，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全球一体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内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展望，是处于争论双方的概念范围之外的。然而，这个同毛泽东斯大林主义建设“一国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教条相对立的纲领，正是通往中国工农大众全面解放的唯一道路。

今日中国的神话和现实

邓小平领导的中共政权，在1976年毛泽东死后数年实行了市场导向的改革政策。这政策包括对外开放，并随后吸引了大量集中在制造业的西方、日本和海外华人资产阶级的直接资本投资。主流的资产阶级评论家常用中国予人深刻印象的经济、尤其是工业增长，为说明市场驱动的经济制度比集中计划的公有经济(他们称之为社会主义“指令经济”)优越的实证。而利皮特则代表了一部分中间偏左的知识分子，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以显著的国有经济和国家对整体经济进行管理为基础的、成功的反新自由主义经济策略的首要例证。

后一种观点的价值，在于以它自己的方式，承认了1949年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建立起来的中国经济的核成分，至今仍然是集体所有的。国有企业在战略性工业部门，例如钢铁、有色金属、重型机械、电讯、电力和石油提炼中，仍占有主导地位。土地国有防止了支配农村社会的、大规模农业资本家阶级的出现。大部分在外资部门以外产生的经济剩余，流入国有银行和国库。北京当局至今对金融系统的有效控制，使中国得以免受大起大落的投机性货币资本的危害。这种投机性货币资本，时而对从东亚到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新殖民地各国进行大肆破坏。

现在，世界各地代表政治舞台上所有派别的人物，从中共当局的发言人到华尔街的分析家，宣称中国已经

在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叶全球经济“超级大国”的道路上大步前进的说法已是司空见惯的事。首先，这种观点忽视了在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关系里，中国经济的脆弱性。这种观点同时也忽视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尤其是美国统治阶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革命中诞生的官僚化畸形工人国家——不可调和的敌视。更有甚者，这种观点无视了中国社会内部的不稳定性：中共官僚苛政的种种后果，已引发了大量和增长中的社会抗议。

过去几年来，中共当局推行的经济策略的目标是维持对美国巨大的贸易顺差，这使中国掌握了全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这在美国统治阶级的圈子里逐渐地增加了实行反华经济保护主义的压力。无论如何，美国对中国的巨大贸易逆差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不论美国发生一场大规模的经济衰退，或实行反进口保护主义措施，甚至这两种情况同时发生，都将严重损害中国的工业经济。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为出口市场生产的外资、合资和私营中国公司，以及一些国有企业，将被迫大量减产、裁撤工人和白领职工。这将为整个中国经济带来强烈的衰退效应。

最近，中国着手开放银行业，容许外资得到部分所有权。如果华尔街、法兰克福和东京的银行家们能相当实在地控制中国的金融部门，其经济效果很可能是十分严重的。部分债台高筑的大型国有企业将被迫减产裁员；甚至大量货币资本的突然外流（像在1990年代末触发东亚金融经济危机一样的），也会成为一种现实的威胁。

按主流资产阶级舆论的看法，中国不是已经复辟了资本主义、就是在迅速和不可逆转地走向复辟。然而，就像在前苏联一样，资产阶级反革命必须在具有决定意义的政治层面获胜，即夺取国家政权，才能完成——这不是单单通过国内外资本控制的私营经济在数量上的扩张所能做到的。以美国统治阶级为核心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对这一点是十分了解的。因此英美两国政府公开支持资本主义据点香港的激烈反共党派和势力：这个英国前殖民地（还有澳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中共唯一没有垄断政治权力和组织的地方。美国的统治者亦因此不厌其烦地表示中国需要“政治自由化”。

帝国主义者为了将1991-92年苏联的反革命毁灭在中国重演，致力于助长一股主要以新兴的资本主义企业家阶级，和中共官僚以及管理人员、专业人士和技术官僚阶层中那些同国内外资本有紧密关联的成分为基础的，反共的政治反对力量。

与此同时，美帝国主义一直不断增强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在中亚建立军事基地，试图以美军设施包围中国，并于去年与日本签订共同保卫资本主义重镇台湾（其资产阶级在中国大陆有相当多的投资）的协定。五角大楼一直在积极谋取在美国发动先发核进攻时抵消中国少量核武的能力——华盛顿的布什一伙公开宣布了这一战略。作为托洛茨基主义者，我们主张无条件军事保卫中国和其它现存的官僚畸形工人国家——北朝鲜、越南和古巴——反抗帝国主义攻击和资本主义反革命。我们特别支持中国和北朝鲜测试和拥有核武器，掌握抵御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所必需的威慑力量。

尽管，也部分归咎于其迅猛的经济、尤其是工业的增长，中国已是各种大众不满鼎沸的社会。队伍庞大和战略上拥有巨大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面对的，是一个赤裸裸和日益地不平等和不公平的社会。作为其市场导向改革的一部分，北京斯大林主义当局在当前财政空前充裕、足以满足中国劳动人民的基本需要时，却使公共保

健和基础教育缺乏经费。国有企业裁员，雇主拖欠工资、退休金和各项津贴，以及其它类似的侵权行为，引起了广泛和不断发生的工人抗争。农村充斥着农民的愤怒抗议，反对中共地方官员没收土地从事地产投机，这些抗议频繁地造成了农民和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

现在，当权的官僚层清楚地分为三派：一派希望经济“改革”以同样的强度继续下去；另一派希望加强国家干预控制市场化的恶果，并由此扼杀社会不满；而第三派则期望恢复官僚的计划经济。迟早——很可能在官僚层内部及其周围的资产阶级分子采取行动消除中共的政治权力之时——中国社会里多重的爆炸性社会压力将粉碎执政官僚层的政治架构。到时，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命运将会被赤裸裸地摆在人们面前：是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打开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是资本主义奴役，被帝国主义征服。

我们主张通过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扫除专制和寄生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建立一个以民主选举产生的工农委员会（苏维埃）为基础政府。在一个列宁托洛茨基主义政党的领导下，政府将重新建立包括国家对外贸垄断制在内的、集中计划和管理的经济制度。经济将不再被闭关自守的官僚层武断的“行政指令”所操纵（造成像1950年代毛泽东的“大跃进”那样的灾难），而会由最广泛的无产阶级民主来管理；它将剥夺中国新兴资本主义企业家阶级的财产，并为中国劳动人民的利益重新谈判外国投资的条件：例如，坚持外资企业必需至少给予工人与国有部门同等的劳动条件。中国的革命工人政府将在大规模机械化和科学的农场经营的基础上，促进农业的自愿集体化；而中国需要从经济先进国胜利的工人革命得到大量的物质援助，才能实现这项事业。

在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旗帜下进行的中国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将深深地震撼全世界。它将粉碎自苏联被摧毁以来，帝国主义统治阶级宣传的“共产主义已死”的意识氛围。它将使东亚工业强国和帝国主义霸主日本的无产阶级激进化；激发朝鲜革命再统一的斗争（在被围困的北方进行政治革命，在资本主义南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在南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深受帝国主义紧缩政策折磨的群众中引起巨大的反响。最终，只有在国际范围内，特别在北美、西欧和日本帝国主义核心国家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中国才能作为社会主义亚洲的一部分而实现全面的现代化。为了为无产阶级在这一斗争中提供必需的领导，国际共产主义同盟致力于重新锻造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党。

经济发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

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两人同利皮特之间的主要分歧，并不围绕在对这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时

期里，转变中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事实上的评价。当然，他们在这方面是有一些重要的分歧：例如脱贫人口的数目。但从根本上区分双方的，可以说是一种不同的价值等级制度。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将平均主义和社群价值置于生产力的发展之上，而完全无视后者是从贫困和繁重劳动中解放人类的必要条件。因此，他们在对利皮特的回复中主张：“中国在主流发展标准（经济增长，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收和出口额）上的成功，不但完全没有在人类福利的战线上创造实际或潜在成功的条件，还可能损害了大部分中国劳动人民的人类发展的条件。”

同利皮特、或就此而言新自由主义的拥护者们——

样, 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相信当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 正在驱使(以商品和服务的增加来计算的)经济增长的最大化。这种观点, 同马克思主义关于以私人利润积累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和民族国家制度, 是限制生产力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桎梏的认识是完全相反的。半殖民地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部分国家群众深刻和恶化中的贫困化, 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里昂·托洛茨基在1930年代初, 世界经济大萧条、帝国主义间竞争复苏, 并将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解释道:

“资本主义之一世界系统已过了时。它已不能实践其主要的使命: 增加人的能力与人的财富。人类不能停止于已达到的水平。只有生产力强有力的增加和健全的、计划的即社会主义的组织生产和分配, 才能保障人类——全人类——体面的生活标准, 同时赋予他们驾驭自己的经济活动的宝贵自由。这种自由可分为两个方面。第一, 人将不再被迫用一生大部份时间致力于体力劳动。第二, 他将不再依赖于市场法则……

“技术将人从地、水、火、风这些古老原素的专制下解放出来, 结果只是将他隶属于自己(技术)的专制之下。人不做自然的奴隶了, 却做了机器的奴隶, 更坏的是做了供给与需要的奴隶。现在的世界危机特别悲剧地证明: 能下沉海洋之底, 能上升到平流层的高空, 能在电波上与两极的人作谈话的人, 这骄傲而勇敢的自然之主宰者, 仍是他自己的经济的盲目力量之奴隶。我们时代的历史任务正在于用合理的计划代替未被监督的市场作用; 在于驯服生产力, 强迫它们谐合地一齐工作, 并顺从地服役于人类之需要。只有在这新的社会基础之上, 人才能舒展他疲倦的肢体, 使每个男人及每个妇人, 而不仅是出类拔萃的少数, 都能在思想领域中变成一个完全的公民。”

——《保卫俄国革命》(1932)(中译为《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 收入《里昂·托洛茨基演讲集》(Leon Trotsky Speaks)(1972)

这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未来观, 是同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的思想完全格格不入的。

无政府民粹主义的秘方……

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用以同新自由主义对立的, 是“以工人和社区为中心的经济”的概念。这个术语及其概念完全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社区”是一个旨在模糊社会阶级分界和利益冲突的常规资产阶级术语。特别在中国, 使用“以工人和社区为中心的经济”的概念, 就模糊了工人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异; 而后者是以占有和售卖商品为收入来源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农民的物质利益, 在于以比他们进行生产(如化肥、农具)和个人消费而购买的工业产品的更高价格, 出售他们生产的粮食和其它农产品。此外, 农民这种高价出售粮食的利益, 并不会随着家庭农场改造为农业集体而消失。农业集体成员的收入——不管买家是政府采购机构还是私营市场——仍大部分取决于农产品的卖价。

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尽管公开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 他们的观点其实更接近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民粹主义。他们关于“以工人和社区为中心的经济”的见解同那个和十九世纪无政府主义冒险家米哈伊尔·巴枯宁(Mikhail Bakunin)有牵连的; 主张由政治上自治的、经济上大部分自给自足的公社联合成联邦的典型纲领有相似之处。这从他们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的批评的性质可以看出来。他们断言当时经济的过度集中是没有效率的; 而更重要的是, 他们含蓄地将集中计划经济同政治独裁等同起来:

“经济计划变得过度集中了, 而随着经济结构越来越复杂, 经济计划再不能有效和有效率地反映人们的需求……

“在继续发展中国过往成就的各种优势的同时, 通过创立新的决策和规划架构授权给工农, 是一种紧急的需要。满足这种需

要的其中一项条件, 就是改组和分散经济和国家决策的权力, 来加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对他们的劳动条件和产品的直接控制。”

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谴责市场导向的“改革”政策所带来的不断扩大的不平等。然而, 要使不同企业、工业和地区达到同一水平的工资和福利, 就必须要有集中管理的经济。只有这样的一个体系, 才能实现经济资源从生产力较高的、向生产力较低的企业、工业和地区的再分配。

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在长约150页的《中国与社会主义》以及对利皮特等人的答复中, 都没有解释他们主张的“以工人和社区为中心的经济”, 实际上会是怎样运作的。他们在大部分时候, 只是将这个公式作为消除新自由主义种种罪恶的咒语来使用。在提出“建立一个全国的医疗保健制度”的假想例子时, 他们有这样的解释:

“[建立一个全国的医疗保健制度]需要发展建造诊所和医院的建筑业、治疗疾病的医药工业、生产仪器设备的机床工业、保存记录的软件工业、培训医生和护士的教育制度等等; 这一切都是由人们在地方、地区和全国的层次里, 发展中的需要和能力所形成的。”

他们在文中完全没有指出, 要实现这值得赞赏的目标, 究竟哪些政治制度和结构性的经济机制是必要的。同其它需求相比(如在扩展工业和基础建设、军事防卫、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投资), 医疗保健制度开支占全部可用的经济资源的份额该如何决定? 在建立全国医疗保健制度的过程中, 对各种经济活动(如建筑、医疗设备、计算机软件)的协调, 需要集中的计划和管理。集中计划和管理工人在生产线上的积极民主参与是完全相容的; 例如, 对技术最佳应用的建议、建立和执行安全标准以及维持劳动纪律等等。总体经济资源在各种互相冲突的需求之间的分配, 应交由以无产阶级民主(即工农委员会的统治)为基础的政府的最高机关讨论和决定。无产阶级民主是计划经济合理运行所必需的。

……和毛泽东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

利皮特指出,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体制, 是以斯大林统治之下的苏联作榜样的, 而且“不论中国或苏联, 都没有一点工人监督的痕迹。”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对此并无异议。但“改革”前的中国吸引他们的, 是晚期毛主义意识形态的某些内容, 特别是和1966-76年的文化大革命相关的那种浮夸的平均主义。

毛泽东为了清洗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领导中国从1950年代末的“大跃进”的灾难中恢复起来的那一翼官僚, 发动了名堂荒谬至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跃进”是一场以后院炼钢炉为标志的、企图建立自给自足经济的疯狂冒险, 结局是全面崩溃和大范围的饥荒。在文化大革命的毁灭狂潮中, 在同官僚主义和所谓“走资派”进行斗争的名义下, 几百万学生被动员为红卫兵。在1967年1月, 上海工人配合全国铁路罢工组织总罢工保卫他们的生活水平时, 毛泽东派遣红卫兵镇压了罢工。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个人的物质利益被谴责为“资产阶级的”态度。“社会主义建设”则被定义为对群众社会心理的改造, 使他们以集体的福利为依归(即“为人民服务”)。当时一个毛派分子被广为传播的信条是: “我必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 为自己规定高的政治水平和低的生活水平。”

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并不认同这种“社会主义

的”禁欲主义。但他们确实把社会主义意识同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经济匮乏被克服和物质富足的实现分割开来，从而实际上将技术的进步同人类的平等发展对立起来。他们在给利皮特等人的答复中声称：

“人类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里，并非单单在资本创造的生产力和消费品的丰盛基础上才能付诸实行，而是大多在阶级斗争之中和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的。这里说的阶级斗争指的是为消除一切生产条件的异化现象（即使在资本主义统治之下，同时也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所进行的长期斗争。”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这里将提高生产力和增加消费水平同资本主义发展等同起来。与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不同，马克思主义者不将阶级斗争同提高社会生产力对立起来。恰恰相反，工人阶级斗争的最终目标是推翻限制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和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制度，并以国际一体化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取而代之。后者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全体社会成员均享有充裕物质和文化资源、得以全面地实现他们潜能的世界共产主义文明。

《中国与社会主义》一文之首先在《每月评论》发表，像口头禅常说，决不是无缘无故的。早从1960年代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主政的时期开始，《每月评论》就长期是美国毛派和亲毛左翼知识分子的头号刊物。斯威齐宣称“中国革命的经验……证明了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并非对社会关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不可逾越的障碍。”（《每月评论》1974年11月）

利皮特同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两人目前争论的整个框架：在融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某种形式的伪平均主义、闭关自守的国民经济之间选择，根本是错误的。对毛泽东来说，“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教条，只是一个将迫不得已的事情说成是美德的典型斯大林主义措辞。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意味着一个建立在物质丰富的基础上的、没有阶级的平等社会。社会主义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实现的概念，是极度反马克思主义的。为了在全球的范围内调度生产资源，社会主义需要国际的计划经济。实际上，中国的“一国社会主义”，和斯大林及其继承者们的苏联的一样，都意味着反对国际工人革命的展望和全面地同世界帝国主义调和。

在1950年底中国加入朝鲜战争时，美帝国主义及其盟友（如日本）对中国实行了贸易禁运，禁止向中国出口广泛的一系列工业产品，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包含精密技术的设备。这项禁运在此后维持了二十年。在1950年代期间，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和贸易促进了中国经济（实现了与现在同等的增长率）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大型现代工厂设备的建设。然而，随着北京和莫斯科两地的民族主义官僚层裂痕的加深，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在1960年代初中断了和中国的经济关系。就是从那时开始，毛泽东和他的理论家们才将“自力更生”（即闭关自守的国民经济）的美德宣扬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基本原则。

然而，当中国在几年后同美帝国主义结成针对苏联堕落工人国家的战略联盟时，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是以1972年美国战机轰炸北越时，毛泽东拥抱美国三军总司令尼克松为标志的。北京同华盛顿的联盟，在1979年中国入侵越南时以鲜血被确认。作为回报，帝国主义者向中国开放了市场和供应来源。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五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大部分是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进行

的），尽管在非常低的基础上开始，增长了超过两倍。然而，中共还是维持了“自力更生”的意识形态姿势。

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谴责中国过去几十年采取的出口导向增长战略。诚然，他们坚持他们并不反对外贸本身、而只反对资本主义利润规律支配的外贸：“工人面对的问题并不是出口生产本身，而是没有不同于由利润驱动的出口行为的选择——那些满足人类发展需要的选择。”（原文的着重）然而，中国是在一个由资本主义企业、银行和国家支配的世界中存在的；因此其出口活动就必然地受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规律的约束。

作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反对中国通过同西方和日本企业进行贸易和成立合资企业，而同资本主义世界形成的广泛经济关系本身。在中国，一个由列宁托洛茨基主义政党领导的、以工农委员会为基础的政府，将试图利用世界市场加速经济发展。在实行这项政策时，政府将重新建立国家对外贸易垄断制，并重新谈判外国投资的条件。最为根本的是，中国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府将积极促进国际无产阶级革命。

中国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在过去和现在——的真正罪行，是它不但助长了资本帝国主义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延续，还确实地巩固了它。在冷战最后的二十年期间，毛泽东和邓小平之下的中国，都在美国率领的反苏联盟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中国斯大林主义者对苏联的反革命毁灭，这次国际无产阶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应承担直接的和不小的责任。

在后苏联时期，中共政权继续同帝国主义的利益和企图调和。胡锦涛政府因此一直支持布什的全球“反恐战争”：美国不论侵占伊拉克和阿富汗，还是现在对伊朗（中国的第二大石油供应国）进行军事威胁，“反恐战争”都是它的政治理由。此外，北京同华盛顿和东京勾结，以中间人的身份促成了旨在制止北朝鲜开发核武的所谓“谈判”。任何削弱北朝鲜畸形工人国家反抗帝国主义黠武行径自卫能力的行为，将会为中国带来同样的损害。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在抱怨中国同资本主义世界的商业关系时，完全没有提及这些中国斯大林主义官僚层——从毛到邓以至胡锦涛——对国际无产阶级犯下的真正罪行。同过去和现在的北京斯大林主义官僚截然相反，为了创造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打倒贪婪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必要手段，列宁、托洛茨基及其他布尔什维克领袖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最先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锻造共产国际。

马丁·哈特-兰兹伯格和保罗·伯克特在《中国和社会主义：市场改革和阶级斗争》（最初以长篇文章的形式发表于《每月评论》2004年7月—8月）一文中，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只有很少的一些评论。而这些仅有的评论却偏偏是混乱和自相矛盾的。他们承认“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中国人民还远远没有得到社会主义的各种承诺”。但因为他们的主题之一是资本主义已经在中国“复辟”了，他们明确地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视为不仅与今天的中国有质的不同、还比它优越的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批判的亚洲研究》（2005年第4期，总第37卷）对维克托·利皮特的答复中，他们写道“中国离开社会主义的趋向”。

对利皮特来说，他在《批判的亚洲研究》（2005年第3期，总第37卷）刊载的讨论《中国和社会主义》的圆桌

会议中主张：“这样的—个制度不能称为‘社会主义’，我倾向用‘国家主义’这个词来形谷它”。此外，他还断言在目前的历史时期，特别在经济上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和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一样，利皮特并没有解释他的社会主义的涵义。但从文章的脉络可以知道，利皮特所指的显然是某种接近完全的共产主义的东西：一个劳动生产率已达到足以克服经济匮乏的水平社会。

尽管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宣称自己的立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之上的，他们显然不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对理解1949年后的中国有任何用处。然而，卡尔·马克思正是为了阐明一个仍以经济匮乏和不平等、差别工资劳动和强制国家机器为特征的后革命社会，而展开了这个概念的：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其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哥达纲领批判》(1875)(原文的着重)

显然地，从毛泽东到胡锦涛时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同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后期展开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标准概念有很大的差别。中国是一个国际上孤立的、官僚统治的工人国家，它是在经济落后、又面对更强大的敌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情况下存在的。

众所周知，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相信无产阶级革命将最早在西欧发生，然后扩展到北美。因此，他们想象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相对短暂的、向社会主义和谐过渡的时期。然而，从1917年第一个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落后的俄国实现开始，历史的实际进程，比他们设想的更为复杂和矛盾。尽管如此，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克党从不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单单在俄国一国建成。事实上，从创立第三国际开始，他们为在世界各地打造革命工人政党、以领导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国际斗争，倾注了全部精力。

然而，国际革命的失败、特别是1923年德国革命的

败北，和年轻的苏维埃工人共和国的日益孤立，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带来的严重破坏，为民族主义的官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从1923—24年开始，苏联在约瑟夫·斯大林愈发暴虐的统治下经历了官僚民族主义的堕落。尽管如此，苏联的全球影响力仍对世界帝国主义起了部分的制衡作用，因此使1949年的中国革命及其产生的官僚畸形工人国家的巩固成为可能。在19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统治者不仅威胁、还确实考虑过动用核武器打击红色中国。他们没有这样做，主要是惧怕这会挑起同拥有核武的苏联的战争。

1949年中共领导的、以农民为基础的“红军”[指人民解放军——译注]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国民党的胜利，摧毁了半殖民地中国的资产阶级国家军事机关。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蒋介石及其党羽带领残余的武装力量逃至台湾岛。新的中共政权立即确立了它在政治权力和组织方面的垄断地位。由此，中国资产阶级被剥夺了政权，而经济在几年后被国有化。与此同时，工人阶级一切从事独立政治活动的尝试都被中共政权无情地镇压下去。毛泽东及其同伙，开始建立一个基本经济和政治

架结构都以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为榜样的国家。

毛泽东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现实

在1960年代，毛主义以其平均主义的号召、群众运动和以道德替代物质刺激，吸引了世界各地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重复了这种态度，尽管他们比上一代的西方毛派知识分子(如保罗·斯威齐)，对毛泽东的中国有更加多的批判。即使如此，他们仍然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描述为“实现了全民就业、基本社会保障和中国劳动人民的普遍平等。”

当然，相对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一类的亚洲资本主义新殖民地诸国，中国的收入分配确实是平等得多。但中国不但没有超越同时期苏联的平等水平，还事实上在某些重要方面比后者不平等。在50年代中，中国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了国有企业的工薪结构，并在整个毛泽东时代维持了这个制度。最高的管理人员薪级和最低的工人阶级薪级的对比是15:1。此外，和苏联一样，中国高级党政干部、企业经理和同类人物，不但可以、而且的确以种种形式的腐败和寄生行为来补充其正式收入。

中国城乡之间日益扩大的社会经济的鸿沟，并非始于邓小平推行的市场导向“改革”。城乡差距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几年就已经非常显著。在1952年到1975年间，同乡村劳动者仅有的41%比较，非农业人口的人均消费增长了83%。(卡尔·里斯金[Carl Riskin]《中国的政治经济：1949年来发展的探索》，1987年版)在1980年(“改革”时代开始的一年)城市居民的人均粮食消费比农村公社社员高60%，并比后者多吃近两倍半的肉类。在消费品(如手表、缝纫机、收音机)占有的方面，则存在更大的差距。总的来说，中国城市的平均消费是乡村的两到三倍。

相比之下，苏联在1960年代到70年代期间城乡人口生活水平的差距有相当可观的缩窄。当时，一大部分的集体农场自愿改造为国有农场，其工人接受的划一薪酬和福利，并不随农业产出和政府采购价格而波动。到1980年代初，苏联农业劳动者的收入以比工厂和办公室工人更快的比率增加。苏联当时可以实现这种更大程度的平均主义，正是因为它当时已达到了远高于中国的生产率水平。

毛泽东时代中共官僚层采取的经济战略，基本上同1930年代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相似。当时为实现经济剩余的最大化，工农的消费水平被压抑，剩余集中投资重工业。在1952年到1975年期间，工业的年均增长达到了11%。在1952年，工业产出占中国净物质产品的20%；到1975年，这一比率增长到45%。毛泽东时代建设的相当可观和相对现代的重工业部门，为邓小平及其继承者实现的高经济增长率和生活水平的总体改善奠定了基础。然而，这种工业投资的高度资本密集性质，限制了城市工人阶级的扩张和农民社会比重相应的降低。在1952—1975年间，非农业人员占全体劳动力的比重仅从16%增加到23%。

到毛泽东时代的最后几年，当局的经济战略在造成大众的不满的同时，面对着日益增长的障碍和矛盾。从1950年代中，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每年仅提高1%，这大部分是官僚主义指令的无能造成的。为抵消这一状况，国民总收入越来越大的一部分被投入重工业，以致重工业投资占国民总收入的比率，从1950年代中的24%上升到1970年代初的33%。用于工业扩张的大量经济资源，主要是通过重税和以人为低价强制征收谷物和其它农产

品的手段，从农民那里榨取出来的。除此之外，城市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事实上被冻结了二十年。美国左翼知识分子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虽然大体上相当赞同毛泽东的中国，仍然承认这个事实：

“在消费和人民生活水平受到损害的同时，[政府]为了维持重工业的高速增长提高了积累率。没有生产率的真正增长；这些高积累和投资水平，是不太可能在不增加人民贫困的前提下长期维持下去的。”

——《邓小平时代：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调查，1978-1994年》(1996)

在他们对“改革”时期中国的谴责中，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给予国企终身雇用制的废除十分重要的意义，并把它说成是走向他们想象中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决定性步骤。他们在对利皮特的答复中写道：“这种物质上无保障的状况，正是资本主义对工人及其生产条件的社会分离的本质。”

无疑地，中国工人将终身雇用和劳保制度(所谓“铁饭碗”)看作是1949年革命的一项主要的社会成果。然而，在一个贫穷和经济上落后如中国的国家，显然既不可能为数以亿计的农民提供国企工业的就业，更不可能

为他们提供那种保障终身雇用、工资福利水平相当于农村公社社员两至三倍的职位。

为了维持社会秩序，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政权禁制农民离开农村到城市寻找工作。此外，当局并不为日渐增加的城市劳动人口的全体提供国有部门的就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700万的城市青年毕业后立即被运送到乡村公社，被强迫同家人和朋友分离。假如这些青年有留在他们居住的城市、做任何工作的选择——即使是没有终身雇用保障、而且工资比一般人低的工作，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认为会有多少人宁愿到集体农场干活？到毛泽东时代的最后几年，农村公社成为隐蔽的失业和不充分就业的巨大储藏所。

文化大革命的部分目的，是以冒牌的“社会平均主义”的名义来削减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而且，一个在特定的企业的终身保障雇佣制度在经济上不但合理，还会逐渐成为通过更新投资促进劳动生产率最大化的障碍。当时中国大部分的工业厂房设备是在1950年代中第一个(也是最成功的)五年计划期间建造的。这一计划的成果是当时中国通过苏联获得的最先进技术的体现。但到1970年代，很多工业企业在技术上已经过时。在一定的投资水平下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最大化，必须以新企业取代一些旧企业，或在旧企业重新装备新的节约劳动力的技术。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特定的现存职位将会被淘汰。

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府会以相当于旧岗位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重新雇用失业工人，并由国家全资安排迁移和再培训。当然，邓小平及其继承者们没有这样做。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被迫自谋生计，当中很多人过着十分贫困的生活。而另一方面，毛泽东政权通过官僚指令和警察国家的镇压手段，事实上将实际工资冻结了二十年。

邓小平开始的市场导向改革，是企图在斯大林主义的波拿巴主义框架内，解决官僚指令经济效率低下问题的一种尝试。正如我们在1980年代所描述的：

“在斯大林主义制度之内，存在着一个以市场机制取代集中计划和管理内在趋势。由于不能以苏维埃民主(工人委员会)的纪律约束管理人员和工人，官僚层越来越将以市场竞争的纪律来控制各个经济参与者的办法视为解决经济效率低下的唯一答案。”

——《通过苏维埃民主实现中央计划经济》，《工人先锋报》第454号，1988年6月3日。重印在《东欧的“市场社会主义”》1988年7月。(引自中文《斯巴达克思》第7号，2005年8月)

“改革”时代的各种矛盾

毛泽东去世时，中国尽管建造了一个相当可观和相对现代的重工业部门，仍是一个农村占主导地位的农业国。超过四分之三的劳动人口从事农业，而80%以上的人民在乡村生活。当时的农业产出赶不上工业增长的速度是促成“市场改革”的一个因素；更确切地说，低水平的农业生产率已成为迅速和大规模工业化的一个根本障碍。今天，过半的劳动人口在制造业、建筑业、交通和服务部门工作，而全国人口的40%已城镇化。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这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发展。中国工业能力在质量上相应的扩展也具有同样的意义。

与此同时，北京斯大林主义者的政策牺牲了工人阶级和农村劳动者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使他们过着贫困的生活；加大了中国的城乡差距；滋长了同中共官僚及海外华人资产阶级有亲戚和金钱关系的资本主义企业家阶级；并产生了一个富裕和享受西化生活方式的管理人

员、专业人士和技术官僚阶层。

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两人同利皮特代表了这一矛盾现象的两个极端。前者为了证明中国劳动人民的状况在全面恶化而挑选证据。他们指出了明显而持续增长的社会不平等，城市失业的增长，公共医疗卫生和基础教育的恶化。而利皮特则为了相反的动机而选择了证据。他指出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大部分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相当大的改善(尽管各个阶层的改善程度是十分不平等的)。利皮特引用了一些说明在过去的几十年，数以亿计的农民因政府的政策而脱离了贫困的研究。

不论在《中国和社会主义》及其对利皮特的答复中，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都没有引用那些俯拾即是、说明工人阶级经济状况改变的基本尺度的统计数据。在1979-1998年期间，制造业工人在价格调整后的年均收入增长达4%。仅在1988年和1989年，由于当时通货膨胀率异常的高，收入才出现了负增长。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3》，在1999-2002年期间，工资的年均增长率接近12%。在过去几年，一些主要的工业中心，如深圳和上海，竟然开始经历劳动力短缺，尤以技术工人居多。结果，为了吸引工人，雇主提供了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福利。一位在华尔街银行高盛供职的经济师梁红评论说：“我们正在看到中国极度廉价劳动力的黄金时代的终结。”(《纽约时报》2006年4月3日)

然而，尽管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年均增长率接近10%，中国工人阶级各个部分的生活水平并非都得到了改善。事实是恰好相反的。从1990年代中开始，中小型国企工业往往以贱价卖给管理人员的方式被私有化。企业私有化、合并和倒闭造成的结果，大约有2000至3000万的工人被解雇，其中妇女比例失调地占多数。那些(主要在私营经济)找到新工作的人，已是幸运的少数，但他们还要面对薪酬降低和失去大部分或全部在国企工作期间得到的广泛福利的状况。

受国企倒闭影响而经济上特别遭受破坏的一个主要地区，是一大部分老旧工厂设备的集中地，东北的“铁锈地带”。在这里，多达40%的工人阶级失业。整体上，失业率被估计为城市经济活跃人口的6%-13%。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个指导经济政策的政府部门，推断今

年如有8%的经济增长，中国将额外产生1100万个就业机会。这还不到官方发表的城市失业人员加上新增劳动力共有2500万人的一半。（伦敦《经济学家》2006年3月25日）

城市内以及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在“改革”时期不断扩大，是一个被普遍承认的事实。除了新兴的富有资本家阶级外，中国城市现在还有一个生活水平大体上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同类人相当的、显著的小资产阶级专业人士阶层。与此同时，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出版的《2005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中国城乡平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已达到了3.2:1的比例。

这些统计数字不应掩盖农民状况在某些重要方面，同时得到了显著改善的事实。在1978-1997年间，农村地区电力的消费几乎增长了八倍。现在大部分的农村家庭都拥有一些家用电器。利皮特指出，到1997年时，三分之二的乡村家庭已至少拥有一台黑白电视机，一种接触现代文化生活的基本手段。

然而，在其它重要的方面，农民的状况恶化了。毛泽东时代的乡村公社提供了基本的医疗保障，中小学教育，养老金和其它社会项目。在1980-1983年间，邓小平政权解散了公社，以持有土地长期租约的家庭农场（即“家庭承包经营制”）取代之。以前由公社提供的社会项目，现在理论上由地方政府接管。但在中国政府财政极端分散的现状下，农村地区乡镇的贫乏税收是远远不能胜任的。农民家庭不得不自掏腰包来支付子女医疗和教育的费用。这种情况的社会后果是可以预料的：

“尽管中国在提供接受教育机会方面取得值得赞赏的进步，一些严重的不平衡仍然存在。乡村远远落后于城市，而中国的文盲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学校之间的素质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受教育机会的差距，则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而扩大。”

“城乡以及不同地区的居民之间的健康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乡村儿童和母亲的死亡率是城市的双倍……所有指标都显示城乡儿童之间在营养上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2005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英文版）

在农村，官方所称的“群体性事件”（即骚动）有急剧的高涨。这些农民抗议和暴动，针对的不是地方官员在没有经过合理补偿的情况下没收土地，就是武断的征税、腐败和其它官僚主义弊病。胡锦涛政权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下，承诺改善农民状况，对此作出回应。农民的税务负担被减轻，许多农村学童的中小学学费将被免除，中央政府同时计划在农村投入更多款项从事社会项目和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然而，正如《经济学家》（2006年3月11日）所指出的：

“这些措施并不预示任何重大的政策转变。中央政府在农村的开支仍将仅占政府总开支的8.9%：这比去年的8.8%有所增加，但低于2004年的9.2%。废除农业税和其它对农民开征的费用每年将平均节省每个农村居民156元——大约净收入的4.8%。”

真正缩小中国的城乡差距，需要经济资源大规模的再分配和再配置。在农村引入现代科技——从联合收割机、化学肥料到科学农业的整个体系——将需要一个质量上比现存水平更高的工业基础。而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将提高对大规模扩展城市的产业就业、以吸收农村广大剩余劳动力的需求。显然地，特别在当前中国工业基础规模依然有限和生产率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前景进展的速度及其最终实现的可能性，将取决于社会主义日本或社会主义美国对中国的支援。这再次突显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

中国无产阶级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

尽管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争辩说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生活条件在“改革”时期里恶化了，他们这个立场的关键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出发点的。他们谴责世界上最庞大的产业工人阶级在中国的发展，并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复辟”。在这里，他们的无政府民粹主义观点，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进步和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异的立场直接地对立起来。他们在对利皮特的答复中，以赞同的态度引用了有份参与《批判的亚洲研究》上关于《中国与社会主义》一文的讨论的左翼学者吕大乐的这个陈述：“1978年后的经济改革导致了中国工人和农民的真正无产阶级化。经济改革使他们真正地被市场支配，并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同他们分割开来。”

将“市场改革”和资本主义复辟等同起来的吕大乐，在描述中国无产阶级队伍的庞大增长，是随着他们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的分离而发生的时候，究竟有什么意思？除了工业的私有化外，他所指的大概是毛泽东时代大多数人隶属的农村公社的废除。这些农村公社基本上是由使用劳动密集手段和较原始技术的落后小农场凑合而成的。即使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比邓小平及其继承者统治的时期较为平等，这亦只是一种在压倒地以农业为主的社会里的、贫穷的平等。

回顾卡尔·考茨基在1899年撰写的《土地问题》，对我们认识中国农民的一大部分转变为无产者的历史意义是有帮助的。列宁认为这本书是对了解现代世界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考茨基后来的右翼修正主义和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敌视并不能否定其早期著作的价值）。毫无疑问的，考茨基描述的十九世纪末德意志帝国的阶级性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根本的差异。尽管如此，中国农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无产阶级化造成的各种社会影响，还是同这个过程有对应之处的。正如考茨基所描述的：

“工厂通过集中分散的工人，促进了他们之间的交流；通过发展交通系统、将知识上较发达的工人从城市带到村庄，它拉近了工厂村庄和外部世界的距离。因此，这是使部分农村人口接近城市无产阶级、逐渐地唤起他们对后者争取解放的斗争的兴趣和认识的一种手段。而最终，在有利条件下，这将使他们得以参与这场斗争。”

事实上，来自乡村的外来工人〔到城市工作的农村人口〕已经站在了最近的中国工人斗争的最前线。在东南沿海，许多年轻的外来妇女以罢工或其它手段拒绝在

血汗工厂的恶劣环境下工作，从而造成了2004年夏以来的严重劳工短缺。在上海和北京，占蓬勃发展的建筑业的劳动力达百分之八十的外来工人，为改善工作条件而进行了成功的斗争。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尽管中国放宽了对农村人口向城市移动的限制，但限制本身并没有被废除。被迫从事最危险和卑贱的工作的外来人口，不但没有合法城市居民的权利，还往往被强迫住在隔离的区域。许多城市工人鄙视外来人口，认为他们抢走了工作、压低了工资。在今日中国，一个革命先锋党会为团结工人阶级的所有部分，并与农村劳动者和城市贫民结成联盟而斗争。为外来人口争取和合法居民享有同等权利（包括获得医疗、住房和公共教育的权利，以及同工同酬）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展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自由主义者利皮特同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哈特-

兰兹伯格和伯克特之间关于中国和社会主义的辩论中，双方的立论都是建立在一个根本错误的框架之上的。在经济上，双方都否定了资本主义是阻碍生产力全球发展的桎梏，而生产力只能在国际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得以进一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而在政治上，双方都否定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展望，这条实现社会主义、最终解决匮乏的必由之路。

托洛茨基在其对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堕落的开创性研究《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中，引用了这个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中作出的评论：“生产力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匮乏就会普遍化，而如果出现匮乏，争夺必需品的斗争又要开始，而这就意味着，一切旧的欺诈行为[马恩著作中为‘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译注]必然复活。”这里马克思所说的“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指的是阶级压迫、不平等和剥削。斯大林主义者断然否定了这个唯物主义的认识，宣扬只要挫败帝国主义的军事干预、社会主义便可在一国之内建成的白痴主张。斯大林主义者这样曲解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结果，便是他们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背叛。在苏联，这种背叛的最终结果，是灾难深重的资本主义反革命。而在中国，斯大林主义的苛政则造成了一个充斥着各种矛盾和社会不满的社会。

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展现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所得来的巨大优越性的同时(这种优越性最重要的表现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水平远远高于印度一类资本主义新殖民地)，也显露了斯大林主义官僚统治带来的深刻恶果。这些恶果包括大幅度增长中的不平等，与寄生官僚层紧密相连的新生产阶级势力的滋长，和将摧毁中国工农大众成果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威胁的逼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锻造一个列宁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党，领导庞大而有巨大力量的中国工人阶级站在农民和城市贫民的最前列，进行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正如托洛茨基在《被背叛了的革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资料室1963年12月版[根据1937年英文版翻译])中写道的：

“问题并不在于一个统治集团代替另一个统治集团，而在于改变国家管理经济和指导文化的方法。官僚专制政治必须让位给苏维埃民主政治。恢复批评权利和拥有真正的选举自由是国家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一点意味着恢复苏联各党派(从布尔什维克党开始)的自由，恢复工会的作用。在工业中实行民主意味着按照劳动者的利益从根本上修改计划……‘资产阶级分配标准’将被限制于严格的必需范围以内，并且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而逐步让位给社会主义平等……青年将有机会自由呼吸，进行批评，容许犯错误和成长起来。科学和艺术将摆脱自己的锁链。最后，外交政策将恢复革命的国际主义传统。”■



以“靖國史觀”武裝起來的日本自衛隊

趙京 譯

日本防衛相濱田靖一 2008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五深夜舉行緊急記者會，宣佈罷免自衛隊航空幕僚長（相當於空軍司令）田母神俊雄的職務。理由是田母神在公開發表的論文中否認日本在二戰期間的侵略行為，並且呼籲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當天晚上，日本首相麻生太郎也譴責田母神的論文有欠妥當。他說：“即便是作為個人發表的論文，也與他目前的地位不符，有欠妥當”。

田母神的論文獲得日本一家經營連鎖飯店的阿帕集團（APA GROUP）主辦的第一屆《真實的近代史觀》有獎徵文最優秀獎，並於星期五刊登在阿帕集團的網站。田母神在論文中稱，說日本是侵略國家完全是冤枉。1995 年日本內閣通過時任首相村山發表的“日本給亞洲各國人民帶來沉重損失與痛苦”談話，麻生上臺以後也表明將繼承這一立場。作為航空自衛隊最高首領的田母神的論文與政府見解背道而馳。日本有分析認為，這對麻生內閣的亞洲外交是一個打擊，同時為自衛隊供油相關法案的審議增添麻煩。但 11 月 11 日舉行的日本參議院外交防衛委員會聽證會，變成了剛被革職的田母神俊雄的獨角戲。

田母神（插圖為 2008 年 8 月 19 日訪美時）神氣地誇口：“如果我讓自衛隊官兵們應徵，馬上會有上千篇論文。”簡直是向日本的文職政府挑釁。“我只是說日本是好國家而已，以此被解職，不可思議。”“自衛隊官員也有言



論自由。言論自由的權利不能被村山的談話限制。”“如果不說自己國家的好話，不會有幹勁；說自己國家的壞話，會影響自衛隊的士氣。”當社民黨的山內德信議員進一步質問：

“你的本意是讓自衛隊行使集團自衛權，堂堂皇皇地拿起武器去戰鬥嗎？”時，田母神毫不含糊地回答：“我就是這樣認為的。”這一事件顯示：以田母神為代表的極右“靖國史觀”派已經在自衛隊中紮下根來。

過去，田母神就利用空軍幹部學校，組織私人圈子，發行機關報《鵬友》，宣揚侵略戰爭史觀和主張修改憲法。田母神在擔任小松基地司令時就與要求採納右翼教科書的團體串通起來，促使當地的右翼團體結成“小松基地之友會”。田母神 2003 年任自衛隊統合幕僚學校校長時，主導設立“國家觀·歷史觀”課程，招聘外面的右翼講客來兜售充滿天皇主義的國家

觀，否定憲法。在防衛省提交的資料中，把課程的內容和講師名單都塗黑，不讓公眾知道。

這一次懸賞論文，就是由田母神向航空幕僚監部的教育課長介紹，以人事教育部長的名義向全國的部隊發出應徵要領的傳真（《朝日新聞》11月15日報導），完全是組織性的行為。對此，原自衛隊陸軍幕僚監部人事部長志方俊之解說道：“歷史觀非常重要。如果認為日本過去犯下深重罪行，怎能讓年青自衛隊士兵自豪地為國捐軀呢？”“愛國的士氣，不能由‘自虐史觀’培養出來。”（《朝日新聞》11月13日）。這證明自衛隊的上層已經形成了肯定侵略史觀並進一步系統地灌輸給士兵的事實。我們從自民黨的國防部會議員們的擁護氣氛到互聯網上一片“英雄！”的叫好聲中，也可以感受到日本社會中，肯定戰爭歷史的“靖國史觀”並不只是一小撮右翼團體的陰謀，而且是在日本政府默視、在財界推動下，正成為統治

意識的主流。

麻生首相、濱田防衛大臣趕忙讓田母神領取6千萬日元“定年退職”，而沒有“懲戒免職”。反對黨民主黨在此事件上也態度曖昧，沒有就實質性的“文民統治”追究自民黨的失職，更不可能深入改造已經被“靖國史觀”武裝起來的自衛隊。據報導，民主黨的鳩山幹事長曾經與田母神共同出席在阿帕集團的會長家中舉辦的酒會（《現代日本》11月13日）。

在目前的金融恐慌的經濟危機中，很有可能日本的統治階層會促使執政的自民黨、公民黨與在野的民主黨聯合執政，以他們的遠遠超過2/3的議席數目，一舉修改日本憲法，把日本推向軍國主義的道路，重演日本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由軍人威脅、影響政治的悲劇。

譯自日本《橋樑》週刊2008年11月24日



日本愛媛縣警察當局的組織性犯罪被揭穿

遠山裕樹

2008年9月30日，日本高松高等法庭判決，確認愛媛縣警察仙波敏郎巡查部長控告愛媛縣當局因為揭露警察當局貪污而被打擊報復的國家賠償要求，維持2007年9月11日在松山地方法庭判決的結論。愛媛縣警察當局在向縣議會報告中，承認“不就事實進行爭論。經過詳細檢查的結果，找不出上訴的理由。”相當於全面認罪。

以警察廳為中樞的全國警察組織，自從2003年北海道警察當局貪污事件（偽造收據）被報導公開以來，連續被揭發出同類事件，在國會也被在野黨議員追問，警察內部拋出一些替罪羊，全面抗拒。儘管文書管理規則要求保存五年以上所有收據，但全國有326個警察課或署在過期以前，把大量的搜查費證據、偽裝出差的旅行費等文書銷毀，顯示出這是來自警察廳的指令。

早在2004年5月，受到北海道警察當局貪污報導的刺激，大洲警察署的原會計課長勇敢地站出來，揭露出：“大洲署的搜查報酬是偽造的。”警察廳和縣警察當局表面上承認過失，暗地裏全面動員，孤立會計課長。仙波看在眼裏，知道腐敗透頂的警察系統已經不可救藥，堅定地站出來，真名實姓地召開記者招待會支持會計課長，被當局24小時監視起來。

在2005年1月20日的記者招待會上，仙波以自己38年警察生涯的真實體驗，揭露警察的組織性犯罪：“1972年9月自己升任三島署巡查長以來，平均每年兩次接到會計課長的指令，每次要求偽造三份收據。當我問為什麼這樣做時，會計課長都回答說：這是組織的指令。從我在1973年到1995年的七個警察署的工作期間，都被這樣指令。作為執法的警察，我不能偽造文書，一次也沒有合作。這樣，從24歲升任巡查部長以來，儘管在考核中名列前茅，在32年的工作生涯

中，一次也沒有機會得到提升。”“搜查警察從來沒有對提供情報的合作者支付過報酬金。偽造的出差費也是同樣為了警察上司的吃喝玩樂。”“偽造收據成為升職的一個條件，不肯同流合污者就不能升職”。這就是警察系統性犯罪的實態。

縣警察當局一周後馬上把仙波從鐵道隊調到只有一張桌椅的通訊室，同事也不理他了。仙波毫不畏懼，於2月11日以“因為被報復調動而遭受巨大的精神、物質痛苦”為由向松山地方法庭提出控告。據日本共產黨根據公開的資料，他們調查過約二十名提供情報者，都沒有收到過警察的報酬金。但縣警察局不由第三者確認，自行調查247個相關人物，聲稱“沒有找到偽造收據、假出差的事實。”但這一次法院判決是對警察組織性犯罪的確認，是對2006年起實施的“公益通報者保護法”的具體執行，保護從內部揭發政府（特別是公安政治警察）、企業犯罪的良心公民。愛媛縣的人事委員會也已經認定取消調動，讓仙波回到鐵道警察隊。

從某種意義上說，日本的統治體制，正是因為（在美軍支持下）維持了警察系統才維持了自戰前以來的統治。日本的政治結構，除了外交，基本上沒有變化。所以，對於警察系統的組織性犯罪很難得到揭發，即使揭發出來，也很難繩之以法（如過去對日本共產黨幹部住宅的偷聽，現在對反戰人士的鎮壓）。希望這次仙波的法庭鬥爭勝利是一個契機，要徹底追究日本警察全國性的組織犯罪（特別是政治性鎮壓）的責任。

趙京譯自《橋樑》週刊2008年10月27日

出席 Yahoo 雅虎 2008 年股東大會

趙京

我去年十二月向 Yahoo 公司提交了一份要求公司制訂中國政策的提案在今年的股東大會上表決（注 1）。與去年的股東大會提案一樣，Yahoo 又雇用知名的 O'Melveny & Myers LLP 律師公司拒絕我的短短一頁的提案。其主要理由是我的提案“模糊”，公司無法具體執行。還是與去年一樣，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 SEC 對於 Yahoo 的拒絕不採取任何行動，實際上默許了 Yahoo 的行為。正如我在〈華爾街日報的政策取向〉一文中也觀察到的，SEC 已經放棄了“保護（占絕大多數人口的）小股東”

的主要職責，對美國的經濟、金融危機負有不可推卻的責任。

紐約市政府代表屬下的行政、教育、警察、消防等廣泛部門的退休基金股東去年提交了類似的 Internet Censorship（互聯網檢閱制度）提案，加州 Harrington 投資管理公司去年提交了類似的人權委員會提案，在股東年會上付諸表決，未被通過。今年這兩個提案又被提交股東大會表決，我和封從德、小高、張前進一家三口、伏虎於 8 月 1 日上午趕到聖何西的 Fairmont 旅館，支持這兩個提案。



Yahoo 過去的股東大會都在公司總部附近的 Santa Clara 會議中心舉行，那裏允許公眾自由進出。這一次，Yahoo 爲了躲避我們的抗議，改在離公司很遠的旅館，把沒有股票的抗議人士阻擋在外。幸好旅館正門對面是聖何西的中心公園，我們在旅館對面拉出支持人權提

案、釋放政治犯的圖片，接受媒體採訪（見注 2）。

我十點鐘進入會場，看到大會廳只有一百人左右，非常安靜，與這幾個月來圍繞是否同意被微軟收買吵得揚揚沸沸的爭鬧完全相反（我連續接到過 6 份投票表和幾封來

信，要我投他們的票，但都反對人權提案）。原來，揚言要把所有現任董事選掉的億萬富翁 Carl Icahn 已經在幕後與現任董事會達成交易，今天不來挑戰，兩星期後將（以 5% 的股份）接受 3 個董事（占 27%）的席位。這真是一個“金錢能使鬼推磨”的社會，每當面對那些“當今萬戶侯”時，我都想到無政府主義者柏克曼幾十年前買一支舊槍去教育鋼鐵大王卡內基的代理。現在，我以自己的微小退休基金作為“股東大會”的入門票來教育當今的權貴們。

我很快把“會議規則”讀完，知道一人只有一次兩分鐘的發言時間。我注意到除了認識的 Doherty（代表紐約市政府退休基金）、Harrington 和 Cruz（代表大赦國際）外，那個總是為公司辯護的白人也來了。在提案後的討論時間裏，那個白人急忙發言反對人權提案。但他的理由不在提案本身是否對錯，而是因為提案人是“政客”。真感謝美國還有這樣的“政客”關心中國的人權。我發言支持這兩個提案，以自己出生於北京卻十多年不能進入中國的親身經歷，說明 Yahoo 應該意識到在中國做生意時的政治社會責任。而且，在今天的世界上，忽視人權對公司盈利也是危險的。

我稍微留心觀察了 Yahoo 的創始人兼執行長楊致遠，感到他是一個技術人才，並不勝任領導世界上點擊率第一的網站。例如，Yahoo 現在同時也兼具媒體的功能，但他對

新聞自由並不理解多少。他後來在回答提問時重複過去的老調，說 Yahoo 等公司無法解決人權問題，要由美國政府出面等等。我本來可以再用自己在美國的事例說明美國政府也不可信，但由於只能發言一次，就退場了。當然，這也是世界上所有商業頭目們的通病。從某種意義上說，全球化讓許多跨國公司的影響超越許多國家權力，而這些公司的頭目或經理們卻沒有受過基本的民主選舉等訓練，“一股一票”的股份制度更容易把金錢與專制權力結合起來，出賣了世界民主化的理想。所以，我們更必須利用一切機會，為那些沒有政治經濟權利的人們戰鬥。

2008 年 8 月 2 日 San Ramon, USA

注

1 本文中提及的相關原始檔，都可在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的網址 <http://cpri.tripod.com/cpr12.html> 上查到。

2 <http://cntv.us/zh/view/9510/灣區華人支持雅虎股東互聯網審查和人權的提案>，
http://www.worldjournal.com/wj-sf-news.php?nt_seq_id=1753778，
http://www.worldjournal.com/wj-sf-news.php?nt_seq_id=1753779

《華爾街日報》的政策取向

趙京

我九十年代在日本工作時，唯一訂閱過的報紙是日本共產黨機關報《赤旗》。《赤旗》本身沒有多少新聞價值，只是使我通過它對那些我相當瞭解的日本事務的報導，比較全面地認識日本共產黨的政策。那時，除了日共所有的日本政黨都參與了政權的輪換交易，透過日共，不失為一個觀察、欣賞的好視窗。例如，當我讀到《赤旗》首先報導日本首相細川簽字的一個日期為“九月三十一日”捐款

十月評論 2008 年第 2/3 期

收據時，我意識到這個沒有政策、沒有實力、只靠“清新”形象登臺的“泡沫”政客的末日到來。

《華爾街日報》是我在美國訂閱的唯一報紙。從去年八月以來，我每天花一、兩個小時研究比較，收穫不小。除了其商業影響外，我主要觀察它的政策取向。這主要從它的 A 版後面兩三頁的意見欄表達出來。

首先，其非經濟、非商業、非金融的單純政治性的意見幾乎沒有價值，屬於政治宣傳廣告。例如，被趕出聯合國大使職位的 John Bolton 作為常客，經常就美國的外交政策的焦點問題（北朝鮮、伊朗等）發表違背事實的謬論，與《華爾街日報》相對客觀的經濟金融報導很不合拍。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的“學者”們（多為退職官僚）也以此為陣地暴露他們的“自由保守主義”主張。政治家本人在此發言，多屬防衛性質。例如 John Edwards 在民主黨內初選時遭到《華爾街日報》等大力抨擊，不得不來此澄清。克林頓夫人也在此向華爾街示好，但奧巴馬比較聰明，沒有直接撰文，而是由兩位州長為他代筆在此聲明。最蹩腳的是布托夫人，竟然也跑到這裏來向華爾街求援。我當時就預感到她在巴基斯坦的不詳命運。

其次，有些相關政府官員來此作政策性宣示，值得一讀。例如最近美國財務部長 Paulson 就次級房屋貸款問題，負責金融事務的中國副總理王岐山就知識產權等問題在此說明，都是為了安定金融業、投資人的擔心。至於溫家寶或胡錦濤那樣級別的人物，就沒有必要到這裏來湊熱鬧了。

第三，具有特定傾向的某些教授、專家常常來這裏露面，雖然不負責任（他們享有言論自由），倒可以聽聽他們的一面之詞。他們主要借此場地為共和黨的經濟、金融政策獻計，基本上以 Friedman 馬首是瞻，沒有必要認真研究其成分有多少“科學性”。例如，名氣很大的經濟學論客 Paul Krugman 因其民主黨自由派色彩，就不能在此發言，他的陣地是對面的《紐約時報》。

第四，有一些曾經在股票市場翻雲覆雨的人物，如 George Soros，也常常來作一番“哲學式”預告，不妨聽之一笑。同時，要注意有一些人是因為持有某行業的股票，來試圖誤導讀者的。

這一年來，華爾街（美國金融市場）經歷了兩大劇變。《華爾街日報》如何報導它們呢？

第一是中國股票的暴發、暴落。《華爾街日報》對此幾乎沒有什麼深刻的認識，報導中通常只能披露一些中國股市的神秘關鍵人物 deal makers，完全沒有分析、批判、揭露中國金融非透明、非民主的本質。這表現出華爾街為了爭搶中國金融市場、為了討好中國的上市公司到紐約證券市場來交易，不惜犧牲多年的教訓而置大多數普通小股東（因為美國的幾乎所有員工都通過退休基金投入股票市場）的利益不顧。例如，有一家北京公司 Xinhua Finance Media Limited，打著“新華”的名義來美國上市（代號 XFML），給別人的印象是靠新

華社的壟斷地位控制中國的財經新聞，其實沒有任何實際業績。

其次，美國金融“產業”的衰落過程，突顯出美國政府的政策幹干本性。美國的克林頓政府財務部長 Rubin 和現任財務部長 Paulson 皆來自最大的投資銀行 Goldman Sachs（高盛集團），本身就是“誰操縱美國財政”的證明。在這一次金融危機處理中，由 Paulson 親自出面，與 Fed 聯邦儲備銀行決定把第五大投資銀行 Bear Stearns（貝爾斯登）賤賣給 JP Morgan（摩根）銀行（我在貝爾斯登工作的同學形容其為“屠宰”行為），把本來管理、監督華爾街的 SEC（證券管理委員會）完全當成廢物來對待。Paulson 然後又決定今後聯邦儲備銀行可以直接貸款給投資銀行。其實，所謂“投資銀行”，並非從事銀行業務，而是擺脫相關銀行法規約束的投機基金而已。

去年七月，當貝爾斯登的兩個“套利”（或稱量子）基金破產時，SEC 就已經注意到了。原 SEC 的主任會計 Lynn Turner 指出：“SEC 應該告訴他們向外尋求資金。如果貝爾斯登那時得到足夠資金注入，就不會發生客戶都來撤資的事情。”但 SEC 沒有盡職，其頭腦 Cox 在今年二月的國會聽證會上以及直到貝爾斯登破產的前兩天三月十一日，一直宣稱 SEC 滿足於五大投資銀行的現金儲備。問題不是現金不足，而是“信心不足”（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23, 2008）。Cox 本人在三月十三日貝爾斯登面臨破產被“屠宰”的當天，竟然找不到他。原來他跑到一個大學俱樂部去參加一個官員的 65 歲生日去了！其實，人們早知道 Cox 的知識和野心都不在美國的金融治理，為什麼不早點換一個政客（國會議員）呢？SEC 在 6 月底才起訴早已破產的貝爾斯登的那兩個“套利”基金經理。以筆者在與 Yahoo 等大公司打交道的經歷（參閱 <http://cpri.tripod.com/cpr12.html> 等），知道 SEC 是為大公司服務的。

Paulson 用聯邦儲備銀行的貸款通過摩根銀行“屠宰”貝爾斯登，是因為這個華爾街第五大投資銀行的倒閉會引發全球性金融危機。那麼，這本來要求加強 SEC 的職責，限制投資銀行的賭博性危害全球的業務，但結果卻演變成縮小 SEC 機能，擴大 Fed 的權力，更進一步把美國公民的稅金直接可以填充到投資銀行的全球性豪賭行當。這真是本末倒置，表明美國金融政策為統治集團政治利益服務的本質。

2008 年 7 月 2 日 美國 聖拉蒙

他們的危機，我們的苦果

這是類似 1931 年的情況嗎？

查理·波斯特

這次金融危機是我們所知道的資本主義的完結嗎？簡而言之，不是。資本主義無法避免週期性的利潤下降和經濟停滯的短期和長期危機。然而，正如 150 多年以前馬克思指出的，資本主義的內部機制——壓低工資，改組工作，大規模破產——讓它從這些危機中得以恢復。將不會有“最後”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它必將被推翻。



我們如何理解當前的金融危機呢？顯然，次級抵押貸款市場的崩潰是觸發危機的導火線，儘管，正如道·亨武德指出的，次級抵押貸款最多約占四分之一的按揭市場，其中只有 10% — 15% 的貸款處在違約風險中。金融部門的放寬失調——開始於列根和老布殊時期，完成於克林頓時期——導致了金融產品迅速的衍生（對沖基金，住房抵押貸款債券等），在建築，機械，設備以及商品和服務庫存（以下簡稱“實體經濟”）方面的實際資本投資幾乎沒有基礎。

但是，虛擬資本的增長和崩潰——馬克思所謂的“財產權利的流通”——是每個資本主義經濟週期的一個性能。當商業週期通過其高峰時，資本家尋求有利可圖的新投資。由於商品和服務生產的利潤下滑，資

本流入針對未來財富的金融手段——投機性地押注於經濟將繼續增長。實體經濟的經濟增長放緩時，金融泡沫會不可避免的破滅，從而降低了資產的價值——如住房——那是虛擬資本賴以存在的資產。結果是大家都極為熟悉的——投資者的恐慌，股票和其他金融工具價格的大幅降低，以及金融部門高漲的破產潮。

在過去的 25 年，我們已經看到了一些金融危機——1987 年的股市崩盤，20 世紀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儲蓄貸款崩潰，以及這個十年的“Dot.com”泡沫的初期的部分破裂。然而，沒有任何一個金融危機，引發了全面的崩潰——嚴重衰退甚至全面蕭條——也即“實體經濟”投資和生產中的全面崩潰。隨著資本主義國家的融資，金融部門得以穩定，在這些恐慌後，“實體經濟”和華爾街恢復增長。

說到底，“實體”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健康緩和了這些金融恐慌的衝擊。一波的破產，兼併和收購浪潮淘汰了低效的固定資本（貶值的資本），提高勞動生產率（剝削率）的“精益生產”，以及放鬆資本和勞動力市場管制的新自由主義資產階級國家的政策，所有這些都刺激了利潤的上漲。資本積累的擴張“長期浪潮”減少了金融危機的長度和深度。

但是，當前的金融危機，達到了這樣一個地步，即有明確跡象表明，美國和全球資本主義經濟正在進入一個新停滯狀態的長期波浪中。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的長期繁榮期間，在實體經濟中，投資的真正增長——尤其是增加生產的資本化/機械化——現在正走向反面，指向了長期的利潤下降和停滯不前的資本積累。

在一個利潤長期下降的新環境下，開始於次級抵押貸款市場，並且蔓延到華爾街核

心的崩潰，對資本有非常不祥的預示。破產或接近破產的貝爾斯登，美國國際集團和其他企業和股票市場的不穩定是預示著尖銳而嚴重衰退的“火警”。如果金融破產無核查地氾濫，一個 1929 至 1931 年大蕭條那樣規模的生產的全面崩潰，可能隨之而來。

然而，全面的蕭條是不太可能的。資產階級對蕭條的政治效果有充足的理由感到害怕，這導致民主和共和兩黨的政客放棄一些正統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並核准——在深深的民眾憤怒中，經過一些混亂的政治談判後——某種布殊版本的 7,000 億美元方案，旨在為前投資銀行（現轉換成或吸收進通用全能銀行）和保險公司紓困。這種補貼，暫時和局部國家調控的恢復，可能會穩定金融部門和減少——但並不防止——來臨中的經濟衰退的深度和長度。與此同時，其他公司部門正在排隊領取其“商業凱恩斯主義”的慷慨股份的乾薪，特別是做慣了老大的三大汽車公司。

資本作為一個整體將為這個紓困方案付出代價。當政治上災難性的經濟崩潰得以避免時，利潤下降的根本原因——過多的固定資本——在金融部門的紓困後將繼續存在。因此，衰退後的利潤，將仍然太低，不能鼓勵在商品和服務生產上的新投資。與此同時，大規模的資本主義性質的國家融資，注入現金到銀行體系，由增加中的聯邦赤字給與資助，這將增加貨幣供應量。可能的結果將是太多的錢追逐太少的商品——即新一輪的通貨膨脹。

無論誰在 2008 年 11 月當選總統，都將可能面臨著同樣的“滯脹”——通貨膨脹和經濟停滯的結合——20 世紀 70 年代尼克遜，福特和卡特與之纏鬥不休的問題。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對工薪階層生活標準的更尖銳打擊將是目前危機的主要後果。我們這些革命左翼的人只能希望，滯脹的回歸，也將鼓勵早幾十年的工人階級和人民鬥爭的回歸。

在目前的危機中，對於積極分子，有一些基本點要提出來。首先，國會計畫把目前投機熱潮的收益私有化，其損失則社會化。

但是，如果有任何人應該受益於政府干預，那應該是普通公民，特別是數以百萬計這樣的家庭，他們因為過高的抵押貸款，以及新收緊的破產法，有失去家園的危險。

如果有資金購買以及“社會化”倒塌的大銀行，那麼這同樣的資源可以輕鬆地被用來重構掙扎中的房主的抵押貸款。也有錢用於建立廉價和節能住宅，醫院，公共交通和學校的工作計畫。

我們這樣做的時候，為什麼不把一些資金用於社會保障的維護，並確保通過一個單一付款人系統的全民保健制度？畢竟在該國中，醫療危機是破產的單一最大原因。單獨付款者是穩定住房市場的第一步！

其次，我們社會實在的無法承受的“奢侈品”，是戰爭和帝國的費用——喬治·W·布殊的伊拉克戰爭，最終將耗費 1 至 2 萬億美元，在 150 個國家的美軍基地，或者 2009 財政年度五角大樓的預算增加百分之六，現在高達 6215 億美元，包括 686 億美元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費用（但不包括後來帝國佔領所要求的全部“緊急補充”的撥款）。

第三，我們需要解釋為什麼政府和資本主義國家，對資本家的需求作出回應，而不是對大多數人的願望作出回應。民眾對救助華爾街的這一波憤怒，迫使政府和國會領導人在立法中，寫入一些溫和的規定，限制首席執行官在不平等日益嚴重的時候領取“過度”的薪金。這些姿態無法掩飾基本現實，即在危機時期，國家“社會化”資本風險，而把每個人最重要的必需品“私有化”。

本文初刊在“團結”網站。

查理·波斯特在紐約市教授社會學，是紐約市立大學教師工會的積極分子，也是“團結”的成員。

（衛眾譯自《國際觀點》第 405 期，2008 年 10 月號）

“氣候危機將結合資本危機...”

法蘭歌思·切斯奈斯

我將捍衛的觀點是，這場危機始於 2007 年 8 月，它代表了一場真正的休止，結束了世界經濟一個長階段的擴張。這場休止預示著一個危機進程的開始，其特點可同 1929 年的危機相比，雖然這一次發生在一個非常不同的背景中，而且因素是必然不同的。



法蘭歌思·切斯奈斯在 2008 年 4 月拉丁美洲巡迴演講 攝影：PUC-SP

重要的是先記住，1929 年危機的發生是一個過程：一個開始於 1929 年的漫長過程，它伴隨著華爾街的崩潰，不過其高潮來得很晚，出現在 1933 年，緊接著危機之後，一個冗長階段的衰退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我之所以這樣說，是要強調，在我看來，我們正在目睹的是開始階段，真正的開始階段，一個具有類似廣度和時間的進程的開始，即使這些類似性僅止於此。在紐約、倫敦和其他大證券交易中心的金融市場現在正發生的事情，只是一個過程的一面——幾乎可以肯定不是最重要的一面——一個必須被解釋為歷史停頓的過程的一面。

我們面臨馬克思所說的那種形式的危機，它標誌著資本主義的歷史限制，那裏的所有矛盾。這種說法不是要捍衛任何版本的資本主義“最後危機”論或任何類似說法。在我看來，問題是理解到，在我們所面臨的情形中，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局限性是顯而易見的。那末，須要瞭解的是什麼？但願聽起來不會像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傳教士，我願意給你們讀一段

‘資本論’的話：

“資本主義生產的真正限制是資本自身，這就是說：資本及其自行擴張，表現為生產的起點和終點，表現為生產的動機和目的；生產只是為資本而生產，而不是相反：生產資料只是不斷擴大生產者社會的生活過程的手段。以廣大生產者群眾的被剝奪和貧困化為基礎的資本價值的保存和擴張，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內運動，這些限制不斷與資本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須使用的並旨在無限制地增加生產，為生產而生產，無條件地發展勞動社會生產力的生產方法相矛盾。手段——社會生產力的無條件的發展——不斷地和現有資本的增值這個有限的目的發生衝突。因此，如果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發展物質生產力並且創造同這種生產力相適應的世界市場的歷史手段，那末，它同時也是它的這個歷史任務和同它相適應的社會生產關係之間的經常的矛盾。”[1]

危機的兩個新方面

當然，還有一些像“歷史任務”這樣的術語，今天我們將不再使用。另一方面我認為，今後幾年我們就要看到的這場危機，將恰恰在這樣的世界市場的基礎上展開，這個世界市場是馬克思曾經直覺到而現在是蓬勃存在的。這是我們所涉的不同於 1929 年世界局勢的一點。如中國和印度這樣的國家，那時仍然是半殖民地國家，沒有任何如今的特點。它們的特點（表現為綜合和不平衡的發展）需要細緻分析。但是，這些國家現在完全參與到了單一的世界經濟裏，直到歷史的現階段，這個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規模尚不清楚。

這樣開始的這場危機，其背景是這樣一個世界，即在與 1929 年的情況不同的意義上，這個世界是獨特的。這是第一點。以下是第二點：我認為，在這新的歷史階段，這場危機發展的方式將是世界氣候危機的殘酷現實同資本的結合，我們已經在見識氣候危機的初期表現。我們進入一個其複雜關係確實關乎人類的危機階段。這包括戰爭。一場世界大戰，在目

前這只可能是核戰爭，但即使排除這樣大規模戰爭的爆發，我們還是面臨著一種新的危機，即組合的經濟危機，它開始於自然界殘忍報復的情況下，因為在資本主義框架內，人類冷酷地對待和殘害自然。它是某種幾乎排除在我們討論之外的東西，但它本身將成為一個中心現象。

例如，最近我讀到法國社會學家弗蘭克·坡普的一本書[2]，它說安第斯冰川是拉巴斯和埃爾·阿托（玻利維亞）供水的來源，其 80 % 以上已經耗盡，而且據估計，在大約十五年內，拉巴斯和埃爾·阿托將不再有水可用... 這是自稱為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我們，從來沒有處理過的東西。我們從未討論過這些事實的性質和廣度。然而，這個事實可以大大地修改我們所知道的玻利維亞階級鬥爭：例如，首都遷至中部城市蘇克雷的運動，如此有爭議，它強行把自己弄作一個“自然”現象，就是因為拉巴斯將會缺水的緣故。我們進入一個這一類事實將干預階級鬥爭的時期。問題是，在革命的圈子內幾乎無人談到這一點，我們繼續討論的事情，其重要性在當前情況下是微不足道的，同我們必須正視的挑戰比較，是雞毛蒜皮的問題。

克服資本“內在障礙”的三種手段

為要繼續討論資本主義的局限性這個問題，我想返回比前面引用的更早的馬克思的話：“資本主義生產總是竭力克服它所固有的這些限制，但是它用來克服這些限制的手段，只是使這些限制以更大的規模重新出現在它面前。”[3] 有一個可有用於分析和討論的避雷探測器。在過去的三十年，美國後面的資產階級廣泛使用的，克服資本固有局限的手段，主要有三個。

首先是金融，貿易和投資的整個自由化進程，也即政治關係的毀滅進程，這些政治關係，出現於 1929 年和 30 年代的危機的基礎上，出現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國革命和民族解放戰爭之後。這些關係，沒有影響西歐或拉丁美洲的資本的存在，但在同一時間代表了對資本的部分控制形式，所有這些關係都被摧毀了。

第二個用來克服資本這些固有限制的手段，是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求助於虛擬資本和各種形式的信貸的創造，在該體系中心的國家裏擴大了不足的需求。

第三個手段，歷史上對資本是最重要的，是蘇聯和它的“衛星”國作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完整成分的全面復辟，尤其是中國，因為它標榜以財產和生產關係的受控改造而更加重要。

在這三個過程的矛盾影響的框架內，有可能掌握已開啟的危機的廣度和新穎性。

自由化，世界市場，競爭...

讓我們先看看，蘇聯解體後，舊蘇聯“陣營”以及中國同化於資本主義後所形成的空間，造成全球範圍內的自由化和放鬆管制的矛盾影響。自由化進程涉及到拆除建立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的國際框架內的調控要素，導致了一個差不多完全被剝奪了調節機制的資本主義。不僅放鬆了對資本主義的調控，而且一個世界市場實在和完全的建立了起來，轉化為大體上是馬克思直覺和預期到的現實。把世界市場的概念作個說明是有用的。“市場”這個詞是指從資本運作的限制裏釋放出來的估價空間，以這個空間作為真正的國際中心化和集聚機制的基礎，有可能為資本生產和實現剩餘價值。這種空間開放且不均勻，但卻嚴重的減少了資本流動性的障礙，能夠組織全球規模的估價週期。它帶來的情況，能夠讓所有國家的所有工人相互競爭。因此，它是建立在這樣的事實上的，即工業後備軍是真正全球性的，資本作為一個整體，按照馬克思的研究，控制著積累過程中對工作者作整合或排除的流向。

這就是在人類和世界大眾加入這一生產的可能性是非常有限的條件下，“為生產而生產”之過程的總體框架。這就是為什麼，對於作為一個整體的資本和每一個特定的資本，要取得資本估價週期的積極成果越來越難的原因。而且它來自於這一事實，即在世界市場上“盲目競爭律”不斷發揮更大的作用，並且變得更具決定作用。中央銀行和政府可以嘗試彼此協商合作以克服危機，但我不認為把合作引入世界範圍是可能的，因為世界已經成為資本之間可怕競爭的場所。而且現在資本之間的競爭遠遠超出世界體系的老牌和最發達部分的資本之間的關係。它包括按資本主義觀點看來最不發達的階層。因為在包括最寄生的特定形式中，在世界市場上，一個資本集中化的進程，離開帝國主義中心的傳統框架而發生了：同他們有關係，

但條件是在世界框架內也引進一些全新的東西。

能夠按照自己的權利把自己結合進世界壟斷寡頭的合作夥伴的工業集團，在過去 15 年來，特別是在最近的階段，已發展到該系統的特定點。在印度和中國真正強大的資本主義經濟集團已形成。在表達為石油收入和它特有的寄生物的金融水準上，主權財富基金成為資本金錢重要的集中點。他們不是美國的簡單衛星。他們有自己的戰略和自己的戰術動作，在決定及將要決定資本生命的關鍵點，在許多方面修改地緣政治關係結構。

因此，我們必須考慮的另一個層面是，這一危機標誌著美國可以充任一個沒有對手的世界強權而行使的階段的結束。我認為，我們已經離開了梅薩山羅斯分析過的階段，他在 2001 年的著作《美國將經受考驗》中是這樣說的 [4]：在很短的時間移動過程中，他們的世界關係已被修改，美國將不得不立足於他們必須分享權力這樣的事實，就這些世界關係重新談判，並且重組它們。而且，當然，在資本的歷史上這是從未以和平方式發生的事... 所以，第一個因素是資本選來克服其局限性的手段之一，它變成一個新的緊張、衝突和矛盾的源泉，因此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已通過這一危機而開啟。

不受控制地創造虛擬資本

核心經濟資本使用的克服其局限性的第二個手段是，廣泛訴諸於創造完全人為形式的有償需求的擴大。這加上其他形式虛擬資本的創造，產生出當前的金融危機的條件。在一篇《手段》雜誌的同志好心轉譯成純正西班牙語和發表的文章中 [5]，我用相當長的時間檢查了虛擬資本的問題，即它的積累和給它以特點的新過程。對於馬克思，虛擬資本是證券的積累，是既成投資的“影子”。以債券和股票的形式，它們出現在作為資本持有人的眼中。對於作為一個整體的系統，它們不是資本，但對於它們的持有人，它們是資本，並在“正常”的經濟條件下，在資本估價過程的結尾，它們確保他們的分紅和利益。

但其虛構性質出現在危機局勢中。當過度生產危機發生時，加上企業的破產等等，這種資本可以突然消失。你在報紙上看過這樣或那

樣數量的資本“消失”在股市下跌之中？作為恰當稱謂的資本，這些款項並不存在，儘管事實是，對於這些股票的持有者，這些稱謂代表了分紅和利益的權利，獲得部分利潤的權利。

當然，今天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在許多國家，養老金系統基於虛擬資本，它的形式是擁有的利潤股份，而這種利潤在危機的時候會消失。1980 年和 1990 年代的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的每個階段，加強了虛擬資本的積累，特別是手頭掌握的投資基金，養老基金和金融基金。早在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出現並貫穿於本世紀的巨大的新鮮事是，對虛擬資本形式貸款的創造，尤其是在美國和大不列顛，有一個不尋常的推動。給公司信貸，而且也特別給家庭貸款，提供消費信貸和抵押貸款。因此，我們目睹了在創造大量虛擬資本的方面的質的飛躍，導致更尖銳形式的漏洞和脆性，甚至涉及到次要的衝擊，包括完全可預見的事件。例如，根據對以前的經驗所做的充分研究，這些經驗讓我們知道，房地產熱必然會以眾所周知的內在原因而結束。當股市存在股票無限上升的幻覺這一點比較易於瞭解時，整個前面的歷史表明，這不是真實的財產：當我們談論建築物和房屋時，這一點是必然的，即繁榮在某個時間會終結。但金融投機持續的增長和成功的依賴程度是如此強烈，以致於這個正常而且可預見的事件轉化成了一個導致巨大危機的因素。對我所說過的，我需要加以補充，即在過去兩年的繁榮裏，貸款給了沒有起碼償還能力的家庭。而且，所有這一切結合了新的金融“技術”——我已經在上述發表於《手段》雜誌的文章中做了解釋 [6]——允許銀行出售指定的綜合證券，其出售的方式，使得沒有任何人能夠確切地知道他們買了什麼。這就解釋了 2007 年開始的“次貸”效應蔓延的毀滅性特點，也特別揭示了“毒品效應”強烈地毒害了它們之間的銀行關係這個事實。

現在，我們在見證這一進程的“解體”。必須要清除 n 次累積的虛構“資產”，它來自銀行的平均有效資本控股（其本身包括債務，這個時候被視為“可回收的”）之 30 倍的負債率，這種“解體”當然有利於金融資本的集中。當美國銀行購買美林時，它代表一個典型的集中進程。我們 9 月 17 日看到的危機跨越步伐，是財政部和聯儲局不阻止萊曼銀行破產的決定引起

的。9月18日，他們不得不改變立場，並大規模地援助美國國際集團 AIG。債務國有化的過程意味著一個新的虛擬資本的創造。美國聯邦儲備局增加大量的虛擬資本以保持幾近破裂的虛擬資本（銀行和投資基金）的價值體制中心化的幻想，連帶被迫在特定時間大力增加財政壓力的前景，而實際上聯邦政府又不能這樣做，因為這意味著收縮國內市場並加速危機步伐。因此，我們在目睹一場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的輕率冒進。

這個過程的框架內，我們還看到，主權財富基金力量的增長，其效果是在金融領域裏修改資本間的分佈，使它有利於積累這種類型基金的養老金這一塊。它是這一進程的又一個干擾因素。

要結束這第二個方面，我們應該記得，正是其 7-8 % 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對外赤字，給美國以資本估價週期的戰略中心的特點，在實現剩餘價值的時候，估價週期這是決定性的。不僅對於美國控制下的資本，而且對資本整體估價的進程，這是真的。現在，面臨著一個不可避免的准經濟衰退，大的問題在於中國是否能夠替代美國，在此時此刻成為這一保證實現剩餘價值的地方。美聯儲局和美國財政部的干預程度解釋了為什麼在美國活動的收縮和進口的下降至今相當緩慢和有限的原因。現在的問題是，他們創造越來越多的流動資金作為單一的經濟政策工具，這種做法能夠堅持多久？是否有可能無限制地創造流動資金形式的虛擬資本以保持已存的虛擬資本之價值？我看，這似乎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假設，美國經濟學家本身也對其非常疑慮。

中國的過度積累？

最後，我們來看看資本尋求超過其固有限制的第三條道路。這點最重要，而且提出的問題最有趣。我指的是，對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關係的整個系統的擴展，特別是在中國的擴張。這是馬克思有一次曾提到的可能性，但只是在近幾年它才成為現實，而且它在擴大危機因素的條件下實行了。中國的資本積累成立於內部程式，而且還是在某種完美引證但很少評論的東西的基礎上：經濟的第二產業的很大一部分的轉移——消費品部門——從美國到中國的轉移。這大為增加了美國的赤字（貿易和預算赤

字），唯一可能扭轉赤字的是美國的巨大“再工業化”。

這意味著，美國和中國之間建立了新的關係。它們不是帝國主義強權和一個半殖民地國家間的關係。美國已創造了一個新類型的關係，他們現在面臨承認它並承擔後果的困難。立足於貿易順差，中國積累了億萬美元，隨即借給美國。後果的一個例子是兩家名為房利美和房地美公司的國有化：中國銀行掌握了這些公司的 15 %，並通知美國政府，它不會接受它們的貶值。這是一個全新類型的國際關係。

但是，如果危機的傳播形式是出口大幅下降並影響生產，以及銀行結構和中國上海證券交易所的危機，會發生什麼事？在我已經提到的文章[7]中只有最後一頁談到這個問題，但按某種方式，它是危機下一階段的最具決定性的問題。

在中國，出現了一個資本之間競爭的內部進程，它結合了中國政治機器各部門之間的鬥爭和它們之間爭奪吸引外國公司的競爭的過程。除了導致大規模的自然破壞外，它還引起了巨大生產能力的創造過程：在中國一個資本的過度積累集中了起來，在某一時間，它將難以承受。在歐洲，加速搬遷的生產能力和工作機會，轉移到這一資本主義世界的奇異天堂，即今日中國，這在大工業集團中間是聲名昭著的。我的假設是，這一資本向中國的轉移，導致以往積累運動的改變，並造成資本有機構成的一個新興起。激烈積累的手段是生產和原材料的非常浪費，及固定資本的其他部分。第一產業（生產工具）生產能力的大規模創造是中國增長的發動機，但讓這一生產運行以及實現價值和剩餘價值的最終市場，已經是世界市場。它的不斷惡化，使經濟衰退籠罩在資本積累上。邁切爾·阿格裏塔，對它作了專門研究[8]，明確肯定，確實存在過分積累，即在中國有一個生產能力加速創造的進程，在外部市場萎縮時，這一進程將帶來落實整個生產的問題，這正是今天開始的情形。中國確實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因為即使是其經濟的小規模的變化都會決定世界上許多其他國家的經濟狀況。如果中國對投資商品的需求下降一點，對於德國，這足以使它的出口損失和進入衰退。中國的這些“小振盪”非常強烈的反響在其他地方，對於阿根廷的情況也應是顯而易見的。

繼續思索和討論

回到我起初所說的地方。即使它們可比較，由於美國的生產過剩危機從一開始就一直發生下來，危機的這個階段不同於 1929 年。此後，它加深了，但顯然從一開始它就接近於生產過剩危機。今天相反，主要的大資本主義國家實施的政策正在推遲這一時刻，但它們不能做更多的事情了。

同時，如同 1929 年和 1930 年危機時發生的情況，即使在不同的條件和形式下，危機與資本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完全重組其力量的經濟關係的必要性相結合，這標誌著這樣的時刻，即在重新談判他們與中國和世界其他地區的關係時，美國將看到它的軍事霸權只是一個因素，一個從屬的因素。當然，除非他們從事後果難以預料的軍事冒險，目前，國內政治條件的現實不允許它以任何方式這樣做，但不能排除如果經濟衰退導致了長期的蕭條和革命運動它不會這樣做。

出於所有這些原因，我認為我們正在處理的遠不止一個金融危機，即使我們目前處在這個階段。即使今晚我不得不專心於嘗試解開虛擬資本的線團，並幫助理解為什麼這個資本是如此難以拆除，我們正面臨一個無限廣泛的危機。

考慮到抵達布宜諾斯艾利斯後，以及甚至今天晚上在這裏，我所看到的問題和各種觀察，我有個印象，許多人認為，我在描畫此刻資本主義的一個大災難圖片。我確實認為，我們正面臨一個大災難的危險，而不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災難，不是一個“最後的危機”，而是人類的大災難。如果我們嚴肅地考慮氣候危機，可能已經有一些大災難的東西了。例如[9]，我同意梅薩山羅斯的看法，但我們沒有多少人同樣重視它，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正面臨一個迫在眉睫的危險。悲慘的是，目前這僅直接影響到其生存不在考慮之列的人們：在海地發生的事情似乎沒有任何歷史意義，孟加拉發生的事情在受災地區之外沒有意義，發生在緬甸的事情也沒有影響，因為軍政府的控制阻止它讓人知道。在中國也是同樣的：我們討論了增長的指標，但不管其他生態災難，因為鎮壓機器控制關於這個問題的資訊。

最糟糕的是，“生態危機並不像聲稱的那樣嚴重”這種觀點，不斷地由媒體發出來，非常

地深入人心，包括一些左翼知識份子。我已開始工作撰寫關於這個問題的文章，但由於金融危機的開始，我在一定程度上被迫回頭關注自己的財金情況，儘管我相當不滿這件事，因為在我看來，本質的東西處於另一個層面上。

結論：所有這一切發生在這麼長的階段之後，這個事實，在資本主義的歷史上沒有可比較的類似事件，50 年不間斷的積累（除了在 1974-1975 年有短暫的間歇），而且資本主義的領導圈，尤其是中央銀行，從 1929 年的危機中吸取了教訓，這一切意味著危機的發展是緩慢的。自 2007 年 9 月以來，領導圈的話語不斷重複說，“最壞的時期已經過去”，而這時可以肯定的是，“最差”的在我們前面。

這就是為什麼我堅持，風險就是儘量減少這種情況的嚴重性。我建議，在我們的分析和我們處理這些事情的方式中，我們必須整合的起碼的可能性就是，我們可以無意中把這種在一天結束時“無事發生”的說法，滲入人心。

我們在這裏再次發表給阿根廷評論《手段》雜誌會議的論文，會議召開於 2008 年 9 月 18 日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發表在《手段》雜誌，39 期，2008 年 10 月。

法蘭歌思·切斯奈斯是 ATTAC 法國科學理事會成員和幾本書和許多經濟學文章的作者。

注釋：

[1] 卡爾馬克思，《資本論》：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94-c3/ch15.htm>

[2] 弗蘭克·坡普，《1999-2007 玻利維亞書籍，泥土氣息》，2008 年巴黎版本

[3] 卡爾馬克思，《資本論》，同前。

[4] 伊什特萬·梅薩山羅斯，《社會主義或野蠻：從美國世紀到十字路口》，每月評論出版社，2001 年。

[5] 《迴圈結束。金融危機的範圍和方向》，《手段》雜誌 37 期，2008 年 3 月。本文最早出現在法國，見法蘭歌思·切斯奈斯，《一個週期的結束，金融危機的範圍和進展》，《紅方孔》第 1 期，2007 年 12 月-2008 年 1 月。

[6] 同上。

[7] 同上。

[8] 見邁切爾·阿格裏塔和伊維·蘭德裏，《走向超級大國的中國》，《經濟學》，巴黎，2007 年。

[9] 伊什特萬·馬盛隆，《唯一可行的經濟》，每月評論出版社，2007。

經濟危機、氣候危機和糧食危機

《紅色》雜誌對法蘭歌思·切斯奈斯的訪問記

“氣候變化的推進速度，影響最貧窮和最脆弱的國家的人口，使他們遭受幾方面的聯合影響，這幾方面是世界經濟衰退，全球變暖和農業政策對眾多國家的影響。”

問：目前的危機，同在過去二十多年的那些危機有什麼不同？

法蘭歌思·切斯奈斯：這場危機正在結合全球社會危機原有的非常嚴重的層面：即南方的氣候危機和糧食危機，造成危機的原因是農業領域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以及汽車展銷大廳的力量，使其惡化的原因是基本商品的期貨市場的投機。一個文明危機的這些層面和經濟金融危機之間的融合將給予這個危機一些具體特點。此外，同以往任何時刻，甚至是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刻相比，在更大的程度上，這次是一個世界性的危機。

問：是什麼組成危機的這個全球特性呢？

法蘭歌思·切斯奈斯：它的震央在美國和英國，金融全球化的關鍵國家，其虛擬資本擴大的專門運動敗壞了信貸系統。價格的小型崩潰和極度動盪，通過我們所謂的“消極預期”，把危機蔓延到企業以及家庭。另外的非常嚴重的後果，是嚴重壓縮依據於證券交易股票的養老金。由於信貸癱瘓，危機蔓延到習慣於訴諸個人信用或被迫這樣做的公司和家庭。以房地產和抵押貸款為引擎推動2002-2007年人為增長的國家，它們的這些機制走得比較超前，那些地方的養老金同金融市場的連接發展得最廣泛。不過，沒有一個老牌工業化國家得以逃脫。股票交易與直接投資的密切關聯，是自由化的結果，它意味著衰退結果在各經濟體之間傳播。

問：所謂的“新興”國家在危機的發展中將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法蘭歌思·切斯奈斯：中國併入世界貿易組織就已助長了危機的準備。世界工業後備軍的質的擴大是資本和勞工，以及“剝削的上升趨向”（見邁切爾·胡森一文）之間的力量關係變化的支柱之一，這是一個世界的進程。我們經常聽說，新興國家同危機脫鉤以及認為它們具有相當的危機免疫力。這是錯誤的。美國和歐洲開始的經濟衰退已經導致了日本和中國出口增長的放慢。我們已經看到其在德國的機器出口，在如阿根廷一類國家的農產出口上的反響。中國“野蠻資本主義”捲入了工廠、基礎設施、辦公室和住房的投資競賽中，其標誌是馬克思常說的無政府狀態的競爭。以撒·約書亞回顧說，1929年至1933年的危機有兩個極點，美國和德國。這一點可能是相同的，即亞洲和中國成為生產過剩危機的未來震央。有兩手“新牌”，一個在美國，一個在中國，毫無疑問可以阻止它。它們會要求在這兩個國家，組成一些旨在重大的財富再分配的社會集團。那樣做的政治條件是遠未存在的。在統治階級，占主導地位的思想是，只要作一些小的改進，仍然有可能保持現有系統一如既往。

問：您能多說一些與生態危機的關係嗎？

法蘭歌思·切斯奈斯：氣候變化的推進速度，影響最貧窮和最脆弱的國家的人口，使他們遭受幾方面的聯合影響，這幾方面是世界經濟衰退、全球變暖和農業政策對眾多國家的影響。目前，這個挑戰文明的問題，被處理成彷彿是一個維持秩序問題。但是，在某些國家，聯合影響無疑將是如此之大，以致它將從經濟上反彈，惡化經濟衰退，並引發被剝削群眾的反應。

原刊《紅色》2008年10月，衛眾譯自《國際觀點》第406期，2008年11月號。

毒性資本主義

蜜雪爾·胡森

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危機，正在動搖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之根本基礎。它正在加速發展，沒有人能說它將走向何處。

本文不準備一步一步地跟從危機展開的步驟，因為到本文出版時，它可能會變得過時。而是尋求提出一些該危機的解釋關鍵，並表明什麼是關係到整個社會的危險。

金融危機的機制

複雜的金融危機使我們有點頭暈，但仍然可能查明其主要機制[1][2]。出發點是存在著相當大量的“自由”資本在尋求最大的盈利。每隔一段時間，這個資本會發現新的礦層，並釋放一個以“自我實現的預言”為生的動力：通過把現金沖向似乎最賺錢的地方，資本家實際上提高了成本，從而證實了使這種現金衝動得以啟動的樂觀主義。那些作出警告，解釋為什麼證券交易所或抵押貸款市場不能走得太高的人，似乎顯得荒唐，因為制度就這樣運作。

圖 1 指出了那些主要事件：1987 年的證券交易崩盤，其後，另一個發生於 1990 年第一次海灣戰爭前。從 1995 年中期，開始了被稱為“新經濟”的階段，它伴隨著證券交易瘋狂的上漲。東南亞和俄羅斯的危機 --- 和美國長期信用管理（LTCM）的破產 --- 在 1998 年只是暫時壓扁了泡沫，到 2000 年開始時，它激烈爆發。

兩年後，迅猛向前的飛行再次開始，並最終導致 2007 年 7 月的次貸危機。為了泡沫能夠起飛，擁有可用資本是不夠的；還須規章制度不設置任何障礙。於是，用政治性質的決定，通過執行複雜的金融創新和日益不透明的操作回避規章。我們可以用杠杆效應做例子，它有可能把金融機構最初配置的總和成倍地擴大。衍生產品使複雜的購買

業務和前瞻性出售成為可能。銀行可以擺脫呆帳，方法是把它們與其他的一起放入一種運氣袋，然後再以保障（某種證券保障的術語）的形式出售。風險附加的各種債務開始分發流行，不再組成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的一部分，從而擺脫審慎規則，該規則要求把債務限制於金融機構本身股值的一定比例。

次貸危機爆發在一個相對狹隘的經濟部門，它貸款給貧困戶並用他們買的房子作擔保。這些合同是真正的詐騙，因為銀行清楚地知道，它們不會被償還。但是，證券擔保化使得擺脫它們是可能的。房地產市場的衰退正好與第一批的屋主破產合拍：這些用腐朽貸款擔保的房屋的山出售已經不再可能，即使可能，則其售價也不再多於起初的貸款。住房危機開始了鏈式反應：一個接一個的銀行發現它們的虧損，並逐漸無法獲得新的資金來源，以彌補這些虧損。為了防止了一系列破產，中央銀行和政府注入資金或“國有化”部分銀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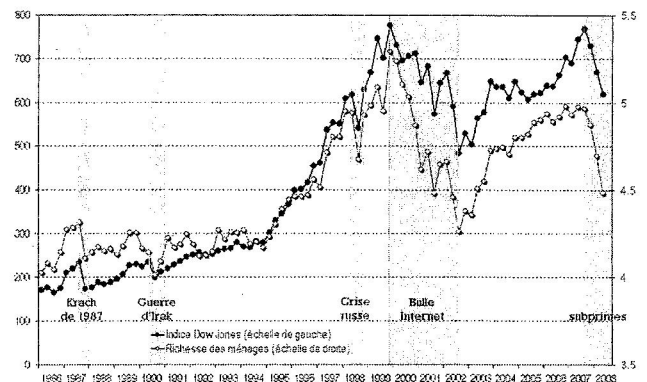


圖 1: 美國證券交易和家庭財富

- 目前價格的道瓊斯指數（基點 100 1960）
- 家庭的淨財富作為他們目前的多重收入。

圖表來源和資料：<http://hussonet.free.fr/toxicap.xls>

從虛擬到真實

這個簡單的概括提出了幾個問題。最根本的是，從虛擬經濟到實體經濟的通道。每一個金融危機，比如目前正在發展的，事實上，必須被解釋為價值規律對秩序的要求。

金融資產有一個“價值”。如果我有一百萬股，其價格是 100 歐元，那末我的財富是 1 億歐元。如果我的股票價格翻一番，那末我的財富也翻一番，如果它的價格掉了一半，我就失去 5 千萬歐元。但這些數字只是衡量我金融財富的虛擬價值。當我試圖擺脫股票，套取現金，以便買真正的東西，比如房子，唯有這時，利潤（或虧損）才成為真正實在的東西。股票交易市值，即股票的總價值，本身並不意味著什麼。金融市場主要是二級市場，例如，在那裏，有人出售維旺迪的股票，以購買法國電信股票。根據供給和需求，這些股票的價格會波動，但這些交易也是虛擬的，即在這些交易中價格的實行是比較象徵性的。這些特定種類的價格，可擴大上千倍，彷彿他們就像一個特殊的貨幣，同實際貨幣脫節的貨幣。因此，我們可以想像一個經濟體，那裏每個人都將是一個股票的億萬富翁，但條件是不尋求出售其股票。為了使表達方式真正的雄辯，我們要有一個真正的經濟在按部就班地進步，以及一個金融領域在以難以置信的速度膨脹。

但是，雙方之間持久的分離是不可能的，因為金融領域和房地產領域之間存在著“轉換節點”。一個增長率在 2 個或 3 個百分點的經濟，不可能像股票辯護者聲稱的那樣，提供一個百分之十五的普遍利潤。只要來自金融資產的收入再作投資，那末財富的增加就無關於任何實際方面的物質聯結，而且其誤差可能成為無限的。但是，如果其中由金融資產組成的那部分提款權尋求轉移到實體領域時，換言之，對貨物作交換時，這種轉讓必須符合價值規律，或者更切實地說，符合供需規律。讓我們實際想像一下，這一新的購買力，沒有在生產方面找到一個對應的部分，也沒有成功地成為來自工資需

求的替代品：然後通過價格上漲作調整，這等於是收入貶值，包括財政收入的貶值。這事實上解釋了股東對通貨膨脹非常敏感的原因，因為出自於他們財富的真正收入取決於它。但是，如果這種貶值發生，它會影響到財富的估價，於是股票的價格必定下降，以期符合它們提供的實際收入。

金融資產代表生產的剩餘價值的股份權。只要沒有行使這一權利，它就仍然是虛擬的。但只要有人行使這一權利，他們就會發現，它受制於價值律，這意味著，非常簡單，你不能分配比所生產的財富更多的實體財富。從客觀的角度來看，證券交易的價格，因此代表了企業的預期利潤，用它可以支付財政收入。但是，他們已經完全失控起飛，同以剝削人類勞動為基礎的資本利潤，現在保持的只不過是一個遙遠的關係。在整個資本主義歷史上，這種現象從未達到過這樣的範圍，而且它不可能永遠下去。

金融化的經濟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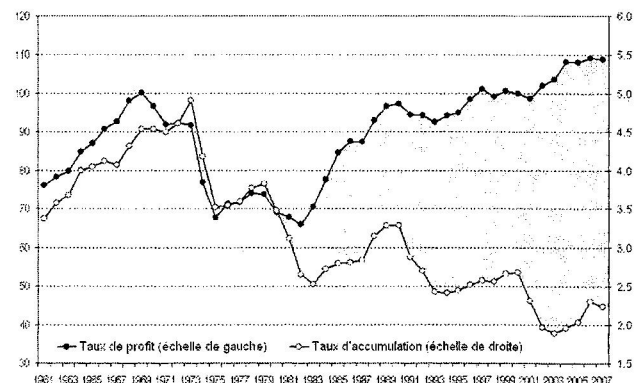


圖 2：速率的利潤和積累率：美國+歐盟+日本

• 積累率=淨資本數量的增長速率 • 利潤率=利潤/資本（基點：100 於 2000 年）

來源和圖表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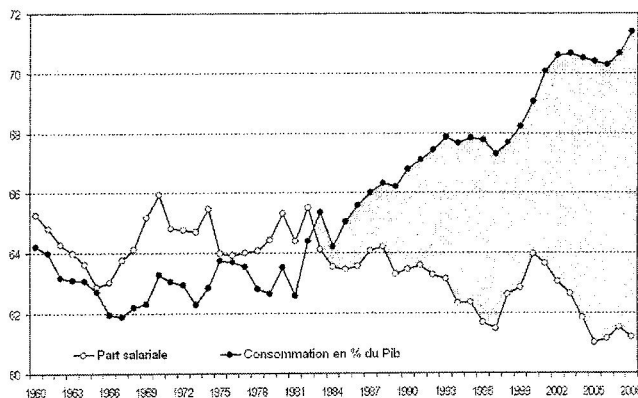
<http://hussonet.free.fr/toxicap.xls>

金融泡沫並不僅僅依據於投機者的貪婪妄想。它們由自由資本的持久創造而得以營

養成長。第一個來源是非累積盈利的趨勢增長，它本身來自一個雙重運動：一方面，工資[3] 普遍下降，另一方面，儘管有利潤率的重新建立，積累速率還是停滯，甚至下降。圖 2 表明，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開始，利潤率和積累率平行進化，然後分歧開始加大。灰色區域可以衡量剩餘價值的非累積部份的增加。

這種新的和空前的結構先驗地帶來了一個現實問題：如果工資所占的份額下降，如果投資停滯，誰將購買所生產的東西？換句話說，什麼是符合這個新的模式的再生產模式？只有一個可能的答案，即：非工資收入造成的消費必須補償工資消費的停滯。這的確是正在發生的事情，如圖 3 所示。

圖 3：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中的工資和私人消費份額



資料來源和圖形：

<http://hussonet.free.fr/toxicap.xls>

對於事情是如何演變的，我們可以按照程式化的方式，歸納如下：在美國，工資所占的份額仍然相對穩定，但家庭消費增長大大快過國內生產總值。在歐洲，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所占的份額仍然相當穩定，儘管工資的份額有明顯減少。這兩種情況下，工資的份額和消費的份額（灰色區）之間的差距都擴大，以彌補利潤和積累之間的差額。金融就是用來實施這一補償的東西，爲了做到這一點，它遵循三個主要途徑。首先是股東消費：把非積累剩餘價值的部分分配給金

融收入的持有人，他們是它的消費者。這是很重要的一點，即：再生產是可能的，前提是，用股東的消費支援工薪階層的消費，以提供足夠的市場，因而不平等現象的增加同這一模式是一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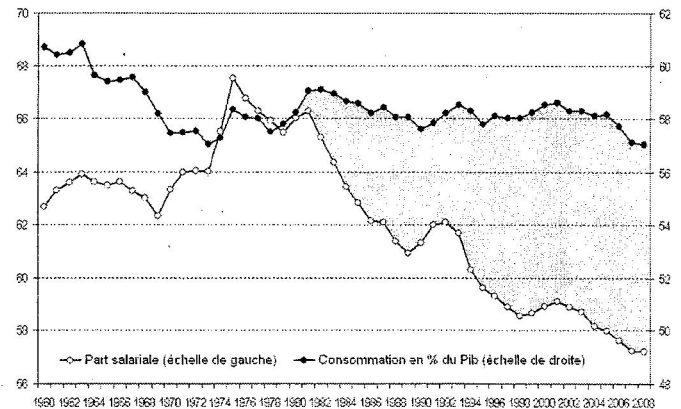


圖 4：歐洲聯盟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工資和私人消費份額

資料來源和圖形：

<http://hussonet.free.fr/toxicap.xls>

第二，資金的干預在於把某種混淆引入工資和投資收入之間：工薪階層收入的增加部分採取金融報酬的形式，該報酬可分析爲剩餘價值的分配，而不是實際工資。最後，這尤其是美國的實情，即金融有可能使家庭的債務大量增加，這些家庭消費量的增加，並不是因爲工資上漲，而是因爲儲蓄率的減少[4]。

因此，金融不是一個健康身體上的寄生蟲。它提供了非投資性盈利，但它隨即獲得了某種程度的加強這一機制的自主權。自由資本流通，尋找最大的利潤（著名的百分之十五的規範），並取得成功，至少暫時在某些部門取得成功。銀行本身攫獲越來越大份額的利潤。這種最大利潤的競爭，提出了盈利能力的規範，並精選出多一點被認爲有利投資的地方，從而放出新自由資本，新自由資本轉而又去尋求金融的超盈利能力。這種惡性循環是再次基於收入分配，這種分配不利於工作者，也不利於承認他們的社會需求。

向實體經濟的傳送

1987 年，證券交易崩盤導致多數經濟學家設想一場世界經濟的殘酷減速。但發生的是相反的事情：從 1988 年起，發達國家經歷了一個非常活躍的增長週期。因此，股票交易危機沒有被轉嫁給實體經濟，相反，它被清潔了，又可能重新開始。清理賬目和消除跛腳鴨，畢竟是危機的一個傳統功能。幾年後，一個大規模房地產和抵押貸款危機襲擊日本，日本當時正展現崛起中的征服世界市場的力量。然後開始了為期 10 年的幾乎為零的增長，使日本的經濟有很大的困難需要避開。

因此，金融或多或少是根據地點和時間而獨立自治的，今天，我們必須弄清楚的問題是，金融危機是否會傳給實體經濟。第一個論斷說，不能主要用金融危機解釋目前的衰退，還要考慮其他因素：石油和原材料價格的上升，歐洲的貨幣和預算不足的政策，新興國家的競爭等。根據這一論斷，金融危機首先集中在美國，對世界經濟形勢的影響將相對較小。按照所謂的脫鉤理論，新興國家的需求將在那裏接管來自美國的危機。中央銀行和政府的干預將有可能避免一系列類似 1929 年的巨大危機，並把銀行的損失分攤到時間層面上。總之，金融領域和經濟領域將相對分割化。

這種分析基於不可否認的現實，但並不從這些現實推出違背其相對樂觀主義的結論。誠然，危機同幾個方面相結合，特別是石油和原材料價格的上升。但是，這些各個方面都屬於同一系統，它們使我們回到根本上的一個共同起源，就是當前世界經濟的結構組織。如果你認為危機可分隔為一些密不漏風的部分，你就根本不會理解目前的危機。這幾個方面的同時性，會在相反的方面，加強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傳輸。它將按照六條主要管道傳輸，管道的相對重要性可以因國家而異：

1. 收縮信貸（信貸緊縮）在金融危機的傳播中發揮了很大作用，因為陷入虧損困難

的銀行無法成功地再融資。但是，這些限制也牽涉到家庭消費和公司投資。這種影響，在如美國或英國這樣的國家，將尤其顯著，在那裏家庭消費靠的是舉債。

2. 證券交易價格的下跌，貶低了持有者的金融和房地產的價值（見圖表 1），迫使他們減少消費。這是“財富效應”。

3. 廣義不確定性 --- “信心喪失” --- 影響人們消費和投資方面的行為。

4. 這樣的住房危機促使總體經濟的減速。

5. 分配給各救援計劃的可觀撥款數目必將削減公共開支或增加稅收。

6. 最後，經濟減速通過貿易和投資傳播到整個世界經濟。

所有這些機制目前在作用中，它們結合危機（石油等）的其他方面，影響的擴大，遠遠超出了金融領域。因此，金融和實際經濟之間沒有隔離牆，因為金融是新自由主義之資本主義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

危機走向何處？

今天嘗試預測這種危機正在把我們帶向哪里，將是不成熟的（和輕浮的），但它的規模使得回到正常狀態這件事，令人難以置信。在任何情況下，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是：美國模式的根本基礎將因金融危機而受到質疑。這種模式立足在一個雙赤字，一個對外貿易的赤字和一個國內儲蓄的赤字。在這兩種情況下，金融在管理這些不平衡現象時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國內，是金融使得債務的增長有可能，尤其是在抵押貸款市場；對外部，其職能是確保平衡支付。但是，如果金融緊縮，則這個增長模式的基礎消失：家庭債務從此被制止，而外國資本的進入也不再有保障。因此，金融危機將導致美國經濟增長的持久減速，這將傳送到世界其他地區。

但與此同時，不容易看到可以取代它的東西。實在的辦法須是回到某種形式的“福特主義”，該主義的基礎是工資的增加並行於生產力的提高，收入的分配較少不均和重新平衡外貿。這種模式的可能性是抽象的，而且它假設一個目前無法實現的社會關係的殘酷反轉。如果奧巴馬當選，今天看來是可能的，我們不能指望他進行“羅斯福”方案：他缺乏政治意志，而且也缺乏資源工具，因為救援計劃將持久地占去相當的預算。

擺脫美國模式的具體方式將影響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第一個未知因素涉及到美元匯率，它應繼續下降，因為它是美國的一種手段，能刺激其出口和減少其貿易赤字，而且還在實質上減少美國國債。但是，這把衰退出口到歐洲，全球都對於匯率被高估的歐元敏感。美元的下落，或甚至維持在目前的匯率，提出了另一個問題：資本會繼續流入美國嗎？新興國家和石油生產國很可能在某一個時刻點，因為盈利不足或風險增加，阻止資本出口。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他們沒有興趣採取行動削弱美元，因為他們以美元方式持有的錢也將貶值。另一個因素也必須考慮到：如果美國經濟放緩持久，新興國家的一個重要出口管道將乾涸，促使他們重新把其增長的中心放到國內市場。很難平衡這些不同的因素，這些因素將不會以同樣的速度演變，但我們仍然可以提出兩個預兆：

1. 擺脫經濟危機必要的時間，成正比於用於拯救金融部門的巨大資金。最有可能的演變軌跡是日本式的情節，需要幾年的時間消化吸收被吞沒了的大量資金，這是我們在上次金融失敗裏，從另一個聯盟中已經看到過的事情。如果沒有實行替代的措施，至少在發達國家，資本主義將發現自己處在緩慢增長和社會倒退的情況下。實體經濟的衰退已經與我們同在，而且其客觀的決定性因素，例如汽車業的危機，正在繼承金融風暴。

2. 擺脫危機的方法將以主要經濟角色的激烈鬥爭為標誌，每個人都尋求把危機的後果轉嫁給他人。在社會層面上，這意味著資本反對工資和社會支出的壓力加大。在國際層面，大國之間的商業和經濟戰爭將發生在更大範圍裏，將產生一個世界經濟分化的趨勢，更甚的是，如德國財政部長彼得·史坦布律克施說的：“美國將失去其作為世界金融體系超級大國的地位”。

經受考驗的歐洲教條

在危機期間，競爭仍在繼續。宣言聲明和政府決定的刺耳聲音部分地反映了這種兩難境地：一方面，每個人都明白，這場危機需要全球性的解決方案，但是在同一時間，每個人都試圖從該形勢裏攫取益處，或至少保存本錢不失。對於個人資本這顯然是真的，對保爾森計劃方法的討論也涉及到了這個問題，即：是否有必要拯救所有的金融機構或者只是救一些“跛腳鴨”？但是，在著名的世界政府的層面上，它尤其是真的，大家已經能夠觀察到國家利益的力量之捲土重來。

分佈在世界市場上的資本可能會發現，返回國家政府保護傘下的港口和庇護所，是非常有利的。但是，我們不能談論“政府的回來”，因為政府總是在最後的訴求中，為資產階級的利益提供保證。再次，關於“帝國”的論文，表現出其局限性：全球化沒有消除資本和資本主義內部對手之間的競爭，也沒有導致一個世界資本主義政府的形成。在歐洲，所暴露出來的程度不等的危機影響，解釋說明瞭協調的困難，並表示不存在一個真的歐洲資本。只要這是一個注入流動資金的問題，歐洲中央銀行就會干預，理所當然地應對突發事件。但是，一旦這是一個要納入預算的支出問題，我們看到，在“憲法”上，歐洲聯盟被剝奪了面對這種危機的手段。法國希望有歐洲規模的救援計劃，德國和愛爾蘭則寧願每個國家各自有自己的政

策，兩者之間的差距日益擴大。如果危機發展，這些分歧無疑將會暫時被克服。然而真的情況是，這危機將持久地質疑歐洲新自由主義建設的根本原則。此外，它還將突出歐洲經濟結構上的弱點：即使在中期，“悲觀情緒是必然的”。[5]

對勞動者的影響

今天正在發生的一切，彷彿該危機是一場人所共遭的自然災難，而且法國總理菲隆沒有忘記呼籲民族團結。恐慌的氣氛被工具主義（實用主義）地具體化了，把我們每個人都置於投機者的地位。銀行的破產是個威脅恐嚇，它也威脅最保守的存款者。這一切顯然不是某種陰謀，但它有助於試圖掩蓋什麼是社會上危急的事情，我們可以用一個真正的問題對它作總結，即：誰來為該損害付款？

目前關注的是富人，但是現在必須把勞動者考慮在前，不應那麼多的關注儲蓄者，而應多關注勞動者或養老金領取者。這場危機已經破壞了數以百萬計的美國家庭，它帶有非常嚴重的後果，首先影響到養老基金最發達國家的養老金領取人，如在美國和英國。在這兩個國家，該系統已經處於破產的邊緣，退休金的實際價值隨著證券交易倒臺將明顯下滑。這是一個應該吸取的教訓：把你的退休金放到證券交易所賭博絕對是一個非常糟糕的主意，任何救助保護計劃應考慮到事情的這一面，而保爾森的計劃顯然缺乏這種考慮。

勞動者身處雙重火線：直接地，因為公司要盡力彌補他們的財務損失，將以通貨膨脹和石油價格上漲的風險為由，並利用大環境的不確定性，更為嚴格的凍結工資。他們也將受到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間接影響，它將帶來一連串的倒閉和裁員。在美國和法國，就業的喪失已經開始。他們也將是福利開支削減的首當其衝的受害者，削減的原因是為了彌補金融救援計劃的費用。

消除金融和社會屏障

從反資本主義和/或全球正義的角度看，這場危機是對金融資本主義批判的一個明顯確認。所有讚揚金融好處的經濟學家，今天大肆演講調控它的必要。在法國，薩科齊無法找到足夠的狠話譴責資本主義的過分行爲，而把按揭貸款的發展放入了他的方案。所以，意識形態景觀在極為迅速地變化，我們必須從新自由主義主張者的潰敗中攫取力量。

但是不管怎樣，這場危機並不自發地創造一種有利於替代方案的氣氛。所有回收翻新的新自由主義者都費盡心思，他們把自己理想的救援計劃擴大，其擴大的根據有透明度，審慎的比率，投資銀行和存款銀行的分離，證券重新納入資產負債表，限制高層管理人員的薪酬，信貸評級機構，會計準則改革等。

正如其中一人所提出的，這是一個“從資本主義者手中拯救資本主義的”問題。[6]這些提案破壞社會自由派的穩定，因為基本上那是他們自己的方案。但是，這完全是一個最低綱領，甚至可能轉移對真正的問題的注意力。正在擬議的一些措施必須得到支援，如禁止避稅天堂，但對金融管理當局和政府貫徹落實它們具有信心，那會天真幼稚的。他們必須是更廣泛計劃的一部分，該計劃旨在消除金融並把社會問題放在前面。再次，金融化的最終來源是拒絕滿足社會大多數人的需求。因此，你不能把金融泡沫一勞永逸地爆發掉，卻沒有關掉供應泡沫水的龍頭。

這個方向的發展可以根據國家的不同而有差別。在歐洲，它可以結合兩條軸線。第一軸是銀行的國有化。但是，這正是他們在做的，人們將反對的。這個論點可以轉變：這一點恰恰證明它是可能的！而且我們正在尋求的國有化，只是把損失社會化，其功能是保存私有化的金融。真正的國有化必須無條件地進行，它必須涉及整個系統，因為所有的金融家要對危機負責，不管他們是否因

為危機失去了金錢。否則，它只是為銀行部門的改組提供國家援助。

第二軸，可稱為社會屏障，它相對於稅收屏障而言，在法國，稅收屏障保護富人不受累於稅收。但保護工人免受危機的影響，真的是一個問題，因為沒有人可以坦然地爭辯說，他們負有任何責任。與此同時，我們必須考慮一些措施，它們可給不同分佈的收入提供基礎，並且立足於一個社會正義的基本理由。應當禁止公司在繼續支付其股東巨大紅利的同時，他們繼續裁員，進一步擴大有風險的工作和凍結工資。在法國的情況下，公司支付的淨股息占 2007 年的工資總額百分之十二點四，而 1982 年只占百分之四點四。

因此，危機就是發動反對轉讓紅利給工資的時機。不是凍結工資，而是在工作者的控制下，把分紅凍結在目前水準，並且把它們轉移到打算作其他用途的共同基金上，現在正是時候。

這些款項可用於維護失業者的收入（禁止分紅，從而在資金上幫助禁止裁員）和用於資助社會保障，社會預算和公共服務，其比例將要民主討論。另一項措施將包括強制維護工作者的購買力，其做法是，對於拒絕維持工作者購買力的企業，按相應比例，撤出政府對它們的援助。這些是唯一能夠使那些對危機有責任的人付出代價的措施，這將為更好的財富分享奠定基礎。潛在涉及的總和有九百億歐元：這是百分之五的法國國內生產總值（GDP），換言之，同美國保爾森所設想的 7000 億美元計劃，比例正好相同的。

蜜雪爾·松，經濟學家，負責巴黎經濟社會研究所（IRES）。他是左翼智囊團 Copernic 基金會成員，也是 ATTAC 科學理事會的成員。剛剛出版了《純粹資本主義》，洛桑，2008 年，第二版，可以在 <http://hussonet.free.fr> 查閱他的著作。

注釋：

[1] 詳細說明見‘回聲報’，“每天全球金融危機”，<http://tinyurl.com/toxico2>，或雅克·薩皮爾，“金融震撼的 7 天”，<http://tinyurl.com/toxicol>。

[2] 綜合介紹，見蜜雪爾·阿格裏塔，“瞭解危機的 10 項要點”，新觀察家，9 月 25 日，2008 年，<http://tinyurl.com/toxico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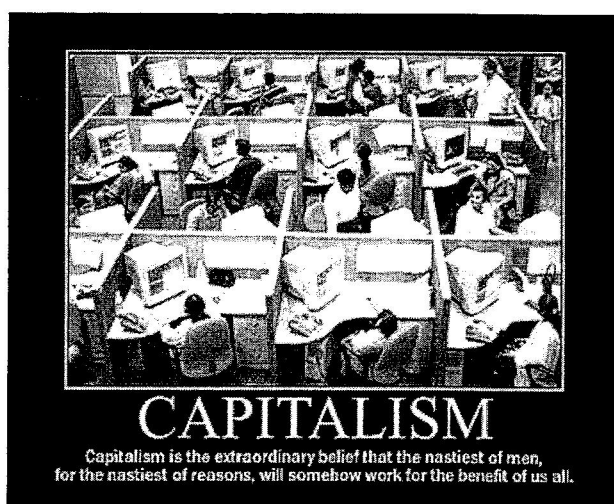
[3] 見蜜雪爾·胡森，“剝削率的上升趨勢”，Inprecor 534-535 期，1 月至 2 月，2008 年，<http://hussonet.free.fr/parvainp.pdf>。

[4] 見蜜雪爾·胡森，“美國：一個模型的結束”，突破，3 期，2008 年，<http://hussonet.free.fr/usbrech3.pdf>。

[5] 派翠克·阿圖斯，“歐元地區在中期內的經濟形勢會是非常悲觀的嗎？”
<http://gesd.free.fr/flas8420.pdf>。

[6] 路易吉·津加萊斯，“為什麼保爾森是錯誤的”，2008 年 9 月，<http://gesd.free.fr/zingales.pdf>。

（衛眾譯自《國際觀點》2008 年 11 月號，第 408 期）



關於國際形勢的報告

法蘭索瓦·薩巴多

本報告介紹了我們眼中國際形勢的最重要特點，沒有涉及每個問題，它可能會被標記為某種歐洲中心主義，導致某些問題的部分解決方法。另外，關於國際建設的問題和下次世界大會最緊迫的事情，隨後會有一份報告。



2007 年夏末以來，國際形勢的明顯特點，是金融和經濟危機衝擊全球經濟。這一危機的出現形成了一個轉捩點。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因為它代表一個時刻，包括幾個過程，是發生在 20 世紀末和 21 世紀初的歷史改變的一部分，特點是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及其矛盾。

對該危機，我們已經根據法蘭歌思·切思奈，厄裏克·圖桑和革命共產主義聯盟(LCR)經濟工作組的分析作了研究。

1. 在一個美國經濟週期終結的意義上，這是一個轉捩點，該週期起於 2003 年的經濟回升，以國內消費膨脹和大量債務為標誌，在非常低的利率和降低財務費用的基礎上，該機制導致當前的“房屋泡沫”。因此，發展了“次貸系統”，即浮動利率風險貸款系統，給最脆弱的家庭貸款。連帶外國資本金融赤字和美元貶值，這是 2003 年至 2008 年美國增長模式的主要機制之一...但是，2005 年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美聯儲，美國中央銀行）提高利率，使得經濟機器失調，造成數百萬負債家庭的破產和崩潰，從而導致重要信貸

機構的破產並使銀行體系動搖。因為信用是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特點。事實上，為了維持高額和定期的利潤，動態的需求是必要的。它不會來自工資，因為雇主把工資壓得很低，也不會來自充分發展的新興國家的國內市場，也不是來自從分配給股東的收入，因為股東數量不足以支援需求。因此，當代資本主義在房屋信貸用戶裏發現了這方面的需求。這個危機過程在美國發作了。

2. 我們所面臨的不僅是一個金融和銀行業的危機，而且是一個真正的經濟危機。全球化金融體系特有的機制把次貸危機在世界範圍內擴大。它挑起償債能力和流動資金的危機，打擊了整個國際貨幣體系。這導致資本大規模的注入美國經濟（國會通過超過 1680 億美元的經濟重新擴張計劃）導致利率下降，在另一方面，因歐洲中央銀行（ECB）拒絕降低其利率而導致新的緊張局勢。但這項政策不足夠讓經濟機器再次開動...

由於美國經濟衰退的預測正一點一點地被證實，美國地產業已經崩潰。其他國家如西班牙、愛爾蘭和澳洲採用了與美國相同的住房貸款機制，因此也受到危機的打擊。

✦ 美國經濟活動正在減緩。

✦ 美國和歐洲的經濟增長預測為 1.5 到 2 % 左右。

✦ 2007 年 1 月，美國經濟創造的就業機會的結算結果是負的。2007 年 1 月，美國經濟失去了 17 000 個工作。

✦ 在房地產和工業界分別喪失了 2.7 萬和 2.8 萬個工作。市場估計創造了 7 萬個就業機會。在法國，2007 年創造了 30 萬個就業機會，但在工業界喪失了五萬多職位。

✦ 300 多萬住戶將發現自己無家可歸。

✦ 我們正在重建將造成數以萬計失業者的體制。國際勞工局（ILO）估計，將有五百萬以上工人失業。

在目前階段，這個金融危機的代價是數百億元的損失。

這場國際金融體系的危機導致信貸收

縮，從而使得經濟活動減速。各大銀行需要清理（把“爛債”從“良好投資”中清理出來）從而導致經濟活動放緩。

行政當局及美國聯邦銀行正面臨著一個可怕的兩難局面：要麼重新啟動經濟，降低利率，注入流動資金，加劇赤字和債務，加大通脹壓力，並有貨幣貶值惡化甚至導致美元崩盤的危險（這是一個真正的危險：在五年內，美元已貶值 25%，增加了危機的風險）或者，通過提高利率，或減少債務，嘗試減少不平衡，而這會導致經濟活動大幅下降，他們發現自己正處在一個經濟衰退中。

3. 在這場危機的源頭，有切思奈稱之為“不間斷積累的長期階段”，即自 1950 年以來的一個不間斷（沒有戰爭或革命）的資本積累過程。這是資本主義歷史上的這種類型的過程的最長階段。這個金融化的起源與資本主義是一體的，即與利潤積累是一體的，利潤不再投資於價值和剩餘價值的直接生產。這些利潤的定價遊離於生產過程之外，而僅僅通過金融市場的交易來確定。此外，還有兩個其他的金融交易，也按同樣的方式定價：私人退休基金和同石油收益連接的資金流動。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不斷地被市場吸收能力所限制。如果商品生產和服務業沒有足夠的利潤，那麼投資就會落在其他地方：對投資在商品生產的每 1 美元或歐元，就會有多得多的資本金尋求在證券交易、投機基金、財產投機、黃金、金融和貨幣交易中為自己定價——這是資本主義利潤積累的邏輯，是私有資本和私有生產資料的邏輯。

20 世紀 70 年代末也有轉捩點，同自由反改革思想和華盛頓共識有關，它導致我們所謂的“資本主義全球化”，就是說，一個標誌著“大大超越經濟範圍的資本主導”的社會，一個通過經濟的“大規模商品化”和“大規模金融化”的迅猛擴張而來的市場社會。這個全球化的實現，只能通過在俄羅斯、東歐國家和中國那樣的大國裏恢復資本主義的過程，重新整合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來達成。這強烈刺激了世界資本主義的增長，不過這個資本主義受到一些矛盾的破壞，這些矛盾同金融資本的迅猛擴張是相連的。

但這種增長也是三十年左右的某種類型積累的結果，特別是因為：二十多年來，經濟中的工資份額的下降，分配給工人的那一部分財富生產的下降。結果，這剩餘價值，比全國財政收入增加得更迅速，被一小層財富擁有者壟斷了，這些財富擁有者在瘋狂地搜尋越來越多的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這導致的結果是：巨大過量的流動資金和金融資本，離開實質經濟而自立，並且自行其是。它運作到這樣的地步，使得不平衡過大，以致引起危機：這是正發生在美國的事情，在整個 2000 年的頭十年裏，那裏一直存在著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實質經濟最慢的增長（即使是有一些增長）和最強烈的金融經濟擴張之間的矛盾。這是美國增長模式的限制，該模式的增長今天正在弱化甚至消耗殆盡。

新的世界力量關係

4. 但是，它顯示了新的世界力量關係，顯示了美國、歐洲和新興國家如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印尼、南非、馬來西亞之間的新關係，在這個意義上，它也是一個轉捩點。

20 世紀 90 年代的危機幾乎只觸及所謂發展中國家：1994 年至 1995 年的墨西哥危機，1997 年至 1998 年的亞洲金融危機，1998 年的俄羅斯危機，1999 年的巴西危機，2001 年至 2002 年的阿根廷危機……這一次，危機沒有爆發在週邊，而是在中心。

北方金融體系的危機是如此，以致我們眼睜睜目睹資本外逃到如印度，中國和巴西這樣一些國家的證券交易所。北方國家被迫接受由南方的“主權財富基金”拯救他們的金融機構。

這些資本運動也以金融形式表現實質經濟的變化：

世界 GDP 分佈的變化：在過去十年，根據所有的估計，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在世界 GDP 的份額增加了一倍，從 6 % 升至 12 %。當然，關於中國的統計是不可靠的：2007 年 12 月，世界銀行承認，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按購買力平價（折算為我們用這筆錢可以購買的等價物）被高估。2005 年國內生產總值不應該是 88190 億美元，而是 53330 億美元。對貧困家庭數目做計算時，這使得一個主要結果有幾千萬的差別，但這個或那個數

字之間的這些差別，不會讓人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總趨勢有疑慮，該趨勢就是：修改世界經濟力量間的均衡和相互關係。

經濟增長率的提升，商品和服務生產的增加，全球勞工分工的變化是顯而易見的。作為世界“工廠”或“工廠”，中國得益於部份世界生產機器（特別是美國）的搬遷和再定位的整個運動，也獲益於大量的分包業務。同時，這一重組加強了中國資本主義。她現在應該是第三或第四位的世界強國。她已是僅次於德國和美國的世界第三大出口國。她是資訊技術生產的第二大國。雖然其消費比例仍然薄弱，但在固定資本的生產性投資上，特別是在基礎設施和關鍵經濟部門上，有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增加，增加了 25 % 以上，甚至有導致“經濟過熱”的風險。

她是接受外國資本直接投資（外國直接投資，FDI）的第一個國家。還有一個需要加以研究和澄清的問題：在中國的外國投資中，什麼是來自散居於香港、臺灣的華人資本份額以及美洲華人資本的資本份額...，它們與本土資本合併可以給整體中國資本相當的實力。中國和印度的增長率在 8% 和 9% 之間，而美國和歐洲在 1.5% 和 2% 之間。中國製成品的出口已積累了數量可觀的儲備外幣：到 2007 年 12 月，它們價值超過一萬四千億美元。它有一個 2.5 億到 3 億居民之間的市場。

中國，印度，俄羅斯和巴西的國內生產總值加在一起，其經濟權重潛在地相當於美國的——我所以說‘潛在地’，是因為它是“四個國家的經濟”權重，而不是一個單一國家的單獨一個經濟體的權重。亞洲國家和石油國家積累的儲備相當大。2007 年底，發展中國家一共持有 46000 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而工業化國家持有的不到其三分之一。亞洲國家的商業盈餘和這些外匯儲備，被置於美國的短期國庫券，股票，私人債券中。正是它們，實際上在補貼美國的赤字。

5. 當然，現在我們也不應低估這些新的世界經濟巨頭對美國經濟的依賴。美國繼續扮演世界經濟火車頭的角色。它代表了 25 % 以上的全球 GDP，不要忘記歐洲，它的 27 個國家，代表了約 25 % 至 30 % 的全球 GDP。美國市場仍然是中國生產面向的一個主要市

場。35 % 以上的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依賴於出口，即使有些專家解釋說，中國經濟的出口敏感性正在減少。中國國內市場沒有足夠的容量來吸納中國的生產。大西洋彼岸的嚴重經濟衰退難免會影響世界經濟活動，而且也會影響中國，即使是有限的。但中國身上的更重的壓力是程度巨大的社會不平等，城鄉之間的難以忍受的緊張，有所減少但仍然非常嚴重的影響著數億人的貧困。對貧困的統計往往低估了它。

但有一個新的世界經濟結構，讓我們提出一些問題，即同整合新興國家時的世界經濟危機有關的分析問題。

兩個替代假說

如何擺脫目前的危機，答案大部份就在亞洲，美國和歐洲之間的關係中：

* 目前的金融危機揭示了一個過度積累和生產的過程出現在所有亞洲經濟體裏——中國、日本、韓國、臺灣、印度。這標誌著世界需求的總體下降，它可能導致類似 1929 年危機的總危機發生。中國內部市場的限制，約 6 % 至 7 % 的通脹上升率，社會不平等的增加，特別是在農村，貧窮的錢袋急速增加，糧食危機以及遏制機制靈活性的中共 (CCP) 獨裁，這些加重了危機爆炸一側的份量。但也有一些其他的假設：

* 或者，用內部需求的增加和內部市場吸收中國生產的新能力來補償外部需求的收縮，然後，會有再啟動經濟機器的新可能性。中國生產過剩的唯一補救辦法，是把基於出口增長的經濟活動調整為以更多內需為中心的增長。如果這樣，美國和歐洲的“反危機”機制和新亞洲能力的結合，可以遏制危機。在任何情況下，有必要研究並且再研究發生在中國的事，尤其是因為我們缺乏其內部知識，而且由於傳統和我們關注的國際趨勢基本集中在一系列歐洲和拉美國家。研究亞洲必須成為一個優先事項。

惡化的勞動階層的力量關係

6. 經濟-世界正在改變其軸心。但這些經濟進程表達了世界政治全景的變化，力量關係的變化。

a) 這個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新階段是長期的，

這期間，從勞動階層的角度來看，其相關的勢力在全球削弱瓦解。開始於 1970 年底的自由主義高壓，再加上俄羅斯的重整，東歐國家和中國融入世界市場，為統治階級的主動性提供了新能力。自由主義反改革思想，社會關係的開放，再加上新技術的引進，轉換成靈活性和不穩定的工作，改變了資本主義剝削的形式。在世界勞動力市場的章程的框架內，被置於彼此直接競爭中的工作者數量，有相當大的增加。

b)此外，隨著世界經濟的變化，在資本和勞動之間也有一些新的勢力關係。從社會力量的總關係的角度來看，這個世界的重新定位，發生在這樣的國家，在那裏，具有工會或政治形式的獨立工人運動，在結構上是薄弱的。在美國有工會的存在，但從未有大规模的工人黨。史達林主義所造成的破壞，粉碎了俄羅斯和東歐國家中獨立工人運動形式的可能存在或出現。在中國和印度，數千萬人進入工資勞動經濟，但至今沒有政治或工會代表。中共的獨裁，迄今已阻止了獨立的工人組織的發展，即使在中國有越來越多的衝突和社會暴動，表明存在萌芽形式的協會或工會。在印度，情況更為複雜，因為在許多州有一些起源於親蘇聯或親中共的組織。

亞洲，特別是中國和印度的獨立社會組織的存在和發展，對於世界各勢力的社會政治關係，將是決定性的。在一系列東歐國家的部分政治復蘇——包括工會的重建，新一代工人進行的鬥爭激烈的罷工，和政治左派尤其是波蘭和俄羅斯左派的重生，以及斯洛文尼亞的工會戰鬥——必須專注地遵循進行下去。

c)儘管這些工作階層在退卻並且有一些變化發生，但在穩定世界局勢方面，全球化的資本主義並不成功。不存在一個新的世界秩序：

- 首先，由於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內部矛盾，特別是資本主義金融積累模式的限制，戰爭的風險；

- 其次，慢性的社會阻力，包括初級階級鬥爭，反對高昂生活費用的暴動或動亂，控制自然資源的運動，民主的反叛。

- 最後，政治危機。資產階級領導的危機與左右兩派的政治代表性危機，甚至公開的政治制度危機結合在一起。拒絕布殊，德國大聯

盟的無能，義大利的嘉年華，和薩爾科齊的越軌行為是這種現象的例子，而這發生在帝國主義中心。

陷入泥沼的美國

7.這些新結構在國際政治領域有結果，被削弱的美國資產階級和在這個新的世界競爭中要保持其地位的歐洲強權，尤其是面對中國和俄羅斯，他們的利益使他們聚集在新的聯盟系統裏。這遠不排除為各個資產階級侵略性地尋找新的市場份額，以及世界經濟中保護主義緊張局勢的發展，但美國和歐洲聯盟的政治聯繫趨於加強。薩爾科齊的法國和布殊的美國的新關係是這個轉捩點或變更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希拉克反對伊拉克戰爭。薩爾科齊支持它。他甚至站在與伊朗對抗的前線。但更廣泛的，法國返回北約和融入這個聯盟內歐洲軍事力量的設想，則清楚地表明正在進行的重組類型。

美國處在新選舉的前夕（在 2008 年年底），它能夠導致美國政策的轉變或修改。美國和國際政治的大問題，將是弄清楚美國是否會從伊拉克撤軍。

極有可能，為了根本的原因，佔領會繼續。在過去的長時期，美帝國主義已確認了其戰略上的政治軍事重新部署的政策。正如歐尼斯特·曼德爾指出的，二十多年前它就面臨一個矛盾，面臨著經濟及美元的下降趨勢和其政治軍事機器霸權之間的不對稱性，該軍事機器得到以軍備為中心的經濟的支援。這些深刻的傾向使克林頓，奧巴馬，甚至麥凱恩之間的細微差別或分歧是相對非本質的，即使美國競選展開的方式，以某種樣式表現出美國政治制度的缺失。不過說到美國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和政策，這是一個用侵略性的軍事政策補償一些經濟轉弱的問題，該政策就是佔領伊拉克和阿富汗，對抗伊朗，在較小程度上與俄羅斯和中國對抗。這一方向，還包括一個“再殖民化”某些國家的政策，目的是保持或甚至擴大對自然資源或石油一類戰略原料的控制。

但軍事上的優勢並不自動意味著軍事勝利。“新越南”是美國媒體經常慣用的形容當地美國軍隊情況的說法。政治上和軍事上，布殊政府是真的陷入了困境。無論是在伊拉

克，還是在阿富汗，美國不會贏得戰爭。以色列沒有贏得對黎巴嫩和真主黨的戰爭。他們不能在伊朗重複“伊拉克方案”。重新武裝的俄羅斯和美國，兩國之間的緊張也影響到世界關係。最後，就像在巴基斯坦、阿富汗或某些非洲地區那樣，整個衝突地區都正在出現“失控”衝突地區的情形。造成國際形勢的不確定和未知要素，帶有前所未有的戰爭風險。從軍事的角度來看，即使美國仍然“第一”，在單極世界秩序後面，我們正看到多極力量關係的一些要素在出現。

8.也正是在此框架內，必須考慮新的社會和政治現象，它們不採取階級矛盾或極端化的形式，標誌著或將標誌著世界局勢的演變。我將不會詳細探究它們，但它們有一些重要的後果：

- a) 全球氣候變暖的生態危機和後果已經開始，並有可能在長時期內引發新的災難——生態的，社會的和人類的災難。我們剛剛在這些牆壁內舉行了一個研討會，發展我們關於氣候問題的思想。
- b) 組織，流派，宗派或宗教群體的存在，當然，有必要分析他們的特點，但有一個一般的趨勢。可以有進步的宗教流派，但在全球範圍內大部分宗教流派是反動的。這正是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境內所涉及的情況。應該指出的是，宗教現象的增加也影響到資本主義中心的國家：薩爾科齊對政教分離的質疑，福音派在美國的崛起。
- c) 也有必要考慮非洲一系列國家的破裂傾向，而且還要考慮其他危機的出現和後果，像巴爾幹地區的情形一樣。

拉丁美洲的後果

9. 美國陷入伊拉克的方式有國際上的後果，尤其在拉丁美洲，更是如此。問題不在於低估了“帝國”仍然加在它視為後院的拉美大陸的壓力，因為哥倫比亞最近對委內瑞拉和厄瓜多爾的攻擊提醒了我們。按相同的方式，有必要把一場國際經濟危機給拉美大陸可能帶來的後果，連帶拉丁美洲地位的惡化，特別是有關的農業出口和某些原材料問題，融入我們的分析。其地位的這種惡化，會加強北方的壓力。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

更需要指出的是，拉美大陸的親美右派，特別是它的先鋒隊：哥倫比亞烏里貝政權獲取主動性的能力。有“哥倫比亞計劃”在，更有查韋斯在 12 月 2 日全民公決的失敗，再次給美帝國主義一些獲得主動權的能力，就像凍結委內瑞拉國營石油公司（PVDSA）資產的試圖表明的那樣：在巴拉圭也有軍事基地。

仍然要給玻利維亞“政變者”（putschist）右翼和秘魯及墨西哥“自由—專制”右翼以支持。美洲自由貿易區（FTAA；西班牙語，ALCA）是一個失敗，然而美國和一系列南美國家之間的雙邊條約已經締結。但是，儘管過去數周在拉丁美洲的情況中，出現了有利於美國、哥倫比亞和極右力量的調動和轉變，我們還是必須加緊削弱美帝國主義對拉美大陸的幹預能力。介入伊拉克和阿富汗，又準備幹預拉丁美洲，在軍事層面上是很困難的，雖然美國保持對南美的壓力，無可否認的是，一個新的力量關係出現在美帝國主義和一系列拉美大陸國家之間，而且它並非是最不重要的。這種力量關係有利於兩個國家集團。

第一組集團由巴西，阿根廷，烏拉圭和巴拉圭組成。獲益於一個經濟發展的階段和執政政府的能力——巴西的盧拉，阿根廷的基什內爾，烏拉圭的塔巴雷·巴斯克斯——引導，控制和整合他們的群眾運動，或更確切地說，整個他們的領導層，尤其是巴西的工人黨（PT）和聯合工會聯盟（CUT），以及阿根廷的庇隆主義政治工會派（即使盧拉比基什內爾更靠近右派）的那些領導層，這些國家的統治階級已贏得了新的談判迴旋餘地，並在美帝國主義身上強加了一系列經濟要求。他們按自己的利益，以自己的方式，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伴隨他們的是“社會援助”的一面。尤其是以其農業出口政策和同國際金融體系的特殊關係，他們已經強力打進了世界市場。這個以巴西和阿根廷為首的國家集團，今天佔據中心地位。

第二組今天正在承受一個與美帝國主義部分破裂的新經歷，它由委內瑞拉領頭，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緊隨其後，他們都得到古巴的支持。這些國家，每一個有它的特性，今天正試圖減緩債務的束縛，取回他們天然資源的所有權和控制權，確保食品、保健和

教育的社會方案，恢復其國家主權，反對美國和歐洲（尤其是西班牙）的壓力。在這些政治和體制的變化下面，存在社會運動和群眾運動的動力，這些運動持續活躍在整個大陸，當然有程度的差別。巴西的形勢顯示社會動員水準的一個下降。阿根廷則繼續有一個高水準的鬥爭，還連帶強力的工會和協會，但他們的政治意見表達極其脆弱。托洛茨基遠左派的三個選舉集團的選舉得票結果低於 2%。正是在玻利瓦爾省、厄瓜多爾和玻利維亞動員的過程中，社會運動保持一定程度的自發活動。在一些國家，這些運動同激進的或革命的民族主義潮流的進步相連。

委內瑞拉，一個關鍵的國家

從這個角度來看，很多事情依賴於發生在委內瑞拉的事。革命過程依然開放，但查韋斯處在一個十字路口：要麼，他前進，再次同最具戰鬥力的團體連接起來，滿足基本大眾的要求，玻利瓦爾省革命進程將重新啓動和深化；否則，他須屈從整個政府官僚和雇主階層的壓力，包括來自玻利瓦爾省過程內部的壓力，尋求引導、調和及阻止這相同的過程；而且他將失去作為其社會和政治基礎的各重要團體的支持。全國工會（UNT）或‘社會主義潮流’的某些工會領導人的幹預，提醒我們政府的當前航向。不過還有，一切都在運動。

玻利維亞危機正在加速，在那裏，莫拉萊斯和大多數人、工人、農民、印地安人捍衛的新憲法雖然通過，卻不被右派和集中在桑塔·克魯斯和西部省份的“富裕白人階級”承認，西部省份中有四個地區剛剛宣佈了它們的自主權。為了本憲法的實施，為了滿足玻利維亞人口中最貧窮階層的生死攸關的需求，革命者都站在莫拉萊斯的社會主義運動（MAS）一邊。

但關鍵的國家是委內瑞拉。如果玻利瓦爾省進程失敗，這在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將會有立即的反響，更遑論古巴。卡斯特羅的引退開啓了一個新的政治局勢。直接或間接的幹預風險始終存在著，這讓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記住要與古巴團結一致反對帝國主義。但是，正如菲德爾說的，危險在於革命從內部被消耗掉，而且現在有一場辯論正

進行著：與市場應該有什麼樣的關係，他們應不應該走中國的道路，可以有什麼樣的革命民主空間……一句話，這所有一連串的問題，我們必須解答。

歐洲的社會阻力

10. 歐洲，因為經濟競爭力削弱和政治癱瘓，儘管它在世界上的地位更減退了，仍然是一個主要的，為保護權利和社會成果而發生衝突的對抗地區。尤其是，這些政策在資本主義的歐洲有一系列的後果，在那裏，歐洲主要的資產階級，為確保他們在世界競爭中的地位，身先士卒地攻擊“歐洲社會模式”，事實上是攻擊社會保障制度，工人的社會權利，公共服務。這項政策集中在新的“歐洲條約”上，該條約全盤採納 2005 年被法國和荷蘭人民拒絕的歐洲憲法的計劃大綱。由於融入歐洲聯盟的東歐國家的緣故，該條約正在得到加固。

這種整合已導致了一系列社會權利的廢除，並因此把這些國家佔多數人的階級的整個生活和工作條件降低。在法國，薩爾科齊政府的思想家已公開宣佈：要廢除 1945 年抵抗運動全國理事會（CNR）的方案和那以後的所有社會成果。薩爾科齊宣佈，他“要超過撒切爾夫人的改革”；但他既缺乏有力量的關係，也沒有政治工具來實施他的方案。

資產階級領導和政治代表性的危機，在一些國家的政治生活中舉足輕重。尤其是，對養老金和某些工人階層的特殊養老金制度實施其反改革立場，通過壓低工資和質疑社會權利，統治階級繼續贏得一系列的得分點，但他們還沒有戰勝工人運動。在像法國、義大利和德國這樣的國家中有社會阻力。20 世紀 80 年代，在“英國礦工”型的歐洲，沒有發生過一次工人運動的重大失敗。重要鬥爭和主要對抗仍然擺在我們面前...

...及其弱點

不過應作三點注解：

鬥爭是防禦性的。它們不能阻止，更不能扭轉反改革過程。它們表現為暴動或局部的鬥爭。它們可以適度地動搖制度；但是，這並不能停止反改革進程。

在整個歐洲，這些鬥爭是程度不等，因

國家而異的。在法國，階級鬥爭水準仍然相當高——歐洲人在談論“法國例外”——在義大利也是這樣，在 90 年代結尾和 2000 年的頭十年的開始，有一個由工會運動和強大的全球正義及反戰運動的總罷工組合期。最近，在德國有一個鐵路工人的重要罷工，即使它是一個沒有得到其他工會和大部份工會左翼援手的罷工。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社會鬥爭的水準仍然很低。在北歐國家，儘管有較強的攻擊，情勢仍在政府和工會運動領導層的控制下；鬥爭水準是相當低的。

在有一定程度鬥爭的國家裏，必須強調一個矛盾的局面：在鬥爭水準和覺悟水準之間有一個真正的不平衡。可以有局部鬥爭和暴動，卻沒有階級鬥爭浪潮的簡單增長——隨著一個全球水準的鬥爭，工會和工人政黨成員有所增加，而且階級鬥爭和革命政治潮流有所增加——就像 20 世紀 60 年代末，以及 20 世紀 70 年代的歐洲，尤其是歐洲南部的情形一樣。因此，所作的鬥爭難以找到使用階級鬥爭術語的政治表達。

接受或拒絕資本主義全球化——兩個左派

11. 在當前國際經濟形勢下，面對資本主義全球化，左派、工人運動、社會運動面臨兩個主要趨勢：一個方向是適應自由資本主義，另一個是（我們的）抵抗，鬥爭以及反資本主義的戰鬥路線。在法國，我們有一句套話來形容這種情況：我們認為，“有兩個左派”。當然，在現實中還有幾個不同的“左”，但我們真的面臨一個根本的選擇：接受或拒絕這種資本主義全球化！

相當大部份的工人運動——社會民主黨，前史達林主義或後史達林主義，綠黨——的傳統領導層，和某些發展中國家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選擇了適應。這是融入國家體制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整個過程的結果。但這個當今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整合過程，用日益強大的債券，不僅用政治體制而且用資本，使得所有這些政治組合發生了質的變化，結構性變化。選擇斯特勞斯·卡恩（法國社會黨的主要領導人）掌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是證明！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要求如此，使得達成統治階級和改革運動之間的社會妥協的迴旋餘地，大大減少。

大經濟集團，金融市場，政府高層要求改革派領導層接受這樣的框架，該框架旨在尋求最大的利潤，增加世界經濟的金融化。結果，社會民主轉化為社會-自由主義。面臨階級鬥爭，社會民主黨用它的支持交換反對社會改良的資本主義秩序，我們從這樣的社會民主黨轉移到社會主義政黨，在變成“自由主義反改革政黨”之前，先成為“沒有改革的改革派政黨”。

在歐洲，歐洲聯盟提供了基督教民主黨和社會民主黨之間的協作框架，目的是部署對養老金的反改革，和清算社會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務。這並不排除在援助最貧窮階層的方案（一個最低收入制度，巴西的“家庭補助”方案）與處理工作階層權利和社會福利的困難核心問題的反改革方案之間，達到微妙的平衡組合。

但這些選擇極其顯然是政治層面上的：在歐洲社會民主黨朝左派和右派之間的一個“第三條道路”的演進中，在現時在義大利和在法國把過去的社會主義政黨改造成美國式的民主政黨的呼籲中，這也是我們在巴西看到的，在那裏，在僅僅大約十五年的時間裏，工人黨完成了幾乎有一個世紀歷史的社會民主發展軌跡：從一個階級政黨，工人黨轉化為社會自由黨。再次，這種演變並不排除社會援助政策，這些政策為那些政黨提供了社會基礎。

這種社會自由的演變代表一個總的趨勢。在一系列的國家，它是個未完成的過程。此外，在一個政府交替的政治體制裏，統治階級的需要“能夠在右派和左派之間作選擇”。因此，這些社會-自由組織不是像其他的資產階級政黨那樣的黨。偏向“左派”仍然可能保住官僚機器的巨大利益。這是德國社民黨的情形，不過有限制，須要同世界資本主義的目前航向保持相容一致。在另一個層面上，尤其是他們帶給普通階層的感受方面，右派和左派之間仍然存在分歧，但總體說來，社會民主黨和其同盟正到處經歷這個融入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過程和“走向右翼”運動。

一系列的力量，試圖把自己游離于社會自由的力量，例如，共產黨，某些生態組織和左派改革黨，他們自稱作“反自由派”。問

題是，他們把自己融入政府機構，或在一個聯盟系統內屈從民族一庇隆主義或社會自由派力量，導致共產黨及綠黨仍留在反自由宣言的水準上，同時又明確地加入中左或社會民主主義的國會或政府聯盟：這是法國共產黨(PCF)、德國左派黨或義大利共產主義重建黨的情形。

同資本主義決裂的左派

12. 在左派的另一極，有拒絕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力量，它們抵制全球化和捍衛反資本主義方向。

我們的計劃，我們的左派，是一個反資本主義的左派，有革命傳統的左派，與資本主義決裂的左派。在這個框架內，我們認為，在建設新的廣泛的反資本主義政黨方面，我們可以有一個新的時期。“新的時期，新的方案，新型的黨”這是我們在 90 年代初期和中期說的。我們認為，資本主義全球化和其相應的矛盾，及其對工人運動演變的影響，是這個新時期的證據。

從某一個角度來看，當前的國際資本主義危機，給這項工程以實際可能性。體制內部有更多的矛盾，傳統的領導向右轉變開闢了更多的空間，在一系列國家裏有重新出現的社會阻力，有左翼改革派或反資本主義組織的新經驗的發展。在這新的歷史時期，問題不只是提出建設我們自己組織的問題，還要再次為工人運動和社會運動、商會、工會的重組和重建籌畫遠景。

領導危機的問題，出現在其最廣泛的層面：覺悟，自發活動的經驗，建設，組織。有必要通過一系列的抵抗鬥爭重新組建一個新專案，新要求，新的組織形式，採納舊工人運動中最好的東西，而剔出最差的。一切形式的自我組織和自我解放的主軸，在這些重建進程中是決定性的。但建設新的反資本主義政黨，也有困難；當然，這取決於革命的和反資本主義的力量的積累，並不存在世界的或大陸的建黨路線。

不是機械的，但在最近經驗的基礎上，特別是在巴西，有必要強調指出，在巴西我們付出了很高的代價，但我們在巴西也學得了很多。在義大利和法國，這些新政黨的主要綱領和政治路線正在顯現出來。

新的反資本主義政黨：“對事件和任務的一個共識”

13. 我們要建設的反資本主義政黨，它們所以反對目前的資本主義危機，並不是為了改革或維護帶有人類面孔的資本主義或者處理過度的自由主義，以便返回到戰後資本主義，而是為了打擊資本主義的利潤邏輯。我們需要一個反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新方案。一項行動的或反資本主義過渡的方案，它保護急切的需求（工資，就業，服務，土地分配，自然資源的控制，女權主義，最根本的生態層面……），民主的需求（帝國主義主導的國家中民眾和民族的主權問題，拉丁美洲的土著人問題）和過渡時期的需求，從而導致對財富作另一種分配的需要，以及對資本主義所有制經濟的質疑。

這些方案的實施，要求在大多數人的階級的動員和自發活動的基礎上管理工人。

這一仗（是今天的一個主要戰鬥）意味著拒絕對管理國家事務和資本主義經濟的社會自由派政府的任何參與或支持。這場戰鬥把我們同左派黨、共產主義重建黨，作為歐洲左翼黨一部分的共產黨的計劃分開來，同大多數巴西社會主義民主趨勢黨（DS）的政策分開來。

因此，參與或不參與這種類型政府的問題，在歐洲和拉丁美洲的主要國家，已再次成為權力戰略的根本問題。

但是，以托洛茨基所謂的“活動和任務的一個共識”作為參考，我們要建設的這些政黨，並沒有所有的方案，並不是所有的歷史，而只有戰略和方案的參考，這些戰略和方案的參考堅實可靠，足夠供中長期的建黨之用。我們不從劃定這些政黨的意識形態或歷史準則出發，而是從聯繫階級鬥爭的關鍵參考開始，以最好的革命傳統，制訂出一個社會主義過渡方案。

我們希望這些政黨要多元化，成為所有反資本主義的流派和活動家的聚集處。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將成為這些政黨內的一個流派。但我們必須更進一步：在讓一系列的戰略和方案的問題開放的同時，需要再次研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規劃，充分參加關於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的辯論。這些都是新的

方案，它們旨在試圖回應新的歷史時期。

這些都是反資本主義政黨的組建基礎的參考資料，這些政黨正在興建中——如法國的新反資本主義黨（NPA），義大利的批判性左派，丹麥的紅綠聯盟，葡萄牙的左翼集團，巴西的社會主義與自由黨，還有在未來幾年內將會出現的其他經驗。我們正在籌備的‘1968年五月’的研討會，2008年5月在巴黎

舉行，亦在此框架內。

作為國際形勢的導言，這報告在2008年3月1日第四國際的國際委員會會議上辯論。

法蘭索瓦·薩巴多是第四國際執行局和第四國際法國支部革命共產主義聯盟全國領導的成員

§

§

§

§

從生態社會主義批判野蠻資本主義

社會主義抵抗

本文根據2007年9月1/2日在英國舉行的社會主義抵抗運動年度大會主要文件編輯而成。該文件解釋了為何社會主義抵抗運動正在改變其政治綱領、觀點和公開形象，趨向於成為一個反資本主義的、生態社會主義組織。這會使其觀點裏的一個變化清晰起來，這變化暗中進行至少有一年，現在是公諸於眾的時候了。這變化的核心是爭論點：自由市場，私人化的新自由主義已經超過二十年，到了一個新的致命的階段——我們所謂的‘野蠻資本主義’階段。文件說明了為何在現階段只要有一個中心是講述環境危機的社會主義聲音就足夠了。



1. 導論：野蠻資本主義——破壞生命，

破壞地球

現在幾乎沒有人懷疑人類正面臨一個巨大的環境危機。儘管迫於最惡劣污染者的反對，國際氣候變化委員會最近的報告已經做了淡化處理，仍舊詳細圖解說明了這意味著什麼。除非人類生產和消費的後果有根本的反轉，數十億的人將會面臨洪水，沙漠化，水荒和其他環境暖化的環境後果引起的災難。今年多事的‘颱風之夏’，在中國，印度，澳洲，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有大洪水——南歐洲還有40度以上的滾滾熱浪，只有用氣候變化解釋這些事，圍繞於此，現在存在大量的科學共識。

總而言之，氣候變化可能是工業化的結果，但在最近25年裏大為強化的資本生產主義也對它大力推波助瀾。要弄清這是如何發生的，要看看一個老爭執：電腦技術一旦普及，工作應該就會‘崩潰’。

1981年ASTM(科技工作者工會-編者)總書記克裏富·切金思同工會的主要研究者巴里·夏門(現工黨成員)出版了一本書，書名為“工作的崩潰”。基本思想是：隨著電腦化的實施，生產率會大幅提升，導致對人工的需求迅速下降。會出現這樣的問題：我們要怎麼樣使用所有那些閒暇時間？我們要如何

保證分配有限的工作，讓每個人都有收入？有論辯說，通過一點社會工程可以很容易克服這些問題。

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裏，這樣的事並沒有發生。電腦化沒有導致工作的崩潰；相反，正如保羅·馬松在其近作“生於工作，死於鬥爭”中說的，全世界的工作者比過去更多了，工作階級走向“全球化”。甚至像英國那樣高就業率的國家，人們工作時間更長，更加繁重。1981年以來，平均工作時間增加。富裕而短時間工作的樂園從未出現。如何解釋這個矛盾呢？只有在勞動主要是為了社會再生產和滿足人的需求時，切金思和馬松的思想才有效。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它不是這樣的。

作者們遺失了關鍵的一點——資本主義正要產生空前未有的更大利潤，為此需要從來沒有過的更多的商品和輸入空前多的勞工以供剝削利用。於是，28年來我們一直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在大多數超級市場有42種洗衣粉可選用，有93種不同的個人銀行帳戶方案，72種轎車模式可選用，17種名人雜誌，商店裏(不算互聯網)有56種MP3播發機和541種你可以用於作地面通訊的電話。

有便宜航線從英國到423處地方，而鐵路運輸卻是大多數人難以負擔的。為了這一切，人們工作得更長更累，得到更少的退休保險費，更困難的老年，糟糕的公共服務和醫療衛生照顧，而社會較窮的階層整個生活品質要差得多。夏門/切金思方案下的可能情形同當今日常生活的現實之間的距離是巨大的。

就是這種巨大強化的商品生產(常常無用而破壞環境)使環境危機雪上加霜。

所有這些情況的出現，不只是因為任何形式的資本主義一般優先權，而是因為現存形式的‘野蠻資本主義’，它拋棄一切社會責任感大肆搜獵地球，增加大量的監視，暴力，戰爭和拷問，並且把目標定在通過榨取窮人的勞動獲取短期利潤，不管社會和睦和平的發展以及多數人幸福生活的可能性。

這種病態樣式的資本主義顯然帶給人類空前的生存威脅——環境大災難威脅。

對人類和地球的整體威脅，我們這裏把它歸於四種——環境大災難，帝國主義戰爭和壓榨第三世界，日常生活中的野蠻資本主義，以及讓人沒有安全感的監控。它們相互關聯；都是單獨一個權利剝削系統的一部分。‘新自由主義’加上美式新保守主義的成分，已經退化到新的更野蠻的階段——‘野蠻資本主義’。

該資本主義的新階段促成一個不可避免的結論——唯有通過政治和生產的整個變革，換言之，通過我們社會關係的變革，才能建立一個人類可承受的未來。我們正面臨人類文明空前未有的最大危機。從未有過危機如此直接臨近人類文明的存在。需要有革命性的答案，合格的答案要超越對日常競選活動的口號“說不”的標準，指出用生態社會主義取而代之的道路。

對於社會主義抵抗運動，這意味著我們政治立場、競選的輕重緩急點、我們的組織形式和我們的自我定義諸方面的轉變。

2. 生態唯物主義和革命生態學

當代馬克思主義對逐漸出現的環境危機的關心來得較晚，在20世紀後期讓生態學家和綠黨佔據這個領域——至少就有關的形勢迫切性來說是如此。現在是作再次說明的時候了，即不但環境保護堅定地定位於馬克思主義傳統中，而且唯有通過這樣的檢討才能發現生態危機的持續而足夠的解決方法。

這個傳統的關鍵理論重建者是《馬克思生態學》作者約翰·貝拉米·福斯特。他系統地立論，說明在19世紀中期建立歷史唯物主義的鬥爭中，生態概念是馬克思(其實也是達爾文)的中心思想。人類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的產物而非神的創造，這個思想建立了人與自然關係的基礎，也建立了生態和歷史唯物論概念。

貝拉米·福斯特強調說：“馬克思的世界觀是深刻而真正系統生態的，其生態觀念源於他的唯物主義。”

從一開始，馬克思關於人的勞動同它的生產品隔離的觀念就同人類與自然疏遠的理解有關。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模式和私有制下的自然商品化導致“自然實質上的

退化”。在其經濟哲學手稿裏，馬克思指出大城市的工人們必須忍受惡劣條件，他們的生活裏不再有光明，空氣和清潔，取而代之的是黑暗，污染空氣和污水。

在《資本論》裏，馬克思關於自然的唯物論概念完全整合到其歷史唯物論裏。如貝拉米·福斯特指出的，“馬克思使用‘新陳代謝’的概念把勞動程序定義為‘一個人和自然兩者間的過程，在這個過程裏，人通過自己的行為理性地干預和調控同自然的交換代謝，‘這個過程完全超越資產階級社會的能力’”。

真實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態學觀點，主要著眼於無產階級生活的退化，而不當它是革命過程本身的一個主要因素 - 這個概念是生態社會主義者或革命生態學者必須把它同今天協調的。如貝拉米·福斯特給出的，目的是“理解和發展一個革命生態學視野，即把社會變革同人和自然關係的變革以我們所知的生態學方式聯結一起的視圖”。

社會主義抵抗運動的生態社會主義轉變自身也基於第三世界活動家的工作，其中包括在環境問題上清楚確定為基本左派的那部分。比如，范達娜·席瓦 1992 年對印度綠色革命的批評，是對鄉村農業環境裏的生產主義的嚴酷控告。她和整個印度左派，尤其是女權主義者，圍繞水特別是水壩問題的活動，對我們有重要的教訓作用。

我們拉丁美洲團結一致的工作讓我們可以討論一些這樣的問題，比如，古巴和委內瑞拉兩者嘗試把生態層面納入革命過程。

3. 資本生產主義

革命社會主義者總是喜歡滿足人類需求的全國全球的經濟發展。但那並不意味著增加任何商品的生產，我們都喜歡。相反，資本主義下的大批生產是社會上無用的，是多餘的或乾脆是有害的。某些產品 - 象汽車 - 直接傷害環境；其他的則無用而又耗費大量的地球資源。

過去，馬克思主義者的作為，弄得像是商品生產及其隨後的使用不影響環境。事實上他們能夠對環境施加巨大影響。在追求無止境的商品瀑布中，地球資源的揮霍浪費

是由廣告業引生的人造‘欲望’，是罪惡的。它存在只是因為那是資本主義的作用方式。“新”商品的源源不斷對維持利潤和擊退競爭公司是至關重要的。

然而，我們對所謂“商品景象”的批判，並不意味著我們反對所有進一步的經濟發展，尤其是在第三世界。那既不意味未來的決定性新發明不要實施了，也不是說技術水準應維持停滯的狀態。而是說，必須在社會用途的基礎上審察新產品，而不能以新瓶舊酒的包裝謀利。

我們不能拋棄工業化退回到聯邦村。但可以重整社會，使生產品和服務是有社會用處的和環境友好的。還有，在工作時間和經濟發展兩者之間，人們希望有個怎樣的輕重比例，可以做民主決定。極大化經濟增長遠不是理性的，那意味著大多數人生活的中心是(不斷增加的)工作。

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大量生產是無用的，這一點很清楚。瑪格裏特·撒切爾的“大轎車經濟”就是個典型例子。規劃社會和環境上最友好的交通時，沒有一個理智的人會去考慮，把中心放在私人轎車上而讓公共交通填補餘缺。但那的確是最近 25 年發生的導致環境巨害和公共交通被忽略的事。

大量投入無社會效益的勞動時間做這樣的設計，該設計的目的是去競爭幾乎同樣的模型，設計它們的廣告和銷售，計算道路傷亡事故的後果，保證轎車行駛的汽油生產等等。勞動時間和能源的部分投入就能建立集運行、社會效益和高度環境友好性於一體的公共交通系統。但因為那不是資本主義的作為方式，所以未能付諸實施。“大轎車經濟”就是個經典例子，表明人類(利益的)輕重緩急是如何被利潤的優先所扭曲的。

4. 環境危機的社會層面 - 即刻的天譴

最近的聯合國報告列舉了全球暖化和二氧化碳排放未被扭轉的可能後果。問題不是氣候變化會不會發生 - 我們已經身在其中了。問題在於：從現在開始，我們如何減少進一步的溫室氣體排放，如何控制破門而入的全球暖化影響。

在英國，關於環境變化的討論逐步擴大，但提出的“解決方法”仍然是邊緣的。

政府拿出了一個草案，僅管提出了針對排放的法令目標，卻遠未涉及扭轉危險和加劇的氣候變化的必要措施。它提出的到 2050 年減去 60% 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其間的 2020 年減去 26-32% 的排放量作為過渡的建議，遠低於防止達到二氧化碳臨界點所需要的量，而潛在的全球暖化可能旋轉得失控。許多科學家和環境學家現在都同意，必須減少 90% 的排放量才能逆轉已經上路的全球暖化進程。這期間飛機場大步擴建，並且政府還告訴我們沒有必要限制人們的飛行。

我們被告知，任何情況下，英國只排放了 2% (當然是不準確的) 的廢氣，而我們再怎麼做，結果都會因為中國和印度排放率的增加給大大抵消了，其中，中國每兩周完成一座新的煤火力發電廠。正是富國污染了世界並繼續是主要的污染源這個事實被略去了。它也略去了這個事實，即類似中國和印度這樣的國家沒有什麼機會去認真處理他們的廢氣排放問題，而富國一如既往地污染環境。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業委員會的報告說得很清楚，沙漠化、水荒和乾旱、穀物損失和食物危機，因缺乏乾淨水導致的疾病高漲和其他的環境效應，將不成比例地打擊“那些最無力處理它”的人 - 也就是窮人。農村和城市的窮人最難找到能迅速改善其生活的資源，如改變地方，找到水和食物的替代來源，找到藥品和醫療設施或緊急救災援助。窮人是環境危機的第一批受害者，因為國家和統治中堅動員起來保護富人。在鄉村和城市都是這樣，在窮國和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也是如此。

在這種情況下，新奧爾良的卡特琳娜颶風影響是個高度象徵性的警告。它極可能是氣候變化誘發的事件 - 颶風和熱帶風暴日益頻繁而猛烈，西非和加勒比海附近的海洋每個夏天都更熱了。

其次，受害者不成比例的貧窮。軍隊緊急進駐那城市是要維持秩序(在富人區)和保護財產(同上)。連續數天讓窮人自生自滅，死亡數百人，此時富人卻策劃如何利用這場災難按階級逐出不想要的人(也就是說窮人和黑人)。當一大群本土人口被逐出時，旅遊鬧市地區卻在恢復它的整個容光

以保障旅遊經濟運轉。

在第三世界，日益頻繁的氣候變化誘發事件，特別是洪水，總是打擊氾濫平原處的窮人最厲害 - 因為他們的居住條件最為脆弱，經常處在不安全和危險的地方 - 那兒除了環境骯髒，還缺乏排水和衛生設備。

資本主義總是把緊缺資源分配給富人。它的武器是軍事壓力和市場 - 兩者都是殘酷的殺手。環境危機將使安全，健康，食物，水，適當的住房的供應極度短缺，窮人將走投無路除非他們反抗鬥爭。那就是為何我們將越來越多地看到，在第三世界和更多的地方的階級鬥爭的形式會是獲取和保衛像食物一類的基本資源，食物和住房。私有化的深入將使所有的資源都難以讓窮人得到，而總是有助於富人。對富人來說，所有東西都便宜。

根據邁克·大衛思的‘貧民窟世界’一書，世界 60 億人中有 10 億住在貧民窟 - 這個數目還在迅速增長。由於環境破壞的瘋狂，特別是洪水，加上飲用水和衛生設備的嚴重短缺，第三世界貧民窟可能成為疾病和產生大流行病的大規模中心，情形比現在嚴重得多。邁克·大衛思指出，禽流感的第一次大波浪很可能來自雅加達而不是東安格利亞。

馬克·裏那思在其著作‘大趨勢’裏指出，倫敦衛生和熱帶藥物學校估計，每年有 16 萬人死於氣候變化引發的瘧疾，痢疾和營養不良。而這還沒有計算一些很可能與氣候變化相關的極端風暴災難的後果，如有名的奪去 13 萬條生命的 1991 年孟加拉龍捲風，以及加勒比地區的颶風米契和安德魯，兩者都是超過五級的強颱風。

五角大樓在其聲名狼藉的針對‘最壞的情況’方案的文件裏，設計了一個世界生態大災難 - 不是發生在 200 年之內而是 20 或者 30 年內。根據‘觀察家’雜誌(22/2/2004)的說法：“‘觀察家’獲得的美國防部高官查禁的一份秘密報告警告說，歐洲主要城市沉入升高的海洋，英國到 2020 年墜落進‘西伯利亞’氣候。核衝突，大規模乾旱，饑荒和廣泛的動盪將在世界範圍內爆發。”

“文件預計，突然的氣候變化可能把地

球帶到無政府狀態邊緣。各國發展核武器以確保減少中的食物，水和能源供應。對全球穩定局勢的威脅使恐怖主義威脅大為黯然失色，一些知道報告內情的專家這樣說。”五角大樓的反應是建立高度軍國主義化的社會，即“美洲城堡”，其基本目的是讓人不停地逃離窮國，從內部保護富人避開被逐窮人的憤怒。它用大規模的暴力包括核武器對付任何阻礙美國從世界任何地方獲取它需要的資源的人。

總是窮人，尤其是他們的婦女和孩子為環境災難付出代價。孩子們容易感染疾病，不能抵抗暴力，而婦女擔負撫養孩子們的主要責任，在幾乎所有貧窮社會的鄉村城市，無論是第三世界還是第一世界都是這樣。在第三世界，完全是婦女去尋找水，木柴和食物以養家。氣候災難不只是一個階級問題，也是一個性別問題。食物，居所和水的缺乏越來越厲害地逼迫貧窮家庭出賣他們的孩子們作契約勞工，實質上的奴隸（在印度這已是大量發生的事了）或性奴，這些已經出現在很多第三世界國家了。

環境災難的世界開啟了大量增加的軍國主義，壓榨和戰爭危險的大門。富裕的少數可以讓生態系統敗壞下去，但它會毀滅窮人。同它作鬥爭是社會主義階級鬥爭的生死攸關的一部分。

5. 人口增長和婦女權力

如果不提前的話，到本世紀中期，世界人口預期會從現在的 60 億增加到 90 億。這樣的水準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是不可以承受的。所以關於人口控制的辯論跟隨著我們。如果要馬爾薩斯主義者，厭惡女人者和種族主義者的解決方案不成功的話，必須力爭基於克服貧窮和加強女權的生態社會主義方案。

儘管貧窮無知總伴隨著高生育率，多數貧窮女性其實不願意把她們的生命化在生兒育女上。因此北南兩地的婦女運動的中心要求總是享有安全可靠（最好免費）的避孕法和墮胎。窮人常會有大家庭以作為對抗老年貧窮的保險。人們富裕些，出生率就下降。

家務的集體化也是男女平等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要求，在討論資產階級個人主義

的替代物時，我們再回到這個題目來。任何社會崩潰期間，家庭暴力和針對婦女的暴力總會急劇地增加。

6. 先進國家的野蠻資本主義：跑步機型社會

西方國家已經被新自由主義控制了 25 年之久。這代替了 50 和 60 年代的凱因斯混合經濟型福利國家模式。這個系統的實質是大規模私有化和市場化；水和能源事業這樣一些國營工業已經私有，不同程度的私有化甚至被引進到教育和健康系統。新自由主義破壞社會物品以便利私有商品；儘管公用事業和老人院這樣一些社會服務體系的主要方面已經私有化，財經盈餘仍然從工作者的薪金和儲蓄裏擠壓了出來——全進了金融資本的利潤，所有公用事業都負有它的巨額債務。工作過程變革和勞工訓練嚴格是大眾不安全感的結果。人們工作得更重更長，導致較少安全和健康的生活。

約翰·貝拉米·福斯特正確地把這歸納為“跑步機型社會”。上面已經描述了跑步機型社會對環境的毀壞作用。這就是所謂私人股權資本 (PEC)。因為新自由主義墮落成野蠻資本主義，現在正準備把這個螺絲再旋轉一下。PEC 是對數百萬工作者的一個新的巨大威脅。簡而言之，私人股權公司是為在有限的時間借鉅款的短期協議。這些鉅款於是用來買一些據說是‘表現不佳’的公司（比如說，森斯伯瑞，一個被私人股權黃牛盯住的獵物）。一旦落入 PEC 資本家的手裏，公司資產就被剝離，員工被解雇，留下的人被付給微薄的工資，沒有退休費或福利，借款的利潤巨大。顯然什麼都沒建設，沒有貢獻，除了短期利潤——沒做任何事。戈登·傑可 - 邁可爾·道格拉斯在電影“華爾街”中扮演的拆賣資產變態惡漢——同現在的股權資本強盜相比，是神智健全和良心道義的模範。不用說，新工黨熱烈歡迎 PEC，尤其是戈登·布朗。

據《獨立者》(2007 年三月二日)報導，“儘管工會擔心就業機會減少而嚴厲攻擊政府有關部門，昨天戈登·布朗仍然讚揚了私人股權業創造就業機會的能力，...。布朗先生是最近一位在該行業的增長暴風中談論私

入股權話題的工黨政治家。工會和某些工黨政治家嚴責私人股權公司的拆賣資產，削減就業，以及最近數星期在聖斯伯裏超級連鎖店競標上的不公開化，這使得那些怕曝光的事業被置於照明燈之下...。布朗為政府部門的辯護緊跟這個星期托尼·布雷爾對私人股權投資的公開支持。”PEC 狂熱發作的時間，野蠻資本主義正準備大規模攻擊福利資本主義最後的碉堡 - 國民衛生保健(NHS)和教育系統，在這些地方市場方法，人為目標、和私人資本的引進是明顯的。



當越來越多公司垂涎利潤最高的奢侈品市場時，新自由主義把生產的優先權轉向奢侈品生產。你可以從航線上或火車上分給‘第一(經濟)級’和‘商業’乘客的座位空間，清楚看到這種情況。奢侈品 - 高級訂制服，手錶，旅行箱，遊艇，豪華轎車(包括 SUV)，豪華旅館，豪華大樓，昂貴旅遊 - 所有這些比大眾產品的單位利潤要高得多(常常是百分之百)。奢侈品生產加倍傷害工作者和環境。它炫耀一種難以到達的舒服生活和‘時尚’，那些商品實在是沒有社會效益的，但耗費大量的原材料(金和銀!)和能量。

野蠻資本主義是對於戰後工人運動成果的反革命。它使數百萬工作階級和中產階級健康和生活中出岔子，落在不安定的無止境的工作巢穴之中，面臨越來越多為貧窮所困擾的老年。所有這些都有利於億萬富豪，在階級分化和社會不平等程度深化時，億萬富豪以量子跳躍的速度變得更加富。

日漸嚴重的文化傾倒，社會和睦的腐蝕和只剩‘成功’與‘名聲’的腦死亡文化，所有這些交織一起。安迪·沃荷一首可怕的預言詩說，每個人都願意出名 15 分鐘，現在人們因為出名而成為名人，並不是因為

他們實際上做過的任何事情。在像‘大兄弟’和‘孤島餘生’這樣一類丟臉的白癡電視節目上，人們競爭得‘勝’ - 從而變得出名和富裕，於是成為名人。富人空虛煩躁的生活方式就是無止境地慶賀製造新品行，這些品行甚至同福利資本主義都根本是格格不入的 - 致富是值得的，變窮是不值得的。不可避免的結果是大眾文化的傾倒和無價值‘文化’商品的重複製作 - 85 個電視頻道裏沒有值得看的東西。

我們的結論是，沒有工作，教育，休閒和文化方面的一個革命 - 不僅在報酬的平等上，而且在生產什麼和怎麼樣生產的性質上的革命，在先進國家就不能處理不平等、權利和財富的基本問題。離開跑步機型環境意味著走向更人性化的生活，它伴隨各種優先權，各種產品，各種能源 - 一套不同的人的關係。一個保護環境的人類社會同資本主義是不相容的。

7. 虛偽的親資本主義的解決法

然而，在進一步轉向獨斷的解決法之前，資本主義也將嘗試緩和適應氣候變化，以及指定反資本主義反對派。這涉及市場、新技術和某些定量配給和徵稅。它的中心是一切東西直到空氣的商品化。這就是京都議定書一類地區和國家的協定的意思，創造對帝國主義北方根本有利的碳市場。我們可以期待通過在可再生的節能產品上的合理的投資根本轉向‘低碳經濟’。這將包括核能和所有實際上對社會和環境有害的技術，它們編織成作為拯救地球的方法。

氣候不穩定加速時，企業資本主義也要面對巨大數額的保險帳單(卡特裏娜颶風據估計要花費 1400 億)，其中大部分付給工作者，不過其中相當一部分是企業付給自己的。因此，我們可以期待一些痛苦的措施，包括非常古怪危險的技術補救法，比如巨大的硫屏障擋住太陽，用碘化銀炸彈轉移風暴雲(去哪里?)。同時，加拿大和俄羅斯這樣的國家將獲利於短期的‘黃金橫財’，北極冰蓋的融化啟封了最後的殘存石油。

像清潔發展機制這樣一些措施，將會用碳吸存和生物燃油植林使南方變成殖民地，讓北方能繼續污染環境而無須改變生活方式：

北方生態上濫用資源，而南方承受災難後果。

然而，有必要認識並審察這個過程中南方精英們的角色作用。烏干達總統穆塞韋尼最近把全球暖化說成是“（北方的）富人對（南方的）窮人的侵略行為”。就是這個人，現在允許賤賣和毀壞他自己國家的熱帶雨林，殘忍鎮壓反對派。

隨著稀有資源耗盡，氣候不穩定加劇，南方現在的戰爭越來越殘忍（達爾富爾是個明顯例子）。數百萬人被迫逃難或‘為得到保護’和生存屈從殘忍的軍閥。我們急需把對這情況的瞭解整合到圍繞難民和收容所的組織運作裏去。

8. 戰爭和帝國主義

野蠻資本主義在濫用暴力方面，處於最公開和蓄意殘忍的時候。用‘帝國主義’這個詞描述美英兩國同第三世界各國尤其是中東國家的關係，如今幾乎沒有什麼爭議——事實上像尼爾·福格森（英國經濟史學家）和邁克爾·伊格納蒂夫（加拿大作家、政治哲學家、人權民主學者）之流還為此公開歡慶。軍事帝國主義的干涉被斷定為“反恐戰爭的一部分”。很清楚，美帝國主義在中東開戰，目的是控制世界已知的最大油庫和油路，同時也佔領歐亞大陸的要津，那對維持美國經濟政治的全球統治是相當重要的。

面對來自日本，歐洲，以及今日中國的日益增長的競爭，合眾國過去二十年裏發動了其一台在世界上居於絕對優勢的機器，就是軍事機器。現在一百多萬美國現役軍人駐紮海外。柏林牆倒塌後的十八年，‘和平股利’沒有兌現，卻以其自己的方式表明，美國的海外侵略擴張確實不是為保衛美國利益而對抗‘共產主義’。

當今美國的軍事侵略——有英國的支持，提供政治保護——不只是對準美國認為的敵對政權，比如伊朗，而且也針對大眾運動。在菲律賓和哥倫比亞兩處，來自像黑水保安這樣的軍事公司的美國顧問和安全‘諮詢員’是美國大規模軍事干預能力的一部分。美國軍隊現在中亞國家和非洲角，以及世界上數百個基地裏安頓下來。這台軍事機器的巨大開銷——英國是其小號的仿造——其本身

是所能想像的資源最無理的使用，造成巨大的環境破壞。確實，軍事帝國主義，野蠻資本主義和第三世界剝削處在環境破壞的‘前沿’。

帝國主義近來發動的戰爭例子是眾多的。2006年夏天以色列攻擊基野電廠，引發的海面浮油層可能已經破壞了黎巴嫩沿海的海洋生命，並且威脅東地中海的整個生態系統。

據馬克·裏那斯報導：“自從7月13日以色列戰機攻擊基野電廠以來，15,000多噸燃油從那兒溢漏出。似乎有預謀地要阻礙任何止住流油的嘗試，以色列隨後兩天再次轟炸電站，以防止急救人員進到那兒。這場災難的規模是從衛星照片看到的，照片顯示三分之二的黎巴嫩沿海被3,000平方公里的浮油層覆蓋。這浮油層現在開始沖洗敘利亞。”

“巴勒斯坦人對此習以為常，以色列焦土政策的環境後果已經讓他們受害幾十年了。加沙地帶近百萬人的供水上個月被炸停了。因為2002年以色列炮轟加沙城的廢水處理廠，未處理的污穢物留駐在海岸低窪處。垃圾填埋場已經溢出並著火，而且兩座小型堆肥合成廠——外人援建，用來代替填埋場處理垃圾——因為被以色列的子彈損壞而閒置。”

直接軍事干預的環境效應對於環境破壞最嚴重國家的人民來說，只是整個環境危機中的一小部分。大多數最直接的環境破壞來源於採掘工業，比方伐木，採礦和石油工業。這多半是非法掠奪和半合法的資本主義的結果，它一般同當地政府和BP（英國石油公司）這一類‘可敬的’跨國公司合作，在同‘當地人’發生衝突時，這些公司會摘下可敬的面具。特別是伐木造成的最長遠影響具有全球的意義，尤其是為了滿足中國工業的木材需求，造成亞馬遜雨林和西伯利亞森林的毀壞，而中國政府因伐木導致代價重大的災難（洪水和滑坡）後禁止在其自家伐木。

軍事帝國主義的瘋狂通過兩個系統的巨額揮霍費用揭示出來，一個是美國反導彈系統，它的過時將耗費數千億元，另一個是更新三叉戟潛艇導彈系統的布雷爾-布朗誓言，估計最後的費用會達到700億英鎊。

今天，美國統治階級支持的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兩黨聯手政策，在美國領導的聯軍遭到的挫折(陷入泥澤)面前陷入崩潰困境。然而華盛頓的爭論不是質疑美國控制海灣地區的戰略重要性，而是如何成功控制它。還有，美國當局已經表明決心，要以‘猛衝’的策略繼續其戰爭努力，不止在伊拉克。在阿富汗，巴勒斯坦，在黎巴嫩隱藏的戰爭中，其對索馬里干涉，極其公開的對伊朗的戰爭準備，都顯示它要擴大其干涉範圍的戰備狀態。(參見 FI 解決方案：戰火中東，發表於“抵抗運動” No. 43 2007 年 3-4 月)。

帝國主義統治階級裏的各部門正在製造的條件，有利反戰運動在帝國主義中心發起新一輪攻擊，建立或重建這些運動是我們急切要做的事。我們要爭取：

- ✦ 結束所有帝國主義征伐和立即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撤軍；
- ✦ 反對任何對伊朗的刺激和攻擊；
- ✦ 北約軍隊撤出黎巴嫩；
- ✦ 結束干涉巴勒斯坦內部事物，停止制裁巴勒斯坦；

我們支持反對帝國主義干涉、不從事宗派屠殺的所有抵抗運動，特別是對黎巴嫩真主黨和巴勒斯坦哈馬斯，批判他們的宗教極端主義和其政治社會計劃。我們優先建立與工會團結的鏈條(例如，伊拉克獨立石油工人工會)，也要鏈結在該地區構築進步社會主義鬥爭的政治力量(例如黎巴嫩共產黨)。我們的目的是協助該地區出現一個民主的、男女平等的和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左翼。

9. 全球不平等 – 拉丁美洲反撲

野蠻資本主義在各處試圖進一步奴役和剝削第三世界國家。在反對新自由主義和帝國主義剝削的騷動的例子中，最突出的那些出現在窮國，特別是拉丁美洲，這並不令人吃驚。柏林牆的倒塌使我們看到負面的東西，正面的例子的存在 – 出現在生活而不是理論和計劃裏 – 對於反對運動的發展和反資本主義遠景是至關重要的。

沒有一塊大陸排斥新自由主義像拉丁美洲那樣廣泛，沒有那一個地方的左派的再興起如此強勁。埃沃·莫拉萊斯在玻利維亞

當選和雨果·查韋斯的委內瑞拉政府的演變有巨大的意識形態重要性。無論這些政府的方向和最終結果如何，他們已經做了大量的重要事情 – 再次舉起了群眾信服的民眾社會主義旗幟。這對比較年輕的幾代人特別重要，他們不太被意識形態和社會主義的現實套住。

甚至像巴西的魯拉，智利的巴契列特和烏拉圭的塔瓦雷·巴斯克斯這樣溫和的中左政府的當選也是反對新自由主義及右派的鬥爭結果。當我們團結所有運動進行國際反對野蠻資本主義的鬥爭時，拉丁美洲發展的核心是他們從中提出了社會主義問題。下一階段我們面向的中心環節是：

- ✦ 玻利維亞和委內瑞拉革命進程發展中的團結性。
- ✦ 保衛古巴。反對日益加深的帝國主義反動攻擊，菲德爾·卡斯特羅去世時，這類攻擊的聲音會達到高潮。
- ✦ 宣傳古巴的成就，特別是社會福利、健康和環境方面的進步，表明即使窮國，在反資本主義的基礎上也能獲得何等的成就。

10. 監視、禁閉的社會

首先是英國和美國，到如今多數國家都引進了新的安全體制。野蠻資本主義製造了一個更不穩定的世界，為統治階級創造了新的監視和壓榨手段。還要處理對公民自由的限制措施。恐怖主義在現實生活中是小問題，只不過用作頭號大標題，在其後面，新的壓榨性政府動員行動起來反對國內外的抗議運動。

其真正的目標是勞工運動，全球公平及和平運動和民族自治運動。這些鬥爭中的一小部分含有軍事面(巴勒斯坦、庫爾德人的問題)，但越來越多的運動使用正常的群眾動員方式(可能包括公民不服從)，它們卻成為准軍事鎮壓的受害者。

最糟糕的例子還是在第三世界 – 如在 2006 年墨西哥瓦哈卡州，學校教師領導的反對大規模腐敗的州政府鬥爭。數十人被殺害和失蹤；其餘人未經出庭即被處以無限期監禁。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下，群眾運動也發現被新警力和限制包圍，有時乾脆就是兇殘的員警。

對國內居民的監視達到空前的高水準。大規模資料庫和尖端電腦設備特別使得美國政府，也讓其他帝國主義政府，能夠檢察所有電子郵件和互聯網通訊，建立任何公民活動的詳盡即時的資料。有這樣一個長期的趨勢，既在犯罪法中包含越來越多形式的抗議行為，或至少使抗議的形式依賴政府的嗜好和容忍，而後者可輕易修改變更。

在美國，這導致愛國者條款出爐，它實質上授予政府給任何人任何事以非法罪名的權力，可以無限期的秘密拘留任何人。

在國際層面上，它導致酷刑再合法化和美國監禁營的巨型秘密古拉格，導致對使用酷刑的‘特別解釋’——或在特別解釋的情況下，酷刑從外輸入到第三世界國家。

安全壓迫性國家同新帝國主義攜手前進。在許多地方(菲律賓，哥倫比亞和巴勒斯坦)地區壓迫性政府同像黑水公司這樣的私人軍隊或/和中情局這樣的美國特殊武力合作。野蠻資本主義用謀殺、失蹤和拷打的日常代價製造了一個壓榨和暴力的巨大大陸。在現代社會意識形態上最落後的部分(像電視遊戲)認為那是公正的，甚至為此慶賀。

保護公民自由和反對軍國主義是當今爭取社會主義和人類文明鬥爭的一個關鍵部分。朝向監視民眾和限制公民自由的步驟，包括對抗議行為的准軍事化警戒，有如我們在五角大樓的生態大災難計劃裏看到的，如果大災難發生的話，它為一個完全禁閉的國家設置基礎。環境崩潰的悲慘後果，包括危急的生態移民的遷移，只能在軍事獨裁的基礎上加以管理。

11. 戰略和還擊

我們關於全球危機的戰略結論應從下面的假設開始：

- a) 創造一個持久文明要求生產和消費的大規模轉換，而這同資本主義是不相容的。不僅公司和政府不願意反對短期資本主義利益，如上所述，可持續的環境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生產主義偏見也是衝突的。
- b) 無階級和不反資本主義的環境決定論有重大的局限，使它失去作為一個長期戰略的效用。那種試圖把自己同左右兩方面對立起

來的綠色政治主張可能正面傷害對抗生態大災難的必要聯合。

c) 同時，依據馬克思對環境的唯物主義方法的理解，嘗試提升發展一個 21 世紀新馬克思主義，以便迎接環境變化的挑戰，我們要繼續把馬克思主義朝男女平等、反種族主義和反對歧視同性戀者的方向推進。

在英國，先是在撒切爾主義後是在新工黨的統治下，整個工人階級遭受整個範圍的失敗，在這個時期中，至少在革命左翼一些區域裏有一些計劃性成果在某種意義上說已經喪失了，那些成果是因為婦女黑人自己組織的結果而贏得的。

這意味著我們需要緊緊圍繞一些這類問題，同不屬於該歷史部分的同志再作討論，更新我們的分析，以便在發展適用於今天的馬克思主義時嘗試新的綜合總結。

我們不認為這樣做的同時發展一個生態社會主義方法，兩者之間有任何矛盾——我們倒是認為這些討論將會互相豐富和補充。它有兩個層面上的重要性：給我們成功地做出真正的綜合總結的必要機會，和通過我們的報刊、網點、教育場合制訂出我們希望的藍圖。

d) 我們政治學的傳統是不把改革同反資本主義過渡時期對立起來。不過我們要指出，沒有國內外的計劃，沒有大量的社會經濟轉換，那末在氣候變化上可能獲得的改善極為有限。

e) 世界範圍裏反資本主義鬥爭的決定性力量仍然是工人運動。馬克思主義者的一個中心鬥爭是贏得工人運動同意環境保護主義(從而生態社會主義)觀點。古巴的環境保護動員和政策是一個有巨大幫助的例子，稍次的例子是委內瑞拉。

顯然今天願意為環境問題上街的主要勢力在不同的抗議運動中(或不屬於任何運動)，一般說來不出於工人運動。工人運動之外的巨大的力量可在這個結果上發展起來。對於我們——一如我們聯合陣線政治學上的既往主張——在階級鬥爭和反資本主義基礎上，工人運動和社會運動的結盟是我們為之奮鬥的。然而，我們並不認為所有這些勢力在戰略地位上是同等的。

這不是一個道德問題，而是一個精明

實際的政治社會分析，丹尼爾·本撒德和馬薩·哈那可最近的文章有清楚的解釋。

本撒德說：

“從某種觀點看，資本主義確實會被各群眾社會運動的一種聯合或聚集推翻。但是，即便那些運動因為其自由解放事業的緣故，感覺到資本主義是他們的敵人（婦女運動或環境保護運動的情形可能是這樣，不僅是工人運動），我不認為這些運動擔負平等的作用。面對資本的全球模式的支配，它們全都被反映其立場的差別和衝突縱橫交錯糾纏不已。”

“有‘自然主義的’女權主義和革命女權主義，深厚的反人道環境保護主義和人道社會環境保護主義...。如果你認為這些舞臺不是按等級制度，而是簡單並列地構造的，那麼你也許能夠設計一項戰術把變動的聯合體（就當下的問題來說，如‘彩虹聯合體’）放置一起。不過，這樣的作法不會有牢固的戰略凝集。相反，我想，在（資本主義）特殊生產模式裏，剝削關係和階級衝突組成了一個拱形結構，跨越和調和其他的衝突。”

“資本本身是大調和劑，它使社會生產和再生產的每一個方面居下位，重塑家庭功能，決定勞工的社會部分和把社會再生產的人道條件付於價值律。如果情形確實如此，那末是一個黨而不簡單地是各社會運動的總和，是統一覺悟意識的最佳代理。”

馬薩·哈那說：

“...一個人批評黨派時，人們會認為他在為導致鬥爭的運動急迫性賭搏。社會運動是扇形運動而且需要一個接合工具，叫做政黨，社會政治運動，前線或什麼都可以。但是所需要的政治工具，應該清楚表達和提出一個全民建議，為今天的世界作出一個意識形態的建議，在今日世界裏有理念層面上的戰爭在進行，那裏強者掌握的通訊手段差不多是盛氣凌人的。我們可以看看在委內瑞拉媒體上發生的事情。”

我們的方向轉到生態社會主義不改變我們的基本戰略，不過它需要更新：

a) 我們的方向仍舊是在工黨左翼，建立一個廣闊的反資本主義的、生態社會主義政黨，作為解決工人階級和其他大眾階層的領

導層危機的第一步。

b) 我們需要發展一個關於即刻的和暫時的需求的行動計劃，把這些需求整合進拯救環境的鬥爭中心。社會主義抵抗運動之‘生態社會主義’是什麼意思？我們自己定義為生態社會主義者並不意味著放下我們在反帝國主義和反資本主義、女權主義和受壓迫者權利、反種族主義等方面的義務。它也不是激進版本的綠黨：而是這樣一個認識，即資本主義無法解決氣候變化和全球暖化帶來的問題，其本性是為利潤而不是為需求生產，也不管對地球的影響。它因此是‘生態社會主義或原始主義’。

12. 在關鍵環境爭論上的反資本主義立場

然而，尤其是在新自由主義經濟戰略主導的‘野蠻的’或‘病態的’時期，暴露資本主義無能解決它製造的生態系統問題的同時，我們也必須就該危機更直接的後果發展建立政見。但是這些反應必須建立在社會主義框架上，用馬克思理論和階級分析提出解決方法。例如，對於麻煩的綠色稅收問題，所有其他主流黨派，包括綠黨，有一個試著處理碳排放問題徵稅政策。在倫敦一些地區已開始徵收交通堵塞費（在曼徹斯特，特勒姆郡和另外一些地方也引進了該措施），使得進入倫敦中心地區的汽車數量已經減少。但是，顯然減少的基本是窮人的車。

在倫敦中心一星期的往返交通清楚的顯示，只有大型豪華的轎車和計程車行駛在路上。尤其是費用漲到一日 8 英鎊的價錢時，窮人被迫使用擁擠不堪的公共交通。的確，一些增加的錢用去改善公共交通 – 但不是減低世界上任何城市中最貴的交通費。

交通堵塞費是種平頭稅（就像人頭稅），懲罰窮人，製造分裂。社會主義者唯一能夠支持的資本主義徵稅類型是意欲把大型耗油車趕出道路的急劇上升式徵稅。換句話說，對富人徵稅。類似地，對航空旅遊廢氣排放徵稅。政府假裝認為那些排放並不很高，但是國際航空旅行的廢氣排放現在不算作是英國的部分。不錯，對航空燃油沒有像對轎車，大車等等那樣地徵稅，但提高航空旅行的平頭稅，無論是加在燃油還是航行上，這樣的方案會再次打擊窮人，我

們要反對它。

但我們也需要回答日益增加的航空旅行問題。減低廢氣排放最公平的方式是配額，比如說一年一或兩個航班，或限定飛行哩數。還有，不能讓富人買他人的配額，要把這種做法定為非法行為。在我們現今體制下無疑會出現一個非法市場，但我們必須爭取正義和公平，爭取工人階級和窮人的利益，不能僅僅去爭取急功近利。那也不單只是一個正義的問題。

我們必須開條路，聯合盡可能多的必要東西。普通人如果感到唯有他們是必須付錢的，他們就不會改變觀點。讓窮人付款——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肯定都是富人的計劃，但我們要提議一個替代方案。“縮減和趨同”是左翼另外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奧佈雷 梅厄建立的理論承認，工業化世界製造了目前的情形，我們必須激烈地縮減廢氣排放——‘縮減’約束。發展中世界也有理由要工業化，也應被允許工業化——只是在某種程度要有限制。

在未來某個時刻，即發達地區的廢氣減排要同發展中地區增加的排放一致——這就是‘趨同’約束，要用各方同意的國際條約讓它生效。不過該理論納入了一個‘碳-交易’元素。也就是富國可向碳產生量低於其配額的，廢氣排放較少的發展中地區購買排放權。我們要反對這一點。

大多數多少有些組織的思潮指望在市場機制，碳交易裏用資本主義解決辦法，再輔以稅收。現在運作的系統是歐洲聯盟排放交易系統(ETS)，在所有碳交易計劃中它最退步的，而且根據京都協定制定的原則運行。6527 百萬噸二氧化碳的排放許可證已經授予給了耗能大戶。

這並沒有鼓勵較清潔能源而是乾脆給他們一個厚利富礦，許可證的價格提高到 27 美元（每噸），使得整個分佈值達到 1770 億美元。他們也把‘附加費’轉嫁給了消費者，儘管消費者不必要買許可證——從而導致價格上漲。歐洲聯盟官員說，他們知道會出現這種事，並說市場經濟是降低能源消耗的唯一方法（也就是說，較高的價格）。

大多數氣候變化活動分子反對京都協議和歐洲聯盟方案，縮減與趨同(C&C)可以

視為歐洲聯盟方案和京都協定模式的替代方案，是受最廣泛支援的系統，但是也有其他一些系統被熱烈地討論，大多數都涉及碳交易和某種稅收，不過其中有一些比其他的更公正（該運動的一個關鍵字）些。更公正的系統，如封頂和分配(C&S)，可交易能耗配額(TEQs)，涉及加封頂蓋和依據平等‘排放權’分配可交易配給量給大眾。然而，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並沒有那種人權，除了生產工具所有者擁有的那些權利。

我們同封頂運動最大的直接政策差異（存在巨大的規劃鴻溝）是他們對可交易配給量的堅持。我們反對它，是因為它有利於廢氣排放大用戶而懲罰工人階級（具諷刺意味的是，在稅收規劃上，這常是左傾綠黨主要反對的東西）。

我們應當支援無權作交易（如同二次世界大戰時）的計劃好的封頂（或公正的分配比例）。對此的回答是，如同現存系統的所有改革者一樣，我們是不實際的，因為沒有碳許可證的交易，它完全不會被大公司接受並可能把資本主義體系拉倒。

碳交易（同稅收一起）是資產階級對氣候變化的最初回答，它使富裕的北方和西方用錢買一條離開煩惱的路，同時讓貧窮的南方和東方留在非工業或半工業化狀態。史端報告本身，承認市場的失敗的同時，仍然用同樣的機制去解決該危機。

13. 我們的要求

生態社會主義者必須從階級分析開始，這個分析能夠聯合盡可能多的人讓富人而不是窮人付錢。我們支持建立一個群眾運動，在國內外提倡以下的要求：

- ✦ 到 2030 年，英國單方面減少 90% 溫室氣體排放，其他發達國家也減少同等數量；
- ✦ 在一個國際條約裏，給全球碳排放量封頂，不是因為我們認為這個方案容易，或者更可能達成（這依賴各勢力間的平衡），而是因為是必要的，可以聯合國際反對資本主義系統失敗的運動；
- ✦ 支持對航空旅行作國際分配時，任何市場配置都要定為非法的；
- ✦ 反對核能和建立任何新核電站；
- ✦ 支持大量擴展可再生能源；

- ▶ 支援以國家和地區政府的補貼：
- 提供價格便宜，方便搭乘和頻繁運行的公共交通以替代小汽車的使用；
- 保證所有新建築是無碳的；
- 為所有家庭提供絕緣，保能等設備，使它們有能效；



關於氣候變化，我們要為以下暫時而即刻的要求奮鬥，這些要求的宗旨是剎住和逆轉全球暖化進程，從而防止氣候異常和海平面上升。這要包括到 2050 年縮減 90% 石油消耗量，在獨立審查機構的監督下，每年縮減 6%。引發該問題的工業化國家必須帶頭做。最窮困無力的人們為先進國家的行為付出最高的代價。所以沒有理由要求採取沒有在工業化國家實行的措施。這意味著：

- ▶ 免除第三世界的債務。沒有理由要窮國背負著債務去處理氣候變化問題。
- ▶ 大量增加包括太陽能，風力，海浪，潮汐和水電（不包括破壞性的巨型水壩項目）在內的可再生能源的投資。
- ▶ 終結生產主義宣傳社會：為應用而生產，不是為利潤生產。
- ▶ 採取強硬行動反對工業和公司污染源。
- ▶ 提供免費或便宜的，整合公有的交通系統替代小轎車。

- ▶ 鐵路，公路貨運和汽車交通公司的國有化。
- ▶ 停止機場擴建，限制航班並終止無節制飛行。航空國有化。
- ▶ 重新設計城市，剔除不必要的旅行和保守能源。
- ▶ 廢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把資源用於可持續發展和可再生能源。
- ▶ 大規模投資把住宅建得更節能。步向居住空間集體化。
- ▶ 國有化超級市場，區域化食品生產和大幅降低食物運輸半徑。
- ▶ 不用轉基因作物作食物或油料。
- ▶ 終止破壞雨林。
- ▶ 保護氣候變化難民和移民的權利。保護受乾旱、沙漠化、洪水、作物失敗和極端氣候條件打擊的人們。
- ▶ 再國有化水資源和保護水儲備。終止河流和水道的污染。

14. 任務

另外一個文件處理生態社會主義轉變的詳細策略和組織後果。

我們的戰略部署如下：

- ▶ 我們尋求在勞工運動和左翼，在年輕人和環境保護論者包括綠黨中間，建立一個廣闊的反資本主義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潮。
- ▶ 我們力爭贏得勞工運動把反對環境大災難作為其中心和首要任務。
- ▶ 我們力爭贏得環境保護論者和青年一代理解到，生態健全同資本主義不相容，生態和陸性世界即是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抵抗’是英國馬克思主義運動，支持第四國際和其他革命社會主義。

（衛眾譯自《國際觀點》第 392 期，2007 年 9 月號）

為什麼今天需要生態社會主義

喬爾·柯維爾

自舊石器時代捕獵族群造成的第一次物種大滅絕開始，人類就一直疲于應付自己對環境造成的影響。但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這些影響才作為威脅各個物種未來的生態危機而被實際體驗到，近代環境運動應時而生，地球日、環保黨派和不計其數的非政府組織標誌了一個對抗全球威脅的、新的生態意識時代的興起。



早年的樂觀主義現在已大為淡退。儘管有一些有用的干預措施，如更大規模的垃圾回收或發展綠化地帶，但日益明顯的是，整個政府調控和非政府環境組織的以及學術上的各工作專案並未能檢測出生態環境退化的總體步伐。事實上，自第一個地球日創立以來，在諸如溫室氣體排放、大堡礁的喪失、亞馬遜盆地的森林採伐這樣一些關鍵領域裏，崩潰實際上反而加劇了，甚至開始以指數型速度惡化。

我們該如何解釋這個嚴酷的事實：即對這個情況的認識應當激起最強勁的努力以超越現今環境論的局限？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瑪格麗特·撒切爾。70年代後期，正當環保時代剛剛露頭的時候，英國的鐵娘子總理宣佈TINA（“別無選擇”）的興起，TINA是撒切爾口號“*There Is No Alternative*”的縮寫，其意思為“對現存社會而言‘別無選擇’，”更不用談選擇第一波環境論者構想的其他途徑了。

問題出在當時的環保論沒有切中要害，只治標不治本。撒切爾沒有詳細向公眾解釋清楚這一點，但不容誤解的是，她心裏的想法和立

場是：資本主義是不可替換的，準確地說，新生於七十年代更為犀利的資本主義，在替換當時盛行的福利國家資本主義後，就是不可替代的了。面對一個嚴重的資本積累危機，這是一項深思熟慮的反應，該危機使得全球經濟的領導者們實行了我們所熟知的“新自由主義”，撒切爾、連同美國總統羅納爾·里根一起，象徵了它的政治面貌。

新自由主義是純粹資本邏輯的回歸。這並非稍縱即逝的風暴，而是我們居住的世界的真實情況。它有效地掃除了約束資本侵略性的措施，代之以對人與自然赤裸裸的剝削。所謂“全球化”其實就是拆毀資本積累的分界和局限，而湯瑪斯·弗裏德曼一類的空想家稱頌其為“駕乘著自由貿易和無限商品化雙翅”的普世進步的新紀元。這個（變化的）閃電戰或轟炸只是壓倒了軟弱的自由改革，該改革是70年代在環保運動的幫助下落實到位的，其宗旨是檢查生態退化狀況。由於這些運動很少或沒有對資本作批判，在崩潰加速的時候，他們無助地遊蕩漂移。

由此，現在該是我們承認第一波環境論基本前提和組織形式的全然不足之處的時候了。這項認識有其緊迫性，因為生態危機實在地預警了人類生存的真正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現已開放擺在我們面前的這條道路，可以歸因於資本本身，它把我們置於生態混亂的軌道上。儘管有很多複雜因素對應於資本對生態危機的相應責任，但蓋過一切的趨勢是：資本主義要求持續的經濟生產增長，由於這種增長是針對資本而不是為了真正的人類需要，其結果是持續動搖與自然的整體關係。其根本原因在於資本主義同所有其他生產方式的明顯差別，它是圍繞資本本身的生產而組織的——而資本是一種沒有內在限制的純抽象純數位的存在。物質自然世界一定有它的局限，而資本主義除了以其對價值和過剩價值的瘋狂需求拽拖著世界以外，甚麼都不能做。

生態危機預示著徹底改變，對這個事實，我們無從選擇。但我們可以選擇如何改變，或是生，或是死。如伊恩·安格斯在他的郵件討

論錄中，《氣候與資本主義》選項很簡單：“生態社會主義，或野蠻主義，沒有第三條路。”

（瞭解和/或加入此名單，聯繫安格斯：ecosocialism@gmail.com）

這解釋了偉大的羅莎·盧森堡二十世紀初的說法：人性的真正選擇是社會主義或野蠻主義。這是相當正確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失敗（包括當時德國盧森堡和斯巴達克黨人起義，以及之後二十世紀中其他的社會主義革命失利，尤其是在前蘇聯和中國）成就了野蠻資本主義如今的勝利，以及持續不斷的戰爭，噩夢般的消費主義，日益拉大的貧富差距，還有最重要的-----生態危機。除了野蠻資本主義現在意味著生態災難這一點外，選項還是沒有變。因為人類生產系統的混亂已經超越了地球緩解承受人類生產影響的能力。

我們時代的任何社會變革運動都必須優先考慮這項問題，能否解決它關乎到我們的未來。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一個名副其實的社會主義必須是面向生態的，更準確地說，以生態為中心的，於是，只有“生態社會主義”才能幫助恢復我們與自然關係的完整性。生態社會主義與上個世紀“第一時期”社會主義不僅只是術語使用的不同，比如前者完全地需要工人控制工業機制和一些好的環境調控措施。

如同我們在“第一時期”社會主義所做的那樣，生態社會主義需要工人作掌控，因為除非生產者是自由的，否則就不能克服資本主義。但生態方面也引發了一個更基本的新觀點，該觀點質疑生產本身的屬性。

資本主義生產永不停歇的追求利潤，尋求把一切事物轉化成商品，因為只有這樣資本積累才能持續擴張。資本擴張市場份額的競爭推動了癌擴散般增長的致命趨勢，而社會主義---無論是第一時期社會主義的變型，還是生態社會主義---將我們從生產手段私有制度的專制中解放出來，從而使中斷這種致命傾向成為可能。但這也提出了一個懸而未解的問題：在一個生態社會裏，什麼該生產，要怎麼生產？

顯而易見，生產必須要離開交換---商品之路---的控制，轉向實用，即旨在直接滿足人類需要。但反過來，這就要求在生態危機的環境下，“使用”的定義只是意味著本質上能克服生態危機的那些需要，因為這才是作為一個整體的人類文明的最大需要，當然其中每個男女

個體的需要。

於是，人類的興盛只有在這樣的環境中才可能，在那裏資本對自然帶來的危害已被克服，例如，停止向大氣中排放含碳氣體。由於自然界是所有互相聯繫的生態系統形成的整體，生態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生產應當面向生態，包括修復生態系統的損傷，甚至建立欣欣向榮的生態系統群。這需要，比如說，生態合理化的農田；或者---因為我們自己都是活在生態系統中的群居自然物---生態導向的人際關係，包括養育小孩，兩性關係，甚至生活的整個精神和美學面。

這篇文章過於籠統，不能深入討論以上主題。但如上所述，我們談到生態社會主義的時候不只是說我們的經濟或科技必須改變那麼簡單。生態社會主義不再象馬克思眼中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那樣，是一純粹的經濟問題。它需要明確地成為社會和人類存在的根本變革---馬克思預想中的人類演化的下一個階段。事實上，如果要在生態危機中倖存下來，這是必須的。生態社會主義預示著整體模式生產，在那裏自由聯合的勞動力，為創造興盛的生態系統而不是商品進行生產。

誠然，這裏提出的問題遠多於它回答的，該事實本身就是生態危機深刻程度的一種度量。若我們停止向大氣排放含碳氣體並讓氣候系統重新達到平衡自我治癒，世界最後看上去會是什麼樣的呢？在如今社會系統中潛藏的巨大恐懼之下，我們到底如何與自然和諧相處，過完全的人類生活呢？這些問題都沒有確定的答案，但有一點我們必須確定：一定還有別的選擇。

08年10月7日，在巴黎召開國際生態社會主義組織成立大會。要瞭解進一步的資訊，請聯繫焦爾：jskovel@earthlink.net；或依安·安古司：ecosocialism@gmail.com

喬爾·柯維爾在越戰期間投身政治。他曾是反核和平運動“中美洲和加勒比團結運動”的積極成員，這是爭取民主式媒體和環境保護的運動。作為他戰鬥工作的一部分，他在尼加拉瓜曾短暫的生活過。他的兩本新作是“戰勝猶太復國主義”（字裏行間出版社）和“自然之敵”（2007即將出第二版，Zed出版社）

衛眾摘譯自：《新社會主義人》（2007年夏）

安第斯亞馬遜印第安文化的壯麗抗爭

雨果·布蘭哥

在一萬多年的歷史進程中，安第斯-亞馬遜地區得天獨厚的生物多樣性締造了一種與自然界(大地母親)唇齒相依的文化。它的特點體現在其深刻豐富的自然知識和高度發達的農業文明上。這片土地是世界七大農業起源地之一，馴養生物種類數目居世界之首。

它孕育了一種與西方不同的宇宙觀。根據西方觀念，創世者是一個超然物外的精神體，按他的形象創造了人類，並隨後創造了自然界來滿足人類的需要。但印第安人認為，人類是大地母親的女兒又是她的一部分，應當在她的懷抱中與之和睦相處。每一座山丘，每一條河流，每一種植物和動物都有靈魂。



足以強大的印第安集體主義精神堅定地忍受了五百年的侵凌和個人主義的橫行。

農業勞動者團體在蓋丘亞和艾美拉語中的名字是 ayllu，即農村氏族團體。緊密維繫著該團體的許多紐帶表現為勞動方式(ayni, mink' a, faena)和生活的諸方面。團體並不只局限於人。它還包括與養殖生物、藥用生物，以及向養殖者預示季節變換的動植物等的密切公共關係，廣而言之，同所有的動物和植物、雨水和土地的關係。

農業和畜牧業的發展(和家畜的畜養)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區造就了奴隸制度和封建主義，而在美洲卻表現為集體主義的新形式。在安第斯地區，一個版圖佔據六個現今國家之大的印加帝國(Tawantinsuyo)由之誕生。(殖民者們由於無知視之為帝國，就像他們也把駱駝叫做“大綿羊”一樣)

這種集體主義形式的確促成了特權階層和出於征服目的的戰爭，但在這片大陸上，沒有一寸土地是基於奴隸勞動力或封建制度來發展

生產(力)的。

一萬多年以來我們的文明馴化栽培了 182 種野生植物，包括大約 3500 種土豆品種。

我們瞭解 4500 種植物的藥用價值。

印加帝國根據大小農業集水區及盆地分佈來規劃其農業生產。

建造長長的水渠，同時小心地避免土地侵蝕。

我們在山坡上修建梯田，在高原上使用 waru-waru (集梯田、水渠、農田一體)的灌溉系統。

特殊的農業技術因地而異。

在帝國境內建有倉庫用於貯藏食物，以便氣候變化影響到農業收成時供給人民食物。儘管特權階級存在，卻沒有饑荒和赤貧。孤兒、殘疾人和老人由社會供養。

外來侵略

上述這類社會組織的架構，即農業基礎建設和食物儲備架構，被外來侵略粉碎了。

此時的歐洲正處於由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型期，其侵略行為就是一種資本主義舉動。殖民者們自以為到達了印度，儘管沒有找到期望中的香料，卻發現了金銀礦藏。

採礦過去是邊緣產業，但是如今成了經濟中心。他們(礦主)使用比奴隸制更為暴虐的體制採礦。奴隸主象關心他的驢一樣關心奴隸的健康。而秘魯的礦主每年都會收到一定數量的印第安人以“教導”他們。不管多少人去世，下一年礦主又會收到同樣數目的工人。因此，被送去開礦的年輕人和壯勞力都只有待在這上工作至死。因此，年輕的土著民自殺，母親殺死自己的孩子以免除他們的酷刑。這種行為在圖派克阿馬魯起義之後才消除。

農業生產在封建體制下進行。歐洲殖民者從公社手中強佔了最肥沃的土地並將其改成大莊園，社區居民在本該屬於他們自己的土地上充當農奴，被迫為領主無償工作以獲得耕種一小塊土地養家糊口的權利。

許多原因導致了農業的嚴重衰退：

運河、梯田和一體化的灌溉系統(waru-waru)由於無知和缺乏保養已經損毀。

對集水區和微集水區的至今未作規劃，混亂的狀況持續至今。

外來動物品種的進口使得環境惡化。本地土產的駱駝用牙將牧草咬斷，而外來物種如奶牛、馬、綿羊等將草連根拔起。

侵略者們還將自己的宗教迷信思想投注到我們的農作物上。我們的農業精神不符合他們的文化觀念。於是“偶像崇拜根除者”瞄準了papa “聖父”（Santa Padre or Holy father）之類的植物，重新命名它為西班牙語的patata。隨後這個詞作為“土豆”被挪用到英語及其他語言中（potato）。他們也不喜歡小米（kiwicha）和莧蘭（amaranto）。被伊波利托·烏納努埃博士譽為“植物王國的第二主音”的古柯植物，至今在“有教養的”社會圈子內還是這類迷信恐懼和極端有害偏見的物件。

當氣候變化導致饑荒來臨時，各處的食物儲備也被侵略者掠奪一空。綜觀他們的所作所為，我們發現，歐洲人加給我們的饑餓苦難---他們文化的貢獻---比他們的大屠殺和對我們散播天花都要致命。

起義和共和

自圖派克·阿馬魯二世起義開起先例，我們的人民一直努力反抗侵略並開展了大量起義活動，影響遠及玻利維亞，甚至在圖派克被殘酷折磨並處決後，（他領導的）起義仍舊繼續。

不久後發生了所謂的“獨立革命”，卻沒有為土著人民帶來任何可見的改變。號召“獨立”的領導者被授予‘領主’身份（即舊稱謂中的大莊園主的新名字）、‘印第安’或其他身份。

這種領主制度的主要包括由農奴對領主的無償勞動付出。在其他方面，農奴（身份的不公待遇還體現在一些其他方面，如）必須向主人交納一部份他在天然牧場上放牧的家畜，長途跋涉運領主的貨品，往往長達數日晚上只能在露天休息。而主人從肉體和精神上虐待他。還可能會監禁他、強暴他的妻子，農奴的孩子也與學校無緣，有的被迫工作，有時根本沒有學校，或者是由於領主的禁令。

我們六十年代的土地鬥爭

領主封建制度一直持續到上個世紀後半期，資本主義在鄉間的遍及從許多方面削弱了

領主的力量：

- 大規模的新礦從領主那裏調走了勞動力。
- 新的機械化遣散農奴，改雇農藝人員。
- 高價新作物需要更多勞動時間，促使領主要求農奴更多的工作，並驅趕他們以便攫取他們的小塊土地。另一方面，農奴們需要更多的時間為自己的工作並且抵抗領主竊取他們的土地。

面對這些新的暴行，我們組織起來反抗。在領主們不妥協的情況下反抗變成了一場土地持有權戰爭。

我們的抗爭行為不僅將我們與莊園主們對立起來，也使我們反對捍衛封建制度的政府。

在超過 100 個莊園我們拒絕為領主們工作，只經營我們的自耕田。這實際上是一項土地變革。政府用武力鎮壓我們，我們就用武力保衛自己。當時的軍政府摧毀了我們的武裝自衛，但他們也知道，再回到封建農奴制度是行不通的了。於是一項土地改革政策在該地區生效，法律上允許農奴擁有土地。但在其他地區，農奴起義並掌控了莊園。這種行為遭到了激烈的鎮壓，但沒有被有效地控制。因此，後來的改革派軍事政府不得不認真考慮頒佈全國範圍的土地改革措施。

就這樣，我們利用了資本主義削弱封建力量的大好時機奪回了我們的土地。同一時期的巴西農民起義活動卻沒有成功，資本主義在那裏取得了勝利。如今，資本主義的受害者們無畏地進行一項“無地階級運動”。

這解釋了為什麼秘魯持有土地（公有和私有土地）的人口比例是南美洲各國家中（也許古巴除外）是最高的。

一些經歷了這個奮鬥時代的農業勞動者切身體會到質的變化。“如今我們是自由的了。”他們說。脫離封建奴役狀態對他們來說就好像掙脫緊箍身心的枷鎖一般。

與封建制度決裂後他們開始著眼於教育行業，建造學校，支付男女教師的工資，然後力爭讓政府付薪給他們。他們建造醫療中心、並力爭政府支付醫療服務的費用。

他們使用選舉權推選市長，反對採礦污染，要求警司職責集體化、替換腐化貪污的員警和法官，反對任何形式濫用權力，和在許許多多其他方面不懈的抗爭。

脫離封建奴役制度解放了他們，讓他們展開翅膀把鬥爭推向前。

當前的鬥爭

今天的原住民為保護自然而抗爭。他們反對巨型企業（主要是採礦業，也包括石油和天然氣企業）對自然的掠奪。之前的秘魯政府是封建主的僕役，而今天他們又為跨國公司巨頭鞍前馬後，所作所為常常與秘魯人民和大自然的利益背道而馳。

生活條件是抗爭的另一個理由。失業率上升生活水準下降，尤其在農村，由於農副產品的價格極度低廉情況更為惡劣。這與反對美國自由貿易協定的抗爭是息息相關的，該協定有損於我們的農業，卻讓接受政府補助的大型企業獲益。

原住民在秘魯其他人民的支持下，努力對抗腐敗、派代表爭取本地政府的席位。但由於沒有一個可信的民主監督體系，人民的期望常常被辜負。

我們的夥伴

原住民運動無疑是最堅強最不屈不撓的抗爭運動，但卻不是獨一無二的。其他人也和我們在一條戰線上共同奮鬥。

值得特別一提的是被稱為“印第克勝司達（印第安文化衛士）”的知識份子，他們有的甚至不是原住民。自從我們這片大陸上的原住民遭受壓迫以來，就有人奮起反抗和保護我們的文化。

巴托羅·德·拉思·卡薩斯神父的工作是眾所周知的。在秘魯我們有更加令人矚目的人物如岡薩雷斯·布拉達和馬里亞特利奇。作家如 Clorinda Matto, Ciro Alegría, José María Arguedas; 畫家 José Sabogal; 音樂家如 Alomía Robles, Baltasar Zagarra, Roberto Ojeda, Leandro Alviña。

為何而戰

我們在保衛我們文化的各個方面：宇宙觀、社會組織、傳統典禮和農業知識、醫學、音樂、語言和其他種種。

我們並不認為我們的文化比其他文化高一等，反之，在為不使之淪為低等而努力。

我們希望平等對待

我們相信平等性和多樣性可以協調共存。秘魯無論在地理還是人口上都極度多樣化，世

界 103 種自然生態圈在我們境內就有 82%。我們的居民使用多達 45 種語言。印加太陽神也不是排它的神，人們具有不同的信仰和崇拜不同的神。我們的多樣化的權利是平等的，並反對同一純化人口。

一方面我們尊重多樣的個人特質和不同，另一方面我們反對個人主義，我們的文化是崇尚團結的。

我們並非在尋求回到過去，知道我們必須儘量利用人類文化的整體進步。

但這並不和我們尋根的決心衝突。我們在未來將會返璞歸真。

我們愛護自然，並衷心的希望借用于豐富的生物多樣性來發展經濟，通過農業和（藥學）自然醫療和無害的現代科技進步實現這一目標。

我們不想把社會建立如今根深蒂固的反社會個人主義上，這些是侵略者們帶來的糟粕。我們希望重拾和強化農村氏族團體制度，找回集體的團結和友愛，並好好學習和利用一切無害的普遍知識。

我們的文化用一萬年的時間才逐漸成型，我們夢想過去短短 500 年來的打擊只是一個正在逝去的噩夢。

關於作者

本文最初以西班牙語發表在雜誌 Sin Permiso 2007 一月刊。為社會主義雜誌季刊和電子月刊，由包括作者在內的跨國編輯組撰稿。

雨果·布蘭哥是蓋丘亞族農民領袖，1960 年代初曾在秘魯庫斯科地區領導起義。失敗被捕後被判關押在 El Fronton Island 監獄達 25 年，服刑期間寫下了《土地或死亡：秘魯農民鬥爭》，1972 年由 Pathfinder Press 翻譯成英語出版並成為瞭解土著民解放運動的必讀教材。

在一個國際安全防衛活動上，獲得許多著名人物支持的布蘭哥終於重獲自由。在被流放巴西、智利和瑞典一段時間後，布蘭哥作為聯合左派的一員回到秘魯並獲選進入國會。他仍然積極活躍在秘魯原住民、農業勞動和環境保護運動的前線，並著述秘魯、印第安和拉丁美洲相關的文章。

此文英譯者菲爾康諾耶爾於 1960 年代參與了聲援布蘭哥的行動，十年後舉行了這位秘魯原住民領袖的環加拿大演講旅行。

委內瑞拉的機會和障礙——革命鬥士聚集在加拉加斯

斯圖爾特·皮伯爾

“巨大的機遇，極大的危險！”這就是查韋斯總統的一個最親密顧問，在總結委內瑞拉玻利瓦爾主義革命面臨的當前形勢時所說的。



8月，史達林·佩雷斯（社會主義潮流報）和塔茲阿·門德洛斯（社會主義自由黨）海曼·厄爾·特饒迪在第四國際舉辦的加拉加斯研討會上發表演講，討論21世紀在委內瑞拉和其他地區的社會主義挑戰。這次會議彙聚了十幾位拉丁美洲和歐洲國家的革命家，以及委內瑞拉全國各地革命左派的不同流派和個人。

會議在政府資助的智庫米蘭達國際中心舉行，查韋斯2005年的主要幕僚海曼，現今在該中心主持關於21世紀社會主義的研究計劃。

儘管各人有不同的經驗、方法和分析，但是幾乎所有的委內瑞拉與會者對目前挑戰的評估都同海曼相似。

工會領袖和社會主義潮流報編輯史達林·佩雷斯指出了，在新近國有化的電信和電力部門以及國家石油公司裏存在嚴重問題，在那裏，或者沒有工人的聲音，更遑論工人控制了，或者集體協議尚未續約。但他也強調了，在新興的PSUV聯合社會主義黨裏建設新的社會主義先鋒隊的巨大可能性。

‘我們的美洲計劃’的卡洛斯·藍茲，曾經在阿爾卡薩鋁廠領導目前為止最雄心勃勃的工人控制實驗，分析了可能導致“反革命復辟”

的能量離散，即所謂“玻利瓦爾省熵（可能出現的程度）”的危險。

羅蘭·鄧尼斯和裏卡多·納瓦羅來自分裂的‘我們的美洲計劃’的其他兩派，他們也辯稱，原玻利瓦爾計劃的內部矛盾，包括1999年憲法的內部矛盾，現在正露頭。埃塞基耶爾·薩莫拉全國農民陣線的西蒙·烏斯卡特吉，闡述了一個不尋常的雙權力中心的顯現，它現在必須要麼轉到左，要麼轉到右。

來自社會主義重建社（第四國際的厄瓜多爾支部）的瑪格麗塔·阿奎那伽列舉了一個有說服力的案例，旨在給任何新的社會主義專案一個強硬的女權主義面孔。她指出，在她自己的國家和委內瑞拉，革命進程都面臨另一種矛盾——基層婦女在這些鬥爭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例如在厄瓜多爾原住民運動內部或鄰國委內瑞拉的動員活動上），和她們在政治領導上的邊緣化，兩者極度不相稱。

這是一個第四國際與會者敏銳感覺到的主題，那不僅是由於9個拉美國家的14個與會者裏9人是婦女，而且因為其中許多人是捲入爭取女權的政治活動的年輕一代。

許多委內瑞拉與會者都提到玻利瓦爾主義革命，在該革命的這個時刻，不難找到正面可能性的活生生的例子。訪問西部城市卡拉拉，就可以親身體會一下，通過社區議會，所謂“民眾力量的爆發”可以走多遠了。

這些議會——查韋斯稱之為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第五種最重要動力——是聚集200多家庭的民眾權力的地區機體。去年12月查韋斯再次當選以來，它們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在全國數以千計的社區。

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的討論內容和權力範圍仍然有限，限於非常直接和局部的決定。他們同意其社區最迫切的需要，制定處理這些需要的計劃，然後監督其實施。因此，社區議會不必要侵佔多少現行地方政府的權力。

目前正在委內瑞拉討論的憲政改革應給予這些社區議會更大的權力，其中包括一個規定，即所有地方政府的財政預算案中，至少有

5 % 應移交給社區議會。但卡落拉當地政府走得更遠，通過參與式財政預算案，將其投資預算的 100 % 控制權交給民眾權力組織。

迄今為止，卡落拉有點例外——在委內瑞拉，幾個地方行政部門顯然致力於建設一個新的「社區」的政府，以取代仍然占上風的舊資產階級政府。——但它並不完全孤立無援。對維多利亞（維多利亞市長是一個具高度戰鬥力的青年女子）的工業城的訪問，讓人看到了，所有的當地政府的社會服務部門和其預算，是如何被調離市政府並且置於社區議會區域網路的控制之下的。

而只要在馬拉凱大道上往下走一個半小時，就很容易地看到海曼·厄爾·特饒迪和其他人提及的那種危險。經過九個月的佔領，在桑尼塔日·德·馬拉凱浴室工廠的工人控制的示範經驗，似乎像是被一場政變推翻了。

原材料的缺乏，天然客戶的切斷和銀行債務負擔，使得一些工人開始失去信心。勞動部提供了一個處理方案，包括支付可觀的利益來換取佔領的結束和把工廠移交回缺席業主——然後協助安排不支持佔領的白領行政人員的閃電大會，拋棄已經在領導工廠的工廠委員會。

這只是最新最戲劇性的例子，它表明在面對合作管理或工人控制最根本的活動顯現

時，玻利瓦爾政府態度，說得好聽是冷漠無情，說得難聽是徹頭徹尾的破壞。

一個月前，桑尼塔日的一些工人訪問過卡落拉，聯合慶祝 Aporeea 網站成立周年。這另一個新聞網站已成為玻利瓦爾主義革命左派的虛擬家園。作為 Aporeea 的創始人及社會主義潮流報的一個編輯，貢薩·戈麥斯在加拉加斯研討會的發言稿中指出，這正是一種鬥爭組合，其最大的機會就在於把革命進程推向前。

但很明顯，玻利瓦爾主義領導層內部的一些人，對不起，包括勞工部長，自稱為托落茨基主義者的何塞·拉蒙·裏韋拉，都不希望這種情況發生。幾位委內瑞拉與會者指出，微妙的平衡的達成，需要玻利瓦爾主義革命的國際支持者的團結一致，並且同時以他們非凡的潛力，捍衛和大力支持現有的成就和新進的鬥爭；同時也要發出更清楚的，比有時可能為委內瑞拉革命家所發的聲援還要強的聲音，反對來自內部的，威脅到革命的濫權行為和危險。

註：斯圖爾特·皮伯爾是第四國際委內瑞拉和拉丁美洲地區的記者。

§ § § §

諾姆·喬姆斯基對委內瑞拉最近發展的評論

2007年5月18日，卡比爾·喬什-威加彥和馬守·斯闊斯塔-司徒拔報導

喬什-威加彥和斯闊斯塔-司徒拔：一個由加拉加斯回來的朋友，描述了一輛正在攀山的巴士，一步步地爬斜坡，經常由於發動機劈啪濺射而拖延或停止，但終於達到了頂峰。這讓他聯想到委內瑞拉革命進程。為什麼我們今天不從描述玻利瓦爾革命的進程和它現在所具有的影響兩者開始。你能不能陳述一下，查韋斯 1999 年就職儀式以來，委內瑞拉社會和其人民的日常生活改變得如何？

喬姆斯基：有一些變化。我不認為它們很顯著。這可能是委內瑞拉歷史上的第一次，即有政府確實在利用其龐大的資源幫助比較貧困的那部分人口，而不是僅僅是作個姿態而已。這主要是在衛生，教育，合作社等方面。至於有多麼大的影響，很難說。但我們肯定瞭解民眾的反應，這畢竟是最重要的問題。重要的不是我們怎麼看它，而是委內瑞拉人對它的看法。這是人所共知的。在拉丁美洲有不錯的民調機構，主要的一家是位於智利的「拉丁美洲

民主動態調查(Latinobarometro)非常可敬的組織。在美國也有類似的，不那麼詳細的民意調查。他們監測整個拉丁美洲對各種關鍵問題的態度。最近的一次是12月在智利的調查，發現---正如早先的民調一樣---在委內瑞拉，自1998年以來，對民主和政府的支持度一直在急劇上升。在對政府以及民主的支持方面，委內瑞拉現在同烏拉圭持平，都處在頂端。在支持政府的經濟政策上，它超過其他拉美國家，以及在相信這些政策幫助窮人也即絕大多數人而不是精英方面，它也遙相領先。而且在其他問題上也有類似的判斷，正如我所說的，它一直在急劇上升...儘管存在障礙，但已出現了某種程度的民眾認為非常有意義的進展，這是最好的估計了。

喬什和斯闊：隨著委內瑞拉聯合社會主義黨PSUV成立的宣佈，以及他們在各項服務和公司裏的嘗試性撥款的加快，你是否可以預測這場革命的成熟呢？

喬姆斯基：這不容易說。存在有衝突的傾向，而委內瑞拉的問題是哪一個會占上風。有民主化的傾向，權力下放，民眾的集會，社區控制自己的預算，工廠合作社等。所有這些都是邁向民主的建設。也有獨裁的傾向：集中，魅力人物等等。置身於這些政策本身中，你不能真正判斷它們將走向哪里。對於一個國家而言，控制自己的資源當然是完全合理的。

以智利為例，它被認為是民主資本主義的海報男孩，自由市場的擁護者，等等。這是黨的標準路線。在這個說法中或多或少隱瞞的是：智利出口的主要是銅-這是其主要的收入來源，而且世界上最大的銅生產公司，智利國家銅業公司(CODELCO)在智利，它正是國有企業。它是被阿連德收歸國有的，至今仍然是國有化的。也存在一些私營生產者。智利國家銅業公司(CODELCO)，作為政府企業，提供給國家的收入大約10倍於把收入送往國外的私人企業。而且資助智利社會計劃，等等。還有許多其他國家也控制自己的資源。那是理所當然的事。因此，如果委內瑞拉更廣地控制自己的資源，那應當是一個非常積極的發展。在另一方面，它也可能不是。因此，舉例來說，

當1970年代沙地阿拉伯石油國有化時，這表示他們-主要是ARAMCO(沙烏地阿拉伯國家石油公司，簡稱沙特阿美)-控制自己的石油獲利，而不是外國公司。在另一方面，它掌握在相當苛刻的暴政手中。是華盛頓在該地區的主要和最有價值的盟友，是一個相當殘酷的暴政和世界上最極端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國家。因此，該說法取決於如何利用資源。

喬什和斯闊：南方共同市場，即南錐體共同市場，是南美洲最大的經濟體。它按照自由市場風格的配置建立，像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似乎並不傾向於現行的新自由主義學說的任何替代。你能評論一下該組織嗎？

喬姆斯基：目前，南方共同市場更多地還只是希望而非現實。它有計劃，也有了一些進展。最新的南方共同市場會議，實際上是去年12月在巴西舉行的，拉美國家領導人在科恰班巴會議上提出了一些計劃。他們在為歐洲聯盟型的聯邦作一些計劃。歷史上拉美國家相互分隔得厲害，這對走向一個帝國強權是非常重要的，這種強權過去曾經主導過該地，最近則是美國。拉丁美洲國家彼此分離，沒有整合，而走向整合是非常重要的，並且他們還只是剛剛在認真地開始。南方共同市場是它的一部分，科恰班巴的會議又邁出了一步，還有其他步驟。一體化是維護主權和獨立的一個強大步驟。當國家彼此分離，他們有點可能成為打擊對象，或者是被武力打擊或者是被經濟箝制。如果他們整合和合作，就極大地免除了外部控制，也即免除過去半個世紀的美國控制，---但它回歸的比這個遠得多。

因此這是一個重要步驟，但有障礙。一個障礙是，在拉丁美洲也有內部整合的迫切需要。每一個國家，在少數有錢的以白人為主的歐化精英，和大量的以印第安人、黑人和混血人為主的極度貧困人群之間有一個非常尖銳的鴻溝。這個種族相關性並非完全準確，但它是一種相關性。拉丁美洲有世界上一些最嚴重的不平等現象，而這些問題也開始得到克服。有很長的路要走，但也有走向它們的步驟。在委內瑞拉，在玻利維亞，在一定程度上在巴西，在阿根廷都有這些問題，眼下還沒有涉及多少其他的地方。也許有厄瓜多爾，與新政府

有關。但在這些國家裏，無論是內部一體化和外部一體化，這些都是很重要的步驟，而且一體化確實是500年前西班牙殖民以來的第一次，所以它有某種重要意義。

喬什和斯闊：讓我們回到對專制主義的一些批評，這些批評針對任期的延長，以及最近的所謂授權法。

喬姆斯基：當然，這些法律在議會裏通過了。議會剛巧幾乎完全是由查韋斯主導的，但那種情況出現的原因是反對派拒絕參加會議。可能是在美國的壓力下。我自己不喜歡這些法律。它們如何產生，取決於民眾的壓力。他們可能是走向專制主義的步驟。他們可以是實施建設性方案的步驟。這不由我們說，這要由委內瑞拉人民來說，而我們很瞭解他們的意見。

喬什和斯闊：委內瑞拉的石油財富有機會把援助擴大到西方的貧困社區，包括紐約和倫敦，允許它購買阿根廷、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的債務。你能不能談談委內瑞拉使用其石油財富的情況。

喬姆斯基：讓我們從其對西方的援助開始，那是一個小的反諷。但有一點背景。正是在這裏，我所在的波士頓，它開始了一個專案。所發生的事情是，一組參議員接觸了八大能源公司，並詢問他們是否能夠向美國窮人提供短期援助，度過嚴寒的冬天，因為高油價讓他們無力支付油氣帳單。他們得到了委內瑞拉所有的西鐵古石油公司 (Citgo) 的一個回應，而且有一間公司確實在波士頓提供了臨時的低價石油，然後紐約的布朗克斯和其他地方安全渡過了那個嚴冬。這是對西方的援助。因此，它不只是查韋斯提供的援助，而是更多。

至於其餘的，不錯，查韋斯購買了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阿根廷債務。這是一個幫助阿根廷擺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努力，是阿根廷總統要做的事。國際貨幣基金會有點像是美國財政部的分部，在拉丁美洲有巨大的影響。其計劃的執行，除去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外，在拉丁美洲比世界任何其他地區更嚴格，他們是一場災難。比如說玻利維亞。他們遵循IMF的政策25年，結果，人均收入低於開始的

時候。阿根廷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海報兒童。這是不可思議的，它做的所有事情都正確，他們要求每個人遵守同樣的政策，對世界銀行和美國財政部同樣的政策。當然，所發生的事情是，它導致了整個經濟災難。阿根廷曾設法從根本上違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規則以便脫離災難，而且他們決心要擺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如基什內爾做的，而委內瑞拉則幫助了他們。巴西曾經按自己的方式做同樣的事情，而現在玻利維亞在委內瑞拉的幫助下正在這樣做。實際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陷於麻煩中，因為它的資金主要來於放債收入，如果因為那些政策過於有害而國家拒絕接受它的借貸，尚不清楚他們將怎麼去做。

也有加勒比石油計劃 (Petrocaribe)。一個根據優惠條件並且可以延遲付款，向許多加勒比及其他國家提供石油的計劃。另一項計劃是所謂的‘手術奇跡’。它利用委內瑞拉的資金把古巴醫生 --- 古巴醫生受過高度訓練，同第一世界的系統相比，他們有一個非常先進的醫療制度 --- 送到像牙買加一樣的地方，和該地區的其他國家。它由尋找完全喪失了視力但可以手術治療回復視力的失明者開始，經過古巴醫生所確定的患者，被帶回古巴，經過他們高級醫療設施的治療，能看能見地返回其國家，留下一個印象。

美國和墨西哥顯然也作過一些努力做類似的事，但它從來沒有到達過任何地方。事實上，查韋斯計劃的影響可以在布殊最近的旅行上看得很清楚。新聞界談論他關於拉丁美洲的新計劃的轉變，但是如果你留意一下就看到，實際情況是布殊在拾查韋斯的牙慧。這是奇妙的新計劃。拾查韋斯的牙慧，卻沒有實行它，或幾乎沒有實行它。



厄瓜多爾，委內瑞拉和玻利維亞當前經驗的特點

埃裏克·山特

在拉丁美洲，如果排除古巴，我們可以舉出三大政府類型。第一類，右翼政府，華盛頓的盟友，在該區域發揮積極的作用，佔據戰略的地位：它們是哥倫比亞的阿爾瓦羅·烏裏韋政府，秘魯的阿蘭·加西亞和墨西哥的費利佩·卡爾德龍。

第二類，我們找到所謂的“左傾”政府，它們實施新自由主義政策，支援國家的或區域的資本主義計劃專案，這些政府有：巴西，烏拉圭，智利，尼加拉瓜，和阿根廷的克莉絲蒂娜·費爾南德斯·基什內爾的貝隆主義政府。這些政府實施新自由主義政策，使掩蓋在一些社會援助措施下面的大資本獲利。實際上，通過社會方案的應用，他們使得吞下新自由主義藥丸這件事變得比較輕鬆。例如，在巴西，貧困家庭得到一些政府幫助，以保證政府得到該國最貧窮地區民眾的支援。

其中的一些政府正試圖改善其與華盛頓的關係，特別是建立同美國的自由貿易協定。智利已簽署了一項，而巴西的盧拉，也在尋求與華盛頓圍繞一系列政治問題達成一項協定。但與此同時，巨大的意見分歧依然存在於盧拉的政府和美國之間。這些分歧包括保護巴西資產階級在農業和一系列的工業部門的利益，特別是那些不接受美國保護主義的出口部門的利益。

第三類國家，我們找到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它們面臨地方資產階級重要部門和華盛頓的積極反對。古巴本身是一個第四類國家。

群眾動員的重要性...

關於第三類國家——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我們必須指出，把作為近期歷史標誌的強大群眾動員運動考慮在內，我們才能理解這些國家的政治。

在厄瓜多爾，由於大規模的群眾動員，1997年至2005年有四個右翼總統被遣送回家。

2000年4月直至2004年底，在玻利維

亞出現了反對水私有化的重要鬥爭。2003年10月，圍繞著天然氣問題的動員，推翻了總統貢薩洛·桑切斯·德·洛薩達，並迫使他逃往美國。

1989年以來，在委內瑞拉出現了重要的動員，創造了反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大眾社會鬥爭，該組織在20世紀90年代遍佈全球。更引人注目的，是2002年4月12日巨大的群眾動員，自發的遊行示威，反對推翻查韋斯的政變企圖。這些群眾動員直接導致2002年4月13日年烏戈·查韋斯返回在米拉弗洛雷斯的總統府。這些大規模群眾動員是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政府存在和生存的一個決定性因素。

...和新憲法的民主通過

第二個重要點是憲法修改。1999年，在委內瑞拉總統雨果·查韋斯的第一任期內，新的民主憲法（由制憲議會草擬）通過了全民公決。這部憲法，它仍然是有效的，保證大多數委內瑞拉人有更多的文化，經濟和社會權利。此外，實際的憲法建立了民主機制，它允許罷免尚在任期中的各級職位當選者（包括共和國總統）。

委內瑞拉通過了新憲法，結果啟發了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的政府。玻利維亞在2007年通過了一部新憲法，在厄瓜多爾，2007年9月選出的制憲議會，在起草一部新憲法，將在2008年9月提交公民投票表決。

這些都是有效深刻的改革！正在這三個國家實施的這些民主政治變革不僅在多數工業化及其他國家的大眾傳媒中系統地被銷聲匿跡，而且更有甚者，媒體已策劃了一個不斷的攻擊運動，目的是把這三個國家的國家元首表現得像是可惡的民粹主義和專制的領導人。

關於新憲法的通過，這三個安第斯國家的經驗是非常豐富的。對於其他國家的人民和政治力量，它們應該是一個鼓舞。我們只有把歐洲的情況，同批准憲法條約的任

何民主程序的缺乏相比較。

矛盾

當然，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當前的經驗也有矛盾和重要的局限性，應加以分析。在厄瓜多爾，進行中的改革過程是動員廣泛的社會各界。現任總統拉斐爾·科雷亞，2006年底以多數票當選，他的背後並沒有一個政黨或一些議員。儘管遭到右派和所有大眾傳媒的強烈反對——在厄瓜多爾沒有公共電視臺或廣播電臺——在關於召開制憲大會舉行的公投中，科雷亞贏得了82%的選票。科雷亞在2007年一路建造的這種政治運動，在制憲議會選舉中，獲得了70%以上的選票。如果我們把他的盟友加上，那末他有80%以上的多數優勢。

目前在厄瓜多爾，社會運動不斷地受制憲大會所歡迎，以期更好地考慮他們的建議。這樣，可以讓廣大的民眾參與新憲法的制訂。因此，這是一個非常開放和非常有趣的過程。7月底，我們將知道最終的結果，那時，制憲議會通過了新憲法方案，然後提交給9月底的全民公投。可能的是，將提交給選民的文本會受到不同方面的批評（例如，沒有墮胎權或沒有禁止轉變基因生物）。

在玻利維亞，修訂過程正處於相當激烈的衝突中。總統莫拉萊斯的社會主義運動黨（MAS），顯然贏得了制憲大會簡單的多數（55%），但沒有三分之二的絕對多數。這使局勢複雜化。儘管有右派和統治階級設置的，有時是暴力的障礙，新憲法最終在2007年12月獲得通過。因此，由於反動派非常積極的動員，局勢極為兩極化。右派開展種族主義運動，並且威脅把該國東部地區的領土分離出去，在東部他們控制著局勢。目前為止，這種反動叛亂能夠停止新憲法全民公決的舉行。

恢復公眾對自然資源的控制

第三個重要點：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的政府已經採取措施，加強公共部門和增加對自然資源的控制。在委內瑞拉，國家控制大型石油公司，即委內瑞拉國營石油公司，雖然該公司佔有了優惠私

人的利益，並宣佈擁有其在美國的大部分利潤。這是一項非常艱苦戰鬥。資產階級組織了2002年4月的政變，隨後是停工關閉行動，於2002年12月和2003年1月癱瘓該公司。2003年頭幾個月，委內瑞拉的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但在多數人民群眾的支持下，政府最終重新控制了局勢。

去年，委內瑞拉政府還控制了一個重要的油田，法哈·德·奧裏諾科油田。在委內瑞拉，國家生產三分之二的石油，大型石油企業生產三分之一。然而，目前在談判達成的新合同的框架內開採石油，其中國家徵集比以前更多的租金。

我們必須添加其他的國有化做法：電力生產和分配，電信（CANTV委內瑞拉中央電信公司），一家鋼鐵廠（SIDOR奧裏諾科鋼鐵公司，有1.5萬工人），水泥部門和一些參與糧食生產的企業。不要忘記土地改革，其目的是把土地交給其勞動者。

在2006年，玻利維亞把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國有化。埃沃·莫拉萊斯派遣軍隊控制油田，但跨國公司繼續在那裏積極存在，因為是他們在提取石油和天然氣。顯然，國家是天然財富財產的所有者，但卻是大跨國公司在利用石油和天然氣。

戰略協議

委內瑞拉和玻利維亞之間協議的戰略上的重要性，將使玻利維亞加強一個公眾石油公司的石油和天然氣的開採和提煉。玻利維亞沒有一個煉油廠；厄瓜多爾所有的那些是不夠的。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出口石油而且進口燃料和其他成品油。這裏，我們可以再一次看到，委內瑞拉，厄瓜多爾和玻利維亞之間的戰略協議的重要性，它加強後兩者的自主權。

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與第二類國家（巴西，烏拉圭，智利，阿根廷）共同的是一個關於社會援助計劃的確定政策。它不是純粹簡單地拒絕這些計劃措施，但它必須完全促進就業機會的創造，大幅增加工資，並保證工人，農民，手工業者，小商人，養老金領取者和其他社會階層的更多的社會和經濟權利。委內瑞拉和玻利維亞已經朝這個方向前進，但仍然有許多工作要做。

厄瓜多爾：科雷亞將暫停支付部分債務嗎？

厄瓜多爾就其公共債務發起一項重要舉措。2007年7月，科雷亞創建了內外公共債務積分審計委員會（CAIC）。這個委員會的12名成員來自厄瓜多爾社會運動和非政府組織的，6名成員來自取消第三世界債務國際運動（我作為廢除第三世界債務委員會CADTM的代表，是該委員會的成員）和4個政府代表（財政部，會計法庭，反腐敗委員會和總國庫）。有趣的是，沒有人談論到民間社會的代表（例如，其中的雇主協會），反倒是代表來自社會運動，如土著運動（CONAIE，厄瓜多爾土著民族聯合會）和厄瓜多爾其他的激進社會運動。科雷亞的想法，以及他一個政府部門的想法，是為了避免償還一大部分公共債務。

如果科雷亞實現他的目標，那將意味著直接對抗自己的民族資產階級，因為在大部分公共債務的償還中，獲利最多的是厄瓜多爾資產階級。這也意味著對抗國際金融市場和世界銀行。政府右翼和大型金融集團，更不用說世界銀行和大多數最工業化國家的政府，正在行使的強大壓力，以壓服科雷亞無所作為。2008年7月中旬，當內外公共債務積分審計委員會CAIC移交其報告時，他應該做出決定。對此沒有任何確定處，並有這樣的可能，即科雷亞可以決定避免這種對抗。

美國和地區資本家的戰略：對抗和分離

美國和地區的資產階級的戰略顯然是面向對抗：2002年反對查韋斯的政變，2002年12月和2003年1月委內瑞拉的老闆關門停工，和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和委內瑞拉的大眾傳播媒介的反政府運動。

但是，根本的問題是分劃國家的一個新戰略。玻利維亞資產階級正在組織該國東部地區分離出去。大眾媒體稱之為半月（月球的一半）的區域，以聖·克魯斯作為主要的經濟中心。大地主與出口企業（特別是轉基因大豆）的業主蔑視國家整體，煽動民眾宣佈獨立。他們習慣於訴諸種族主義行動。我們已經毫不含糊地申明，即這一

富裕地區的人口並不構成有民族自決權的國家。政府對該權利作出的回應是，表示願意承認該地區更多的自主權，但不能分離，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有他們一邊的理由。

厄瓜多爾的經濟中心建立在瓜亞基爾，在太平洋沿岸，而基多——在經濟上也是重要的——是政治首都，位於海拔2800米以上的在安第斯區域。瓜亞基爾的資產階級在其右翼市長的領導下，要宣佈獨立。

在委內瑞拉，西部州蘇利亞（接壤哥倫比亞）的州長一直揮舞著分離的威脅。

毫無疑問，所有這一切構成華盛頓預謀的大陸戰略，旨在支持當地資產階級破壞正在經驗左翼運動的國家。

想起加丹加

聯想起比利時，美國和其他強權對剛果民主共和國加丹加省的政策。讓我們回顧起西方資本支持加丹加省的分離主義反對剛果總理盧蒙巴的做法。當親西方的獨裁者蒙博托上臺後（盧蒙巴被暗殺，他被武力帶到加丹加省並移交給他最凶的敵人），大國停止支持分離主義分子。

我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因為有些左派把國家的這些分劃視為人民自決權的一個無可辯駁的表達。

在玻利維亞的情況下，這顯然是地方資產階級反對全國大多數土著權利的反應。似乎還不夠，他們還利用種族主義和反動語言。2007年12月9日，聖克魯斯的市長，珀西·費爾南德斯，在評論制憲大會通過新憲法計劃時，宣佈說：“在這個國家，為了存活，很快就必須有人傷害自己和穿起羽毛服！”從那時起，他的支持者組織對土著人民的攻擊，我們應該記得，土著人民構成了這個國家的絕大多數人口，幾百年來，他們一直是掌握在歐洲和其後裔手中之統治權的受害者。

跨國公司的攻擊

華盛頓和某些歐洲國家首都的戰略還包括另一個方面。跨國公司埃克森美孚和委內瑞拉國家石油公司PDVSA之間的衝突，美國西方石油公司和厄瓜多爾石油公司——一家厄瓜多爾上市公司之間的分

歧，義大利電信和玻利維亞之間的分歧，等等。大型跨國公司（不要忘記巴西石油公司）反對三個左翼政府的恢復公眾對自然資源控制的決定。這些跨國公司利用世界銀行仲裁（解決投資爭端國際中心 ICSID），以解決投資分歧。他們還訴諸在倫敦，阿姆斯特丹或紐約的仲裁法庭處理貿易問題。

存在這樣的風險，即在未來幾個月內，關於兩個拉丁美洲國家之間的一個合同，可能爆發一場衝突：將於 2008 年 8 月就職的巴拉圭當選總統，費爾南多·盧戈宣佈，他將修改巴西加給這個國家的片面合約，該合約是雙方都生活在軍事獨裁政權（伊泰普水電站合約，可追溯到 1973 年）時締結的。能源價格急劇上升時，實際上，巴西給巴拉圭生產的電力支付可笑的低價。巴拉圭和巴西有完全不同的經濟權重，而且巴拉圭有很好的理由要求修改或終止合約。

這些類型的衝突局勢表明，拉丁美洲國家有退出 ICSID 解決投資爭端國際中心的必要，就像玻利維亞那樣，並建立一個拉丁美洲的組織來解決各國與跨國公司（北方的或南方的）之間的訴訟，或拉丁美洲國家之間的訴訟。當然，在這最後的情況下，在訴諸多邊解決方案之前，有必要首先尋求一項雙邊協議。

人民之間的貿易協定

同一些拉美國家與美國和歐洲聯盟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相對立，值得強調的是已經簽署的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和古巴政府間的新協議。

我們必須引證一些例子，比如，20000 古巴醫生自願在委內瑞拉工作，主要在貧困的區域，提供免費的衛生保健，還有，在古巴醫院，為委內瑞拉公民免費做了 40000 例白內障手術和其他眼疾手術。作為交換條件，主要是以貨易貨的交易方式進行，委內瑞拉向古巴提供石油。委內瑞拉和玻利維亞之間也存在同一種協議。

最後，這些國家的當前經驗，在多數大眾傳媒展現的漫畫和負面形象上大為不同。正在進行的過程是複雜的，有時是相互矛盾的；退卻是可能的，甚至相當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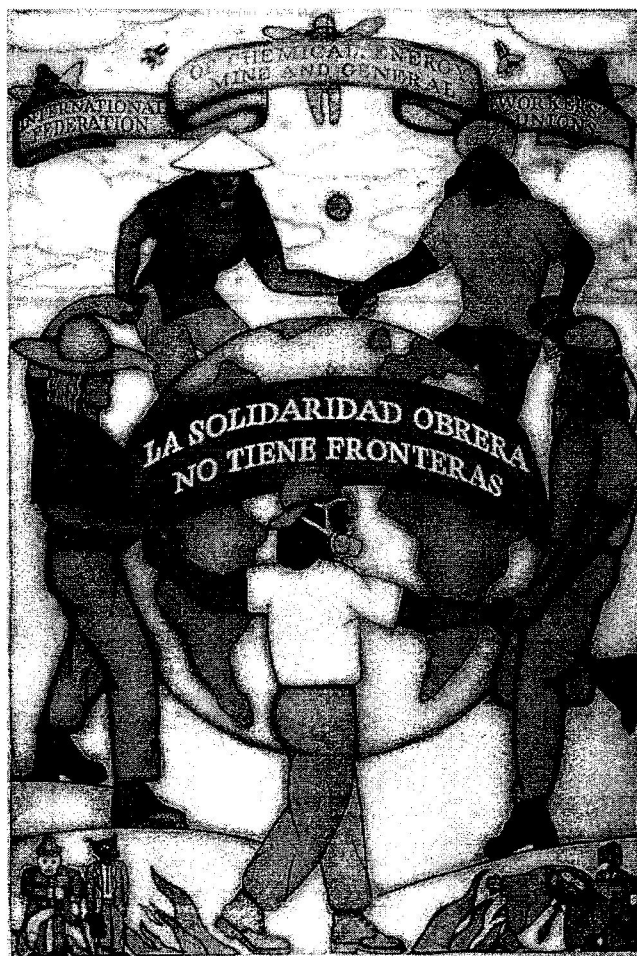
也許，在有利於人民的政治和社會變革上，政府將無法走得足夠遠。

由當地統治階級和華盛頓精心策劃的不穩定局面，可能減緩這些過程。隨著哥倫比亞在 2008 年 3 月侵略厄瓜多爾，很顯然的是，波哥大和華盛頓都有意利用戰爭之槍反對基多和加拉加斯的制度。

我們無法在本文作分析，它就是生產者對整個生產程式控制（工人運動中傳統的說法是，工人控制和自我管理）的弱點。

本文由費德里科·富恩特斯翻譯自西班牙文版，發表在社會主義復興國際雜誌“聯結”上。

• 埃裏克·圖尚是取消第三世界債務委員會主席（CADTM）。



巴拉圭：盧戈的勝利和左派鬥爭的新空間

雨果·理奇

2008 年總統大選中，科羅拉多黨挫敗的含義遠不止巴拉圭政府的改變。這個失敗意味著，拉美最後一個按冷戰政治和思想意識形態框架組成之政黨的垮臺。

阿爾弗雷多·史托斯納爾 36 年的獨裁（1954 年至 1989 年）實際上把“反共產主義鬥爭”作為一個中心。在“科羅拉多黨的統治”期間，美帝國主義設法建立了一個穩固的同盟，幾十年來，該同盟使它能够設立拉美地區的情報活動。從 1970 年代的禿鷹行動，到“過渡”年代的美國軍隊之出現，所謂“過渡”，其目的是“訓練”巴拉圭武裝部隊的成員，這些軍事活動和演習，被以各種方法合理化，從“三重邊界”（該地區有巴西，阿根廷和巴拉圭的共同邊界）打擊“潛伏的恐怖組織”，到結束“毒品的種植，生產和販運”這一目標。以侍從主義，貪汙腐敗和報酬系統為標誌的權力行使，以及訴諸於恐懼和恐怖手段對群眾意識的控制影響，這些經過六十年的施行後，科羅拉多黨垮臺了，它代表這個國家政治歷史的一個重要週期的結束。無論從嚴格的民主角度來看，或者因為它引起的矛盾，特別是涉及到支持候選人費爾南多·盧戈---今天的巴拉圭總統---的社會和民眾運動的可觀動員方面，都有必要認識到這一事件之進步性質。

盧戈的出現，政治危機的產物

這個天主教教會前主教的政治上出現可以用三個因素作解釋：

1. 帝國主義統治模式的筋疲力盡，獨裁統治垮臺後，在科羅拉多黨的領導下，該模式轉化為新自由主義，但是沒有冒危害侍從體制的風險，它在侍從體制的基礎上，按照“國家作為雇主”的原則，建造了自己的政治霸權政策。因此，幾乎不到 600 萬居民的國家巴拉圭，雇有不下於 20 萬的公務員，其百分之九十的人是黨員。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的經濟停滯，削弱了這一模式，以至於黨自身的社會基礎被削弱。

2. 資產階級反對黨的危機，尤其是真激進自由黨（PLRA），一個像科羅拉多黨一樣已存在了一百多年的黨，被證明無能策劃出一個可信計劃以鞏固兩黨制，而這件事是美國非常支持的。寡頭---農業，商業和金融的大莊園主---的經濟積累是在國家的保護和幹預下進行的，無論合法的和非合法的，由科羅拉多黨人所控制。在這種情況下，軟弱的自由資產階級只有十分有限的迴旋餘地。

3. 人民群眾中的政治領導危機，結合了左翼政黨的軟弱和分散。左翼運動和政黨幾乎沒有從其主要領導人受到的野蠻迫害中恢復過來，在斯特羅斯納獨裁統治期間，這些領導人被暗殺，“失蹤”，被監禁或被迫流亡。然而過去幾年的標誌是，一些民眾組織，特別是農民組織的動員以及進入鬥爭，這使得這一點越來越清楚，即科羅拉多黨政府回應他們訴求的能力越來越低。

巴拉圭目前有大約 200 萬的國民旅居國外，而且移民率正在增加。大約有兩百萬人生活在赤貧狀況。百分之三十五的人口處於失業或被迫從事非全日制工作。超過 30 萬無地農民受害於土地所有制，今天該土地所有制允許百分之三的人口壟斷百分之九十的耕地。在此背景下，社會鬥爭的強度在政治過渡時期幾次達到了高潮。

傳統政治領導未能在其經歷的危機中恢復過來，這種無能，顯然讓費爾南多·盧戈的形象在進步和民眾的陣營裏得以加強。盧戈公開宣佈其進入政治生活的決定後，他公然蔑視天主教等級制度，不承認梵蒂岡對他制裁。盧戈是聖佩德羅地區的主教，聖佩德羅是該國最貧窮的地區之一，過去幾年中，這已成為巴拉圭農民鬥爭發展的戰略區。有幾次，盧戈表示支持這些

鬥爭，實際上有時參加了鬥爭。因此，他的候選資格，把最保守的政治階層，如大莊園主，畜牧業和農產品企業家的公司，投入恐慌中。在這種情況下，盧戈幾乎花去了一年多的時間，造成了行使權力超過60年的政黨的選舉失敗。

資本主義週邊的“第三條道路”

盧戈的候選資格有益於形成大多數社會組織和左翼政黨的支援。然而，當他的候選資格開動時，這些團體本身似乎不足以克服科羅拉多黨的選舉機器。一開始，這在他的支持者中攪起了疑慮。最後，在盧戈背後形成了一個非常廣泛的聯盟，範圍從堅定的左翼社會組織和政黨伸展到某些保守的團體。雖然結構不同，但這個聯盟立基於一個共同的中間偏左的計劃，要給社會方案一個重要的位置。

渴望改變所表達的三板斧構成了從事競選活動的各團體之間的協議要點。首先，必須終止“科羅拉多黨無休止的統治”，終止貪汙腐敗和有罪不罰無法無天的現象——這個目標，能把來自社會各層面的團體聚集起來。其次，土地改革，一個工人、農民和所有民眾團體的歷史性需求，是一項方案的中心點，該方案首先是民主的，但也包括了一系列的措施，意圖是按照巴拉圭特點作巨大的結構性變化。最後，這個方案捍衛了國家主權，提出了需要重新談判不公正的伊泰布和亞西雷塔條約，伊泰布和亞西雷塔是分別和巴西及阿根廷一道建成的兩個大型水電站。

無疑，引起最緊張情況的是伊泰布壩——它象徵著巴西所維持的同巴拉圭的那種關係。事實上，幾十年來，該國已刺激了巴西大資產階級的胃口，在對巴拉圭傳統農業施加強大作用，影響其結構的過程中，它有系統地接管了大莊園和大片種植大豆的土地。因此，最近幾年，成千上萬的農民被驅離土地，這已對社會的、環境的和文化的水準造成了一系列的消極後果。

聯合了保守勢力的中間偏左政府的出現，並不是該地區的一件新事，就像巴西

盧拉政府表明的那樣。這些經驗的特點是宣示雙重破裂的話語，宣示與“首先捍衛自己一切特權的新自由主義右派”決裂，以及宣示同“傳統左派”決裂，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政治實踐，該政治實踐並沒有真正地同最近幾年應用於該地區的新自由主義派資本主義破裂。在某種意義上說，我們正看到：在資本主義週邊，一個“第三條道路”在成型！

一個新的鬥爭空間和過渡階段的重啓

到今天，這一點變得明顯已有幾年了，即1989年開始的轉型期被限制在一個惡化的保守主義內：在所有的權力領域裏，政治經濟的黑手黨已經設法重組並重新確立了起來。運行中的新進程，遠未鞏固資產階級的民主，它使得重振政治和公眾自由的空間成為可能。科羅拉多黨的垮臺，開啓了一個鬥爭衝突的新空間存在的可能性，解放了歷史地置於科羅拉多黨枷鎖下的社會力量。

這不是一個解決統治階級政治危機的進程。相反，通過堅定巴拉圭帝國主義政策的支持者，它會使科羅拉多黨徒的危機有加深的可能。這個過程，需要改變國家上層的社會力量。真激進自由黨（PLRA）同支持盧戈的最保守的團體妥協，資產階級疑慮地觀看著它（PLRA），不是因為意識形態的分歧，而是因為它是擔心，如果面對社會鬥爭的興起，主要在農村，真激進自由黨（PLRA）將會不夠有效。

左翼組織和社會組織有可能重新啓動一個組織動員的進程。事實上，緊接著2008年4月20日的選舉勝利之後，在新政府運作之前，大莊園的佔領和旨在阻止農產行業前進的社會動員，以新的活力再次開始。然而，馬克思主義的左派成了被分割的獵物，這就是它在上次選舉中展現給選民的形象。一些團體與支持盧戈的保守政黨結盟。其他的則獻出了自己的“重要支持”，但沒有加入變革愛國聯盟（APC，合法集結所有支持的盧戈選舉聯盟）。另一個傾向則呼籲投“抗議票”，但沒有明確地承諾支持盧戈。在社會組織內部形成了

同樣的傾向，即使那些決定加入變革愛國聯盟（APC）的人構成了多數。

左派的總得票數是不容忽視的。然而，由於分散和缺乏團結，這個左派只能得到國民大會的兩個當選名額。爲了克服這個問題，並建立一個統一的領導——正如它盡可能在做的那樣，假如目標是建立另一種政治方案的話，左派必須面對一個戰術上的兩難窘境，該窘境可以確定其自身可能性的極限。這個可能性是，大多數變革愛國聯盟（APC）成員的政治和社會力量，選擇累積來自政府內部的力量，並且維持與保守團體階層的聯盟，以保證費爾南多·盧戈和他的團隊管理的可能性。

在保守勢力占主導地位的國會，盧戈自己的支持者代表的力量薄弱，他一定要打的牌，就是動員和民眾鬥爭，以便讓他的

一些活動得到尊重。盧戈知道，真激進自由黨（PLRA）支持的有限性，特別是在社會政策和計劃方面。他還知道，其他左翼組織和其他社會階層保持其關鍵性的支持，特別是關於他的選舉方案的一些要點。因此，事實上，存在著一個過渡階段的重新啓動，一個新的鬥爭空間，和一個政治領導的危機。爲了把一個根本社會變革的新項目推向前：這是巴拉圭左翼力量和社會各界所面對的挑戰，在他們面前，現在有一個明確的機會。

► 雨果·理奇是巴拉圭政治分析家，住在亞松森。他積極參與大眾社會主義團結黨的（PCPS）活動，在最近舉行的大選中，該黨支持候選人費爾南多·盧戈。



玻利維亞：停滯的轉型

韋伯爾（衛眾譯）

“跨國公司總是在製造爭端，由此積累資本，少數人手中財富的聚斂無助於人道精神…。我可以斷定資本主義是人道主義的頭號敵人。”——總統埃沃·莫拉萊斯，2007年5月22日於玻利維亞科恰班巴的演說，轉自美聯社。

“我們將糾正言論，去掉與實際行動無關的粉飾…這一年（MAS）社會主義運動黨政府的第一年）沒有一項措施影響到玻利維亞中產階級甚至上層階級，我們一再重申，莫拉萊斯政府承認私有財產所有權，尊重宗教自由，鼓勵正當的商業活動，確保教育和保健領域的私人參與。”——副總統阿沃若·加西亞·里內拉，2007年5月1日於柯拉林。阿根廷報。

“我們希望資本主義具有較大的國有成份。”——副總統阿沃若·加西亞·里內拉，2007年5月20日，柯拉林。



2006年十月召開了第十九屆玻利維亞全國工人代表大會，會議討論紀要產生了一份深刻觸及玻利維亞急進勞工傳統的重要文件。檔將其國內的當前情況放入蘇聯東歐集團的“現實社會主義”垮台後的全球資本化的更廣的參照系中，其參照量有：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在全球規模上的擴展，當代中國資本主義剝削的迅猛步伐，持久發生的大眾失業的新現實，以及由於70年代“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結束和新自由主義的躡起，世界各地的工人階級所遭受的衝擊。

乍看之下，由於“大多數---約66%---的勞動力都從事於非正式部門的工作，包括數以千計的微型公司，這些公司規模小而且通常是違法的古柯貿易。”

（轉自經濟情報，玻利維亞概況2006）該工人代表大會意識形態立場看來似乎是不相關的。然而，工會的影響遠遠超過其正式會員，在科恰班巴更是這樣。

90年代後期開始，科恰班巴的工會使得他們打開其中央工會辦公室的大門，面向週邊組織，窮人網路，水資源維權者，失業人員和其他人。2000年的水源爭奪戰爆發時，工會辦公室成了維繫著城鄉聯盟反對水源私有化的中堅社會運動組織“大聯盟”（Coordinadora）的家鄉。

玻利維亞工人聯盟領袖，鞋廠工人奧斯卡·奧利弗是這場運動的主要發言人，並且是這十年初期玻利維亞左翼勢力的卓越人物之一。（見湯姆·劉易思同奧斯卡·奧利弗的談話，科恰班巴！玻利維亞的水源戰爭，南端出版社 2004，121）

工人代表們有力的論證了新自由主義模式（資源和服務私有化，市場至上和“自由貿易”崇拜）加劇了玻利維亞經濟作為原材料（20世紀大部分時間是錫，近年來被天然氣取代）生產者的新殖民主義特徵，深化了國際資本對經濟上最重要生產部門的滲透以及隨之而來的控制，導致了前所未有的高失業率。他們指出，1980年代，私有化和“無競爭力”工廠的關閉使得超過十一萬的工人和礦工丟掉工作。

與會工人代表指出，當前時期的另一個突出特點是，冷戰後美帝國主義與其同盟在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和巴爾幹半島等地區上演的持久戰爭活動。面對這樣的形勢，檔認為國際工人階級面臨兩個可能：野蠻戰爭的加劇和群眾社會狀況的惡化，或者社會主義革命的決定性勝利。

05年12月18日埃沃·莫拉萊斯以53.7%的選票當選總統後，現任社會主義運動黨政府於06年1月開始施政，會議認為，在玻利維亞的環境下，該政府不是獲取這樣決定性勝利的工具。其實，莫拉萊斯政府倒是

象徵了民粹主義的意識形態復蘇。

會議制定的四個戰略準則強調了工人階級的自治獨立和積極進取的行動，這四個準則是：爲了階級聯合；爲了革命的領導；爲了一個屬於工人的政治工具；以及爲了社會革命。

傳統和衝突的遺產

會議文件的特點是革命意識，它代表了持續塑造著當代玻利維亞的激進改革主義的兩個主要反叛傳統之一。不只一個例子表明，關於20世紀玻利維亞好戰的工會主義的記憶仍然活躍在21世紀頭十年的新工作場所和社區環境裏。

玻利維亞工人運動開展於1880年和1952年全國平民革命之間，由革命馬克思主義、工團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強大意識形態主導。在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間，玻利維亞勞工運動以其戰鬥的獨立性，激進的意識，和不受制於國家公司化束縛的相對自由而特立獨行於拉丁美洲。

1952年由礦工主導，工人們嘗試把革命引向革命社會主義但未能成功，1964年到80年代初工人同一連串軍事獨裁作鬥爭，而且在1982年選舉民主的恢復上起了領導作用，儘管他們企求的是超越自由民主並激發起一個社會主義過渡時期。

儘管在1985年到2000年間玻利維亞工人階級，尤其是礦工，遭遇了一系列難以想像的失敗，但是他們的革命馬克思主義傳統隨同他們進入主要城市貧民區——尤其是位於首都拉巴斯邊緣的厄阿托貧民區——的全新組織環境中，也進到了科恰班巴省的查佩爾古柯種植區。

厄阿托是一個八十萬人口的棚屋鎮，82%的居民自認爲是原住民，許多拉美人認爲它是西半球最革命的城市，05到06年間我在那裏參加了許多會議。有些80年代中期迫於生計安置到厄阿托的前礦工們儘管帶著職業性的憔悴，在公眾會議上，他們對全球資本化的當前事態和玻利維亞的國內社會力量平衡作出犀利冷靜的馬克思主義分析，他們這種介入會議的方式給我以無以復加的深刻印象。

前礦工們然後會就他們認識的厄阿托群眾運動最佳鬥爭途徑做說明，目的是推動本土自由和社會主

義解放鬥爭。然而前礦工們決不只是講臺上的權威。他們常常是最先達到和最後離開抗爭政治軍事強權鬥爭前線的人。

我確信，這種底層工人的好戰的激進文化傳統，即使在新自由主義經濟調整的可怕扭曲衝擊下它暫時疲軟，但卻一直傳承了下來。面對新的現實和促進工人階級團結道路上的巨大障礙，工人階級的鬥爭必須調整自身。

當代玻利維亞激進主義下面的另一主要傳統與玻利維亞的歷史淵源更深，實際上是同反殖民主義抵抗的前共和模式深刻相關的。這個傳統就是延續幾個世紀的反對殖民主義，反對1825年玻利維亞共和國成立以來的內部殖民種族關係的抗爭和本土激進主義。

如歷史學家布魯克萊森所寫：“1781年[艾美拉土族英雄]圖派克卡塔里圍攻拉巴斯整整六個月的故事，仍然是糾纏著玻利維亞上層階級的噩夢。她也許還應該指出，在種族化階級劃分的另一邊，同樣是這些故事，在近十年的大部分時間裏，激勵了當代土族激進分子在城市暴動，在鄉村封鎖道路。當卡塔里因1781年的暴亂被處以四馬分屍的極刑時，他警告殖民者說，他將會“百萬倍的捲土重來”，而最近的反叛領袖們就自視爲這種捲土重來的一部分。

雖然在上兩個世紀中某些時期革命馬克思主義和本土反叛運動曾聯合抵抗資本主義和種族壓迫，但這兩個傳統間關係的緊張和競爭並不少見。

於是，2000年到2005年間左翼本土鬥爭的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和本土解放浪潮所具有的互補性成了特別突出的範例，表明這種團結可以產生的力量。左翼本土力量奮力反對自然資源私有化，當軍方無情地鎮壓國內手無寸鐵的示威者時，他們置身於前線，並設法趕下了兩個新自由主義總統：貢薩洛·桑切斯·德洛薩達（03年10月）和卡洛斯·梅薩山（05年6月）。這一切爲埃沃·莫拉萊斯和爭取社會主義運動（MAS）的激烈對立而又複雜的選舉勝利打下了基礎。

這個時期，儘管在無數的左派團體和本土組織之間存在著明顯差別，但對多元化自由的一種共同義務是廣爲接受的。在動亂的巔峰時期——03年10月和05年6月——他們一致的集體行動的力量是極其明瞭

的，當時，成千上萬的本土農民，非正規經濟裏的勞工，礦工，靠福利年金過活者，失業者，教師，學生，醫務工作者和許多其他人佔領了拉帕斯的每一條街道，要求在經濟、國家和社會組織方面實行根本變革。

不幸的是，第三個影響玻利維亞極端主義的傳統多次傷害頭兩個解放計畫。它就是民族民粹主義，多年來，它呈顯各種形式和不同內容，但同1952年的國民革命及其政黨革命民族主義運動（MNR）聯繫最為密切。

該革命達成了礦產國有化，大規模的土地改革分割了大農場（大土地持有），並取消了惡名昭著的包衣制度，在這個制度下，本土農民勞工必須要為地主及其家人和監工提供個人服務，才被准許在莊園中耕種一小塊土地。在革命的最初幾年，這場礦工領導的勞工運動要求實現財產關係的全面社會主義化，以及工人對礦產及其他資源的掌控制度化。

起初，由於大眾運動的壓力，革命民族主義運動黨被迫制定頒佈重大改革措施，然而那以後，革命民族主義運動黨立刻利用美帝國主義的協助攻擊工人。同新吸納的農民組織——被最近的土地改革招安的組織——結盟，革命民族主義運動黨開始反轉革命果實，把軍隊重建為鎮壓礦工的工具。

1956年，引進了一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支援的經濟穩定計畫，通過1964年的右翼軍事政變，當局發展出一套精心設計的分而治之系統，用來處理城鄉各個大眾區域，壓制其最激烈的部分的同時，整合這樣一部分人，這些人可以通過合作關係和符合行政當局意圖的利益分配而整合起來。

儘管2000年到2005年間左翼本土鬥爭反叛浪潮的主流似乎在相當程度上從民族民粹主義的包袱中解脫出來，他們還是未能形成一個能取得政權和推進社會主義本土解放的綜合性的革命計畫。社會主義運動黨作為唯一跨區域連接內部各民族的政黨，加上其農村道路封鎖和街頭示威時期同議會外活動團結一致的早期歷史，此時正好填補了這個真空。

但是自2002年來，社會主義運動黨穩步轉變成為一個溫和改革的黨派，為贏得選舉而討好城市中產階級。這一點再明顯不過的證據是：2003年10月和2005

年5、6月的反抗動盪中該黨扮演極小的角色，在2004至2005期間MAS同卡洛斯·梅薩山的新自由主義政府暫時結盟。

如今情況越來越明瞭，社會主義運動黨重塑了民族民粹主義遺產，將其炮製成適合二十一世紀現實的新雜燴。政府接納了一些本土解放運動用語，這些用語發展於早期群眾鬥爭但把其本土焦點同面臨本土人民的物質現實分隔開了。

玻利維亞的原住民——他們是城鄉勞動階級的絕大部分——在他們的日常生活裏，經受著無孔不入的種族壓迫和階級剝削，儘管事實如此，但社會主義運動黨政府斷定，在50到100年的時間裏，這個國家要過渡到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

與這個政府論點——即眾所周知的“安第斯-亞馬遜資本主義”——平行的組成部分，本土解放運動，已經成了它過去的自己的貧窮版。按副總統加西亞-裏內拉的世界觀，本土解放運動業已簡單地意味著本土民族資產階級或者說“安第斯-亞馬遜”資本階級的產生。兩相比較，很容易讓人認為它同非洲國民大會（ANC）下的南非後種族隔離的作法相似。

加西亞-里內拉立論的假設是，玻利維亞必須經過一個五十到一百年的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資本主義生產力會發育成熟。今天本土占多數的各個小資產階級部分將成為明天的民族資本家，在這個意義上，這就是“安第斯-亞馬遜”資本主義…換言之，這是一種對本土人民有利的資本主義。

副總統的這套理論主要來自20世紀初第二國際的經濟進化馬克思主義，並經過了舊玻利維亞共產黨的疲弱戰線的篩選。按照這個觀點，民族生產力還不能夠助益社會主義；一個本土資產階級的形成將是這個革命的成就。

因此，新民族民粹主義排除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的同時，接納了淡化的本土自由觀。爭取社會主義運動黨借用了革命民族主義黨的1950年代分裂人民運動的一些策略：控制最重要的社會運動組織，遏制普通民眾越過溫和改良嚴格標準的行為，甚至鎮壓那些不願意服從民粹主義限制，和服從國家二等地位的工人和農民。

簡要地概述2006年1月以來主要政策發展，以及梅蒂亞盧納（“半月”區）各部分——潘多，本尼，聖克魯斯和塔里哈——裏面的右翼自治力量的運轉和仍在開展的民眾鬥爭，就可以提供莫拉萊斯政府統治下的新玻利維亞現狀一份比較清楚的畫面。

國有化一切，國有化烏有

2006年5月1日，爭取社會主義行動黨政府的最被期待的政策措施宣佈了：天然氣和石油“國有化”。玻利維亞擁有南美第二大天然氣儲備，已探明的和可能的儲量僅次於委內瑞拉。在五月節事件的幾個星期內，顯然可悲的是，卻看不到這條宣佈國有化的28701號總統令有任何實際的國有化行動。

莫拉萊斯政府誘導公眾相信，這條法令建立了新的特許開採權利金和稅收體制，82%的利潤將歸國家所有，僅僅18%由私營公司所得。事實上這個82/18開的演算法只是個過渡政策，目的是強制跨國公司在180天內和政府簽訂新的合同，不然就得放棄玻利維亞地下的巨大財富。新合同將會允許談判以便總是提醒人們，維持這種短期82/18配比關係會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難，而國際石油巨頭們在新的合同之下應該會作的更好。

在似乎是無休無止的延遲之後，2006年10月，被右翼反對黨指責為腐敗，無能和低效的莫拉萊斯政府終於和12個外國石油公司簽下了44為期30年新合同。政府還設法搞定一些新協議，以高於前任新自由主義政府所簽定的價格，出口油氣到最重要的市場巴西和阿根廷。

在1998到2002年間，天然氣出口給玻利維亞帶來了大概2.32億美元的收入。2006年，由於暫時的高稅政策和新合同生效，政府獲利達16.5億，並預期在2007年達到20億，到2010年達到40億。

由此，跨國公司對玻利維亞自然資源的純粹掠奪和十足剝削至少是暫時告一段落了。政府在天然氣這塊蛋糕上獲得較大的份額——是中期還是長期規模的，隨世界市場不穩定的天然氣價格而定——讓國家可以拿得出錢投入各社會項目，儘管在任何有意義的規模上還不見有行動。

但更合意的稅收制度並不就等於國有化，而且在

這方面，甚至莫拉萊斯政府的改革措施遠不及緊跟著1952年革命之後的幾年採取的措施。跨國公司仍然控制著石油工業；國有石油公司YPFB仍舊缺乏資金因而無能力開採或生產；玻利維亞繼續被迫進行著初級商品的出口，由於沒有附加價值，現在的高價將不可避免的在某段時間後下跌。

如盧爾-日巴奇指出的：

“碳氫化合物未能國有化的問題出在國有公司YPFB的重組…並不是真的。新合同要求YPFB不投資、不承擔風險和責任，僅監督碳氫化合物公司…。同阿根廷簽訂的合約提高了輸送到這個國家的出口價，對巴西燃氣出口提供了耗能多的聖保羅工業帶近30%的能源供給，這兩者將為玻政府帶來可觀的收入增加，但是也鞏固了不經加工的天然氣出口。實際上，這會帶來巨大的短期利益，但是時間長了會引發問題。”

不管莫拉萊斯政府的天然氣政策有什麼嚴重的局限性，政府的新礦業政策相比下只會更加糟糕。在2005年12月選舉前的準備階段，莫拉萊斯許諾恢復在80年代中後期採礦業私有化時荒廢的玻維利亞國家礦業公司。實際上，在安第斯山脈的西礦區，莫拉萊斯政府反而去推動跨國公司和小資產礦業合作社的特權階層部分達成“風險分擔”合約。

玻利維亞也是穆通（Mutún）的故鄉，穆通是世界最大的鐵礦藏地，位於山塔克魯斯的東部低窪部分。莫拉萊斯政府與印度巨頭金達萊（Jindal）鋼鐵粉末公司達成了從2007年九月開始開採該鐵礦的協議。莫拉萊斯強調這項新計畫將帶來約2億的年稅收，但有一部分經濟學家們認為此協議的條款造就了一場對玻利維亞資源的真正的掠奪，同時也又一次錯過了重建玻維利亞國家礦業公司的機會。

所有的這一切都發生在這樣的一個商品繁榮中，這個繁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中國經濟的龐大擴張而推動的。舉例來說，2006年鎳、錫價格飆高了18%，而中國在2006年國民生產總值增長達10.7%的情況下，預計2007年8%的GDP漲幅。

金屬商品價格的力量使得西部高原的國企礦工與合作社之間的鬥爭愈演愈烈。應用前面所述的革命

傳統，前個團體希望重新國有化採礦工業並把控制權交到工人手中。後者則要向跨國資本看齊，進一步私有化國家礦業公司還控制的那部分礦業。

2006年10月初，緊張氣氛瀰漫整個婆所科尼錫礦，錫礦位於歐魯若區烏努尼社區附近。先是合作社攻擊了國有礦工，緊接著發展為雙方使用炸藥等武器的兩天血腥戰鬥。十月五日和六日兩天，至少造成了17人死亡和多人受傷。政府因未派出軍隊維護和平而廣受批評。

這些事件的發生清楚表明了社會主義運動黨政府與合作社之間是多麼的密切一致。這一點最清楚地體現在國家礦業和冶金部長沃爾特·維拉羅身上，事實上，他是合作社高層聯合會的一個前任領導人，甚至在其礦業部長任內仍舊是一個合作社的註冊成員。

17人的死亡迫使政府更換了沃爾特，並在有關其礦業意圖的措辭上加碼。莫拉萊斯又一次宣佈該工業將被國有化，但除了Vinto錫冶煉廠孤立個案之外，沒有其他任何國有化行動。

不幸的是，‘經濟學人’雜誌的駁斥似乎是對的：“10月份[莫拉萊斯]說這是礦業[國有化]的轉捩點。莫拉萊斯鼓動群眾的口號是‘玻利維亞資源用於玻利維亞人’，然而對於他來說，有時候象徵手法和漂亮言辭比實際行動要強悍得多。”事實上，‘經濟學人’雜誌的資訊科最近就一個投資者冷淡的主要氣氛作了報導：

“在面對礦產資源的徵用和其複雜性的時候，玻利維亞礦業部門的投資者並沒有表現的如預想之中的不安。由於玻利維亞所有的礦產品價格堅挺，該部門正處在大量私有投資興起的邊緣。2006年前九個月以來開礦能力的增強顯著提高了礦石出口的數量和收入。在比較堅挺的價格和主要礦物——鋅、金、銀、錫——的輸出增加的操作之下，整個礦產業的生產總值到了92.9%的年增長幅度，高達8.165億美元…政府已經暗地裏保證，無論它在公眾場合發表什麼言論，都不會做不利於合法運作且信用良好的公司。外國礦業投資者們相信，政府即將宣佈的礦業規章修訂案不會是法律上嚴厲的也不會作充公式的徵稅，因而正在加緊推進他們的工程。

莫拉萊斯政府還宣佈了收購一個義大利電信多國公司的51%股份的意願，目的是把ENTEL重建成一個國有公司，但至今這也只是一個宣佈。沒有採取任何確定的行動。

由於篇幅有限，在這裏不能對它們作評論，社會主義運動黨的經濟政策也有類似的深刻局限，受限於它對中央銀行自治的承諾，財政緊縮，受控的微量通貨膨脹，最低收入的硬性規定和公共部門工資的增加，土地改革的限制標準等等。所有這一切發出的信號是，新自由主義的舊模式在溫和改革的本土民粹主義的新莫拉萊斯政府上留下的深刻烙印。

梅蒂亞盧納的右翼自治黨

除了天然氣國有化以外，2000年到2005年間人民左派本土運動明確表示的訴求中，最為清楚的是，建立革命制憲大會，深入廣泛地挑戰種族主義和資本主義剝削，從根本上再建玻利維亞的國家、經濟和社會的基礎。

而社會主義行動黨卻以選舉規則開始它的制憲會議，這些規則保證富含天然氣的梅蒂亞盧拉區的右翼自治力量有資格否決新憲法草案中可能含有的任何革命甚或深入改良的內容。

在試圖安撫梅蒂亞盧拉區的資產階級的過程中，行動黨低估了2006年一月的群眾革命力量之強大和右翼自治分子的相對弱小。但是由於MAS成功地遏制了玻利維亞群眾區域中的大眾動員，加之它沒有挑戰資產階級的基本經濟力量，右派又逐漸開始形成政治力量。

其復興生動的表現在憲法大會的慘敗中。因右派放棄參與討論長達六個月，使得原本為期一年的制憲過程（2006年8月到2007年8月）中斷不前。為使其聯合抵制制憲的行為合法化，右派勢力指控行動黨主張獨裁，並在山塔克魯斯城各處舉行群眾集會，號召梅蒂亞盧納區自治——那當然意味著資產階級掌握當地的自然和農業資源財富。

儘管山塔庫魯斯右派的上層領導組織談論“民主”和“法治”時，他們與委內瑞拉境內的極右勢力非常相似，實際上尋求的是為一小部分精英的利益動搖民主和法治。在玻利維亞，右翼自治分子甚至將克

魯賽諾青年團囊括進其社會基礎中，這群暴力的白種法西斯青年鼓噪梅蒂亞盧納上層階級的種族主義感情，經常攻擊那些地區的本土農民和工人的動員活動而逍遙法外。

鑒於制憲大會引發的危機愈演愈烈，駐拉帕斯的阿根廷大使館擔心一旦內戰爆發，難民群將湧入布宜諾艾利斯，進行了一項衝突變成暴力的可能性調查。結果認為玻利維亞內戰的可能性高達58%。

國際危機組織也在2007年1月就玻利維亞國內衝突升溫的危險發表了報告，同時美國國會外交委員會也派人作了關於玻不穩定局勢的報告。外交委員會的報告飾以這樣一個標題，其題目的頭韻仿佛是福克斯新聞又一次敲響了恐怖主義警鐘：“懸崖邊的玻利維亞”！

2007年1月，科恰班巴地區的右翼行政首長曼福德-瑞易斯·維拉要求舉行自決公投，使他的地區得以加入梅蒂亞盧納的自治勢力，導致制憲大會矛盾進一步加深。事實上幾個月前關於同一個問題剛舉行了一場公投，而且科恰班巴人民早已果斷的拒絕為區域自治而加入梅蒂亞盧納集團。

社會主義運動黨設法動員了科恰班巴古柯運動和城市聯盟的一部份成員向瑞易斯·維拉施加壓力，要他放棄舉行新公投的訴求。在科恰班巴，民眾們封路、在中心廣場徹夜集會。然而，面對極右地區行政首長的傲慢自大和科恰班巴城市日常生活裏嚴重激化的種族主義，民眾運動迅速增長，很快就超出了行動黨政權的控制。

仿效山塔克魯斯的克魯賽爾青年團的新法西斯青年組織同各大眾團體之間爆發了街頭戰鬥。青年種族主義團體和上層階級打手一邊攻擊古柯種植者和城市土族窮人一邊叫嚷著種族蔑稱，工人人民運動給以有力的回擊並要求瑞易斯維拉立即辭職，但行動黨官員指責其為反民主的，號召他們的社會支持者鳴金收兵，移走路障，停止所有暴力行為。

城市最終在軍事佔領下平靜下來，在街頭混戰中雙方各死一人。以托洛茨基派大學生為主導的，極左團體建立科恰班巴地區平行革命政府的簡單行動沒有準確把握好社會力量的平衡，平行政府幾乎一宣佈成

立就湮滅了。在平行政府宣佈成立時，行動黨成功地將古柯工業和城市工會從衝突中拉出來，儘管在衝突激烈的時候也許有採取這樣極端做法的基礎，但在動員活動和正面衝突的末尾採取了措施，而此時整個可能性都消失了。

一組因素削弱了玻利維亞的美國傳統力量。其中之一就是美國現在受困於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帝國主義擴展。儘管國內政治軍事精英和民眾反對伊拉克戰爭，還是看不見這場戰爭的盡頭，而這時布希的眼睛好像還落在伊朗上。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拉丁美洲及世界其他地區調整作用的衰落也將導致美國力量進一步衰落。

美帝國主義

80和90年代美國對拉丁美洲的龐大影響力來自它在這兩個金融組織裏決定性作用。隨著古巴、委內瑞拉和玻利維亞推行玻利維亞式美洲化(ALBA)，拉美各國之間反帝合作的可能性有了一般性的改善。

玻利維亞式美洲化是美國大型企劃如美洲自由貿易區(FTAA)和小型企劃如雙邊貿易協定，中美自由貿易協定(CAFTA)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對立面，並希望能最終替代這些方案。建立有效的反帝聯盟仍然有重重的巨大障礙，但這些地區的美國帝國主義力量已經有了明顯的衰退。

在玻利維亞，所有這些廣泛的因素影響了該國同美帝國主義的獨特經歷。委內瑞拉有從石油流來的巨大收入，即使它們最終有一天會耗盡，但這個事實開啓了玻利維亞的另一條財金線。這筆經濟來源足夠提供非凡的餘地，讓這個南美最窮困的國家制定自主經濟政策，儘管我們只看到其這方面極少的實際作為。

如今的天然氣和金屬製品價格高抬推動了玻利維亞經濟發展，同時也給當政者更多空間來制定更好的社會政策。美國作為玻利維亞的貿易夥伴，其重要性的降低，對減少玻利維亞因迎合帝國而易於遭受的批評也是至關重要的。

然而，美國的帝國計畫在繼續著，通過在玻利維亞多面化的“民主推銷”活動繼續，通過在舊領域中施加其縮小的而不是實在的杠杆作用而繼續，這些領域是毒品戰爭，軍事基地，正式及非正式的軍事訓練

及影響，提供援助，有條件的進入美國市場，和對國際及區域金融機構的統治。

前述的外交委員會徵求的報告提供了美國政府對莫拉萊斯當局感覺的進一步線索。報告的總體建議是採用一項類似美國50年代對待民族主義革命黨政府的政策。民革黨被認為是個潛在危險，但最終可以通過協商籠絡控制，甚至可以變成為一個控制和吸收來自激進社會運動和底層工人抗爭的真正危險的有效手段。保持穩定似乎就是當前執政的目標了。

該報告的作者埃頓阿多-伽馬拉寫道：“只要危機仍存在，美國就很難在傳統政策議程上持續前進。事實上，如果這些緊張對抗的任何一個達到沸點，將會造成廣泛的社會動盪和暴力，美國在玻利維亞和安第斯帶亞區的商業、能源、安全和政治利益可能會受到威脅。”

另一方面，如果繞過莫拉萊斯的修辭去察看，伽馬拉確信無疑的擔保，事情沒有人們可能想像得那樣值得擔憂：

“這些事件都表明，不管他努力塑造的大眾形象是什麼，莫拉萊斯在很多方面都只是一個傳統的玻利維亞政治演員，他在向主要支持者施惠的同時譴責在他以前做同樣事的人。事實上，就這個計畫接受過訪談的一名世界銀行職員聲稱，儘管莫拉萊斯不停重申反世界銀行的言論，該組織和莫拉萊斯政府的關係比任何一個近期的前政府都好得多。”

也許最令人驚訝的是，儘管莫拉萊斯是通過他在查佩爾反帝古柯種植農聯盟的領導作用而在政治上崛起的，伽馬拉的報告說美國的反毒戰爭（在這兒）是比較無憂慮的：

“令人矚目的，莫拉萊斯政府同意美國毒品強制局的工作人員在新政策下繼續在玻利維亞大力開展禁毒，而美國外交人員已經與其玻利維亞同行促成了也許是脆弱的但卻成功的工作關係。2006年9月，美國國際麻醉品監督執法局宣佈，為繼續獲得美國反致幻毒品的協助，玻利維亞必須要在六個月之內達到美國設立的‘基準’。於是在2006年有5000公頃古柯田被根除，以達到其一個基準要求。美國當局同意，莫拉萊斯政府上台之後大大加強了禁毒的力度。”

伽馬拉最終建議華盛頓方面繼續其“民主促銷”戰術，重開軍事援助，並拉攏阿根廷、智利、巴西的政權向玻利維亞施加壓力，讓它為帝國主義和亞帝國主義的相互利益而維持穩定。與此同時，“…莫拉萊斯政府應當儘快找到吸收異議的方式，很多異議如今圍繞在有組織的勞動力團體周圍，這些團體歷史上是支持社會主義運動黨的。”



人民鬥爭

社會主義運動黨政府執政的前一年零四個月，來自人民左翼本土組織自治要求的壓力還相對較少，本土組織尋求推動社會主義運動黨決然地轉向左。社會主義運動黨裏複雜的各個派別越來越多地集中在黨內最保守的領導成員副總統加西亞·里內拉周圍。因此，政府頒發的實際政策動機和戰略經濟計畫檔同他的安第斯馬遜資本主義觀點相當一致。

到目前為止，大多數民眾組織，尤其是農村本土組織，將埃沃-莫拉萊斯政府看成是他們政府。他的原住出身大部分源于西部高原的艾美拉土族和查佩拉省的蓋丘亞土族，看在大部分普通民眾階級和被壓迫的本土民族的眼中，讓他帶上了無暇可擊的文化憑據。

要記住，儘管玻利維亞共和國有62%的人口在2001年的人口普查中自認為是印第安血統，莫拉萊斯卻是其歷史上第一任印第安人總統。所以，當人民組織被動員起來的時候，它往往去保護政府抵禦梅蒂亞

盧納的右翼自治勢力。

目前右派變得越發膽大，並在增加它的政治能量。在山塔庫魯斯，右翼力量能夠動員到幾十萬人遊行反對政府和支持該區的自治。

在與梅蒂亞盧納區的資產階級勢力的談判中，莫拉萊斯政府採用了完全和稀泥的立場，在我看來是個戰略錯誤，因為這給了右派政治力量慢慢在其經濟基礎上重新聚集力量的機會。如果憲法終於通過，並且如莫拉萊斯政府所願，議會和總統選舉在2008年如期舉行，那末很難預料選舉的結果。

在許多農村本土組織似乎會繼續堅定支援現任政府的同時，武裝力量也是一樣，但在城市勞動力運動，社會運動組織，以及礦工中，有越來越多有組織的不滿表達出來。這類潛伏的矛盾導致2006年10月的採礦衝突和2007年1月科恰班巴的城市衝突出現流血結果。

2007年四月，玻利維亞工人中央(COB)宣佈將創立一個新工人政黨（或政治工具）因為他們認為爭取社會主義行動黨沒有採取措施去擊敗新自由主義。工人中央(COB)論述說政府的軟弱讓右翼運動和前總統喬治·奎若加領導的社會民主力量陣線（PODEMOS）有機可趁。現在斷言這個新政黨的未來還為時尚早。

2007年5月，教師和醫務保健工作者在拉帕斯罷工抗議，厄阿托的公立大學學生在背後鼓動了一系列訴求。西部高原上國營礦工和他們的歐魯若印第安農民聯盟，有可能對行動黨政府以外的，社會主義和印第安解放的任何獨立階級的政治活動和鬥爭起到重要的催化作用。2006年的10月事件顯示出他們越來越有組織性，此時合作社份子對政府仍有巨大影響，並保持著動員其民眾的深刻能力。

厄阿托是2003年10月和2005年5至6月的大規模抗議行動的民眾反抗中心，那裏的形式是混亂複雜的。2003和2005年兩個最重要的群眾組織分別是厄阿托地區委員會聯邦(FEJUVE-El Alto)和厄阿托地區工人中央(COR-El Alto)。

對最近以來地區委員會聯邦（FEJUVE）內部普通民眾思想情感沒有足夠的調查研究，但是有一點比較清楚，就是至少領導層變得同MAS政府密切合作

了。因此，地區委員會聯邦(FEJUVE)當前不能像2000年到2005年大部分時間它做的那樣，代表厄阿托地區的獨立激進政治行動。

依據同莫拉萊斯政府的關係來看，直到最近，厄阿托地區工人中央的領導層所處的形勢也一樣。但就在2007年5月22日，一個重要的轉折在厄阿托地區工人中央的第六次會議上發生於該組織內部。工人們批准了他們的政治聲明，叫做‘十月指明道路’，意思同2006年10月的反抗事件有關。

現在，厄阿托地區工人中央要求通過社會革命、用社會集體財產取代私有資產等必要手段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和社群主義社會。這項聲明還指出，現政府的“民主文化革命”政策，即安第斯-亞馬遜資本主義，將在跨國公司和寡頭政團面前把玻利維亞引向失敗。

十月指明道路檔繼續述說，厄阿托應當像2003年10月和2005年5、6月顯示的那樣，繼續作玻利維亞二十一世紀革命的先鋒和總司令部。由此來看，來自厄阿托的被壓迫者將領導社會解放過程。檔還論述了行動黨政府所謂的民主文化革命並不能將玻利維亞從帝國主義的專制中解放出來，也無法停止對玻利維亞工人的剝削。相反地，該革命只會使玻利維亞的政體設施，法律體制和民主系統繼續為資產階級和大地主服務。

回想起20世紀早期革命者羅莎盧森堡的洞見，某記者總結‘十月’時這樣說，“如果資產階級的力量和大塊私有財產的政體保持完好無損，那末佔領總統辦公室和取得議會多數也無法服務被剝削者的利益。”它號召工人、農民和本土人民力量面對國家政府，為政治獨立而鬥爭。

當然，這種冠冕堂皇的說辭立場會實際操作到甚麼程度，還言之過早。然而，在行動黨政府的左翼出現了可見的初期騷動，同時，右翼自治力量正在梅蒂亞盧納地區積聚力量。

本文由《反潮流》首次發表

作者傑佛瑞·韋伯是《新社會主義者》雜誌的編輯和多倫多大學的博士候選人。2000年初次訪問玻利維亞，一直積極跟蹤2002年以來的事件。

（衛眾譯）

痛悼陳華老戰友(1928-2008)

十月評論社同人



陳華同志又名康溪,1928年4月出生於江蘇省如皋縣,非常不幸於本月4日病逝,終年80歲。噩耗傳來,同人等深感悲痛。

陳華同志幼年失學。1942年,僅14歲便投身上海新新百貨公司為練習生。當時已爆發了太平洋戰爭,日帝軍隊開入上海租界,使上海像中國其他大部份地區一樣,變成淪陷區,在日帝汪偽高壓統治下,米珠薪桂,民不聊生,人民備受苦難、壓迫,敢怒不敢言。陳同志目睹這種極不合理現實,非常不滿,在該公司一位較年長同事思想影響後,他接受了馬克思—列寧—托洛茨基的理論主張,參加了抗日宣傳和地下革命工作。

1949年,陳同志轉到香港,響應需要「到工人中去」的號召,考入了會德豐紗

廠工作,同時參加各種活動,向工人學習,也教育工人提高其認識。兩年後,他由廠方推薦入紅磡工業專科學院夜校攻讀。畢業後,1966年獲選為同科臨時講師;1968年,該工專提升為香港理工大學,陳同志也升為正式專業講師,直至1992年退休,移民加拿大,前後共執教28年。這段經歷,反映出他勤奮好學,事業有成。

陳華同志在紗廠工作時,與冼寶華女士共事,於1962年結為夫婦,冼女士亦在九龍內明女子中學執教超過17年,兩人選擇了同一的方向:教育人才;他倆生活非常節儉,千辛萬苦仍要讓兒子受到良好教育,前赴英國取得工程學位,返加後供職為工程師。

陳同志以陸人筆名,為本刊撰寫時事評論(編者按:現擇其中一文重刊於後)。他待人接物,和藹可親,在今年初返中國大陸一行時,也特地到上海探望重病垂危的李永爵同志,兩人終於能見到最後一面,讓李同志帶著溫暖的回憶先他一步離開人間。即在陳同志逝世之前不久,他仍然寄出款項幫助國內和香港的同志,表露出他對同志的關懷。

陳華同志長期患有多種疾病,終致猝然倒地,送院醫治無效,從此我們又喪失了一位老同志,再也無可補償了!但他年青時所開始信奉的理想和事業,將會由其他同志們再接再厲,直至成功實現的。

2008年10月10日

我們要民主與自由的香港！

陸人(陳華)

有人認為香港人不應該奢求民主與自由兼得，爲了保持目前的自由生活，應寧願忍受不民主的殖民地統治。據他們說，今日的香港，比較從前的香港民主得多了。如果生活於共產黨的統治之下，則民主與自由兩者皆無。他們又批評另一些人，說他們只要民主而不要自由。

假使確實有人只要民主而不要自由，當然是十分愚蠢的事，其錯誤與只要自由而不要民主並無兩樣。因爲民主與自由兩位一體不可分割；沒有了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

港英統治者御准的「自由」是對有錢的人盡情剝削貧窮人民的自由，是以被統治者奴服於主人腳下爲條件所恩賜的有限度「自由」。在英國，罷工工人的職業受到保障，在香港，工人可以罷工（當然在實行罷工之前還有其他法律上的種種限制的），老闆可以有開除罷工者的自由，因此工人的罷工自由是名存實亡的。在港英統治之下的自由不僅有限，而且虛偽。

在共產黨的統治之下，既無民主，亦無自由，事實昭著，所以被統治者才前仆後繼地進行着民主鬥爭。他們反對官僚統治，要求人民享有基本的民主權利和自由，諸如言論、出版、結社、居住、遷移、集會……等等。他們爲爭取民主權利和自由而流血，而犧牲，說明了一個事實，即，民主戰士們理解到，若要享有真正的自由，就必須擁有民主權利，自由不可能由一個不民主的統治者賜予。

今日的香港人民可以得到較前略多的民主，是由於歷年來香港人民對港英統治的反抗和公開鬥爭所爭取得到的自由，並非港英統治者善心的賜予。若非來自民間的壓力，形成對港英統治者一種威脅，港英政府即連目前這一點點自由也不會容忍的。

如果香港政府是由香港人民自己在完全民主的基礎之上普選產生的人民政府的話，一定會依照香港人民的意願行事，在那種情形之下，人民可以享受到充份的民主與自由。因爲，政府由人民普選產生，人民當然有罷免其政府中某些成員，或甚至全體成員，而進行新的選舉之權利。個人的自由服從於群體的自由，少數人的自由服從於多數人的自由。少數人的意志可以保留，以繼續爭取其他人的贊同，但是在實行方面却要依照多數人的意志行事。這是對自由必須有的基本認識。

港英統治者視廣大人民的意願若無睹，以少數人的橫行霸道壓制廣大人民的民主權利和自由，是鐵的事實，是香港華人用血與淚換來的歷史經歷，若非由於中國政府容忍港英殖民地統治之存在，即使僅憑人民自己的力量，港英殖民地統治也早就被推倒了。

現在英國政府利用香港華人的懼共（這是中共黨官

僚層的長期錯誤政策所造成的結果）心理去和中國政府討價還價，若一旦交易成功，香港五百萬華人的命運就被英國政府作爲祭品奉送掉了（這就是所謂英國政府議做，港英政府應該負責維持一九九七之前香港的穩定條件之一）。看來這個局面即將到臨，只要賀維外相和中國政府之間取得利益上的平衡和交換，一切便可以落實了。且不管中英之間作了多大的妥協，有一點是可以明顯地確定的：將來香港華人的民主與自由定將由英國政府之手斷送，而非由今日在香港爭求民主權利者斷送。到其時，歌頌今日香港自由的人士，將會如夢初醒，發覺原來沒有民主作爲前提的自由，不過是一場騙局而已。當然悔之已晚，自己大可一走了之，置五百萬中貧窮華人的命運於不顧。

五百萬華人爲了要能夠掌握其本身命運，祇有一個辦法，那便是立即勇敢地挺身而出，爭取民主權利和自由。首先是要求立法局、行政局以至區議會等等之成員必須全部民選，任何香港居民年滿十六歲者，即有選舉和被選權，不分貧富，不論男女，不受教育水準的限制。一切選舉費用由政府負責。政府同樣要由香港人民普選產生，人民有選舉和罷免權。由香港人民選舉出來的議會和政府，由中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中國人民代表大會應對香港人民進行爭取和教育，却不應干預其自決之權。

爲了保障香港人民能行使主權和治權合理無誤，應該由香港人民進行民主討論和自由競選。首先應該公開組黨，組織政黨毋須註冊。現時的政府有義務提供一切物質與事務上的協助，作爲其過渡時期的臨時性職責，其責任，僅在於爲香港人民的民主選舉做準備工作，一旦選舉完成，便立即實行移交。如果現時的立法局全體成員是在民主普選的基礎之上產生，則理應作爲臨時議會存在，負擔一九九七之前的香港人民議會任務，在一九九七之前，愈快愈好，進行另一次「普選全權的香港人民代表大會」的選舉，以取代今日的立法局或臨時議會。現時行政局的全體議員當然也應該由香港人民選舉產生，在正式的人民政府普選產生之前，暫時負起管理香港政務的工作，和立法局一樣，準備將來把政府權力移交給由香港人民在完全民主的基礎之上普選出來的「香港人民政府」，在立法局和行政局由香港人民普選產生之日，港英政府便應立即辦理移交，正式結束其殖民地統治，毋須一定等待到一九九七年，毋須等待「普選全權的香港人民代表大會」和正式普選政府產生。

港英政府不肯立即開放民主，便證明其真正的企圖乃是要用香港五百萬華人的自由和命運作爲籌碼，去和中國政府交易，以換取較多的利益，這就是沒有民主的自由之悲慘之處，也就是中英秘密談判的真實意義所在，和英帝國主義者的真正面目與陰險手段。

（原刊十月評論第 88 期，1984 年 4 月號）

(轉載)

六十多年的情誼：悼念趙青音大姐

周履鏘

周仁生同志於2004年1月23日逝世,他的夫人趙青音同志也於2008年12月2日逝世了。我們又失去了一位好同志。趙青音同志是西施故里諸暨人,她的心靈之美是賽西施的。

青音自幼喪父,她的母親艱難地把她 and 一個妹妹撫養長大。她的妹夫是共產黨的幹部,對丈母娘並不好。仁生回溫州後,把青音的母親接到溫州瞻養。我再次見到仁生青音時,仁生的父親已去世,青音侍奉婆婆和母親兩位老太太。後來仁生和青音都親自給兩位老人送終。

七十多年前,我和周仁生就相識。那時我和他都是溫州甌江小學的學生,不過他比我高五年。六十多年前,抗日戰爭中期,浙江紹興諸暨等地被日本佔領,許多學生開始流亡,當時政府為收容這些學生,辦了一些臨時中學。在瑞安龍川一個小山溝裏的浙東第三臨時中學就是其中之一。趙青音和我都是那所學校的學生,她比我大幾歲,我們曾在豆燈下情同姐弟似的共讀。周仁生在這所學校任英文教師,我們受仁生的影響,接受了托洛茨基思想。抗戰勝利後,我們都到了上海,1947年周仁生和趙青音結婚,我和趙青音都參加托派多數派的sy組織,成為理論水平很低、工作能力不強的托派。1949年底,周仁生、趙青音、我及我的妻子錢慧初,到福建海澄中學任教,又共同一起生活三年。到了1952年12月22日,全國肅托大逮捕,我們同時被捕判刑。周仁生被判無期徒刑,我獲刑七年,趙青音五年,後來周仁生被押到上海,與鄭超麟、尹寬、喻守一、籍雲龍等關在提籃橋監獄,我被送到內蒙古勞動改造,趙青音在福州勞動改造,從此我們天南地北,彼此音訊全無。

在福建被捕時,周仁生和趙青音的兒子

僅二歲,成為無依無靠的孤兒,由一位好心的婦女領養。1956年趙青音提前釋放。她當然

知道周仁生被判了無期徒刑後,今生團聚是沒有希望的。只要她與周仁生離婚劃清界線,還能重返學校教書,否則就是生活無著落的守活寡。趙青音毅然選擇了後者。她從福州去海澄,找到兒子,母子二人經歷千辛萬苦,到了溫州周仁生的老家,從此與公婆生活在一起,代替周仁生孝敬父母,撫育幼兒。加上工作無著落,其艱難就不必說了。最使她難受的還要戴著「反革命家屬」的帽子。後來被安排到街道辦的集體合作單位畫簾社當臨時工,有很微薄的工資。

1966年之前,雖受到歧視,生活還算正常。文革開始後,處境就困難了,成為被專政的四類份子,開始是在單位受批鬥,後來居民開批鬥會,趙青音被拉出來批鬥。使她最傷心的,有幾次把她未成年的兒子也拉出來陪鬥。好心的同情者大有人在,但他們也不敢出聲,只能投來同情的眼神。而一些品行惡劣的鄰里,借機欺侮她們,霸佔她的房屋物品。趙青音所受的苦楚,筆墨是寫不盡的。然而趙青音始終默默地忍受著,她內心的信念不變,堅信仁生是對的,她寧可犧牲一生幸福,要把兒子撫養成人。

我流落在內蒙古荒原三十多年後,到了溫州,再次見到趙青音的情景,在腦中始終抹不去。那時仁生已經回到溫州。青音躺在小天井一間小偏屋(可能是舊灶間)的破床上,因為她的惡鄰居欺侮她,手臂被打斷了,躺在床上不能動彈。青音是一位很堅強的人,我從不見她流淚。那次她見到我,突然淚湧出來。這是受到冤屈遇到親人時的真情流露。

1972年9月,周仁生等仍被關押在獄中的12人獲釋放,要在青東農場受管制,但可接待

家屬，趙青音曾領著婆婆，帶著兒子到農場與仁生短暫團聚。1979年7月，仁生恢復公民權，回到溫州老家，雖然一家擠居在破舊的老屋裡，但總算全家團圓了。

周仁生回到溫州後，當然不能再跟人談托派思想，但他以另一種形象呈現其人品，除了從事翻譯外，同時辦溫州獨一無二的義務英語培訓班。大陸改革開放後，學外語之風盛行，各種收費的英語班像雨後春筍湧現，不少英語教師因此發了大財，可周仁生的英語班是公認水平最高的，但不收費。他是以高超的學識和品行樹立形象，在當地享有很高的聲望。

仁生回家後，趙青音又增加了一份工作。她成了周仁生譯著的第一位讀者，又是文稿的校對和整理者。他的所有文稿都是趙青音娟秀的字體抄清楚的。經她手的光是大部頭的書有《先知三部曲》、《彭述之回憶錄》、《托洛茨基文集》補篇上下卷等，總數超過一百萬字。她是默默地、無聲地作出她的貢獻。

最近上海吳基民先生出版一冊《煉獄一

—中國托派的苦難與奮鬥》，書中有一篇談溫州托派的九個人的遭遇。談到曾猛的妻子秋君，王國龍的妻子劉曼庄，周仁生的妻子趙青音和我的妻子錢慧初，認為可以與俄羅斯「十二月黨人」的夫人相比。當俄國十二月黨人反對沙皇失敗後，被流放到西伯利亞，他們的夫人放棄舒適的高貴生活，追隨丈夫到流放地一起過苦難的生活。其實趙青音等人具有對丈夫無限忠誠的品德之外，還多一層對革命理想的堅定信念。

周仁生去世後，趙青音與常人不同，除了悲痛之外，不斷地自責，多次對人談到，她沒有照顧好仁生的生活，未能使他多活幾年，為理想再做出貢獻。這幾年她鬱鬱地生活，反覆自責，還不斷地說牽累兒子的成長深感不安。她在耄耋之年去世，可說是高齡壽終，但我們仍為痛失這位好同志而傷心。

親愛的大姐，你雖然沒有見到革命的成功，但你播下的種子總會開花結果的。



▲ 韶華已逝的周仁生和夫人趙清音

與周仁生同志的情誼

周履鏘

周仁生同志，1922年4月出生於溫州，2004年1月27日逝世，終年82歲。他的去世，對我們的革命事業，是莫大的損失。

周仁生同志是我的良師摯友。記得我七、八歲時進入甌江小學讀書，那時他是六年級畢業班的高材生。我的姑母周蕙芳與他同班，他們親如姐弟，她有時帶我到周仁生家去，所以七十多年前，我就認識周仁生。但與周仁生的真正接觸，是我讀高中二年級的時候。周仁生擔任我們學校的英語教師，一位僅比學生大五、六歲的青年教師，卻以高超的教學藝術贏得了學生的尊敬。他平易待人，學生們與他接觸，總有一種親切感，許多人不知不覺地逐漸受到他的思想影響。我也是從那時開始，受他的薰陶，慢慢地接受了托洛茨基思想的。

在我和他長達七十年的交往中，有時朝夕相處，無所不談，有時關在同一個獄內，卻彼此隔絕；較多的日子是天南地北，音訊全無；經過長達三十多年的分離，重新聚首時，發現彼此仍心心相通。最近二三十年中，我住上海，他居溫州，每隔一段日子，總能有愉快的會聚。平時也是書信來往不斷。積存盈尺的他稱我“小周”，自稱“老周”的信，留下了深情厚誼，也有他深睿的思想浪花。

周仁生同志學生時代成績優異，讀書廣泛，知識淵博。參加革命工作後顯現他的宣傳鼓動能力極強。他的終身事業是革命工作，而從事的職業是教書。他每到一校任教，就能團聚一批優秀的學生，對之施以思想影響，引導不少人最終成為托派成員。他可算是“工作母機”，到處“下蛋”。至於究竟有多少人受他

的影響，我無法數列出來。但是共產黨判他無期徒刑的罪狀之一是：“殘苛毒害大批青少年的思想。”把這句話反讀一下，可知周仁生對宣傳馬克思主義，托洛茨基主義革命思想的貢獻之大了。

我很難寫出周仁生的整個生平，只寫幾點我與他交往的事。

1947年初，我到上海。此時周仁生已先我到了上海，我們又開始接近。他介紹我讀《青年與婦女》（後改名《新聲》）、《求真》、《新旗》等雜誌和一批政治理論書籍。後來帶我去參加哲學班，每週聽彭述之講課。就是在哲學班，我受到了較系統的政治理論教育，成為一名水準不高的“頑固”的托派。

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到1948年底，周仁生在上海活動（一度到蘇北靖江），他是上海托派多數派的活動分子，當時用化名“沈念。”他曾參加1948年的建黨大會，那次會議，托派多數派改名為中國革命共產黨。會後，周仁生參與宣傳部的工作。

上海解放前，周仁生和林松祺南下福建，經廈大教授安明波介紹，去廈門附近海澄中學教書，後來林松祺去香港轉廣州，周仁生被任命為海澄中學校長。1949年底上海市共產黨當局逮捕了托派多數派（中國革命共產黨）江浙臨委成員及幾個一般黨團員，我也在其中。當時共產黨主要鎮壓對象是國民黨特務。對我們這批被捕的托派只是警告今後不許活動，不久都釋放了。被釋的錢川、丁毅、劉毅去了香港，我南下到了周仁生任校長的海澄中學任教，在那裏一直到1952年12月22日全國肅托大逮捕，三年內我與周仁生朝夕相處，

親密無間地生活在一處。

周仁生在福建，改用諧音周任辛，以後一直用這個姓名。

福建海澄中學，原是一個縣的一般中學，周仁生接任後，以其非凡的才能，三年時間，將之辦成一座在閩南頗有名聲的學校，（現在是省重點中學龍海二中）培養的學生中不少人後來成為很有成就的人材。1952年我們被逮捕後，共產黨當然要大張旗鼓地召開大會，宣佈我們的罪狀，要學生和我們劃清界線。我們想像中，當年的學生，一定是很痛恨我們的。可是後來我們得知，學生們非但不恨我們，反而還懷念我們，一直在尋找我們的下落。大約在十多年前，周仁生後來教出來的一位學生考入廈門大學，他把周仁生的近狀告訴已經是廈大教授的當年海澄中學學生時，他們竟將之當做特大喜訊轉告海澄中學老同學，從此當年海澄中學的不少學生與我們書信不斷，甚至還有人專程到溫州看望周仁生。可見“老百姓心中有桿秤”。

1952年12月22日，全國大肅托，我們都被捕了。當初各人都是單獨關禁的，彼此無法來往，連放風見面的機會都沒有。1954年下半年陸續宣判，在福建，周仁生被判無期徒刑，我和趙養性、黃禹石等被判7—15年徒刑。不久，除周仁生外，其他三人都被送到內蒙古勞改。後來到內蒙的三人調散了，我成為孤單的一人。毛澤東的共產黨1952年處理托派案時是不公開的，秘密關押，秘密審判，我被送去勞改時，不許與其他犯人談案情，我完全是孤立的，但這樣反而可以不用自污，不須“觸及靈魂”。

我於1979年12月22日刑滿釋放，但不許回家，仍被強迫留在內蒙勞改隊留場就業，實際上是由勞改隊轉到勞改局管理的勞改就業單位，繼續受管制，等於變相勞改。與勞改隊不同的只是每月有二十多元工資。當地人稱為“二勞改”，而且判刑勞改是有期限的，“二勞改”是無期的，也就是由“有期徒刑”

轉為“無期徒刑”。這樣我在內蒙又當了二十八年“二勞改。”1961年開始，我每隔二年有探親假，一次我回到上海碰到姑母周蕙芳，她告訴我，趙青音住在溫州仁生老家，與公婆一起生活。還聽說周仁生關在上海監獄。1972年周仁生獲釋，1979年回到溫州，那以後我每隔二年回溫州看望父母，都與仁生會面。1967年，我退休回到上海，與仁生恢復接觸，書信來往不斷。周仁生王國龍每隔一、二年到上海看望鄭超麟，鄭老1948年前我就認識，周仁生介紹我與喻守一、黃鑒銅、李培認識。1993年李培去世，鄭超麟處於無助的狀態下，周仁生希望我去幫助鄭老，於是我與鄭老建立了親密的關係，我與鄭老相處的情況，我已在《意因同志》文中敘述了。

周仁生回到溫州後，主要從事托洛茨基著作及有關著作的翻譯，先後翻譯了多伊徹的《先知三部曲》的第二卷，布魯耶的《托洛茨基傳》的三章，《彭述之回憶錄》第一卷，《托洛茨基文集》補遺二卷，還譯了許多短文。同時從事義務英語教育。

周仁生的不少譯著，亦有我的參與。我的英語水準沒有達到能獨立翻譯的能力，但可以幫助他校對、查找資料等。周仁生翻譯《彭述之回憶錄》時，遇到最大的困難是專名詞的翻譯。彭述之的女兒將彭的口述譯成法文出版，現在由法文譯成中文，就會出現音同字不同，甚至相差甚遠。周仁生手頭又缺資料，我就為他擔當這方面的工作。例如回憶錄中有一節：He Minfan----湖南第一位共產黨人。周仁生把He Minfan譯為何明凡。但打了一個“？”。幾十年來在共產黨的宣傳下，湖南共產主義運動的第一人當然是毛澤東，那還有何明凡？我請教了幾位歷史學教授，都不知道何明凡其人。後來從劉少奇三大卷年譜中查得He Minfan應是賀民範，姓名三個字都不同。類似的人地名很多有同樣的錯誤，我盡可能的查找資料，請教學者，給予訂正。又如引用《嚮導》等雜誌上的文章，由法文轉譯過來，非但

不是原文，甚至連題目也意同字不同，承王觀泉教授將其珍藏的《嚮導合訂本》借我，使我得以改正。

書成後謀求出版沒有成功，我想到先出電子版，我將第一二章在電腦上打字出來，我於2004年1月帶了一、二章的列印件，到溫州與周仁生商量。1月26日下午，我去看望周仁生，他臥在床上，精神尚佳，能與我像平常一樣談話，我詢問他是否可以先將《彭述之回憶錄》印幾十本列印本，當時周仁生對我說：“一切由你自己決定，不要再問我了。”我向他告別時對他說：“我過二天就回上海，火車票已買妥，明年再來看你。”他說：“明天我要到醫院抽腹水。”想不到當天下半夜，他就與世長辭了，他對我說的“一切由你自己決定，不要再問我了。”竟是他的最後遺言。

仁生去世後，我退掉已購的火車票，參加周仁生追悼會後才回到上海。接著我就著手完成仁生未完的工作，首先將《彭述之回憶錄》第三至第六章打字出來，交香港印幾十冊徵求意見本，我在上海複印了幾十本，寄給學者和老朋友。想不到這項工作還起了作用。

為緬懷周仁生老師，我收集他的文章，編成《周仁生文存》，我寫了《周仁生同志傳略》和周仁生年譜，2005年在香港出版。書發出後反映很好。

周仁生譯畢《彭述之回憶錄》後，就專注於《托洛茨基文集》補遺的翻譯。這套文集共12卷，收集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法國、挪威、墨西哥時期的文章，（已單獨成冊出版的《俄國革命史》等未收入）美國開拓者出版社出版，出書後又發現一批托洛茨基的文章，編成補遺二卷，周仁生最後幾年專門從事這二卷的翻譯。周仁生去世前不久，曾來信對我說：他已譯完《補遺》。對於這項譯事，我一直沒有參與，他也沒有將譯稿寄給我，我以為，他早已將譯稿全部寄給香港朋友了。

後來香港來信，才知周仁生並未將譯稿寄到香港。於是我與趙青音聯繫，尋找仁生的

譯稿。原來補遺上下二卷，上卷的上半冊周仁生譯，下半冊由仁生的學生虞君翻譯，下卷周仁生親自翻譯。我打聽到虞君可能曾將譯稿輸入電腦。幾經周折，終於從虞君處得到譯稿，於是我製成了光盤寄到香港，還自以為完成得很好。

2005年我得到了托洛茨基文集補遺的英文原版，我一對照，大吃一驚。原來虞君的電腦中保存的名為補遺上下兩卷譯稿，實際上只是上卷的上下兩半部分。也就是我作為兩卷寄給香港的譯稿，只是上卷的譯稿，根本沒有下卷的譯稿。我再請趙青音尋找，她表示實在無力了。無奈我於2006年親自到溫州，到周仁生家中，我和趙青音二人，從仁生的遺物中，終於找到了下卷的大部分譯稿，其中一部分是趙青音抄正的，大部分是仁生的手稿，密密麻麻地寫在學生用的練習冊上，共有二十多本。可能只有趙青音和我二人能全部認清，此時，趙青音已無力再謄抄，我將之帶回上海整理。我化了一年多時間與原文對照，將之輸入電腦，個別缺譯的部分盡可能補譯出來，最後製成光盤寄到香港，總算了卻了一個心願。

為了紀念周仁生同志，我勉力接過他未完的工作，僅以上述幾件事的完成，以誌對他的緬懷。

寫於2008年8月



緬懷李永爵同志

周履鏘

革命者在進行地下活動的時候，互相之間雖然在一起，彼此之間常不交往。我與李永爵的關係就是這樣。從 1947 年開始，我與他曾一起聽彭述之講課，每週一次是雷打不動的，期間有一次參加葉家花園的戰後托派大聚會，我的記憶那次聚會，是借用給劉光和魏秋開結婚派對的名義。後來我把此事寫進回憶文章《聽彭述之講課》，永爵看了以後哈哈大笑，說：“你參加人家的婚禮，竟把新郎新娘都搞錯了。那次是我與羅麗萍結婚的名義。”可是“特殊的婚禮”主角卻是老頭彭述之，和一位越南的同志，大家都聚精會神地聽他們講話，根本不注意新郎新娘。

當我與永爵再次會面時，已是 1987 年我從內蒙勞改單位回到上海以後。永爵比我早幾年回到上海，當他與妻子羅麗萍團聚時，已經步入花甲之年，他們沒有子女。當我重晤李永爵時，羅麗萍已病逝了。他的住處離我家不遠，一間不足十平方米的破屋，一架破床，他獨自蟄居在那裏。

李永爵理論水準比我高，文章也寫得不錯，他還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他能排練指揮歌詠，還是居委會的文體委員，專教老頭老太唱歌。畫藝雖不很精，但喜歡露一手，李培和秀雲結婚時，永爵畫了一幅“晚晴”祝賀。

李培去世後，我和李永爵輪流去幫助鄭超麟。後來永爵住所拆遷，得到的拆遷補助款全部給了羅麗萍的侄子，自己搬到李培的住址，與鄒秀雲分住兩室。秀雲一再對我說，他們只是朋友關係，我從不問這些事。直到他們住到一室，我也不問一辭。我每到鄭超麟家，一定要到秀雲與永爵家，有時在他們家吃飯喝酒，秀雲總是熱情相待。

幫助鄭老的工作，永爵與秀雲在生活方面的照顧比我做得好，我在整理文章，與外界聯繫方面比他做得多。鄭老是少數派的領袖，李培去世後尚有少數派葉春華住在鄰近，可是幫助鄭老的卻是兩個多數派成員。

在與鄭老相處的七八年中，我與永爵幫助鄭老是盡心盡責的。（但期間永爵受到葉春華的暗算，我當年曾將經過寫下來，但從未示人。現在我也年老多病，也許有朝一日就會死了，現將當年寫的附在後面，供少數朋友看看。）2004 年我家被強遷，我家搬到浦東，離得遠，鄭老也去世了，我與永爵的見面就少了，只是通電話或發 e-mail。秀雲患心臟病，永爵患前列腺病，他們多次住院。後來永爵病情日益嚴重，到 2006 年經多方檢查，最後確診為前列腺癌，且已到了晚期。他的最後二年，病魔纏身，在痛苦中熬過的。

永爵自從接受托洛茨基思想，為革命坐過日本憲警的牢，蹲過國民黨的監獄，最後被共產黨關押了三十多年，可說一生坎坷，歷經苦難，但始終堅貞如一，無怨無悔。晚年他曾笑著說，他一生有二次關鍵的選擇，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一次年青時父親要他留在海外，他選擇了回國。另一次是 1949 年，他與妻子羅麗萍身在香港，他們卻選擇了返回大陸。

1948 年下半年至 1949 年，有一批已經到了香港的托派，全國解放後卻相繼離開香港回到大陸，主要是當時在香港受到英國帝國主義的打壓和就業生活困難，又見到共產黨取得全國勝利，認為返回大陸可能對革命有所作為。據我所知，有喻守一、謝山、林松祺、李永爵、羅麗萍、黃禹石、陸績、曹惠白等人。到了 1952 年 12 月共產黨在全國大肅托時全部被

捕，後來判刑時，非但沒有因回國參加革命工作而減輕，反而以“潛回大陸進行反革命活動”而加重，喻守一判無期徒刑，黃禹石、李永爵十五年，沒有一個逃脫厄運。南方被捕的都集中到武漢勞動改造。期滿後還不許回家，直到 1983 年李永爵和姜君羊才許回家，但沒有退休勞保，每月只給 45 元生活費，他們幽默地說，只夠喝開水的錢。生活全靠親友援助。即使如此，他們仍樂觀地生活，常說要多活幾年睜眼看看世界的變化。永爵平時寫些回憶文章，十多年下來積了不少篇，親自編成一冊，書名《坎坷》，已在香港出版。

2007 年他的病情加重，國外朋友知道後，紛紛寄錢給他治病。一次老李打電話給我，對我說，他已將過去寫的除收入《坎坷》之外的文章編成一冊《夕陽紅》，已交香港出版，書出版時他可能已經死了，囑我以後代他分發。又一次打電話對我說，康溪要從國外回來，到時約我聚會。2007 年底，永爵病危住院，要我立即通知康溪，囑他到上海後先找我。我立即發 e-mail 給戈兄，請他轉告康溪，戈兄回

信，康兄已經動身赴大陸了。我猜想永爵住院後，住處沒有人，康兄無法見到永爵了。

我家發生變故，家務纏身，我未及到醫院看望永爵。我家 2008 年 1 月 2 日搬家，原有的電話停機了，寬頻轉移還未接上。永爵恰在此時去世，秀雲及朋友一直聯繫不到我。待我知道時，追悼會都開過了。這是我終身的遺憾。後來我去看望秀雲，她告訴我永爵最後病況，還對我說，康溪找到醫院見到永爵了，二位戰友，終於見到最後一面。

近年來，周仁生、胡振東、劉平梅、周冀甌、姜君羊、章宏業、李永爵等相繼逝世，他們都是無愧的戰士。老一代的相繼逝去，是無法抗拒的自然規律，可喜的是第四國際依然存在，而且不斷壯大。去年我整理周仁生翻譯的《托洛茨基文集補遺》的原稿，最後一篇是托洛茨基被刺後的最後一句話：“我深信……第四國際定將勝利……前進。”錄此句以告慰逝去的先輩。

寫畢於 2008 年 9 月 5 日



The State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

-- 60 years after the "Universal Human Rights Declaration"

Zhang Kai

2008 is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Universal Human Rights Declaration", and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China's endors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Pac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However, China's human rights conditions have little improved. Dissident Liu Xiaobo and Beijing scholar on constitutional affairs Zhang Zuhua were arrested for their promotion of "Charter 2008".

Charter 2008 consists of 19 points, including the revision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removal of clauses that are incongruent with the principles of people's sovereignty;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free from intervention of the party; the army to be under the state rather than the party, and the army to be loyal to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State; safeguard of human rights, and no-one should be subject to illegal arrest, detention, interrogation and punishment; abolition of labour re-education camps; full universal suffrage; direct election of the state president; rural-urban equality and abolition of the existing dual rural-urban residence scheme; 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formation of parties; freedoms of parade, rally, demonstration and expression; separation of the judiciary, executive and legislature; democratic election of the legislative bodies, etc.

Charter 2008 was signed by over 2000 famous personalities in China. They include Mao Yushi (Beijing economist), Sha Yexin (Shanghai playwright), Liu Shahe (Sichuan poet), Bao Tong (Zhao Ziyang's former secretary), Ding Zilin (mother of a June 4 victim), Liu Xiaobo (Beijing

writer), Zhang Zuhua (Beijing scholar on Constitution), Xu Youyu (Beijing philosopher), Zhang Sizhi (known as conscience of Chinese lawyers), Li Pu (former deputy director of New China News Agency), Yu Haocheng (former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of China Law society), Jiao Guobiao (former associate professor of Peking University), Ren Duguang (former deputy director of Research Division of the CCP Central School), Li Datong and Gao Yu (journalists).

At the same time, over 100 people gathered for a sit-in outside the Foreign Affairs Ministry in Beijing to demand the government's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The petitioners included senile women, holding placards that demanded attention to illegal arrests, forced acquisition of land, abuse of power of local cadres, compensation for grievances, etc. Some held the photos of their relatives who had been beaten up in labour camps. The Beijing police initially demarcated a protest zone for the petitioners, but when the numbers increased, the petitioners were eventually taken away in buses.

Hu Jintao, the President of the State, has made proclamations in recent years about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In a recent letter to the China Human Rights Research Society, he said that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had taken as an important principle the respect and safeguard of human rights, and such clauses had been written into the Communist Party's Constitution and the PRC Constitution; he claimed that a new chapter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of China's human rights had started. (Wen Hui Pao, 12 Dec 2008)

Yet, in actual politics, there are numerous instances of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Apart from the arrest of some signatories of Charter 2008, the mass media have also been subject to strict control.

It was reported that a number of media workers have been blacklisted by the Central Propaganda Office, and will be put under strict monitoring and control. The newspapers include the Southern Urban Newspaper, the Southern Urban Weekly, and the South Wind Window in Guangzhou; New Beijing Daily, Yanhuang Chunqiu, and China News Weekly in Beijing. The list also included 15 active journalists, such as Jiang Yiping, the Chief Editor of Southern Weekly. The reasons are reported to be the government's fears for the possibility of serious unrest due to various sectors in China being affected by the current global economic crisis. Furthermore, 2009 is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PRC, and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However, the efforts of the people for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have never stopped. On the one hand, the growing social polarization and social injustice have caused the people's struggles to be more frequent and more intensive. At the same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has been an impetus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The spaces for the circulation of news, information and views have expanded. The monopoly of the party newspapers has been seriously challenged. Now, any local news of significance is carried as headline news in the internet, and hence widely known not only within China, but also internationally. Indeed, with China's internet users reaching almost 300 million, which is over one quarter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the monopoly of the bureaucracy over information and public opinion is seriously undermined. This is undoubtedly conducive to the advancement of the human rights of the Chinese people.

20 Dec 2008



Hong Kong	2	Unite to act against layoffs and salary reductions	Zhen Yan
	4	On the 2008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s	Jun Xing
	5	My Propositions (reprint)	Leung Kwok Hung
	6	People's Legislator reporting to you (reprint)	Leung Kwok Hung
	7	CUHK Student newspaper wins the court case	Jun Xing
Macau	8	On Article 23 legislation in Macau	Wei Bo
China	10	The state of China's human rights	Zhang Kai
	12	The root of the toxic milk case	Zhang Kai
	14	The realities of China today	Hart-Landsberg Martin
	23	China's "market reforms": a Trotskyist analysis (reprint)	Workers Vanguard
International	31	Japan's self-defence guard armed with historic view of the Yasukuni Shrine .tr.	Zhao Jing
	33	Japan's organized crime by the police	tr. Zhao Jing
	34	Attending Yahoo's 2008 shareholders' meeting	Zhao Jing
	35	Policy inclination of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Zhao Jing
Special Pages on the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Crises			
	37	Their Crisis, Our Consequences: Is this what 1931 looks like?	Charlie Post
	39	"The climatic crisis will combine with the crisis of capital"	François Chesnais
	44	"The crisis is combining with the climate and food crises"	François Chesnais
	45	Toxic capitalism	Michel Husson
	52	Report o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François Sabado
	60	Savage Capitalism - the Ecosocialist Alternative	Socialist Resistance
	72	Why Eco-Socialism today?	Joel Kovel
Special Pages on	74	The Epic Struggle of Indigenous Andean-Amazonian Culture	Hugo Blanco
Latin America	77	Opportunities and obstacles in Venezuela	Stuart Piper
	78	On Recent Developments in Venezuela	Noam Chomsky
	81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xperiences in Ecuador, Venezuela and Bolivia	Eric Toussaint
	85	Paraguay: victory of Fernando Lugo and new space of struggle for the Left	H. Richer
	88	Bolivia: Transition on Hold	Jeffery R Webber
Obituary and	96	Obituary on old militant Chen Hua (1928-2008)	October Review
Memory	97	Appendix: We want a democratic and free Hong Kong (reprint)	Lu Ren (Chen Hua)
	98	Remembering Zhao Qingyin (reprint)	Zhou Lüqiang
	100	Friendship with comrade Zhou Rensheng (reprint)	Zhou Lüqiang
	103	In memory of comrade Li Yongjue (reprint)	Zhou Lüqiang
Article in English	105	The state of China's human rights	Zhang Kai

十月評論 2008 年第 2/3 期合刊 (總第 225 期)

目錄

香港	2	團結起來行動 遏止裁員減薪.....	振言
	4	2008 立法會選舉評議.....	軍行
	5	我的主張(轉載).....	梁國雄
	6	平民議員向您交代(轉載).....	梁國雄
	7	《中大學生報》獲平反 言論發聲自由齊爭取.....	軍行
澳門	8	簡評澳門第 23 條立法.....	微波
中國	10	《人權宣言》發表六十周年看中國人權.....	張開
	12	毒奶害人 禍根何在?.....	張開
	14	中國現況.....	哈特-蘭茲伯格·馬丁
	23	托洛茨基主義關於中國「市場改革」的分析(轉載).....	斯巴達克派
國際	31	以“靖國史觀”武裝起來的日本自衛隊.....	趙京譚
	33	日本愛媛縣警察當局的組織性犯罪被揭穿.....	遠山裕樹
	34	出席 Yahoo 雅虎 2008 年股東大會.....	趙京
	35	《華爾街日報》的政策取向.....	趙京
經濟與生態	37	他們的危機，我們的苦果——這是類似 1931 年的情況嗎?.....	查理·波斯特
危機特輯	39	“氣候危機將結合資本危機...”.....	法蘭歌思·切斯奈斯
	44	經濟危機、氣候危機和糧食危機.....	法蘭歌思·切斯奈斯
	45	毒性資本主義.....	蜜雪爾·胡森
	52	關於國際形勢的報告.....	法蘭·薩巴多
	60	從生態社會主義批判野蠻資本主義.....	社會主義抵抗
	72	爲甚麼今天需要生態社會主義.....	喬爾·柯維爾
拉丁美洲專頁	74	安第斯亞馬遜印第安文化的壯麗抗爭.....	雨果·布蘭哥
	77	委內瑞拉的機會和障礙——革命鬥士聚集在加拉加斯.....	圖爾特·皮伯爾
	78	對委內瑞拉最近發展的評論.....	諾姆·喬姆斯基
	81	厄瓜多爾，委內瑞拉和玻利維亞當前經驗的特點.....	埃裏克·山特
	85	巴拉圭：盧戈的勝利和左派鬥爭的新空間.....	雨果·理奇
	88	玻利維亞：停滯的轉型.....	韋伯爾
悼念與回憶	96	痛悼陳華老戰友(1928-2008).....	十月評論同人
	97	附錄：我們要民主與自由的香港(重刊).....	陸人（陳華）
	98	六十多年的情誼：悼念趙青音大姐(轉載).....	周履鏘
	100	與周仁生的情誼(轉載).....	周履鏘
	103	緬懷李永爵同志(轉載).....	周履鏘
英譯	105	The State of China's Human Rights.....	Zhang Kai